

## 权 利 声 明

对从博库网([www.BOOKOO.com.cn](http://www.BOOKOO.com.cn) 和/或 [www.BOOKOO.com](http://www.BOOKOO.com))下载的作品，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博库公司(BOOKOO, Inc.)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OOKOO, Inc.)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OOKOO”，“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BOOKOO, Inc.的商标。

## 目录

权 利 声 明.....	1
目 录 .....	2
序 言 .....	6
第一章 “ 站在百老汇 ” .....	8
第一首英文诗.....	8
房东爱德.....	14
独自过春节.....	18
爱德的故事.....	24
第二章 我身兼三职.....	29
菜单小姐.....	29
罗得岛聚会.....	37
小镇创作假.....	43
永别方老.....	47
最好的诗“ 做爱 ” .....	49
家住布鲁克林.....	56
第三章 漫漫的夏天.....	64
约会王孙.....	64
毕加索的光彩.....	71
舞台风景.....	75

第四章 触摸乡愁.....	79
亲吻加拿大.....	79
庞德与佛堂.....	83
这世界不能没有我.....	87
开始我的传说.....	92
香香诞生.....	100
第五章 初识马克.....	108
我成了指导员.....	108
初识马克.....	118
“ 校长社区服务队 ” .....	122
马克身缠三件官司.....	123
爱，血，冷，美，黑.....	136
第六章 倾听大萍果.....	142
替查理打工.....	142
马克，马克.....	149
读书时代.....	160
人生的背景.....	165
第七章 送 别.....	175
迈阿密之旅.....	175
回到从前.....	186

悼念吴健雄.....	191
查理的政治观.....	197
快乐春假.....	209
第八章 超现实的“小手指” .....	217
小手指.....	217
要回国了.....	222
在美国庆祝香港回归 .....	229
捡便宜租房.....	234
第九章 我会倒下吗？ .....	236
艾瑞克夫妇.....	236
歌舞升平的夏天.....	239
受不了的苏菲.....	249
我要倒下了.....	254
致信江主席.....	259
打 击.....	263
第十章 最好的毕业论文 .....	279
网络讨论江主席.....	279
“向日葵婊子” .....	283
最棒的诗诵.....	299
第十一章 艺术永恒.....	305

最后的写作课.....	305
克林顿，So what? .....	308
我成了一个新人.....	309
华裔生活.....	316
体验声音.....	324
荣誉人物.....	329
麦丽萨和中国女儿.....	335
艺术永恒.....	341

## 序 言

我想把这本书献给一些青年人，那些曾经和我一样迷茫和奋斗过的青年朋友。我想告诉你们，梦想并不遥远。

有的朋友对我说，你来美国几年，得到的东西比别人十几年还多。这话可能对，也可能不对。因为，到美国来，不论你的父母在中国干什么，不论你的家庭地位如何，贫富如何，应该说，每个人都是从头开始。只要你努力，加倍努力，学应有的本领，每个人都有机会，竞争也是平等的。

在纽约地铁里唱唱歌，为人消磨时间，你会得到回报。但是美国社会也是残酷无情的，露宿街头，绝没有人会问你一声。无论在哪儿都一样，人生必须努力，加倍努力，而不是投机取巧。我们必须懂得感激，感谢善待我们的人；懂得回报，回报给予我们机会的社会。这样，善待我们的人会更加友好；造就我们的社会会更加公正。即使犯了错误也没关系，因为你是无辜的，因为你太年轻。当你经过一定时间的人生之旅，你会懂得宽容自己，善待自己。

读书期间打工和毕业后当记者，我见到过各种各样的名人，从总统副总统、主席总理，到市长部长大使、诺贝尔奖获得者；也采访过杀人现场，与最厉害的纽约警察打过交道，住过破旧肮脏的穷人区，穷的时候连一张一块五美元的地铁票都舍不得买。这些经历不但没有妨碍我在纽约学习，反而加快了我认识生活、刻苦学习的

速度。遇到的人和事与在中国一样，有的很好，有的很糟糕，提高了我看待生命的觉悟。

现在回想起来，一切都发生得那么快，以至于回味无穷。当初的变化之大，大到你来不及想它，感受它，它就出现了。然后又很快消失了。

但是，任何经历过这些的人都会明白，人生其实没有什么可畏惧的。这本书就是这样的一部表白。

在此，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是他们给予我生命；我要感谢我在纽约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是他们给我认识美国、认识自我的机会；我要感谢我的朋友们，他们给予我的关怀和帮助，让我学会珍惜自己，热爱生命。

## 第一章 “站在百老汇”

### 第一首英文诗

站在百老汇大道上  
每个人都忙碌着，专注于自己  
而不是你或我  
赶着去上班，或赶着回家  
没时间想别人  
想老得克萨斯或父母  
这条路通西休斯顿，这条路通坚尼路  
不必操心  
每件事物都各就各位  
每个人在这儿都有一个机会  
作一个自我  
不必管他人  
除了自己。

这是我来美国写的第一首英文诗，也是我平生写的第一首英文诗，它作为我在纽约大学学习写作专业交的作业，题目就叫“站在百老汇大道上”。

上个礼拜一我上了第一次课，用的是一首译成英文的中文诗，



我的导师金耐尔课后对我说：“我喜欢那首诗。但在课堂上我没说，因为，那是翻译诗。从今以后，你要用英文思考，用英文写作。”

接着在礼拜五他让我去他办公室，找我谈话。

开始我还真有些诚惶诚恐，不知道该谈些什么。好在老师平易近人，既友善，又慈祥，他一开口就问我这儿的一切还适应吗，我点点头，说还行。随着他就很仔细地翻着我送给他的中国山水明信片，说他80年代应中国作协邀请访问中国，见了艾青等人。后来他因病，放弃了去三峡旅游提前回美国了。

“真的？”我一下子兴奋起来，“我就是来自三峡地区的。我们三峡是世界闻名中国之最的大峡谷。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我的家乡有柑桔藤椅竹席三峡石还有红叶皮革丝绸神女峰……”

这时，长着大鼻子大脑袋的教授正笑咪咪看着我，待我停下，他说：“你是我们专业有史以来招收的惟一的中国学生。我们就是看中了你的独特的文化背景，希望以你的优势影响别的同学。我们很重视中国的传统。”

一提到影响，我就焉了，我连英文诗都写不了，还影响别人呢，别给中国人丢脸就算上帝保佑了。但为了他这句话，我在纽约的第一个周末，除了房东带我在市内游了一圈外，连行李都没来得及清理，就憋了两个晚上，才憋出了这首诗。

当我在课堂上读完了这第一首英文诗后，一直没人说话，我心

里开始发慌了。我紧张地看着同学们，感到热。他们大多穿着衬衣或薄衣裳，我穿的是一件出国前芹姨和她同事给我连夜赶织的纯毛高领毛衣，室内的暖气一烤，从里往外直冒汗。里面穿的也是一件带领的厚针织衣，活像个套中人。

看来，我的美国同学们恐怕从未读过如此简单的英文诗。除了一种瞬间印象还有什么呢？我忐忑不安地等待宣判。

好一会儿，班上惟一与我同样黑眼睛黑头发的华裔同学山德娜才开始发言，“邵薇，如果我没听错，你是用英文写的这首诗，那我要祝贺你了，我用中文说句完整的话都困难，别提用第二门语言写诗。我们曾谈到你用中文写作然后译成英文，你感到有些东西在翻译中失去了。但在我看来，你的英文写作不如你的想法那么成熟。”

紧跟着同学们接着山德娜的话纷纷说开，总而言之，大家都一致认为，能把一首英文诗第一次表达得如此完整，已是很不容易了。

当然，也有人问，诗中的“老得克萨斯”为什么会是“老得克萨斯”？有人说我用一种讽刺的语调在评价一种文化，有人说不喜欢这个结尾。我觉得美国同学们说话怎么这么直率，完全没有我习惯的“温良恭俭让”，开始听起来很不入耳。



在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出生地

下课前，同学们把写了评语的诗稿交回，我立马翻出金耐尔用铅笔写的意见：

有些好句子。但我们没有读到你——作为个人的东西。

山德娜住在我附近，所以我们约好放学后一起回家。

我第一次见她时好激动，以为遇上了阶级姐妹，结果她一开口艰难地用中文发音说“你好”时，我才发现她是个冒牌货。她的祖母是中国人，到了她这一辈已经变种了。除了她的黑头发短得与我的相近外，我们之间找不到任何相似之处。但她对我热情友好的确胜过了别的美同学。

正因为这种八杆子也打不着的阶级情，我像遇到亲人似的很信任她，给她讲了一大堆困难。她倒利索，“你呀，只管写出好诗来，多读，别的课应付过去就好了。我就希望自己毕业有一部像样的诗稿，然后找地方出版。那就是你进这个专业的目的。”

“以后你想做什么呀？”

“当诗人呀，我喜欢。我男朋友也喜欢。”

“你男朋友干什么的？”我刨根问底。

“他外州经商，每个周末来看我。”

当她听说我是拿的全额奖学金时，非常东方人式地体贴，交待我说：“不要让别人都知道你拿的全奖，他们会嫉妒。”山德娜解释，几乎每个美国同学包括她自己，都是存了很久的学费才能进纽约大



我自己过生日

学，有的人借贷了很大一笔钱，有的人打两份半工，有少数同学还是全时工作。难怪我们的课都在晚上呢。

2月7日是我生平第一次自己过的生日。一个下午我都坐在窗台边，看外面的雪地、车道，即兴写了一首诗：“致母亲，在我的生日”。没有母亲，人生的酸甜苦辣从何而来？

雪开始溶化，气温在零度左右，暖气可开可不开。我打开一点窗户，呼吸这难得的自然空气，凉浸浸的，吃冰棒似的，透骨的爽快。

去见金耐尔时我带去了昨天在家憋出的几首诗“我窗台的三只鸽子”、“白雪”、“九月的信”。

看了这几首诗，他看着我说：“我总算放心了，它们比你的第一首英文诗长进了一大步。那首‘站在百老汇大道上’只有印象，没有感情的东西打动人。我甚至开始怀疑把你从母语的环境中提出来，是否是个错误？”

我心里一惊，莫非他们已经对我失望？这个老师好像比我还想得多，他这么操心为什么？

金耐尔的时间很宝贵，我们班的所有人都将毕业，每个人都找他谈论文，每人半小时，我每次占的时候都超了，下一个同学都等在门口了，我才起身和金耐尔拥别。每次他都紧紧地拥抱我，不说别的，只要我多读，多用英文，查字典，并借了我一本硕大的《美

国（文化）遗产字典》。

从金耐尔的眼神中，我读到一些焦虑和期待，让我有些震动，作老师的如此，我还有什么别的不能豁出去？

这两天冷得很，尤其是那风，像个调皮的孩子张着冰冷的手脚就要往你身体里钻，吓得人缩手缩脚的。

上完“写作课”，快11点了，山德娜、丹尼尔、卡罗和我去附近的一个酒吧，我照例要了一杯可乐，他们喝啤酒。坐在吧台黑乎乎的桌子旁，他们几个人不停地说东说西，我有时真佩服美国学生能讲，课堂上从不缺乏自告奋勇拼命发言的人，反过来，课堂上的这种活跃气氛也就成全了我这种又害羞又不能说的。

要不是等山德娜一块儿回家，我早自己回去了。为了安全也为了节省一块五毛钱的地铁费，只好听她瞎聊。她又在讲她的猫，山德娜说她和男朋友做爱时，她的猫就蹲在旁边看。

卡罗很可爱，问：“那你不觉得是在与两个男性做爱？”

山德娜的猫是雄性的。听她这么说，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总想和他们谈点正经八百的问题，问他们今后想做什么。

“做什么？做诗人呀，还做教授，像金耐尔一样。就非常满足了。”山德娜的执著让我很感动。我在中国的诗人朋友可是躁动得多，评论家也是。

从他们口中，我才知道金耐尔是美国非常知名的诗人，获过好

多奖，包括普利策奖和全国图书奖。

我大吃一惊，真的为自己孤陋寡闻而惭愧。一定要去图书馆把金耐尔的诗集借来看看。

## 房东爱德

我的房东爱德是个对东方人和中国人有感情的美籍老人，并自称为作家。

我搬到他家的第一个礼拜，他就开始对我进行启蒙教育，关于纽约，关于艺术。周六爱德带我去看了一场现代舞表演。

爱德说，他是这家小剧场的小赞助人，每年捐他们100块钱，几乎每个礼拜都有免费票。我一听别提多高兴，马上觉得每月550美元的高额房租得到了补偿。我从小就喜欢京剧和川剧，喜欢那全面的歌舞和故事。

爱德也很高兴，遇到知音似的。他太太爱米莉就不喜欢，只是偶尔去看百老汇歌剧什么的。

我一听还有百老汇歌剧，又激动了，说下次我也去。

爱德答应下周去老人俱乐部看看最近是否有票。有时他有票没人去看也是浪费。

到了我们住家附近的七大道二十三街，就是著名的舞蹈剧场实验室。爱德数家常一样给我详细介绍。别看这是一个小型舞蹈剧场，世界各地的年轻舞蹈团都会争相在这里表演实验舞蹈。能在这个剧

场演出的已算有一定的水平，如观众反应很好，就会继续演出，还有宣传，还有可能被推上百老汇。观众中时不时会有百老汇的导演或经纪人，他们一旦发掘出好剧目或出色的表演团体或个人，演员就有可能一炮走红，摆脱穷艺术家的命运。这是纽约成千上万呆在东村西村待成名的艺术家的梦想。



房东爱德的最大一间屋是我在纽约的第一个家。摄于1996年4月

“所以，年轻人都想住在西村，这里的房价自然也高了。不过，邵，”爱德诚恳地说，“我真的没多收你的钱。你住的是最大的一间屋，里面一切都是我儿子用过的，连小彩电我也舍不得扔。”爱德随

时都不忘感化我，让我一定要明白他租房给我不是图的钱。可我也明白，不为钱，他又何苦自己住小房子，太太住客厅，让一个陌生人到家里？但爱德是一个讲感情的人，我得领他的情，有时还得陪他聊天，还得让退休老师的他教我学英文。

他继续讲：“里面还有一个小画廊。表演开始前，有一些咖啡甜点之类在画廊的桌子上，一个小木箱供观众自愿投钱，一块，五毛不等。每次我都早来喝咖啡，这儿的咖啡很好。”他眨眨左眼，秘密似的。“不过，今天你第一次来，待会休息时你吃一块点心。我出一块钱，请你。”

小剧场里的座位坐得下100人左右，从低到高往后排，舞台

与观众席平行。第一排的人与表演者非常靠近，连汗毛都看得清。爱德说他总坐第一排，有时还有裸体表演。我暗笑，他也笑。

演出开始了。是一个来自新英格兰的七人舞蹈小组。

三女四男，身着工装，没有更多的装饰，舞蹈动作简单有力，如何为钱拼命工作，机器拼命运转。有小银幕展示各种工人运动的场面，演员手拿一纸板挡住脸，上面出现一些人头在演说：“我们中间是谁在为别人干又脏又累的活，得到了什么报酬？是谁在干轻松愉快的活，又得到了什么报酬？”最后团结一致，在一种现代音乐与古典音乐的混合之中达到和谐创造的境界。

这不是和中国三四十年代工人闹罢工一样吗？敢情帝国主义的美国也有无产阶级，也闹工潮？

演出完毕是讨论，演员们坐在台上，听观众提意见或建议。

星期天中午爱德又带我去著名的林肯表演中心听音乐会。

我们坐车从著名的四十二街经过，停在中央公园附近。爱德一会指着我们路过的某栋楼说，这是A B C美国广播公司，这是《纽约时报》，这是百老汇歌剧院等等。很多欧式建筑都在100年以上。

爱德与爱米莉真是一对奇怪的夫妻，两人除了吃饭在一块，平时在家都各干各的。房子的卫生也是各管各，去洗衣房也是自己去自己的，爱米莉周末休息就自己去海边玩，两人很少一块儿活动。



爱德有一次抱怨爱米莉买的东西他吃不惯，就掏了20元钱给她，让买点他喜欢吃的火腿和熏肠。

我问他为什么还掏钱，他说，爱米莉住在他的房子里，什么也不管，只负责买吃的。他的退休工资得付每个月几百块的房屋维修费、水电气费，还不算小儿子在日本留学的开销。这个家要不是他省吃俭用，像他们那样都过摩登日子，得去讨口。他很节俭，平时什么都舍不得花，电视也很小很旧。我们一块出去，他买杯五毛钱的咖啡都得咕咙半天。

我问他要不要我帮他屋子吸尘时，他好像吃惊地问我，你愿意吗？

“没问题。”我挽起袖子就干开了，他的房间比我的小很多。

我吸尘时，爱德打开衣橱，给我看里面的衣服，说这些布衬衣都是20多年前的，遇上打折时买回来，穿也穿不完。不过，它们的质量好，现在的东西又贵又差。我知道爱德喜欢社会主义，动不动就说，我要还年轻，就去中国。看病不要钱，否则，一辈子存的一点钱，到老看医生也看没了。

“不是有保险吗？”

他说保险只是一部分。我告诉他社会主义也在改革，不完全是他想象的那样。

他喜欢亚洲喜欢中国，有一次，我听他屋里传出中国音乐，敲

门进去，他在看中文电视台的文艺节目，一群红衣绿裤的少女在跳舞，民间舞蹈什么的。他看得专心致志，我问，你看得懂吗？他说懂，你看她们多高兴，多漂亮。打扫完卫生，爱德放了一盘饼干在厨房的桌上，请我吃。我拿了一堆在中国的照片给他看，我外公，我妈，我芹姨和她的孩子表妹表弟。看了一会，爱德说：“邵，我看你可以做明星呢。”

我笑了，知道他有东方情结。他说别笑，我说的是真的。你看你很上相，脸和脖子的骨架线条很好，又年轻，这就是美。

## 独自过春节

今天是中国的大年初一。

早上 6 点 4 5 就起床，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1 2 点钟一到，我就赶紧给家里打电话，拜年。拨了近 2 0 分钟才通，电话那头已经叫叫嚷嚷在祝我春节快乐。我依次给我 9 0 多岁的老外公、我妈、我芹姨、舅舅舅妈、小妹、小弟纷纷拜了年。我准备打 2 0 美元的电话，可以通 2 0 几分钟呢。

几天前收到家信，有外公的、妈的、芹姨的、妹的。外公的信里夹了十块钱，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薇孙女：你来信报到平安，以发财兴旺安定为好。当地生活是否习惯？最保重身体长寿。在外面不可放松要有知心朋友相互照顾。耍朋友最着重考虑性情好。你是邵家高尚人才全家光荣，全

体带动向前。压岁钱少，立在快乐。祝你春节快乐。康宁言。九五年元月十七日。

电话中千叮咛万嘱咐，外公的耳朵还好，听得见我要他保重身体的话。他还说，听得真切，好高级哟！

我听见妈妈在唠叨莫说了莫说了。气得直嚷，妈，你别管，让公公和我说。

中午，我沿着百老汇大街，从二十几街出发，到四十八街移民局办我的社会安全号码，相当于中国的身份证之类的证件。这是到纽约后人人都建议我需要立即办理的事情，以后开银行账户、打工等都离不开它。然后，一路走走停停，一直走到一百多街的哥伦比亚大学，花了差不多4个小时，去听晚上7点的一个演讲。

我之所以选择走路，主要是因为百老汇太重要了，它贯穿曼哈顿南北，犹如一条动脉血管，纽约的历史，社会变迁大都发生在百老汇大道上，沿街集中了华尔街、歌剧院、林肯中心、中央公园等代表纽约的著名景观。

在中城一带集中了美国100多年来的娱乐发展史。建筑典雅欧化，有些外表旧损的房子一打听原来是有名的剧院，某某大师在这儿表演过成名作，让人大吃一惊。不同的剧院以其上演不同的名剧为其招牌，像“猫”是在百老汇大道与五十街的冬宫剧场上演；而“西贡小姐”是在百老汇与五十三街的百老汇剧院上演等等。在

一些大牌明星招牌中，我一下认出了在“音乐之声”里扮演玛里亚的朱里亚·安得鲁斯，她在著名的百老汇歌剧“维克多·维克多里亚”里扮演女扮男装的国王。听爱德讲，朱里亚的嗓音仍属一流。我来过几次的林肯中心就在六十多街。

我和爱德去林肯中心听音乐会，坐在音乐厅里，让人感到自由平等。听完音乐后，有时表演者还和观众讨论，偶尔还有小酒会，人们一问一答，非常融洽。我更深地体会到，在纽约，再高雅的艺术也还是人的艺术。即使是穷学生，可以买便宜如十美元的票，位置是差些，但音乐厅的设备好，远一点也无所谓。

百老汇沿路上有很多新鲜的小铺小店，我都进去晃一下。书店里的杂志也翻一翻。渴了舍不得买水，得找公共饮水处。

在纽约能学的东西真是太多。我有时觉得自己就是一块干瘪了太久的海绵，拼命地张着嘴四处吸收一切可能的东西，怎么都觉得不够。

我终于从赵毅衡编译的《美国现代诗选》中，查到了金耐尔。其中这样写道：金耐尔是60年代成名的新一代诗人。大战复员后，他进了由著名评论家布拉克墨尔主持的诗歌讲习班，开始诗歌创作生涯。50年代他在法国教书，深受法国现代诗歌影响，他抛开新批评传统，转向惠特曼和威廉斯。1960年他的第一本诗集就表明他从独特的角度走近了美国当代的“开放体”诗歌潮流。金耐尔

在 60 年代群众运动中似乎比其他诗人活跃，他是反越战诗人联合会主席，也是种族平等大会的成员，曾因民权游行而被囚禁。60 年代中期以后，金耐尔的诗风趋向一种略带抒情的风格。但他的大部分作品中半吐半露的感情与复杂的象征纠结在一起。金耐尔自称是在内心荒莽的黑暗进行探索，而大自然则充满了我们难以理解的意义，因此也有不少论者认为他应当归于新超现实主义诗派。金耐尔也是个勤奋的翻译家，他译的法国 17 世纪诗人维庸的诗集得到很高评价。

看到自己教授的作品被翻译成自己的母语，我一下子好像对他亲近了许多，也似乎理解了他对我的期待，他对我的民族情感的尊重。

读完中文不够，我又查看美国的一套权威选本《当代美国诗选》。里面有一张他的照片，由他女儿毛德所拍。他那爱尔兰人的大鼻子，大脑袋，在我眼里是智慧是慈爱。之所以知道毛德是他女儿，因为在赵毅衡的选本里，选有一首金耐尔给毛德的诗：

“……而她，刚生下，/ 她唱，她哭喊，/ 她开始写这篇文章，她的头发 / 抽出嫩枝，/ 当她初次跳到地上，她的牙齦发芽，/ 烟雾依然附在 / 她的脸上，她把手 / 伸到父亲的嘴里，一把抓住 / 父亲的歌。”



我的导师金耐尔先生，他是美国诗歌

在书后的介绍里，我知道了到 199

4 年为止，金耐尔出过 1 2 本诗集，有 5 本译著，还有小说和访谈记。他先后毕业于普林斯顿和罗切斯特大学，获奖学金去了巴黎。曾在美国海军服役。在中国和欧洲广泛游历、教学。1 9 8 3 年以《诗选》一书获全国图书奖和普利策奖……

我忽然想起金耐尔在写作课上朗诵诗的情景。他总是微扬着头，双手放前，一字一顿，清晰有力，那神情像面对上帝和深爱的女人似的。每个音发出来是那么富有情感和男性的魅力。我听同学们说过，金耐尔是美国诗歌界最有名的美男人，多少女人爱他。我说，他的确惹人爱呀。我的意思是说他值得人爱。我的同学们都笑起来，说我也爱上了他。

上个礼拜五与他见面时，他说，我们要表现人性中痛苦的丑恶的，让人不愉快的经验。那些美的忧伤的东西已经太多了。

有一次上课，他照例带一首自己的诗请我们评价，题目叫“半夜的大便”。开始，我不知道大便这个词，我就问这是什么意思，同学还笑，有个人给我解释，说是狗屎，粪，我仍不懂，学英文十几年，可从没人教我这种词汇。最后，当我明白时，大吃一惊。那首诗我是后来查字典才明白过来的。我给他写的评语是这样的：用一块大便来象征生命，有意义和无意义的，的确让我震惊。大便在人体体内形成然后被排泄掉，本是一个自然生理过程。作者以此过程比喻生命本身的成长与消亡，却是一个残酷的命运问题。任何一

个人都知道生命的残酷性，但以此种方式表达对生的渴望留恋，我是第一次读到并被它震撼了。这块大便带给我一个重要的信息。

金耐尔是这样写在白色马桶里被反复冲洗却不愿离开的大便：

“我想回去，重新进入 / 生命的轮回，现在，这个时刻 / 当我被化作你半夜的一块大便 / 微笑着但必须在一小时内分离 / 我想。但你不要。请不要……”

写作课上讨论我的“祈求”一诗，我自我感觉不错。爱德也帮我看过，说他非常感动。

但同学们对我诗中的有些用法感到陌生，不理解为什么要那么写。

他们似乎更注重单个词，词的变化，注重语言的可能性，可信性。我的语言不严谨，不耐读，随意性很大，而且，我现在虽然用英文写作，可我的英文与他们的英文是两回事。

金耐尔给我的意见仍然是：为什么诗中只有美的、伤感的，而没有丑的、痛苦的、强烈的、有力的东西？这个题目可以写出很好的诗，可你写得这么忧郁、甜美，这不够，远远不够。

我看着他，怎么越看越陌生，全没有我读他的诗时的感觉。本来自从我用中文读过金耐尔之后，感受亲近了许多。

现在连他都对我不耐烦了。金耐尔一向鼓舞学生，也很给我打气。可他对我的态度越来越严厉。他要读到我写的好诗，可我写不

出来。我的思维还是中国似的，我想的问题，我的好恶观还是中国似的，一旦要用英文思考，语言是一个问题，观念也是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写丑的恶的强烈的打击乐似的，我就这么种人，生成这样了，怎么办？

## 爱德的故事

又下雪了。

爱德和我去舞蹈剧场工作室看演出。这是一出关于移民经验的舞蹈，题为“子宫的迁移”，可能是从家族故事发展而成的。作曲家是一个华裔美国人。音乐混杂多变，爱德说是现代社会的反映。

回家的路上，爱德给我讲他父亲的故事：

“我父亲由英国来到纽约，从事小本的皮件经营，他做的皮带真是好，积攒了一些财产。可他与我母亲关系不好，两人一直不好。我父亲有一个情人，在他临死前，就是这个情人陪着他闭上眼睛，也算幸福了。我要有这么个情人就好了。”

我说：“爱德，爱米莉对你也不错呀。”

“什么叫不错？你还年轻。以为给你做饭就是爱你？不是的。爱米莉以前是不错。后来，两个儿子大了，纷纷离家，各自为生。她便感到失落，对什么都不热心。她的烹调技术不错，可现在，一年也做不了一次正规的饭，平时都拿一些速食打发我。你知道不？我曾结过一次婚，在爱米莉之前。前妻非常漂亮，但狂热崇拜马克



思主义，搞运动。又都在20来岁的年龄，我们只好分手。”

“那你就没有别的好朋友，知心朋友了？”

“有啊，我在语言学校义务工作，有几个中国学生跟我不错，很重情义。有一次，我生病了，其中一个还买了水果来看我，我儿子都没来。小儿子跟我亲，可又在日本。每次打电话就是要钱，要钱。全是爱米莉给惯的。对了，他的太太还是我给找的，就是在这个舞蹈剧场工作室。你不是说我每次都提前到吗？有一次我早到了，两个日本学生坐在门口等票。你知道我常有多余的票，但我从不卖钱，遇到有些穷的学生或艺术家就送给他们。这两个人就和我聊了起来。她们从日本来旅游，听说这个剧院有名，就想看场演出。我给她们票，她们很感激。我说我对你们好，我儿子在你们国家，也希望得到善待。我喜欢亚洲人，我家的房子就只租亚洲女孩。日本人客气礼貌我很喜欢。”

“那中国人呢？”

“我也喜欢呀，你看我就让你住进了我家嘛。我要再有个儿子，就让他娶你。”

“可惜呀，你只有两个儿子。”

“……后来两个女孩中的一个回日本和我儿子好上了。快得很。我儿子可漂亮了，比大儿子好看，大儿子是银行总裁，找了一个印度女孩，我和爱米莉都不喜欢，她只爱他的钱。你不知道，她

告诉我儿子她从小没玩过玩具，他就给她买了一个大玻璃橱柜，放满了玩具。你说疯不疯？他弟弟在日本读书，他从不帮一点。儿子没用，还是女儿好。我这辈子没指望。”

“哎，我也替你遗憾。算了，什么时候你去中国旅游，说不定有人喜欢你呢。”

“那可好，我有个朋友找了个亚洲女人，听说不错的。我以前最喜欢我的表妹。小时候，她很胖，我就咬她，她哇哇叫。后来，我们长大分开了，十多年前，她忽然找到我，说你过去常常咬我呢。我说我很抱歉，可现在你要我怎么办，要不你咬我好了。我们真是亲热。后来她又离开了，这一分别就再没联系过。都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这就是人生，有时越想越没有意思。”

来美国才一个多月，就感觉累得一塌糊涂。睡不好，吃不好，东一顿西一顿，天天吃从国内带的“七叶神安片”，治疗神经衰弱。

爱德总对我说，不要在一天中发愁所有的事。你每天只能做一件事。

爱德年轻时学哲学，讲话也很有哲理，我相信他的话。凡事也会请教他。但我这人好像是个操心的命。脑子一刻不能闲着。总把自己搞得忙忙碌碌，有时也是迫不得已。这不，来美国后，电脑总不能不学吧，不能不上网吧？上了网就跟上了贼船一样，网上无奇不有，总想看吧。找房子、找工作、找对象、找乐子、发牢骚、发

神经，统统网上来。学了这样想那样。

所有的人都说我的房租太贵，建议我另找住处。如果我白天打个半工，或者周末工，时间应该没有问题。我需要有点收入，一是支付昂贵的房租，二来减少家里的担心。要是有点钱，我不但可以在假期出去游山玩水，还可以买电脑写作。需要钱的地方太多，同时，我对校园外的纽约生活有种渴望，我决定在每周3次课之外，找份半工打。说干就干，我买了份（当地最畅销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开始打电话找半工。

嘿，还别说，打过去问都没位置，早被人占了。看来这工还不是我想打就打得了的。

某天下午在家看书。电话响了，“请找邵薇，我是××”。

我吓了一跳。××？诗人，我的哥们忠忠托我带书给他。我还是1985年在重庆读书时见过××。

那一年，他和重庆诗人张枣、柏桦等人来重庆朗诵诗歌。那个时候大学里文学社团活跃的很，我们西南师大有“五月诗社”，重庆有“大学生诗社”，几所大学联合办的，我还当过这两个社团的副社长。想想我就是在那次认识了××，那时的我年少气盛，充满浪漫理想和青春期的忧郁。

那天我穿一件粉红色的风衣，朗诵完后请××给我签名。

他看了我一眼，在我的诗歌笔记本上写下赵××三个字。我一

直保存着，也把他沉静的面容记得牢牢的。多年来，他像个影子一样一直没从我的头脑中消失过。我读他们办的杂志，关注他的动向。

忠忠曾取笑我说，到了美国，先记着找你的偶像潇洒一把。

我们约好××来我住的地方。坐了一会儿，他说，我们出去吃饭吧，看我迟疑，他说，走吧，我请客。

在我们对面的一个小馆，××点了虾，炒菜，面食和米饭。我说，别点多了，他说，吃不了，你拿回家吧，

我不知说什么好。我从写诗以来，就崇拜他诗歌中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气质，他的“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在任何时候都是激动人心的诗句。

我想告诉他多少人在寻找他的消息，多少人等着读他的诗。

但我只问他：“这么些年过得还好吗？”

“在欧洲漂泊了一些年，现在在加州大学一个分校教书。出了几本诗集，英译本。”“家人呢？”“太太和女儿来了，我买了个房子，日子过得正常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心情难平。也许××并不需要我这样想这样说。但我由衷地希望自己青春年代所敬仰的诗人既能在异国他乡也能在自己的国家与亲人团圆。

## 第二章 我身兼三职

### 菜单小姐

一路唱着“红岩上红梅开唉唉唉……”去我家附近的一家餐馆面试。

到今为止，我去了三家要请人带小孩的家庭面试。有一家是一对双胞胎，两个孩子可爱极了。但时间太长，每周有差不多30个小时，有时还额外有事干。

另外的两家人很客气礼貌，但我走后没有消息来，人家问我有经验没有，我说没有。同学们都说我傻，在美国，凡事都说“yes”，就是“是”，“有”要肯定的回答。

这一回，有了革命歌曲壮胆，我见了“妈妈佛”餐馆朱老板一个字不含糊地说了一连串的“yes，yes，yes。”

朱先生问我家住哪？

“不远，就十个街口，对这一带了如指掌。”

“但我们已有足够的小姐和先生端盘子，抹桌子。我看你学生模样又会说，干别的工种怎样？”

“什么工种？总不会让我当厨师吧？”说完，我们两个人都笑了。

“我们餐馆开张不久，生意不饱和。我想请你来每天花几小时

到附近送菜单，尤其是办公大楼和住宅楼，一般这些地方不让发菜单，影响卫生，有些人也烦送外卖的打工仔。所以我看你能说会道，又是女孩子，人家不会往外赶。如果你愿意，我付你每小时 7 美金，怎么样？”

我自然高兴，还不露声色说：“我要干得好就当女招待？”当女招待有小费，而且，过去的留学生文学也多有提到在餐馆当女招待的故事，有的还很浪漫。

“对，只要有空缺。干得好我就给你增加工资。”

我答应明天开始干活。

第一天上班，用这儿的话来说，是开始正式打工。我从中午 12 点干到晚上 8 点。

这一带属于格林威治村，很多咖啡店小酒馆，外加小古董古玩店、珠宝店、旧书店、杂货铺。我串街走巷，进店入铺，专挑我没走过的地方去，游客似的，把好些条街活生生逛了个遍。

有一次，走累了，路边有个教堂，我进去一看，一些人在祈祷。我也坐在后面，低头祷告，差点睡着。

我的第一天工作在新鲜中打发得很快。

开始打工后的一天，与一家房东约好



走街串巷，当送菜单小姐，这是麦迪逊广场

在打工

之前去看房子。单房一间，350元。

约好上午10：30去。可我等了半个小时也不见说好了在楼下等我的房主。过了好一阵子，才听楼梯响，走出来一个打哈欠的男人，说房东不在，他是房客。我问能否进去看看。他用比较含混的福建话说，你要搬来？我们都要搬走呢。

他带我进了门，暗乎乎的走廊紧靠楼梯。楼梯吱嘎吱嘎地响，好像再多一斤就会垮。

男人说：“白天大部分人都出去打工了，晚上回来吵翻天。”

“每层楼有两家人？”因为我看见两扇门。

“两家？十家都有了。”

他开了一扇门。说是门，其实更像一块旧木板，钉钉补补的。小小的门进来是两人宽的走廊，各分三家，共有六家。可能以前是一套两居室或三居室，现在每一间房不论大小都住一家人。厨房在进门的右边，也就是一个煤气灶一个冰箱，墙上挂一个类似碗厨的东西。人转个身恐怕都要打折扣，大转是断断不行的。

厕所呢？里面。我朝前一步，在厨房的一步之远处，一个马桶，黑黄黑黄的。

出来，我在走廊看了一眼，站在惟一开着的一扇门边。里面整个就是一张大床。一个老太太呆坐在床上，她头的上方悬有一层木板，堆着衣服；床面前挨着门是一个桌子，桌上有一台电视背着门。

这就是满满的一间屋了。其余的家当都堆在床上，挤挤的。对着门是一张挂历大的窗户。老太太就头向着窗户发呆。她没有转过脸来看我。

我想，她是太疲惫了，也许一晚上都无法睡觉，只有等打工的一家大小都睡起来走了，她才有这难得的清静打个瞌睡。要么，她是想家了。这么大的年纪，不知还能否再回老家一次？老家再苦再穷，至少是可以好好睡一觉的。与其这样面无表情地过日子，还不如死，这样地死，也是死无葬身之地。

我在混沌的光线下出了这栋楼。我知道我是多么地幸运，我可以选择不住这里。可我还是忍不住掉下了眼泪，还不能在马路边哭，只好哽咽着，一边赶路。

5 5 0 元的房租是贵，但 3 5 0 元的房子也太差了。看来得做好搬出曼哈顿的打算。

从东往西，我得赶在 1 2 点去餐馆拿菜单，讲普通话的厨师说不急，吃了早饭走。

我说：“不了，在家吃过。”

他说傻丫头，干啥吃啥，明天就别在家吃了。早上来，你赶急，我就随便给你炒个面，煎俩鸡蛋吃。当学生身体要紧。

我背着满书包的菜单又开始走街穿巷了。

进商店，笑脸问声好，递上菜单，请他们打电话叫外卖，我们



餐馆价廉物美，免费送货上门，买的多还送可乐、春卷、馄饨汤。进大楼就得偷偷摸摸，趁门卫不注意，钻进电梯，一楼一楼地去，从关着的门缝里东塞一份西插一份。有时遇上人，打个招呼，人家也不刁难。遇上厕所刚巧没锁的，就进去锁上门蹲上一大会儿，算工间休息。

有一家办公楼防火梯的门开着，我进去一看，哈，窗户通向外面一个广场。

广场上几只鸽子“咕咕”叫，我取出我的面包，扔了一小块，它们立马奔过来。我就这么和鸽子们呆了一会儿，歇够了气，又出发。

莽莽撞撞我抬腿进门，手准备往外拿菜单，一个侍者模样的人过来问，几位？

我一看，妈呀，猛地转过身拔腿就往外跑。

这一下我调儿郎当的心情全没了。认真检讨了自己，我开始向西走。住在曼哈顿西边，还没见过哈得孙河。我边走边瞧，看见有缝可钻有机可乘就把菜单打发几份。近码头了，有些修理铺仓库什么的，大多是黑人西班牙人。我不敢笑得太灿烂，提防阶级敌人别有用心。

但这些人也真热心，说，给我们讲讲，你们餐馆有些什么好吃的。我说，吃你个头。然后用英文告诉他们：有芥兰牛、左宗鸡、

宫保鸡丁、鱼香肉，还有回锅肉麻辣火锅酸辣汤。

我胡说八道一气，扔给他们菜单，说，快！趁现在还不到4点，享受中午特价餐。

他们问，明天你还来不来？

你们今天打电话到我们餐馆，明天我一定来。

晚上我回餐馆，老板一张笑脸叫我快吃饭。我知道生意一定不错，盛起饭来也理直气壮，全不管小姐们酸溜溜地说，站了一天，阳光都见不着一丝。还是你的工作好。



在西村一带送菜单，这是一个街心广场

这一段时间，如果有谁看见一个背书包，手拿菜单穿着老蓝色皮夹克在西村一带东店进西店出笑呵呵与人聊天的女学生，那就是我。现在我对西村这一带的街道可熟了，哪条街靠着哪条街，哪里有广

场，哪里有可以钻进去歇气的大楼，哪栋大楼管理严哪栋大楼管理松我都基本知道。

我在西四街的一个拐角处发现了一个书店。为了写一篇有关伊丽莎白·比肖普的文章，我到处查资料。提不出多少自己的见解，还不会收集足够资料发挥发挥。

我把手中的菜单放进书包里，还原成一个穷学生进到店里面。地下室一般的里面放着蓝调黑调的鬼音乐。我拿起一本书，里面真有

我想要的东西，赶紧抄写下来。

路上遇见几个黑人。黑人说，嗨，中国，你怎么样？

我记着别人告诉我的不要答理黑人，尤其是黑少年黑小伙，他们特疯狂，动不动就强奸抢劫轮奸奸杀，都干要命的事。

我理也不理地走自己的路，让他们说吧。心里想，中国，中国，中国在哪儿你他妈知道吗？

顺着七大道往下走，快到中国城的坚尼路了。我倒回来，从西百老汇大道往上走。这一带是著名的苏荷区，听说70年代这里很差，最近十几二十年兴旺起来，满是画廊、画店、古物店、咖啡店。屋价也飞涨，成为纽约一大旅游景点了。

路边有几个黑人在演唱，两男两女，听着不错。可惜没带个相机，拍一些街景，说不定还能卖钱呢。

餐馆里的阿文在我回去的路上遇见了我。他骑车送外卖回来，我们躲在一栋无人看守的楼道里聊天。阿文长得蛮清秀，猛抽着烟。他告诉我他从福建偷渡来美国的，花了三万美金。现在很后悔，和姐姐一家挤在中国城的一套一居室房内，不懂英语，又孤独，在中国的身份也黑了，不能回去。苦闷得让他说着说着差点流



纽约中国城的孔子像前

泪。

我很同情他，但当他约我明天去中国城看电影时，我推托了，潜意识里觉得不踏实。

我们正要起身离开这栋楼时，一个白人住客从电梯里走出来，见满是烟味道，顿时破口大骂，还说要叫警察。我赶快叫阿文。阿文不明白他骂的什么，还走过去说他惟一的英语单词“Sorry”(道歉)，我说别Sorry了，赶快跑吧。

今天实在太累了。送菜单路过家门口就回来休息了一会儿。听厨房的师傅说，送菜单是男人干的活，老板不该让女孩干。又没有自行车，腿受不了，尤其是刮风下雨的时候，裤子湿了，湿气往身体里走，以后会得关节炎的。

晚上上诗歌技巧课，直打瞌睡，笔记也没记，心里开始难过，难道我千辛万苦来纽约就为挣这点钱吗？上一次和金耐尔见面时，我一脸疲惫，谈到纽约生活的艰难。金耐尔问我，除了这些，你脑袋里还想什么？写作，写作。可谁来付我的房租，谁来替我操心下个月的生活？我心里嘀咕着，没敢说出来。为了省钱，我每天中午离家前都大大地吃一碗面条，然后一直要等到晚上或八九点或11点过才能回家吃饭，这些我能说给金耐尔听吗？当然我不是没有钱吃饭，我只是想把钱花在最需要的地方，自己过日子，什么都得精打细算。每次我给家里打电话，我妈妈都叫我别打，别说长了，她

知道我在美国全靠自己，没人能帮我。这些我能说给金耐尔听吗？他70多岁，为了我这个学生，该操的心不该操的心都操了，我只要写不出他喜欢的诗，就算有天大的理由，也对不起他。

回家后感到腰酸背痛，两腿发胀，风里行雨里走，说说潇洒，其实很辛苦。洗热水澡时，使劲冲腰部，直到发麻。贴上膏药。把自己摆平在床上。

算算，我今天干了9个小时，54美元。挣够钱买个电脑，是我的首要目标。

## 罗得岛聚会

这几天去了罗得岛的布朗大学。

前几天老赵从伦敦发了个伊妹儿，说布朗大学要开个文学讨论会，很多国内的作家诗人都要来，建议我去看看，他和虹影可能也去。

我按他给的主办人的电话打过去问了一下，主办人说，欢迎，没有受邀请也欢迎参加。

在布朗大学真见到了一些老朋友，如王家新、唐晓渡、芒克等，老赵他们却没来。令人惊喜的是我第一次遇上了女诗人张真。在重庆读研究生时，我为了撰写谈女性主义诗歌的毕业论文，去全国各地查资料，在上海曾蒙朋友张亮关照。不曾想，张亮竟是张真的朋友，送了我两本张真的油印诗集。

会议主人刚好把我和张真安顿在一家留学生家里住。我便和张真谈论诗歌写作。她在美国留学多年，英文很好。我乐得有人可以请教，赶忙在睡觉前把我的英文诗给她看。



1996 年与王家新、芒克、唐晓渡相聚在哈佛大学

白天，我到处乱串，逮住人就给人家看我的英文诗。他们都是大名鼎鼎的作家、诗人、评论家，正是我学习的好机会。

第一天下午在布朗的报告会上，有作家陈若曦、廖辉英、郑义等发言，还有从卫星转播的英国作家拉什迪，他因为写了《撒旦诗篇》被穆斯林四处追杀，此刻不知在世界的哪个角落被多少卫兵保护着讲这个话。听说他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得像对克林顿那样严密地保护，以防他被人谋杀。

两天之后会议人马移师哈佛。去哈佛的上午是一场朗诵，不管写诗写小说都上台去读几下。我读了我在中国写的一首长诗，不料观众反应很好，朗诵完，一个姓钱的女生跟着我们到了《倾向》编辑部。

她问我，我喜欢你的诗，但你这么写是基于什么哲学意境？为什么这样写？

我说，有时是事先的构思，有没有哲学得问读者读没读到哲学。有时就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她更想不通了。其实我也没想通。

晚上在哈佛住在女生宿舍。那个姓钱的女孩又来了。我拉着另两个作家认真地请他们谈先锋派现代派创作。我说我是的确读不懂，也不想不懂装懂。我崇尚单纯的美学理想，因为我想写好诗，写英文好诗。我一股脑地诉说我在英文写作中的困惑，其实岂止是英文写作，它早就存在于中文写作中了，否则我就不会想到出国学习写作，我想读读那些在中国被当作圣经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先锋派作品。我首先要弄懂，然后写自己的东西。

诗人孟浪是一个可爱的上海人。他语调快速，思维敏捷，说了几大堆，我想我是听明白了。

我觉得自己像站在河边。河两岸是不同的，但要过到河的那头，我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

来纽约后，我意识到我的思维有些问题，我看待事物有些局限。同时也意识到，我过去的写作是多么的随意多么的懒惰。

这样一想，顿时有了病人膏肓的感觉。

在哈佛有一天晚上是台湾驻波士顿文化处的一位处长请客。我最后一个入座，只好坐在处长的旁边。处长一本正经地敬酒，遇上这些作家诗人吊儿郎当，也算没辙了，只好请大家自便自便。

过一会儿，处长说中国内地改革把汉字改得认也认不得还难看，用法也怪怪的，什么都用搞，难听得很。

我在座中最无资历最年轻说话也最无忌。便问处长，台湾人说搞女人用什么字？

一个台湾女作家说，还不是搞。

我们都笑了。天下乌鸦一般黑。

最后一晚上是一位台湾商人请客，在他家里。

他们夫妻在美国呆了十几年，做电脑生意，家是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我们边吃饭边看电视，正好在播台湾“总统”竞选的活动。李登辉在电视里耀武扬威地讲话，说实在，我是第一次看见台湾选“总统”的情景，第一次知道人们如此关注这一历史事件。在中国我们只知道过去国民党是蒋匪是特务是敌人，现在要统一，大家就少骂为佳。我对什么新党民进党所知甚少，更不清楚谁在和谁竞争。一会儿，连战出现了，带着夫人。有人就介绍连战夫人曾是台湾的中国小姐，来美国宣传被在美国任职的连战抢先得手。仔细看一眼，是有选美小姐的风采。我知道中国领导人的夫人中陈毅的夫人张茜最漂亮最有风采。

边上的人就说，这位是刚从中国内地出来的，三句话离不开内地。

我心想，离不开内地怎么啦，又不犯法。

那天从哈佛回曼哈顿，一进岛，我就高兴得像回家似的。看来我是开始对这个地方有感情了。



铁柱，铁桥，牙齿般错落的灰色棕色大楼房，还有河水，我是离不得水的，看着水我就会心平气和。

回来就开始忙。

这两天在地铁口送菜单。老板说，你给这一带的商店楼房都送得差不多了，就不用东走西走了。少干几个小时，从下午四五点开始在这附近的十四街地铁口发菜单吧。

这样一来，我的收入也少了一半。

在纽约热闹的大街上，路口边，到处可见手拿印得稀奇古怪红红绿绿的商店打折券、销售大甩卖等各式宣传单的人，尤其在上下班时，这些人大多是黑人、西班牙人和亚洲人。除了发菜单之外，纽约发的东西实在太多。有些人甚至就将广告牌背在胸前背后，站在街道，不知是否纽约寸土千金，大概实在没有地方安置广告，或者是人肉广告更有效果。

现在我也加入了这个队伍，发菜单。这种活看似简单，不就见人塞一张吗，其实大有学问。有的打工仔闭着眼乱发，不分青红皂白塞给路人，人家转身就扔进了垃圾筒。

我想，我是一个有智力的人，干这个活也要干出点水平来。我看着从地铁出来的人，尽量看出哪些是下班回家，哪些像住附近的，哪些看着像有能力进餐馆的，等等。

我客气地拿着手里的菜单并不急着递过去，先开口，这是前面

一家新开的中餐馆，有你熟悉的可口的中国菜，也有本店特色菜。欢迎你去餐馆，也欢迎你打电话，我们免费外送。

谁都知道，每个餐馆都免费外送，但多少都会给笑脸送美食到家门口的打工仔一两元小费。我这样说让人更感到悦耳一些，服务周到一些。有的人会友好地伸出手，有的人会客气地摇摇头，偶尔会有人迫不急待地要一张，得救似的，想必是饿坏了。

昨晚刮风下雨，我的裤腿都湿了。风大，我只好站在地铁出口处，趁人少时就走进去躲一阵。

一个脏兮兮烂眉烂眼的黑人在墙边小便，见我，莫名其妙地愤怒起来，非要我给他菜单。我怕他有爱滋病，退后几步，想离他远点，不料他扑过来要抓我头发，我吓得叫起来。一个路过的男人，五六十岁吧，凶



1996 年第一次到 Lenox 镇写作假

凶地责骂那个黑人，直到黑人悻悻地离去。男人和蔼地对我说，别怕，啊！

我心慌慌赶回餐馆，老板问，你在哪儿发菜单？

地铁口啊。

他冷漠地说，那里，我根本没见着你。

老板在我临出门时叫住我，说我的工作没有成效，一塌糊涂，我气得问他说要给我加工资，但从没再提过。他说他从没这样讲过。

我恨不得给他两耳光。

辞职吧！这样下去，我愧对关心我的金耐尔和我自己。

## 小镇创作假

这个周末我们在麻州一个小镇子度创作假。这个写作计划是一个爱诗的旅店主人作为礼物赠送给金耐尔的，每年让我们诗歌专业的人来此度假写作。那个周末旅店不对外，全部腾给我们，让我们写平时在繁杂的世事中写不出来的好作品。

下午我搭乘大巴到了这个叫 L E N O X 的小镇。沿途经过了许多美丽的地方：小河流，古堡，还看见了一条冻河，一座红色的桥。到达我们住的布鲁克农场小旅店，按照事先的安排，我进到二楼我的房间。别的同学都是两人或三人一间，有的还要带睡袋。按他们的说法，是我运气好。

这是一间单人小客房。虽然我也从电影中见过高级昂贵的宾馆，可像这样美丽温馨如童话般的小屋还是第一次看到。干花，小油画，蕾丝花边的用品，壁炉上的诗集，桌上随意摆放的旧杂志，仿佛有音乐沙沙响，河水哗哗流。

我走到窗前，外面是通向林间的小路。有的同学散步。我听见他们在草地上走路和说话的朦胧的声音，天上飘来似的。

晚上靠在床上，夜晚那个静啊，好像你能上天入地，听见空中神奇的声音。其实，你除了风声，再听不到别的了。

我不想睡觉，觉得在这样的夜晚睡眠是浪费，辜负了大自然的赐予。我拿出笔记本，计划写两首诗。

想到白天看见的那条冻河，是与长江不同的，与哈得孙河不同的。它被冰所封锁的河下面一定有鱼有虾，有上游流下的杂物，树枝，有老远老远的人呼唤亲人的回声。我仿佛听见了，从1月2月到3月，早春的气息已经到了。

这么美丽的地方要是和亲人分享该多好。我外公活了90来岁，一辈子在长江边的万县市活动，除了去过重庆，再没出过远门。大山大水虽养人，外面的世界也不错的。

我至今没去过欧洲，但我从书本中早已认识了这个人人类现代文明的发源地。我把今晚这个寂静的夜晚想作是欧洲的夜晚，哈代笔下的乡村的夜晚；或者莎士比亚戏剧中某个人与神对话的夜晚。总之，它是欧洲的。山谷里的小楼也是，偶尔过的车，车牵引的长长的回声也是的。这个新英格兰小小的山地，连山地里的蚊子臭虫，一两声的狗叫，统统都是欧洲的。

这就是单纯的生活。我渴望的生活。

第二天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吃完自助早餐，就是讨论会。拿出昨晚的诗来，读两遍。大家提意见。由于都没有打印出来的手稿，光听不一定全明白。所以同学们都提了些模棱两可的意见，我也就模棱两可地照收了。

中午，我们全体开车出去满山谷地找球场，打棒球。

我没玩过，又自卑又知趣地躲到操场的一角自己荡秋千玩。

不一会，金耐尔在那头用双手拱成话筒叫：“邵薇，邵薇，过来和我们一起打球。”

我也用双手拱成话筒似地答：“我不会玩，算了吧。”

金耐尔仍喊：“你行的，来吧。”



在石码头莫丽家度写作假，右一为爵微儿，右二为莫丽

我只好过去，加入队伍。我木偶似地一切行动听指挥，站哪里，球往哪个方向击，拍子如何把握，几个球下来，我还不错。我们这队赢了，我高兴得手舞足蹈，同学们都笑了。最高兴的是金

耐尔，我知道，他一直暗中注视着我。晚餐是金耐尔和另一个女教授，诗人莎拉·奥茨准备的。

我听同学们说，金耐尔和莎拉就像这个专业的父母一样。他们过去曾是情人，后来不是了。我问为什么？人们说不知道。

晚餐后，是自愿的诗歌朗诵。我高兴地看大家朗诵，没想到金耐尔点我的名，要我朗诵一首中国诗。

我愣了一下，爽快答应了。别的记不住，从小背的李白杜甫总难不倒咱。

我站起来，一字一顿地念开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

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大家使劲鼓掌，说声音听起来太美了。

我得意的很，嘴都合不拢了，心想，他们要再鼓掌，我就来个绝活。唱一首什么“春花秋月何时了”，或者京剧“苏三起解”什么的。

吓唬吓唬美国鬼子。

晚上我写了一首诗，“访列洛克斯小镇——致金耐尔”。

我们在下午的风里玩球

我们在晚上数星星

当小镇的窗户，都关上时

它的天花板可以亲吻低空

我张开我的新眼睛

注视你的脸庞

还是你第一本书中的表情

带着三十年的阳光

周围的树木保护着新鲜的心

有人在火炉旁脚踏着节拍

我们中最年老的人读他的诗

给他的爱人

我们听着

## 列洛克斯离我们真近

## 永别方老

好久没收到中国的来信，今天一下子来了四封。两封朋友的，妈妈的，还有原单位来的。

我惊诧地读到方老去世的消息，哀痛地站在系外面的大学街看着太阳在花花绿绿的人群中发着无奈的光，好像一下子在我与这个世界之间有了一道门，关着的门那头，是死亡。我问自己，人真的是会死的吗？我好像从来都没相信过。我从来都以为我爱的人是不会去世的。从小长到大，我没有一个亲密的亲人去世过。我对死亡的理解是抽象的理解，恐惧也是想象的。



与尊敬的师长方敬先生，如今斯人已去，惟有空叹息，西南师大图书馆

很多年来，我的日记本里夹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少年何其芳的忧郁，是他的也是我们的。谁也无法像我们这些小城人，真正领略远方的神奇。少年的梦是诗的梦，也是忧伤的梦，因为爱就是忧伤。”



1990 年参加西南师范大学校庆

何其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特殊而杰出的诗人，也是万县人，由此我和他及他的亲属有了一份联系，也因此和他的妹夫万县人方敬先生成了老少朋友，方老其时已从我们大学的副校长职位离休。

我做研究生时，迷恋何其芳，读其诗，做其梦；去他的老家，看他的旧居，采访过去曾在万县接待过何其芳的地方官员。

回到学校，我对方老说，我们万县人都很老实怀旧。方老马上说，也有的不，何其芳的陈列馆搞到现在也没搞成，一定有坏人做事不当。方老一贯老少脾气，说话率直冲动，得罪人也让自己伤心。

我在北京上飞机来纽约前，特地给方老打电话告别，请他保重身体，等我以后回国时去看望他。

方老说，看啥子哟，看不看得到还是问题。

如今想来，还是他正确。

方老和很多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人物如巴金、何其芳、卞之琳、臧可家等人交情非浅，但他总是把自己当小字辈看，觉得自己不用功，一生没有成就。香港编的《中国新文学史》认为，方敬和何其芳、卞之琳、艾青等四位诗人在参加革命之前就有出色的作品，而且，他们还是“参加之后仍坚持艺术水准的诗人”。方老在老来离



休以后格外勤奋地写作，八九十年代出了三本诗集，还编有《方敬文选集》。人都说方老不老，诗越写越好。他总是害羞地笑。

方老知道很多的文学趣事，作家趣事，我经常听他讲，听得入迷，这也是文学史的一部分啊。我说，你写下来吧，让我们后人了解历史用。他总说，没时间。

我想，他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卞之琳的《断章》一诗，我读也有类似的感慨。

我们家乡有个诗人杨吉甫比何其芳写诗还早，办学，培养了不少学生，可惜早逝。方老和万县的一些人一起为《杨吉甫诗选》出力，并写了序。有一次，他高兴地对我说，有个马悦然很喜欢杨吉甫的诗，我准备再送他几本。我问谁是马悦然。他说，是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成员。一直在大力推荐中国文学作品。可他从不说马悦然也很欣赏他的诗。我是从别人的文章中读到了。

方老去世了，以后那个美丽的西南师大校园少了一个牵挂的人，少了一个再风尘仆仆地要赶去看一眼的人；少了一个和我坐在红漆斑驳的木地板上谈心聊天、玩米老鼠的人；也少了一个给我讲世事不平的热爱生活的老人；更少了一个让我分享他的人生智慧的老人。

## 最好的诗“做爱”

过去看写留学生的作品，说生活过得又穷又忙又乱，连爱的

感觉，性的感觉都没有了。我现在就是这种全无的感觉。连晚上洗完澡躺在床上多摸自己几下的冲动都没有。每天都累得没睡够似的。心累，装的事太多。

3月无声无息就没了，4月还没有干什么就过了一半。看书也是为了应付作业，第一学期没有几天了。这里的学校5月初放假，4月底就没课了，一放假我就是无职无业无靠的人。民以食为天，我的食在何方？

与金耐尔有一个会面。我们谈到现代诗、写作，及我将来的打算。

上一次，我因为送菜单太累，和他见面时没有准备话题而尴尬万分。从此再不敢没有准备和他谈话了。70多岁的老人，每周花一小时和我讨论，我怎么敢不珍惜这个机会？

所以这次我有备而来。和金耐尔谈起一个我困扰已久的话题：什么是现代？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的诗人的写作要具备怎样的因素才堪称现代？现代人为什么对丑恶的、痛苦的、激烈的东西特别赞赏？

他并不对我的问题作回答，而是说：“你要把你头脑中的情感和思想与此时此刻的生活结合起来，不能一味地写思乡怀旧的诗歌，也不能太依靠传统和忠诚，要创造，在一个没有先例可循的新的领域写出你自己的诗。现代人也讲纯净与真实，但必须先打开你

的所有情感，不要有意无意地隐藏自己。全面回顾自己，包括你的禁区。最真实的就是最重要的。现代人读了上几代人写的忧愁、优美的诗，我们要写点他们没有写过的。”

已经感到有点热，或许春天或许夏天快到了？

坐在家读艾略特的“荒原”，第一次读了几行便开始晕头转向，不断查字典，还是摸不着门，看来名著是要先把人搞晕几次才行。只好又从头读起，再从头读起，再再从头读起。

有一段话我特别感兴趣，“艾略特曾说当他开始写诗时，当时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都找不到能在写作上给他作榜样的人。”也就是说他得摸索自己的路从头做起。

我也向金耐尔提到自己的苦恼。在中国，写诗的人很多，写诗成名的人也很多。我从幼小时背唐诗宋词，读高中写一些押韵的句子，读大学开始写新诗，写了十几年，也乱七八糟发表了很多诗，但我从来没有严肃创作的意识。总怪自己没有才气，写不出像我们四川有些年轻诗人那种才华横溢的诗，只好靠一点点勤奋支撑自己的这种写作爱好。我的很多朋友写先锋诗，我也想写，可写出来没有那种味道。他们看我的诗只会说，不错，女孩子能写成这样已经不错了。或者说两句夸奖的话，并不说，好在哪里，不好又在哪里。我的老师们呢，会觉得有的诗不错，有的诗他们看不懂。

我读研究生时的师兄李震给我的诗集写了一篇长长的评论文

章，里面有严肃的评价也有偏爱的成分，文章题为“还原与超越：无边的女性——邵薇与后女性诗特征”，很多人告诉我这篇文章不错。舒婷的丈夫陈仲义在替舒婷回信给我时，说“舒婷久不写诗了，现在是年轻人后浪推前浪。谢谢你的书。李震的文章不错。”一句没提我的诗如何。他后来在自己的文章里又提到这篇文章。而我自己，对这篇洋洋万言的后女性文章始终没懂得，为什么我还原为什么我又超越？我觉得我还没出发呢。

有一次在一个朋友家谈到写作，我说我喜欢单纯自然的东西，朋友也是作家，在美国呆了多年，说，你还年轻早着呢，先腐朽腐朽再单纯自然吧。我毒辣地想，他妈的纽约能把我怎么个腐朽腐朽，我倒想尝尝。

还有一次，一位旅居美国近十年的女作家约我去中国城见几位老人，他们在大上海餐馆有个聚会。有研究张爱玲小说的哥大教授夏志清、董鼎山，还有另外几位。我们坐下后，夏先生就拿我们开心，在老人面前，尤其在有智慧的老人面前，小丫头，小姑娘只有被取笑的份儿。听说我学写英文诗，他议论开了，问：“在国内读没读过英文诗？国内过去都读译诗，汉译英诗就跟英译李白杜甫一样，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要读原文，读莎士比亚、拜伦。”说完，老先生摇摇头，摇完头，拿起筷子吃青椒炒豆腐干。

聚会出门时，夏志清看看我，又看看同来的女作家，童趣顿生，

说，你看你，刚来，还是一副中国表情呢。

我望着橱窗，笑一笑，是蛮纯朴憨厚的。但只有我知道，那张脸一转身，可能是从陕北高原掉过头来似的，一脸的茫然。我在英文写作中的苦恼，我的厉声尖叫，也是他们这些几十年生活在西方世界的失语，是所有年轻年老，第一代第二代代代相传的华人无法言说的痛苦。

我曾对金耐尔说，我当时要出国，就一个想法，我要写真正的好诗，管它什么派的好诗。我已经感到无路可走了。

金耐尔问我，你现在感觉如何？

不错。因为我是在用英文写，用英文思考，几乎是从头开始，在陌生的语境里，我感到距离的同时也有了自由。思考和胡说八道的自由。这恐怕就是朦胧了。对语言的距离导致了束缚的解脱，这是我现在开始写英文诗的最强烈感受。

金耐尔马上接过话，对，我们要的就是你的这种陌生和距离。

你现在要做的是：打开自己，研究自己。

我们专业举办一个大型的朗诵会，庆贺老诗人斯坦尼·库尼泽的90岁生日。老诗人是纽约苏荷区有名的诗人屋的创办人。诗人屋收藏有很多诗集，诗歌杂志，定期举办朗诵会，是很多诗人常去的地方。

朗诵会在三街与麦克道格街之间的法学院的一个大礼堂举行。

斜对面麦克道格街有一家旧旧的小剧场，以上演尤金·奥尼尔的剧目远近闻名。外面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只有面街的防火梯旧得有些名堂，仿佛在提示曾有一个天才在里面演义过人生。

来了一大堆诗人坐在台上，朗诵老诗人的诗，金耐尔朗诵了库尼泽的一首爱情诗，老诗人自己边听边笑。我是第一次一下子见到这么多的黑的白的美国诗人。看到台上一排的诗人，台下满坐的观众，有的还坐在地上，站在门外，后面有专人在录音摄像，感觉诗还是有人爱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惨。在我们心目中的资本主义国家，有这么多人想当诗人，想得这么专注。包括我的同学们，他们许多人从其它州或外国考到纽约大学来，有的人花掉了多年的积蓄，还向政府借款。在纽约一切都是从头做起，打工，一份，两份，或三份。为的就是要当一个诗人，仅仅是诗人。有的人甚至不在乎能否得到发表或出版。这实在和很多中国诗人不一样。我知道有的中国诗人很年轻就出名了，出版了几本诗集，加入了作家协会，享受到一些作家的特权，然后就以作家的名义活着，却没有了真正的写作。

我带了一首诗去写作课，叫“做爱”。平时都是朗诵两遍之后，先由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讨论，有的意见很有意思，有的也是胡说八道，金耐尔总是最后发表他的意见。

今天，金耐尔第一个开口了，他说这是我这学期到目前为止最

好的诗。因为它写的是自己，自我，性感，现实。诗很短，只有十行：

他从汗水中抬起头——  
把我留在水里  
无底的水又痛又黑  
深深的海水，此刻  
静得像一张没脸的婴儿  
“我爱你，爱”是空屋子的回声  
燃着的烟照着他肩头的星光  
提醒我时间老故事中的某一年  
肉体的搏斗  
是一场自古希腊开始的没有尽头的战争

听到金耐尔的发言，我很惊讶，受到老师表扬做学生的总是高兴的。但这首诗我写得非常容易，自己没觉得好，白天还拿不定主意是否带它去写作课。这也是我第一次写比较大胆的诗，而且是写性，过去我觉得自己没有多少这方面的特别经历，也没多少特别的感受。在我看来，爱情，性，是人类关系中最本质的关系，最体现男人女人之间灵性的关系。但在现实社会中，这历来都不是平等的关系，也是最不单纯的关系。我每次感受最深的是受伤的感觉，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而是这样的关系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必然注定

的。

金耐尔发言后，同学们也说了不少。对诗中有几个词的用法提了意见。

这个礼拜由我提问题。每次写作课的最后十分钟，金耐尔就要求一个事先指定的学生提出他在写作方面的思考或问题。

我今天的的问题是，当你写一首诗时，头脑中首先想到什么？

有的同学认为是主意，想法；有的说是一个词，或句子，然后往下写；有的是先有一个构思，然后写出来，再做修改；有的说头脑里得有音乐刺激等，各说不一。其实，对于我，只要有一张书桌，一个安静的空间就好。

下课时，金耐尔说，中国诗人艾青去世了。他感到非常遗憾，他见过艾青，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 家住布鲁克林

花一周看报纸找便宜的住房。

买了份《世界日报》，上面的广告也是五花八门。有个广告说，征召快乐女孩当室友。

我拿起电话打过去。一个老头接的，说：“想找人做点简单家务，免房租。”

还有这样的好事？老头不愿在电话里多谈，讲有兴趣先看看房子再说。



原来离爱德家不远，太理想了。我当即赶过去。

老头看起来六七十岁，但很精神，和善，穿一身健身服。

我坐下后，他问了一些我个人背景的问题，似乎还满意。

我问他：“免房租要交换什么家务？”

“什么家务？”老头慢条斯理地说，“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儿。每周代买一次日常用品，打扫卫生。”

“还干什么？”我觉得这也太容易了。

老头见我很亲切，就说：“你要愿意，帮我按摩按摩。”

“按摩？”我一愣，还有这等事，我一口回绝，“我可从来没干过这种活。”

“这不是要求，随便你。我看你其实满严肃的，不像表面看起来随和，我不会强迫你的。”老头忙解释，过去有个中国小姐，还是北京来的，很年轻漂亮，干了几个月，回北京了，所以他才重新找人。

“那她干些什么？”

“我们互相按摩呀。”眼看他的手快放到我肩膀上，我一下跳起来，声音发颤地说，“让我先看看房子吧。”

原来，这老头就一室一厅的房子，卧室里有两张单人床，让一男一女住。他说，他晚上都会去酒吧，很晚才回来，不会干扰。

我一下子明白了鬼老头打的什么烂主意，难怪他想找新来纽约

的人。

只有绝望中的人才会上他的当。

终于可以搬家了。离开每个月付 5 5 0 元的地方，到一个只付 3 0 0 元的地方，在布鲁克林，这个地方多好，我还没有真正享受，就要离开了。

之前在学校有三个约会。

一个是与职业办公室的人谈我的简历，他帮我修改提出建议。他觉得我这个专业的就职范围应在文学经纪公司、杂志社、出版社和报纸。一般来讲，找工作的人都要发出几十上百封的简历，然后才慢慢有人要你。

我一听，人都晕了，心想要这样找工作，我都没法活了。我要的只是临时工作。

然后去见了奥茨教授。自从上次去麻州度假认识了她之后，她就对我格外关心。其实她不教我，可能是因为金耐尔的缘故。有天她问我，有没有时间在期末时与她见一次？我当然珍惜可能的学习机会。我们就见了面。我带了“做爱”一诗，想看看她有没有别的看法。

她也很喜欢这首诗，说“汗水——水——海洋”是很联系的意象，把女人在爱情中或性关系中的位置引向更深的思考。

“你要写最内在的情感，与你的中国情结揉和起来。那么，你

就写出了新的东西。”

她打开一个纸盒，里面有很多甜饼，她用面巾纸包了一块给我，说，这些甜饼是送给她班上学生的礼物，学期结束时谢谢大家努力与合作。

我的新房子在布鲁克林。我前后看了多次房，人也看累了。最后找了个便宜的地方。

新房东吉米是从香港来的，开出租车，已经帮我搬了大多数的行李去他家，剩下的小东西我自己分几次捎过去。下午在学校办完事，我去爱德家拿剩下的书。

爱德说，我们还是朋友，你要随时打电话来，有空来玩等等。你的押金我过两天取了告诉你，你来拿，好不好？

我点点头。我一直没提押金，因为有的房东看你提前搬走拒绝还你。爱德是个好人，我也由他决定。

出了布鲁克林地铁站，四周偏僻的破旧的环境，恐怕在布鲁克林这也是较差的地方了。小小的房子一排排的，像墙壁一样把我与它隔的老远。路两旁没有树，光秃秃的砖房，太阳明晃晃的照得人绝望。路上偶尔一两个人，眼泡皮肿没精打采地。地上垃圾狗屎比农村还糟。我从小就习惯了城市，哪怕小小的城市，只要人来人往，有商店，车辆行驶，我就感到心安。现在，安全感没有了，心情沮丧。

和我分租一间房分付 6 0 0 元房租的北京女孩已经住进去了，占了靠墙的床，靠门边的一张是我的。除了一张桌子，房间里就没多余的空间了。整个房间只有一面小窗，我走过去撩起窗帘，以为是天空，不看则已，一看吓一跳。外面是一个灰扑扑的过道，与隔壁的墙只一米左右的距离，墙根下还有一条狗在哼哧哼哧地发怒，找不着债主似的。我马上转过身来，把黑呼呼的窗帘使劲拉拢。

我的行李什么的自然无法打开，把必用品掏出来，其余索性还留在包里，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要搬家。

打开我的电子邮箱，有二十多条伊妹儿。吓了一跳。我在网上可就两三个朋友呀。

仔细看看，才看出名堂来。原来昨天我给一个人发信时，按错了一个 yes 和 no 键，把我的信送到了这个人所在的一个网络上，导致成百以上的人读了我的信。我在回答此人的信中说：“很寂寞，想交一些中国朋友，最好是学科学的单身异性等。”

有的人觉得这样的事新鲜好玩，想与我聊天。有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说他马上要到期回国，我愿不愿意和他交往。有一位老兄更绝，说他的条件都符合，就是结婚了，问我愿意和他交朋友吗？也有人笑我，来纽约不几天，就敢闯到网络上闹新闻。

好在我初来咋到，不懂网事，被网民们给洗刷了一把，也没有感到难为情。不过，我自己也没把这事当真，一时冲动，写了就忘

了，根本没想到真能交上朋友。

心里憋得慌，我又开始写起来：我现在住布鲁克林，环境很差，周围都是打工的人，我很害怕，想与学生住在一起。如有知道租房消息的，请告诉我。

然后送出去，记着按了 yes 键。这次是给所有的人，管它翻天不翻天。

没课也愿意在学校呆着。挨到快晚上了，只好上地铁吧，总得回家。在地铁上，一个女人挨个发一只套着一个小地球仪和铅笔的钥匙链，还带着一张小卡片，写着：我是聋子，我卖这个，请你付一元钱吧。

要在往日，我也懒得理这种事儿，可现在好像有点惺惺惜惺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味道。掏了一块钱给她，随便她聋不聋。

晚上一个认识不久的熟人打电话，他居然也知道了我的伊妹儿，说，这才叫一网打尽，一键走遍天下，没想到吧，来纽约不几天，你就成名人了。

我说，见你龟儿子的鬼，少见多怪。我给你们带来欢乐，得感谢我才行。

早上我几乎是在惊骇中醒来。做了一晚上的恶梦，梦见一个粪坑，脏了我一身。长这么大，好像第一次我感到了害怕。我躺着，想象着各种纽约的恐怖，觉得自己到了危险的边缘。奇怪的是，我

没有悲伤。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安全地活着。

出门时，我把以前在古城荆州买的一个玉观音带在脖子上，不放心，又把一个藏传佛教的微型法器用一根红毛线穿起来挂在脖子上。告诉自己，从现在开始，我要跟林妹妹当初进大观园一样时时处处格外小心。

到学校，打开我的电子邮箱，呵，又有几十条伊妹儿。有一条是反驳我的，说，不想和打工的住在一起，为什么瞧不起工人阶级？

另有一条在反驳他，说，每个人都可以喜欢和什么人住，不喜欢和什么人住。这与看不看得起工人阶级没有关系。克林顿也打过工的呢？是你瞧得起他还是他瞧得起你？人家是学生，刚来，当然学生和学生住好。我们不也会有同感吗？

我看见有人同情我的处境，差点又要掉泪了。

每当消极的时候，我就想，再怎么也要咬牙读完这个书，然后回到老家，与一家人亲亲热热地守在一起。古人说，父母在，不远行。我90岁的外公还在，我也远行，可见也不孝。自己便自怜自艾起来，觉得真是如简爱说的，人活着，就是含辛茹苦。

痴痴地长这么大，除了梦想，我还有什么？

要钱没钱，要房没房。到了30岁，还在为吃饭住房操心，并让一家老小为我牵肠挂肚，不得安眠。我老外公都知道我的房租贵，问要不要家里给我寄钱。我没说，可想，你就是卖了老房子不吃不

喝，也是杯水车薪，没出来的人，没这个概念。不知道消费的差别，钱与钱的差别。

往事如潮，一一涌上心头。最近一段时间来，老感到需要诉说的冲动，长期心理负担太重，现在必须真实地面对自己。

金耐尔这一班 15 个人，除了我，都这期毕业。同一年级的其他人到了下学期又重新选老师，有的同班，有的不同班了。而我一个老同学都没有了，这里很少有中国意义上的同班同学，大家除非选同一门课，有些一学期下来，还不知道谁是谁。

今天上最后一次写作课。我的作业是一首关于纽约印象的诗，恐怕是我住在布鲁克林所产生的不安全感，给吓出来的。但这样的诗我是不希望写的，在我刚来时，电视新闻几乎天天都有关于谋杀的报道，令人触目惊心。纽约不是一个让你轻易产生乡愁的城市，但也不是一个让人亲热的地方。人人都是游客，在这个繁华都市中荡来荡去，一不留神，可能就摔个跟头，或成了名。怎么说，这也是一个偶尔有传奇的地方，有魔鬼的地方。

金耐尔很鼓励我写此时此地的诗，对于这样的诗，他称之为“魔鬼文化”的产物。

金耐尔背诵了一首惠特曼的诗，那么长的诗，他一个字没梗地背了下来，大家使劲鼓掌。这样的诗这样的背诵都是靠的同一种精神。

我知道金耐尔热爱惠特曼，认为他的诗是真正的自我的诗。真正的美国精神的诗。

下课时，同学们都依依惜别，大部分的人要离开纽约。我请他们坐一下，给大家拍了一张照片。

金耐尔也向我道别，他要回佛尔蒙特老家呆半年。他说，邵，努力写作，下学期我回来办事，约你喝咖啡，你可要给我看你的近作。

我使劲点头，心中依依不舍。

### 第三章 漫漫的夏天

#### 约会王孙

第一学期算是正式结束了。好几天没记日记，感觉心都漂了。

我东走西奔想找个打工的地方。这么长的夏天，不挣钱怎么办？

去了世界贸易中心一个中国驻外公司，他们需要一个中英文都好的秘书，什么都得干。地方不错环境也好，一个月 1 000 美元。负责面谈的人讲他过去在团中央还干过，后出来，专门炒股票。但我感觉这个公司什么都在干，旅游、办绿卡、替国内的公司在美国上市等，五花八门。又去了曼哈顿的中国城，听说有很多职业介绍所，我去了几家，都是一些向餐馆提供劳力向家庭提供保姆的地方，



一问，我是学生，又不愿去外州，便不再理我。来求职的大多是福建、广东来的年轻人，我走进去，他们个个盯着，看得人都起一层鸡皮疙瘩。

有一个求职所，工作人员都没有，叫了半天，下来一个人，问找什么工的？回答说，你们在报上的广告登了好几种，现在还有没有？

他说，等等吧，打个电话问问。一去又是半天。

进来一个打扮入时的中年妇女，也来找工的。指着陪同来的英俊小伙子说是她儿子，她们从上海来，一家人都工作，她没事，找点保姆活干。以前有一个工作，干了一天，主人说，你这个样子是做干部的，我们请不起，把她解雇了。

我看这个情形，还是走开的好。没工作就没工作吧，总还不至于挨饿的。

和新室友天天见面，可说的话不多，各自都忙。这两天才得空聊聊天。才知道她是陕西人，在北方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找了什么法子出国，也没读书，也没工作，还四处周游，挺神秘的。

有一晚我们都在家。电话响了，我接的，一个女人怒气冲冲说一个陌生的名字，我莫名其妙，回说，这儿没有这个人。室友说是她的电话，我一听一愣，然后听见她给那个女人解释着什么，有关一个男人。

爱德说对了，他总劝我别着急，会有工作的，说不定，一有有几个呢。

真是这样。昨晚，世贸中心的公司来电话让我今天去上班；有个餐馆也叫我去干；今天回家后，中国城有个律师找我，保证比现在这公司给的多。

我一下子又嚣张起来，天无绝人之路哇！

晚上还收到新认识的王孙从布朗大学打来的电话。他是前几天看了我发出的征友广告好奇来过电话。好在他听起来不讨厌，所以跟他聊了一次。他从台湾来，对内地很了解，听起来蛮具有同情心。今天他打电话问我，周六有没有时间，他来纽约，想请我喝咖啡。

开始热起来了。

按约定见了王孙和他的两个朋友露丝和老甘。那两人是一对恋人，露丝是台湾妹，老甘从内地来。我们一起去西百老汇喝咖啡，我穿一件从国内带出来的20多块钱的旧绛色衬衣，一条牛仔



这是我通过征友广告认识的台湾朋友王孙

裤。露丝穿得漂亮性感，就像台湾电影中的女人。她嗲声嗲气地点了一些洋名字的饮料，说：王孙请客，不要客气。台湾女孩是大方，连名字也洋气。我一直都用中文名字，美国人叫“邵薇”可费点劲，

听来听去成了“小微”。很多女孩都有英文名字，可我喜欢我的中文名字。

我要了杯柠檬茶，心里想，要记着自己付自己的账。

我们坐在凉快的暗暗的咖啡屋，露丝噙着嘴用长长的吸管吸红红的饮料，一边说：“大陆女孩看起来天生丽质，你看她，有点像影星甄珍呢。”

王孙呵呵一笑，说：“莫非咱们遇上大美人了。”

我还不习惯对别人的夸奖说谢谢，反倒心里想，你们算老几，还拿我开心？便琢磨着要镇他们一下。

老甘虽然是内地人，可打来纽约读书，七八年也没回去过，所以他们向我提了很多问题，我便大侃特侃，把我打小就知道的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心里想的统统讲给他们听。

果然露丝和王孙服气地说：“咦，你这人很特别嘛，没见过你这样的大陆留学生呢。不过，你的看法还是共产党那一套，中毒太深。”

看我一副要开战的架式，老甘说，暂停暂停，我们是不是出去逛逛。

付账时，我执意要付自己的，可露丝认定由王孙请客，还把我的钱塞进我的包里。

露丝比老甘矮一截，反把手臂搭在老甘的肩上。走在他们后面

的王孙问我：“露丝的身材好不好？”

“不错呀。”我心想，男孩子问人家的身材好不好，多无聊。可他却有趣得很，接着说：“老甘埋怨露丝的腰腿太粗，露丝以前跳舞的。”

中国城的街道名字都怪怪的，翻译成中文更是搞不懂，王孙说是按照广东话译的，像 Canal Street 译成坚尼路，林则徐雕像外的 Chatham Square 译成且林士果。很多路标都是中英文。

中国城有两个大点的书局，一个是世界书局，一个东方书局。我和王孙去了东方书局，里面主要卖内地的书，不过都很贵。我看了看，还有杂志卖，什么《大众电影》、《读书》、《读者》、《收获》等。不过，看的人比买的人多。让我惊讶的是，里面正播放着《洪湖赤卫队》。

王孙买了一本气功书。我想，这个学物理的，还看气功书？他说什么天体物理与气也有关，反正我不懂。

今天网上一伙人约好去大都会博物馆，有一个“中华瑰宝”台湾故宫文物展。

我与王孙一路走，一路聊天。他看我边看展览还边做笔记，夸我很勤奋，一定是个好学生。

我说都是逼出来的。差得太远了。过去这种机会没有，现在只好补课。什么都想去看，去听，去学，学校的、外面社会的，发

内心的强烈愿望。

“那你小时候，一定很用功了。”王孙问。

“说来别人不相信，我从小就不是好学生，越大越努力。有时想要是从小到大我都能如此用功，那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家人也少操许多心。我外公一直认为我能有今天全靠他的教育有方。他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在‘文革’中也没被革掉。从我读小学开始，他每个月都从微薄的薪水里挤出几块钱给家里上学的孩子们做学习津贴。每人五毛钱不多，可我都拿来吃了零食看了小人书，到没了铅笔橡皮卷笔刀学习用具时，便连哄带骗再去要。我可学就了一套要钱的本领，不惜流泪撒谎。为了那些迷人的安徒生童话呀，打仗的英雄，旧社会的苦孩子们，还有小摊小贩手中花花的玻璃纸包着的水果糖，我可没少投资，上学路上的几个小书摊，我是蹲点最多的，要不是守摊的老头或老太婆催促上课时间到了，我会旷课旷得一塌糊涂。后来知识长进了，就看小说，除了语文和外语过得去，走遍天下也不怕的数理化我是差得没法提。多亏改革，学外语不用数理化成绩，我才钻了政策空子进了大学外语系。我的高考数学成绩考了5分，我还奇怪，问别人，我啥也不懂，怎么得了这125分中的5分？我一个亲戚吃定了似地对人说，邵薇要能考上大学，我手板心炒豌豆给大家吃。如今，往好里想，证明我这人从小好奇心求知欲强；往坏里想，说明我用功没用在正途上。”

王孙听得津津有味，我心想，这是干嘛，诉苦哇，赶快打住。

可他接着问我，那很多内地学生出来都选电脑、工程这些好申请奖学金和好找工作的专业，你会放弃写作选别的专业吗？

“当然不会啦，”我好像受了委屈一样，觉得我辛辛苦苦，别人这样不理解？

我继续说，也许我永远找不到年薪七八万的工作，也许我永远买不起房子、汽车，但我活得自由，干我想干的事。就为了当作家，我整个费尽心思，学习如何表达如何理解瞬间窒息感人鬼情未了现代后现代超现实等等。我妈老说我，别写了，费那个脑筋干嘛？搞得神经衰弱还得看医生吃中药，讨神费力不说，劳命伤财。可妈不知，写不写已经不能由我说了算。

王孙听得傻呆呆，觉得遇到了好特别的人，居然夸我“好伟大”。

晚上我们去了一家川菜馆，叫“五粮液”，据称是五粮液酒厂办的，厨师都是四川召来的。有一次我找工时，找上门，四川厨师很关照，可负责的是这边请的华侨代管，那人没有录用我。

“五粮液”办得很不错，在曼哈顿有几家分店。我来美国还没吃过一顿正宗的川菜呢，点菜时，一个劲地嚷“夫妻肺片，水煮牛肉，红油水饺……”

付账时，每个男士出15块，女士出10块。

这一段忙起来了。每天打完工，就去学校，用电脑，或去图书

馆，总愿晚点回家，回家就睡觉，早上起来就走，不喜欢这个家。

白天在律师楼上班，翻译一个移民案子，是过去国内著名的小百花越剧团的一个演员，作为杰出人才移民的。听说她现在演出很少，平时在衣厂打工。看着她的那些剧照，与这个领导人那个领导人的合影，我也希望她能办成功。不然，她付出的一切太冤枉。

听另一位打工的吕小姐讲，现在国内的很多艺术家到了美国，大多也是在节庆期间做些演出，毕竟观众有限。美国人听不懂，中国人很多又舍不得花钱或没有时间。艺术家们平时就干些餐馆衣厂的活。

在律师楼打工，真可以见到很多新鲜事。我听另一个小姐说，这边从中国偷渡来的兰州人最多，其次是福州、温州、广州。福州人多从墨西哥来；温州人多从欧洲来；广州人从南美如玻利维亚等偷偷进来。一来就到餐馆打工还账，十几二十人挤在中国城的一套房子里，真叫暗无天日。待不好也回不去。有的家里的老婆孩子，跟人走了也只有呼天喊地干着急。有的人在国内当渔民过得也不太差，可一个村一个村地互相传，说在美国能挣大钱。

## 毕加索的光彩

收到妈的信。又在唠叨：年龄不小了，要注意身边的同学，有合适的，也交个朋友，有个照应。注意安全，注意营养等。

可到哪儿去找呢？我忙也忙不过来。过去听人说，很多学理工

科的男留学生在这边不好找女朋友，纷纷回国去找。可我怎么不认识这样的男生？我在英国的一个朋友还笑我说怎么可能没有男朋友？亚洲女孩在美国可吃香。

可我认识的中国人实在不多，有几个也不一定就可以谈恋爱。我还是觉得随缘的好，30年都过来了，急什么急？

而且在美国还不能乱认识人，结交人。我在网络上读到一个故事，说一群人去大西洋赌城。有个男的被一个不认识的女人约出去玩。中途女人说回酒店换衣服，请男的一道，给他一杯水等着。男的再有知觉时，发现自己躺在浴缸里，周围是水和冰。看见一张纸条写着：要想活命，打911。赶快打911，对方问他身上有什么东西没有，他才发现腰上有绷带。很快，他被送进医院抢救，因为他被窃去了一个肾。

是真的吗？

去“妈妈佛”餐馆见那几个每周三聚会的美国人。

前两天，我收到一封信。信签抬头是一个心理医生诊所，信是这样写的：“我是每周三在‘妈妈佛’餐馆聚会的一桌人中的一个。你给过我们四首你的诗，我们看了，觉得它们非常出色，它们写得惊人的简单，又很深地令人感动。你有做一个大诗人的潜质。我们仍然每周三聚会，如果你能够，希望来和我们聊聊。我想其他几人也会给你写信的。”



我都早忘了给过他们我的诗，也记不得给的哪几首诗。这些都不重要，既然他们这么认真，还有心记着，给我写信就说喜欢我的诗，足以打动我了。

下了班，我去了“妈妈佛”。站在门口的朱先生和一个小姐见我跟他们打招呼还有点吃惊。

那几个人早来了，我坐下，点了一份炒河粉。他们纷纷说，都读了我的诗，觉得很不容易写到那样。我说，都是我的教授逼的。其中有一个美术系的教授，也认识金耐尔，说，你跟他学没错。

我们聊了几个小时，他们也给了我一些诗。我说，我现在打工特忙，每周干7天呢。他们大吃一惊，说，你不写诗了？

怎么不写呢，写得少而已。我来这个国家的目的就是写出了好的作品。当然，也希望有机会站在美国的文化角度看待自己国家的文化，多学点。

付账时，我的河粉七块五，负责算账的诗人说，总共60，加小费共70，5个人各出14。我想，这些人喝啤酒吃点心，我为了节约，就一个河粉，也出一样的钱。后一想，这也是平等吧。

算了一下时间，从5月25日起，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8小时，睡觉七八小时，吃饭两小时，坐地铁两三个小时，剩下不到4个小时自由支配，这4小时得用来读书，去学校，干家务活，还与爱德看了两次演出，还要时间记日记，读报。时间精确到每一分

钟，每一分钟都有事情。

昨天又去现代艺术博物馆看毕加索的人物肖像展，据说这个展览是历来最完整的一次。上次来也是趁周四晚上6点到8点这个免费时段，来的都是年轻人，一次却看不仔细，人又多。

毕加索笔下那些女人们情人们，虽然经过了抽象，立体等艺术手法的变形，但那些女人的不幸却是触目惊心的。大部分女人，各具形态和色彩，但每一根线条每一抹颜色都诉说着一个痛苦而压抑的感情故事。我分明看到，这些女人在大师笔下没有真实存在过，她们是大师的毕加索与男人的毕加索在艺术生涯中穿过的景色各异的小巷，不论是俄国的一流芭蕾舞家奥尔加还是作家弗兰西斯科，前者在与毕加索的婚姻末期时，成为一个愁苦的女人，有一张大大的嘴，两个黑洞般的眼睛，坚硬的骨骼，后脊背像一个固执的乌龟壳支撑着一个美丽多姿的芭蕾舞家凄凉的破碎的时光；后者写了一本书，评价毕加索砍掉了他画里面女人们的头颅，使大师彻底断绝了与她的关系。惟一的例外是玛丽亚，她无所求的付出使她在大师的画中幸运地获得些许光亮的色彩，在“带着海滩球沐浴”一画中，她展露了青春而耀眼的女性美。但她在大师的生活中隐没了许多年，甚至在成为母亲以后，毕加索一直对外界封闭她的存在，包括他亲密的朋友都不知道。

我在里面逗留了很久，听见了很多人在毕加索的女人肖像前不

断的唏嘘声，像是在问，伟大的艺术真的需要付出如此的代价吗？

## 舞台风景

又搬了家，这是半年来第三次搬家。布鲁克林的房子住得我胆战心惊，这次搬到了学校附近，在东村，与五个人合用一套三居室，过道里还住了一个福建来的餐馆工。房东是从台湾来的，信佛。

放假了，学校却不会冷清下来。除了夏天修课的人之外，别有另一派风景。

夏天的华盛顿广场热闹非凡，活脱脱一个街头舞台。巨大的华盛顿拱门下，凉爽的喷水池边，有游客在捕捉纽约风情；小孩子们在儿童小乐园里玩耍；小松鼠亮着水灵灵的眼睛互相追逐、打闹，抢着吃路人扔下的一片面包；宠爱的狗也有它的乐园，或者被人牵着四处遛达。无事的人还有附近的居民们坐在阳光下享受着闲适，也可以靠在石凳上打盹儿。学生大多带一张毯子坐或躺在草地上，看书或撩起衣服晒太阳。有些成群结伙的少年，多是黑人，穿着鬼头图案的黑色T恤，戴着或金或银的粗脖链，有的头发竖起来，有的头发染成几种颜色，有的只留半边，像中国“文革”里给“走资派”强加的发型。

周末喷水池没水，就有街头艺人表演杂耍绝活，吞火，抛掷，砍手，切人，你也别管他水平如何，反正跟着观众傻笑就是。除非他请你去和他一起表演，你就得小心了。有一次，一个男的被请进

场中，躺在地上。表演者拿一条黄瓜放在他的裤腿间，先立着做了个象征动作。男的本闭着眼睛，听观众笑，一看，可不干了。好说歹说又闭了眼睛，表演者正要砍黄瓜，他吓得一扑通跳起来，双手护着自己的生殖器，跑开了。表演者只好另请高明。

有时候，会有人若无其事地路过你身边，问，要不要？如果你不懂，没有关系，他会走开；如果你不要，就摇摇头。这是贩卖白粉和鸦片烟。广场上的警察就是冲着他们来的。但这么多的警察也没能阻止生意的继续发展。据说，广场靠南的几个公用电话就经常作为联系业务的工具。后来，这些电话都被改装，贩子们传呼出去后，对方打回来这边电话不响。

有一两次，大白天的，我被问，要不要药？我嘴一撇，没钱。那人说，便宜，一二十块钱一小包。我说，也买不起。他说，没关系，下次吧。

我看看自己，典型的学生模样，也会有人问，可见这个生意做得够仔细了。

前两天看《世界日报》说，今天广场上又开始每年夏天的露天音乐会，还说，去年因为经费问题，停办了一年。

音乐会开始时，夕阳还在树后面，古典音乐的回声悠长，似乎落在草地上又飞起来，环绕着四周不愿离开。在广场的那一边，是更响的一些喧闹和打击乐声，街头艺术家们不甘示弱地敲。

我的前房东爱德与我仍是好朋友。有好的演出他就打电话来告诉我。今天我们去看了了一场百老汇歌剧“西贡小姐”！因为他们老人俱乐部的票有多余。



纽约中央公园湖边

这出剧在百老汇是常演不衰，隔些年换一台演出班子，常演常新。今晚这场的男主角是一个中国人，叫王洛勇。想起在国内看过演留学生的一个电视剧，里面有他。看节目单介绍，他过去是京剧演员。这一点，从他的舞台动作，唱腔功夫可见一斑。他在百老汇能当上第一主角，算是成功者。可我时常在地铁里看到很多中国的艺术家演奏，靠

路人给一元两元的。有一次，我和一位自称咪咪的天津女二胡手聊了起来（我给她一元钱后），她说，白人大方，只要他们喜欢，他们就会给一块钱，遇上善良的老人，最多一次她得了20元。我问她，国内还有亲人没有？“怎么没有？丈夫很有钱，孩子读书，说让我出来闯一闯。只要勤快，我每天也能挣个100元到150元左右。”她的收入还真让我羡慕，只可惜我没有这个专长。临别时，咪咪还给了我电话，说是交个朋友。

爱德说，他过去看的“西贡小姐”是美国演员演这个角色。他们各有所长。

我告诉他，中国的京剧是一门奇艺术，不比百老汇歌剧差，只是用中文唱罢了。

第一次看，我被演出场面吸引，这一次，更注意了故事本身。全剧始终处于高亢的激情中，女主角在自己民族遭侵略而与“敌人”美国大兵相爱产生了负罪感；男主角越南“工程师”的“美国梦”；越南游击队领导与女主角的父母相约后被女主角开枪打死；美国大兵在面对他的妻子与他在越南的爱情之间的无所适从等一连串的故事。这里有种族之间的偏见，战争的仇恨，也有人类在任何情形下无法泯灭的共性。

我喜欢里面的几首歌，“世界的最后一夜”，“我仍然相信”，“你不可以碰他”，“我会把我的生命给你”。

如我第一次看一样，我仍觉得这是个旧故事，装在新瓶子里。爱情的结尾与蝴蝶夫人很相近，女人在爱情破灭后，以身殉情。在西方人看来，这或许就是东方女人的美。但生离死别的爱情，在不可能的战争中，得到这样一个结局，无论东方人或西方人，都是无可奈何的。心都会一样地疼痛。

当然，“西贡小姐”是百老汇的艺术，故事是老故事，东方人的激情加献身精神。但包装是新包装，各种声音、色彩、电、光等现代化的技术都搬上了舞台，还有汽车、直升飞机等，把整个演出搞得活灵活现，不是彼时彼事，而是现时现事，等着自己投入进去。

叫人如何不爱它？

演出结束时，演员们谢幕，一次又一次，先从最小的角色到最主要的角色，全体人员毕恭毕敬，观众激动得真当了上帝一般，热烈鼓掌。有了这样的敬业精神，票房收入才有了保证。

## 第四章 触摸乡愁

### 亲吻加拿大

我失业了，因为雇佣我的那家公司自身难保。约了王孙等几个朋友趁美国独立日假期去加拿大做四天三夜游。

坐车从新泽西，宾州很快到了美加边境，到达了尼亚加拉瀑布。晚上住在瀑布附近，观赏夜景。那天是独立日，我们在加拿大境内看到了美国庆祝独立日的焰火。那晚的瀑布也格外迷人，从远处打过去的彩色灯把瀑水映照得五光十色，流水随着灯光变换颜色，好像是谁在水的上头把成盆的颜料往下倒，哗，红了，哗，蓝了，哗，又紫了。那么巨大的瀑布在夜色中，像是魔术师手中的一个玩具，娇巧婉转地扭动她的身体，任赤橙黄绿把她染得感情四溢。我听人讲，夜晚的瀑布好看，但清晨的瀑布别有诱人之处。第二天一早，人人都在睡觉，我摸起来赶到瀑布边。远远的，就尝到温润的水气，走近一看，昨晚那彩色的女人已变成一个自然姿容的孩子，浑身一片白，不是银白，是有点杂质的那种白，它的四周是自己翻腾向下

的水花，它在水花中舞蹈，冶炼成一条无拘无束的白蛇。

我在惊叹中回过头来，看见了三面旗帜在一片烟雾中婆娑起舞，呵，原来这是两个国家，三个地区的中间地带。我站在这个地方，看不见瀑布的过去。而我自己的过去也很遥远，在长江边，准备出发的轮船一定响过了一遍或两遍汽笛声，我曾多次站在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

船舷，为又一次的离家独行而忧伤。远方有什么，远方在哪里？如今我所感叹的地方离我最近，而家乡成了远方，成了他乡。生活在改变，我所见所闻的都是新的。我从一个外国走到另一个外国，所需只是几百美元的费用，而在我的过去，这是想也想不到的。我在水雾缭绕中似乎看见我的亲人们，他们终身操劳，也爱美，爱自然，但为什么就没有机会看到我所看到的。说到底，我此刻的幸福只是我一个人的，只要我的亲人们无法与我分享这个幸福，我就不是一个幸福的人。

白天的安排有一项是乘船去到瀑布的下面。勇敢的船乘着风浪前进，开始站在船头的人也往后缩，我们虽然全身罩着防水衣，却恨不得连眼睛也遮起来。风是劈头盖脸的风，风中的水是毫不留情的水，稍不小心，你衣服上的一个小缝隙都可以让你酿成水灾，其实，我们已经全身是水了。船进入到瀑布下面，水在我们的眼前四



周飞舞，撞击着我们，我们在水中间只差没有跟着飞起来。我在深深的潭底，想到了太阳。抬起头，在高的崖上面，太阳被水过滤了，不是那么刺眼的火球，整个天空是一面亮闪闪的镜子，我们人在镜子中一定是那瀑水中的一些小毛毛虫。我幻想地从雨衣衣袖下拿出相机，偷窃几个大自然的秘密。我不顾镜头上的水，闪闪几下，照出什么是什么吧？

结束了人与瀑布的战斗之旅，我们到放映间看关于大瀑布的一个录影带。这是一个纪实与神话传说相结合的故事，讲述瀑布的起源、形成、历史与传说，人与自然的互相征服，最后达成和谐的探险经历。

历史在传奇结束的时候开始。那巨大的水流其实从不同的地方来，在这个马蹄形的地形中形成了瀑布，瀑布旁的部落里生活着一个美丽的女人。她听得懂瀑水的语言，知道她如何在水中展现自己的美，如何在风声中追逐流水。这样一个女人，不仅懂得善，还能辨别丑。她听得见外来部落的入侵，也知道如何对待入侵者。

瀑布下面有涡流，如碎银一样地翻腾，在冬天转瞬凝成冰柱。多么可怕的急流变冰柱！

看的过程中，我第一次产生了一个念头，可不可以这样去写长江？古往今来，长江有很多传说故事，但我要写一个新的故事，有人，女神，还有大自然。可以叫长江女神或长江传说。

有王孙在一块，我就有了听众。

因为我的台湾新房东信佛，每天逮住我在厨房就给我讲她的那一套“道”理，报应，吃素。有一次见我烧排骨，问我，“你知道为什么肉在牙齿缝中久了会发臭？因为，那是动物的尸体。”房东太太平时斯斯文文，打扮得也漂亮，可这番话听得我做呕，把好不容易才煮一次饭的兴致全毁了，一锅排骨也倒了。

我向王孙抱怨说：“你们台湾人怎么这么空虚无聊，钱多得无处花，到处都是庙啊堂的？自己去也作罢，还要拉别人。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可是从小也多少懂一些，虽然我不管它什么派，可宗教一个字，引入向‘善’总没错罢。道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我的家乡，它是一种形态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中。我外公祭祖时写在坟匾上的文字有道；逢年过节他在餐桌上先拜一拜，嘴中念念有词也是讲的道；家逢喜庆事便有许多忌讳也是因为道；四川乡下死了人会请锣鼓吹手几天几夜唱孝歌也是奉行的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说的还是那个道……”王孙听得一愣一愣，他虽来自台湾，可从小读科学不一定知道这些。

昨晚安排住宿，导游问怎么住？我们几个人，一对是姐弟，两人自然住一间；我和王孙是新朋友，但图方便也最好住一间。

导游看我犹豫，问王孙，王孙潇洒地说：“我不在乎住一间。”那就住一间吧。大家说在美国，集体旅游都是这样的，没关系。

我看着王孙，他笑咪咪的，像个大男孩，我不知该放心还是提高警惕，我真还没有和一个初次认识的男生合住一间屋子的经历。都说台湾人好色，恐怕是说不务正业的生意人吧，但王孙书生模样很老实，何况同行的还有别的朋友，说出去多不好。

我先洗了澡，上了床，对王孙说，我早点睡，你要干嘛别太大声。等王孙忙完了，我还在床上睡不着，直到我听见从对面床上传来他呼呼的声音，才踏实地睡着。

## 庞德与佛堂

从加拿大一回来，就感到纽约的燥热。过去几天的祥和清静一往南进入美国境内就消失殆尽。这里是另一个世界。

回来什么也顾不上了，天天去图书馆，也不打工了，我得全力对付我选的一



在西洋城海边

门暑期课——“1900年之后的美国诗歌”。这门课我盼了很久，是专门讲授美国现代诗歌的三位大师：埃兹拉·庞德、T.S. 爱略特和沃莱斯·斯蒂文斯的主要作品，作品中特殊的或反复出现的主题和技巧，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他们与各自时代的诗歌流派和批评的关系，以及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等。

由于我的基础比别人差，所以，我一开始上课就开始考虑写论文，提早做准备。

第一次上课，胖胖的教授慈眉善目，慢条斯理，发给我们几页纸，正反都印满了，我接过来一看，是关于庞德研究的部分书目，差点没把我给吓晕过去。别说这些，光读庞德的诗选和诗章就够受了，还有这些文章，书目，还有他的传记。真是上船容易下船难。按专业要求，我的学分够了，我是自作聪明多修的一门课，也是切瑞特在她走之前想多关心我一下额外给我这门课四个学分的奖学金。本以为多学点东西对自己不无好处，哪怕象征性地学学也可以吹吹牛，本人啃了大师们的肉而不是骨头，可事到如今才明白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也不是推的。

老师还在继续谈这门课的要求，每周一和周三晚上6点到8点半，从7月1日到8月9日，课程内容庞杂，进度紧凑，所以，要求我们课前把下次要讨论的诗和文章看了。在课堂上提出问题。8月8日书面考试，再加一篇论文，20页。

我心里直打鼓，选了它，只好没命的学，考试关过不好，我这个中国学生的面子往哪儿搁？

下了课，我专门找老师，暗示他我是外国学生，这辈子没读过几首庞德们的诗，更没读过英文的。所以他最好别把我当美国学生一样要求。

胖胖老师从眼镜后面看着我，中气足得可以唱美声了，回答我：“美国学生也读得不多，你别怕。尽量读，读不懂就问我。”

上帝保佑，我要能提出问题就好了。

终于被我的房东拖去了在皇后区法拉盛的一个佛堂，是一位台湾师祖开的。师祖已去世，留下了恩德。

房东在几个礼拜前就告诉我这次是一个难得的求道吉日，恳求我一定要去，这都是为我好。还要了我的名字去登记。

早上7点出发，到了佛堂。从外面看，佛堂是一栋民居样的花园楼房。没有我想象中的楼台花榭，寺院钟声。

进了门，已经紫烟缭绕，别一洞天。在门口脱掉世俗的鞋子，换上没有尘世污染的蓝布鞋，伸出手，穿上蓝布佛衣，我俨然已像佛家子弟，只差见人就“阿弥陀佛”了。

房东指点我坐下，吃了抹花生酱的面包，喝豆浆。然后到楼上的佛堂正堂，等仪式开始。穿梭不停的兄弟姐妹们，忙着迎接神的来临。

进来一群穿青衫剃光头的男师傅，嘴里念念不停，按规矩奉上茶点香果，然后就千拜万叩。

一个师傅走到我们面前，要求我们坐笔直，否则，趴在肩头的祖先们会跌下来，吓得头几排的人脖子伸得跟长颈鹿似的。

一屋子的人在紫烟缭绕中虔诚地等佛现身。不一会，进来一个年轻人，两个人架着他，说是佛的化身。化身闭着眼睛开始在香案前的条桌上用一根筷子样的东西写诗。佛虽住天上却知人间事，他

诗中一一穿插着在场诚心求道的人的名字。每个被写出名字的人都受宠若惊，心怀感激跪到前面去。

下午是点传师讲道，点传师也是台湾来的，获过教育学博士。这位点传师看着清风道骨，非常有教养。

他说，孔子曰：朝闻道夕可死矣。佛有三不渡：无缘不渡，无信不渡，无愿不渡。人生金玉深藏瓦砾外露。不同的宗教是以不同的语言讲的同一件事情的不同方面，但以道为本，道就是根本。好比种子长大了回到地上；树再大有一个根；因为有了道，有了道理道路，人才能回去。求道需天时地利人和；求道人要有祖德善根佛缘；道，有道走遍天下，无道寸步难行。真理大道就是回天之路。灵性在人存，性去人亡。人是活着的鬼，鬼是死了的人。

最后点传师以一首回文词为结：航舟轻渡远涛流，海天连悠悠；光霞悟，警客归，心肆收；忘怒怨净至性修，器宝成琢磨；仰德映月如键（金监），障难破。

时辰到了，又是叩拜，叫一声我们就匍匐着地拜几下：天地君亲师五叩首，诸天神圣五叩首，弥勒祖师五叩首，南海古佛五叩首，五教圣人五叩首，活佛师尊五叩首，月慧师尊五叩首，各位法律主五叩首，长生大帝五叩首；灶君三叩首，师尊三叩首，师母三叩首，镇殿元帅三叩首，镇殿将军三叩首，教化菩萨三叩首，各位大仙三叩首；道长一叩首，点传师一叩首，引保师一叩首，前人大众一叩

首，自己祖先一叩首。然后，又分乾道坤道即男与女分拜……

总之，我是给拜得七晕八素，一整个神魂颠倒。我又在例假期间，腰痛得像被人硬生生扳断一样。我不停地给自己念叨：行了，行了，我都信还不成吗？想想佛规十五条，我条条都努力遵守：尊敬仙佛；遵前提后；齐庄中正；循规蹈矩；责任负起；重圣轻凡；谦恭和蔼；勿弃圣训；莫着形相；手续必清；出告反面；不乱系统；爱惜公物；活泼应事；谨言慎行。如果目前没做好的，我以后早晚都读都念，当红宝书一样。

等一切完毕回到家，已是晚上了。我躺在地铺上，想缓口气，房东又在外边敲门，说下次有这种机会我再叫上你。

我心里琢磨，宗教的形式这么复杂，难怪现代人没有多少消受得起。没完没了，万里长征似的。我也奇怪，房东没多少文化，可信起宗教来，一万个虔诚，而且头头是道。佛堂里的人也是，个个都能讲一大套。房东的儿子更了得，二十好几，连工作都没有，却每周去佛堂。佛堂里有很多男孩女孩，做义工，大家在一起像姐妹一样，在我看来，说佛堂是个联谊会，更恰当。

## 这世界不能没有我

时时想到金耐尔的话，打开自己，回顾自己。现在想起来，真有千山万水的感觉。才30来岁的人生，好像活了三辈子似的。过去我很少写个人的情感经历，觉得写来写去无病呻吟一样。对个人

情感比较藐视。这是我个人的审美观念与艺术标准，也是很多中国人的。虽然我到目前为止还有这种观念，但与以前是不一样了。

爱情性爱是人类根本的情感之一，我没有理由回避或藐视。我想来想去，长这么大，感情仍是影响我成长的主要力量之一。每一次，我都朝圆满努力，每一次都爱得死去活来，每一次都像站在刀口上，或在火中燃烧过一样；然后遍体鳞伤，告别或不需要告别；然后治疗伤口，然后，重新出发。是什么力量让我如此奋不顾身，又是什么力量让我凤凰似地在烈焰中复活而没有自弃？什么力量让我到今天还可以叫喊着，无所畏惧地：“我是女人，我渴望爱情。”

能够爱才能够生活。没有爱的人生是无奈的人生，没有爱地活着是无意义地活着。

我的中文诗，大多写无可奈何的爱情，忧伤，惆怅，甚至没有绝望。看看写的两首英文短诗，我就老比较，除了语言，有什么区别没有？

“冬天的尼亚加拉瀑布”是这样的：

野起来的水 / 像上了年纪的女人渴望从未有过的爱情 / 当她死去时 / 她的身体石雕像一样冻结了 / 但我听见 / 她没说完的咆哮 / 还在蓝色的天上响。

“细腻的碰撞”稍长一点：

这世界是否到了最后的一夜？ / 你们在冰冷的地板上跳舞，四



只赤脚 / 两只叠着两只 / 告别的感觉 / 像提炼过的水银 / 从血中流出来 / 也好像你在清晨的雨中哆嗦着叫他你年轻的爱人 / 他却忽然死亡 ,把他的半截呼吸留在你的口中 / 在你第一次亲吻他的时候

无论过去和现在 ,相同的是 ,没有一首诗是幸福和满足的爱情 ,没有一首诗是怀念与追忆的爱情。难道过去是不堪回首的 ?

除了爱情 ,我还反思自己的童年。我打小就没把自己当一个普通的孩子看待。我的欢乐是孤独的欢乐 ,一个人在外公的老屋里等待家人回家 ,在自己的幻想中 ,觉得就是因为有了我才有了世界。我撒谎逃学要零花钱 ,觉得我的需要是最大的需要。偷芹姨的一毛钱被发现了 ,我哭不是因为芹姨打我的手心 ,而是我输了 ,我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我竟然恨自己斗不过芹姨。

我还有恐惧 ,孤独时有恐惧 ,看多了地主特务间谍欺压穷人做噩梦的恐惧 ,也是为自己为母亲担惊受怕遭人欺的恐惧。看小人书里 ,地主用一块银元买来穷人的女儿 ,给她灌水银 ,为地主他爹陪葬 ,我哭得惊天动地 ,觉得是天底下最可怕的事了。

但我有幻想 ,这是我今生今世最大的幸运。我的幻想使我没在人间的哀怨和挣扎中消沉 ,世俗的一切离我的心灵有一段距离 ,我听见了天上有音乐 ,市井小巷的戏剧唱腔中流传千秋的悲欢离合 ;看见旧书店里的文字用翅膀衔来的全世界的大悲大喜。我是一个

人，我又不是一个人，不是他们中的一个人。我曾在遭受同学欺负和家长冤枉时，在心中大声急呼：等着吧，看看我的将来，再看看你们的将来！

而将来是无法预知的。我的将来是我的现在，我的现在又成为我的过去。“这个世界总会有没有我的一天。”这是我打开始醒事就开始为之痛苦挣扎的事，从在半夜里不可思议地痛哭到不相信到拒绝承认到残酷地接受，几乎就是我漫长的认识过程和成长过程。我以为只有我经历着这样的生命与死亡的精神折磨，当我读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时，激动得想哭，想把它一字不差地背下来：

“现在的时间和过去的时间 / 在未来的时间里可能都是现在，  
/ 未来的时间包含在过去的时间里。 / 如果所有的时间都永远是现在 / 所有的时间就是无法实现的……那些可能实现的和已经实现的 / 指向一个终点，就总是现在…… / 走，走，走，鸟说：人类 / 不能承受太多的现实 / 过去的时间和未来的时间 / 那些可能实现的和已经实现的 / 指向一个终点，就总是现在。”

这首诗中反复着这样一句：“只有在时间中，时间才能被征服”，在瞬间中寻找永恒，永恒的是时间。

我别无话说。

我仍想大叫：这世界不能没有我。

最初的死亡

小女孩反复地说  
我不要一个人呆着  
我不要一个人呆着  
她烧了童话书撕破衣服  
我会死的，如果我一个人呆着  
她从早念到晚  
翻来覆去地说  
我不要死  
我不要一个人呆着  
她问我  
你可以和我呆着吗  
不，我需要孤独  
那你做什么？  
给穷苦的渔民做饭  
还是给农夫生儿育女  
你能做什么  
咬自己的指甲还是在夜晚手淫？  
不，不，我潜入自己寻找让身体燃烧的语言  
哦，你做些疯狂的事。我恨你做这些。  
我听见背上的洞有回声

风起处我的背冷嗖嗖的  
她仍然怕死  
仍然不想一个人呆着  
我的脚在一块海绵上行走  
孤独的昆虫们淹死在里面  
我不要一个人呆着  
我不要一个人呆着

## 开始我的传说

这一段时间都泡在庞德和艾略特的作品中。看来大师也不是那么好当的。他们在痛苦中写作，在写作中过着痛苦人生。有些苦是常人不能承受的。

我每次上完课后，都花大量时间在电脑上整理课堂上记的笔记，然后借来同学的笔记对照再整理。我想我这辈子恐怕不会再花这么多专门的时间来系统学习这三位大师的作品。也许以后回中国有机会向更年轻的人们介绍和讲解我的教授今天传给我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多么的宝贵，它教会我去认识真正的天才，去珍惜他们每一个用心血写成的文字。

我在学校的音像中心看了一套美国诗人的系列专题片，其中有艾略特、庞德、惠特曼、爱米莉·迪金森等美国文学的大师们。

让我惊奇的是，我在惠特曼的片子中，看到主持人是中年时的

金耐尔。他穿着一件衬衣，挽着衣袖，走在广袤的平原上，讲述惠特曼充满美国精神的诗歌。同片中还有爱伦·金斯堡，金斯堡的父亲曾教过惠特曼，所以，各有各的话题讲。其中，也讲到惠特曼作品中的同性恋问题和惠特曼的同性恋倾向。

我是第一次听说。金耐尔不愧是金耐尔。

而在艾略特的专题片结尾处，艾略特在做演讲，他说：“我这一生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来当一个诗人。”这一代价，是任何奖项，包括诺贝尔文学奖也无法补偿的。

看着他清瘦的面容和被无穷的精神追求变得苦涩的双眼，我想到教授在课堂上所讲的，觉得他的一生就像一个被思想哲学和非个人情感的诗歌掏空了的宝库。

艾略特多次说，他那个时代的美国诗歌没有给他多少教益，他是从别的语言和文学中吸收了他需要的养分。他是在1900年决定要当一个诗人。那个时代的美国诗人中没有他的榜样。那时的美国文学应该算是欧洲文学的一部分，是新英格兰传统影响下的文学，离真正美国文学的形成如惠特曼的出现还有一段时间。艾略特注定了要做一个先行者，也是独行者。

这让我想到中国文学史中的李白、杜甫、屈原……

艾略特写作“荒原”时，正是战后欧洲人面临失落、混乱、空虚的危机时期，他虽不是战士，但对战争带来的绝望深有体会。同

时，他的个人生活也面临危机，他的妻子精神不正常，随时随地跟着他，并要求他承诺永恒的关系，他一方面尽力去处理好这桩婚姻，另一方面承受着强大的精神压力。医生告诉他，他必须休养，他的焦虑症日重一日。他的诗歌中充满了绝望，他把自己当作一个鬼，让这个鬼四处流落。

他写好“荒原”初稿多年，直到他交给庞德，才改变了这首诗的命运。所以，“荒原”的题辞是：献给庞德。然后用拉丁文写着：更杰出的艺人。

教授说，这就是写作“荒原”时的艾略特。我心想，如果让人选择，一头是伟大加神经错乱，一头是平凡人生天伦之乐。有多少人会选择写出流传千古的作品却在神经错乱和绝望中挣扎一生？

我在借来的一本《读者指南》中看到一段话，艾略特讲，对一个诗人最要紧的不是去面对一个美丽的世界，与之发生关系；而是在它的下面看到美和丑，看到厌倦，看到恐惧，和光荣。

不知是否因为读了“荒原”，我也染上了艾略特笔下的现代人的失落与孤独。我看黄昏，满目是乡愁。我看窗外，整个一个荒原。其实，人在哪里，哪里就有乡愁，不分国籍，肤色，一生下来，你就在跋涉，在远离你来的地方。我看飞机从头上飞过，问自己，哪里是故乡？是安魂的所在？古人说，梦里不知身是客。我觉得自己梦里也知身是客。

我关了灯，伸手去摸孤独乡愁失落。我感到强烈的想诉说的冲动。好像第一次意识到还有另一个我，沉重的埋得很深的我，现在她在我的心里大呼小叫，吴清华似地农奴要翻身求解放。

可能是读了大师的作品，自己也想写大作了，或者这个很久以来的想法在向我慢慢走来。我开始构思一个有关长江的故事。

基本想法是：有一个巫山脚下的女孩子，女孩灵秀神奇，她的手弹奏什么，就流出“此曲只应天上有”的音乐，她的十指弹出了血，她的血流进患水灾的江里，水便退却了。一个想长生不老的国王，他到处请道士和尚修庙建寺院炼药，不得。还有一条通人性的白蛇；还有妖魔鬼怪，地狱，人鬼神的故事，还有长江的自然水灾，征服水患是长江流域的人民与自然搏斗的历史。

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巴人就在这里荒耕夜种，建邦兴都。这里有三国时刘备兵败托孤诸葛亮的白帝城；有李白临江吟哦“早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有杜甫，白居易，陆游，刘禹锡及无数诗人豪杰登高抒发“浪涛尽，千古风流人物”；这里有阴曹地府鬼门关的丰都古城；有怀抱琵琶远嫁匈奴的汉妃王昭君当年用过的香溪水，香溪水还在流，可伊人白骨青冢仍没有回家的路。这里有举世罕见的巴人悬棺，有新发掘出的新石器时代的大溪文化遗址，这里有壮丽的诗篇《楚辞》，《楚辞》里有“离骚”，“离骚”是楚人屈原的血泪诵啊：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

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这里就是长江，我的家乡，有我的贫穷的善良忠厚的父老乡亲。

我找出从中国带来的书，一看，还真有我想看的，有关长江的，三峡神话的，还有现在的三峡大移民方面的一套书。

约了美国朋友葛里格出来在附近村里喝咖啡，他也是诗人。

我们东村这一带是年轻艺术家的积聚之地，都穷都有点小追求，酒吧咖啡店到处都是，坐在里面可以聊天，听音乐借用电脑等，个个都是穿戴嬉皮，头发有染得红红绿绿的，也有男人戴着一只耳环的，女人肚脐上穿着银圈，还有身体上刺刻着各种图案或文字的；偶尔街上走过穿着道具服装或戴面具的人，可能是在附近的什么小剧场参加演出的角儿们。这里与商业无关，与正统文化无关，与传统习惯也无关。没有人信奉那些，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一套。

葛里格住这一带十几年了，他住的楼有很多诗人艺术家。七街至十街与A B大道之间，是有名的汤普森公园，周日有各种前卫艺术活动。当然，吸毒品也是其中之一。

我的一位美国记者朋友说，他坚决反对把鸦片和其它毒品混为一谈，鸦片是药，不是海洛因，有专门的团体在争取其合法地位。我看地富反坏右一样看他，你也吸鸦片？他说，当然，你们学校的教授们都吸的。我受污辱一样大叫：你瞎说。他也大叫，我瞎说？你才叫孤陋寡闻，我在纽约呆了十几年，当记者当了七八年，还没



有你知道得多？

我问葛里格，他说，是，我们都吸，但不上瘾。作家应该知道那种感觉。你也要试一下。

我们坐在靠我家附近的一个叫“LIMBO”的咖啡店。我告诉他我的想法，“我要写一首长长的诗。我没法不想它，不把它写出来。这是命运，抗拒不了。我觉得好像憋了许多年，心里都装满了。这条大河，河边的人，我甚至无法告诉你哪些是我个人的经历，哪些是传说的一部分。”他也蛮激动，说你能写出来。我知道，你能。从你那些中国情结的短诗，你已经开始你的传说了。

我兴奋地抓住他的手，今天的咖啡我请客。

论文的基本思路总算出来了。

每次下课后，我都缠着胖胖老师问各种问题，我得让他知道我是在努力学好这门课，如果真的不行，也只能是我的智力问题而不是求学态度问题，这可是个是非原则大事。

那天我和他最后离开教室，他看我这么诚恳，问，你翻译诗吗？

他说，你可以把庞德《神州集》里选的李白的“长干行”一诗再英译一次，看其中的差异。说不定，你会有些想法。

好，我试试吧。

我知道这首诗除有庞德的译文外，还有另一美国意象派诗人爱米·罗厄尔的译本，叶维廉也有一个。

我们走下楼后，教授忽然站着不动了。他慢条斯理摆着手臂弯里的一件衣服说：“我得把这件衣服交给门卫，刚才我从教室里捡的。”

我看他一副认真样子，只好陪他走回去。我们说好，等我把论文理出一个思路，就先给他看看，提出意见我再修改。

就因为译这首诗，我决定了我的论文题目：庞德所译李白的“长干行”比较论。

不知为什么，我对庞德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他伟大而坎坷的一生换了很多伟人都可能挺不过来。他的专题片里每当朗诵他的诗时，都是汹涌激荡的意象出现，仿佛古罗马的残垣断壁，古希腊的天光雷火，刀光剑影，还有拉丁文明，中国古代文明，统统像不死的鬼魂在庞德的笔下穿行。

庞德与中国文学的渊源与他对拉丁文化、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一样，是对当时的美国文学的新英格兰传统和维多利亚传统的厌倦，想从古老文明中寻找新的灵感，他和他的文学同行们大量学习古代语言并翻译。庞德甚至讲，一个伟大时代的文学也许就是一个翻译的伟大时代。他认为，翻译就像一根线把个人的才能与文学传统联结起来。但庞德不懂中文，他所翻译的19首中国古代诗歌集《神州集》（CATHAY）是根据日本学者爱勒斯特·费伦罗沙死后留下的一本笔记整理出来的。

当庞德接触到这样一个广大而深刻的古文明时，他在其中发掘着可为他所用的新的生命。他在精神上认同了李白。两个诗人的邂逅把他们各自的天赋重新创造了一遍，尤其对庞德如此。他的不止于文字而重精神的翻译实质上成了他的创作的一部分。他诗中的意象有些就直接是李白的诗，没有翻译，他的创作也不可能走那么远。

在西方和美国文学中，李白是一个大胆叛逆的人物，比他在中国文学中更为偏激，他的豪饮，他的侠客精神，好游，拒绝像他的前辈那样做个孔孟学者，都使他在西方人眼中成为中国文学史最叛逆的人。这种精神正是当时在伦敦的庞德所需要的，附和了根植在他内心深处的雄心。庞德经常借用古代英雄的面具来抒发自己的孤独，失落。庞德翻译李白的作品，等于在重新确认自我。李白的放荡不羁是他内心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杰出人格的体现，对庞德，这样一个人物是他在伦敦孤独和失落中需要的面具。两个伟大灵魂的相逢使我明白了庞德为什么要翻译李白，有人甚至称庞德为“李庞德”，比嬴探人的相似。他在李白的诗歌中读到了他自己的心境。作为《神州集》的两首主要作品之一的“长干行”，李白着重的不是一个悲伤的爱情故事，而是诗中两颗心的隔离和贯穿始终的无法消解也无法言说的孤独。仅仅从这句诗就可看出他的翻译如何简化了原诗的主题，代之以强烈的怀旧声音：

他们伤害了我。我衰老了。

这个声音不是发自一个十六七岁的商人之妇，而是一个被隔绝了的强大灵魂无言的咆哮。

艾略特在他给《庞德诗选》做的序言中称庞德是“中国诗歌的发明者”，他说，当一个外国诗人的作品被成功地介绍进我们时代和我们的语言习惯中，我们相信他已经被“译”进来，通过这个“译”我们能最终读到最本来的东西。这就是不懂中文的庞德把中国伟大的诗作翻译成英文的伟大所在。

## 香香诞生

加拿大之行后，王孙天天晚上打电话来。问候，聊天，东拉西扯。他每天大部分时间呆在实验室，回宿舍就是睡觉。起床就走。也不自己做饭，都在学校吃。男人是比女人过得简单容易些。

他做博士后有一年多了，我问他是真喜欢做实验物理研究，还是因为找不着工作。他说，是前者。还是喜欢当科学家。他很多同学去了华尔街，做电脑工作，他认为没有意思。我赞同他。因为我干的也是不讨好的事，也很专注。

我开玩笑说，那你想不想拿诺贝尔奖？

他嘿嘿一笑，说，我的获奖演说稿都修改第二遍了。

我笑得前仰后翻。觉得拿诺贝尔奖的人怎么可能是他这样的人。

但我对学科学的人一直有一种幻想，觉得他们纯净高尚，清心

寡欲；而我这种干文学的大多与世俗孽缘太深，无法自拔。加之太个人意识化，无法过关斩将，领略超凡脱俗的科学领域。

我们俩都有兴趣与对方聊天，于我，他是一个异类；于他，我也是一个异类。

知道我还有四天就考试了，他请我考完去布朗玩、写作。我本也贪玩，可我得打工啊！他一个劲地说，还是要劳逸结合，夏天的罗德岛可美了，我们可以去海边，吃海鲜，听爵士乐。

说得我心痒痒的，意志开始动摇了。

他说，女孩子不必太努力，做做头发，打扮打扮自己就好了。那么苦干吗？

哼，看不出，你还大男子主义。我可不是台湾那种娇滴滴而没有思想的寄生虫。我好不容易出国，好不容易走到今天。你怎么能这样讲？

他忙解释，我也知道大男子主义不平等，可这个社会就这样。有什么办法？比如我们实验室要找个女秘书，许多人条件相当，我们就会找漂亮的，会打扮的，能力差一点也没关系。

秘书工作有特殊性。再说我也不是小丫头，只会讨人喜欢就好。我也想做很多事。没办法。

那你来我这儿吧，每天我去实验室，就你一个人在家，正好写作。

我真是向往能有那样的写作条件。现在我住的这个地方比以前好多了，可也住了四五个人。我的房子在过道旁，过道凹进去的地方还住了人，我和那个人之间什么音都不隔。我的房子里，一张桌子堆放杂物，一个几块木条钉成的书架，电视放在地上。晚上睡觉打开睡袋，否则连转身的地方也没有。

有一次，小郑开车送来一箱方便面，抱着上五楼，进了屋，都找不到地方搁下来，最后放在电视机上。他说，你这也太简陋了，至少得有张床。我说，我也想啊，可这是没办法的事。我不想花时间打工，只好委屈些了。我出国只想好好读书，不能再错过机会。你们当外交官的恐怕没过过这种日子吧。他说他以前也来美国学习过，不过，在华盛顿，生活也有基本保障。自然与我不一样。我是完全自费。

想想我在国内，单位分了我一大间临时住房，虽有老鼠蟑螂，我也还像模像样有一堆拼凑捡来的家具，而且，不交房租。

此刻，我正坐在王孙的房子里，对着桌子上的一堆纸构思呢。旁边还有一本唐诗，一本宋词，还有离骚，九歌。这一本本血泪词，歌的都是乡愁，失落，忧愤。

我把平时随兴记的一大堆纸片，卡片，信封背面放在面前，看有没有什么奇思妙想。我惟一的念头就是，用英文写好这首诗，让我的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我的家乡是个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会如

此怀念它。

很多年前，李谷一唱过一首轰动一时的歌“乡恋”，就是唱的三峡，词不怎么样，但音乐美妙动人。万县市文工团有个叫湛明明的写过一首歌词，被人填了曲，叫作“三峡情”，感觉就好一些：“三峡雨哟，三峡云哟，故乡的景哟，故乡的情。从小爱在云里走，口吹叶笛赶羊群；从小爱在雨里淋，手挥竹蒿驾船行噢。/ 三峡雨哟，三峡云哟，如梦的景哟，如痴的情。几时再等上山顶，唱支山歌唤羊群；几时再等夔峡门，喊一声号子驾船行噢……”

现在看来，都不理想。三峡不仅仅只有山歌调，放羊娃。大山大水，必有大爱大恨。写不出这大山大水，唱不了这大爱大恨，也就唱不出三峡的魂。

这几天放松了，但睡眠不多。每次王孙回来后，我们就聊天到很晚，然后，他说，你好好睡觉，我去客厅里看会儿电视，就在沙发上睡。

我不好意思让他住客厅，可我也不好意思和他住一间房。

吃饭时间，王孙就打电话来，我们约好地方，一块去餐厅。然后他回实验室，我回来继续构思。

打开王孙的小收录机，放进去一盘“京华烟云”的带子，从空中传来了“浮生梦”、“天道”、“来生缘”、“爱”和“欢腾”。

下午开始动笔。

我的笔记如下：

这个“传奇”不单单发生在长江，凡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必有的故事。我想了一个副题——她在这里，那里，或别处 / 在开始或结束。

香香是巫山脚下万州城里一个 14 岁的美丽活泼的女孩。她热爱自然，从小与山里的动物为伴，鸟，孔雀，熊猫，猴子都是她的好朋友，但最好的朋友是一条白蛇，她一生下来互相就是好伙伴。

长生不老是国王的梦想，他娶了年轻的香香是遵循古老的方法。

但爱与非爱有个法则，权力是暂时的，如同美一样。香香的美在王宫里日渐消损，她不能离开生长的水土。诗人出现了，他以文字还给香香一个梦，香香爱上了他，并请诗人带她回到南方。诗人正受国王重用，不愿为了爱情放弃个人前途。

正在香香为爱情挣扎时，三峡发大水，白蛇受命治水，并请求带上香香。两人终于回家了。

可家已不是过去的家，整个淹没在水中。

经过搏斗，白蛇制服了水，可香香被妖魔化成了一座石像，不能生还。

天使说，她可以救香香，但要有男人替换的性命。国王没有办法，诗人也不愿意。白蛇说他的使命就是保护香香，他愿意以一死



相救。

香香在白蛇的爱情中醒来，诗人与国王都等着她。可她选择了与白蛇化为一朵云，守护她的家乡。国王的心碎了，诗人在自责中忏悔终身，写下了流传千古的“神女传”。

草稿如下：

身体里的血，河里的水  
万事万物都要流动  
流动的就是美  
今天你做了女人  
今天你要有个梦  
白蛇带着香香进了巫山  
聪明的白蛇知道每一个地方  
他们采集香花蕙草，灵芝百合  
来到香溪边  
洗香香的手，洗香香的头  
洗香香花朵般的脸庞和小小  
的乳房  
直到傍晚，香香才从水里  
出来  
从水里出来的香香看见了一样

东西

一道彩虹横跨在长江两岸

两只脚的女孩

水里出生的女孩

彩虹是她的床

云朵是她的房

河上的婚礼

定在七月七

千年老树砍下做了国王的床

万米丝绸织成一张大被子

河边的人跪着等

月亮下走出万州的小新娘

香香来了，穿着大红绸袍

九百九十九级石梯上

是绫罗绸缎白花花的铺开

她一步步往下走

川剧锣鼓声声往命里敲：

娘子啊，你到哪里去哟？

我下河去，河里有船，

船上有养得白胖胖的蚕茧

蚕茧织着扯也扯不断的丝线

.....

国王的船停泊在水中央

时间也不能到达

五十八岁的男人得到他的长生药

五十八岁的男人正在永恒

划吧，使劲地划进水里，再出来

划吧，划进这个女人的身体，

再出来

生命中的血，河里的水

每一样都在流动

流动就是美

片段笔记：

岩石的棺木开了花，岩石滚落入江水

白蛇以什么方式救了香香，他们又如何化作了巫山云？相对无言，惟有泪千行的爱。

诗人的恨是“此恨绵绵无绝期”。



在故乡的花丛前

国王的恨是张久龄“登荆州城楼望江”的恨：滔滔大江水，天地相始终。经阅几世人？复叹谁家子？东望河悠悠，西来昼夜流。

岁月既如此，为心遣怀睿？

肉体，精神，恩情，爱情，来世，今生，人和魔鬼，鬼城里住的鬼吗？

云就是水，有水，云才活了。满山的柑桔滚动，像金黄的雨点丝绸，绿草，翠竹，米酒玉樽……

## 第五章 初识马克

### 我成了指导员

新学期又快开始了。我在国际学生学者办公室帮忙，做新生服务义务指导员。

所谓的新生服务指导员就是在新学年国际学生注册的那两天，带着新生们熟悉校园环境，告诉他们各自的学院在哪里，如何办理报道注册入学手续，如何选购健康保险，如何处理文化差异导致的生活难题等等。

我自己错过了新生开学时期，漏过了很多重要的信息，所以，一看到学生网络上征求义务指导员的消息后，连忙报名参加。

指导员们每人每天从早上 8 点到下午 5 点，没有报酬干两天活，分发各种资料手册，然后带新生队伍在校园各处走，大多绕着华盛顿广场。中午国际学生学者办公室送匹萨饼来，大家边吃边聊，也认识不少人。指导员中没有中国内地的学生，有几个女孩从台湾

来，还有几个亚洲人。有的人义务干了几年，有的人和我一样，希望来体验一次。不过，他们都是在读本科，大多是文科，就我一个研究生，掺和在一帮20来岁的孩子中。

我们的劳动报酬是一件特别的T恤衫，印有“NYU ORIENTAL LEADER”几个字。

忙完义务服务，我就开始赶快找工作，争取在开学上课前，可以有些收入，开学后经济不至于太紧张。每期必交的学杂费健康保险费差不多要七八百。整个暑假我游山玩水，没挣一分钱。

前两天，我应聘去一家律师楼面试。见我的是一位台湾律师。律师风度翩翩，当他得知我还在读书时，说他们不想找学生。我忙说，我自己有办法处理好学习和工作关系，保证互不影响。暑假初期我曾工作7天，还要读书写作。我本是想让他放心，结果他不但不放心我会专心工作，而且可能还以为我说谎。总之，他大吃一惊说，那你不成女超人了。我哭笑不得。知道这个工作又没戏了。

好在有个朋友介绍我临时去一家美国印刷厂打工，做一些印刷品分类包装活，体力劳动。挣点吃饭钱。美国老板保罗很信任学生。我们可以自愿什么时候来上班，什么时候走，按小时计算工资。只需离开之前，向一个学生头儿报告一下这一天干了几个小时。到一个礼拜就发钱，老板的个人支票，就是一块打工的美国学生也不必报税。印刷厂离学校十来分钟的步行，我便利用去学校的空隙，中

午到那里干上四五个小时，每小时7块钱，这样下来，一天也可以挣个二三十元钱。遇上印刷厂没货，缺活干时，如果我去了，那个老板念在我平时干活仔细，很少出错，不浪费时间，有时还专门找点活给我干，比如去附近的公司送点资料，或去邮局寄点信什么的。

这天，印刷厂来了一个中国女孩卡罗。我们俩边干活边聊天，别人也听不懂。她是山东人，从巴黎来美国刚一个月。我说巴黎那么好，来纽约干吗？

“还不是不安分，想出来闯闯。”

卡罗很小，但性格却女英雄般豪爽。她也爱唱歌，我算遇到了知音。我们每天一遍遍地唱那些革命歌曲，样板戏“红色娘子军”、“江姐”、“红珊瑚”、“洪湖赤卫队”，她也会哼几句京剧，没人时，我们俩就比比划划，登堂入室。她比我厉害的是会来一点花拳绣腿，哼哧一下倒立起来，白墙上留下一对脚印子。

午饭时间我们坐在哈得荪路边边晒太阳，感叹前途莫测，报国无门。

她啃着还带着“佛罗里达”商标的苹果，说她从外交学院没毕业就去了巴黎，拿了绿卡。现在还在摸索中。她父母说在中国机会也多劝她回去，可她想自己闯一下有点名堂再说。

我猜测她一定出身高干，法国那么难呆，她一去就拿了绿卡。

我说，你去发财吧，以后有了钱别忘了赞助文化事业。

这个礼拜，学校热闹得很。开学期间，各个学院都有欢迎同学们返校的活动，加上迎新生，走到哪里都常碰上晚会、聚餐会、欢迎会、入学指导会，国际学生学者办公室有专门的社交咖啡时间，请新来的国际学生参加。我与他们熟了，有什么活动都会提前打电话发电子邮件或寄请柬来。

下午我去了国际学生学者办公室，吃了两块匹萨饼，最后剩了很多在桌上，主任秘书南希小姐请我们能带就带一两块走。我也包了两块，要吃时做个汤，一顿饭就有了。

从电脑中心出来，发现商学院外面也在开晚会，一大堆的汉堡包，可乐还有意大利的面条，我也拿了几样坐下来，听乐队表演。有的同学跑到乐队前面跳舞，高兴得什么似的。

去学生中心看了一圈，里面有学生服务中心专门出售的各类打折票，林肯中心的音乐会，百老汇歌剧，古典芭蕾舞和一些外国百老汇歌剧。定期出售，位子当然是最差，可票价也便宜，学生能支付。这里是我最爱来的地方之一。遇上好的演出票，就花个十几二十几元买个雅兴。除此之外，这里还贴出最近各个学生社团的活动广告，这些活动为吸引人参加，每次都会说：“请来参加，有吃有喝还有娱乐。”有的广告里还会特意画张嘴和一些食物，诱惑学生参加。

前两天的伊妹儿里有条消息说纽约的中国学生会准备成立一

个合唱团，请有兴趣爱好唱歌的同学自愿报名。每个礼拜日练习一次，以后有大的活动就可以登台表演。我高兴极了，马上回邮件说报名参加。

今晚是合唱团第一次聚会。我赶到上西城指定的地点，来了许多人。我们纽约大学加上我有三个人，一个学生会主席和另一个女生。终于和我们学校的中国学生接上头了。以后也可以参加他们的活动。

合唱团这次选了三首歌：“一条大河”、“我的祖国”及“我和我的祖国”。

这学期的第一堂写作课。

老师是一位年轻的美国女诗人，叫莫里，满头红发，看起来聪明绝顶。

她刚出了第一本诗集，脸上还带着一些兴奋。纽约的诗人们出了书，会到全国或纽约各地巡回朗诵，有的是出版社宣传，如果出版社很小，或没钱宣传，有的人也会自己设法四处朗诵，提高知名度或帮助销售。当老师的人便有很多优势，至少有些学生会买他的书。我们班上很多选莫里老师写作课的人，都事先读了她的新书，对她的作品也有些兴趣。

上课开始，莫里让我们先做名字游戏。每个人问坐在自己旁边的人，你叫什么名字？然后做课堂作业。先写十个描写外在世界的



词。再写十条视觉和听觉观察的小笔记。

老师还布置有每周的作业：读一本诗集；写十条笔记；每人轮流和一个同学有一次诗歌约会；每次上课带15份自己的诗稿。

莫里的教学和金耐尔不一样，启发性的内容多，加上她自己也是年轻诗人，所以，和同学们互学互长的成份也多。她的方式对我很适合，我没有像上金耐尔的写作课时那样惊惶失措。而且可能是经过金耐尔的磨练，我多少有了点自信。

这学期我选的另一门课是文学传记课。这次我去查了一下教这门课的教授的背景资料。我从《纽约时报》的书评档案里调出了好几篇他的文章和别人写他的文章。这个教授写的第一部传记作品就获得了普利策奖。不知道他做老师好不好。上学期，同学香奈选了门黑人女老师的课，那老师特严格，看了香奈的论文后说，你这论文写得一塌糊涂，最好当垃圾扔掉吧。30好几的香奈本来就容易感情冲动，一下子在老师面前痛哭流涕，那老师好坚强，不但不为眼泪所动，还告诉香奈，这论文只能得C-，香奈又哭起来。C-等于不及格。

同学们听到香奈的故事后，纷纷表示不选那位老师的课了。

我和一位从台湾来的画家韩先生去苏比士拍卖行，那里在拍卖中国的明清画。

暑假期间我参加一个台湾人的聚会，吃饭吃饱了我又开始胡说

八道侃大山。就这么认识了韩画家，众人都说他长得像秦汉。我见过秦汉的哥哥，或者弟弟，觉得不像。韩画家在座时没多说话，吃完饭一定请大家去他苏荷区的家坐坐。

他的家是苏荷区典型的大仓库房，整整一层楼。过去不值钱，现在值几百万。诺大的画室里挂着他的巨幅画，有些是用电脑喷墨制作的，主要是纽约风景。

他送了我一本他的画册，厚厚的，是他在台湾和在台湾的主要作品集子，在台湾出的。听人介绍，韩画家是来美国的台湾画家中很成功的一个。我看着厚厚的画册，使劲点头。

韩画家开玩笑说：“开始看你年龄小小的，还以为是谁的女儿。后吃饭时听你聊天，没想到你挺有见识的，不简单。”

旁边的人趁机表扬，说内地的女孩努力向上，能文能武。

苏比士真有不少中国画。我在中国没机会见的东西在纽约见着了，感慨得很。难怪人们想出国，连自家老祖宗的东西都得上别人家才能见到。

我们出门时遇上另一个台湾画家查理和他的年轻太太。便约上一道回苏荷喝咖啡。

晚餐是查理请客。我们去纽约大学附近的一家叫“志摩”的日本餐馆。想必这志摩应与中国诗人徐志摩有点关系吧。

他们问我许多内地的事情，这次我尽量让自己听起来不像《人

民日报》，否则他们该说我是中共情报人员了。

杨太太年轻漂亮，是查理的第二个妻子，学新闻的，曾去过内地做采访，她声音柔柔地说，她见过的农村穷得可怕：有的人家吃饭桌上就一盘菜，盘中三片巴掌大的豆腐干，白白的，怎么吃呀？

我没说自己家乡有的农村连吃饱肚子都不容易，还管什么饭呀菜的。

和台湾朋友在一起，我的确有种“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也不是不说实话，总之心里怪怪的，说不出的滋味。想想自己书读得不比别人少，脸蛋长得也不比别人丑，脑袋瓜也不比别人扁，可我得每个月打工，挣几百块钱来维持基本的生活。不过，一想到人家台湾朋友请我吃，还和人家这么比，就太那个了。

付账时，我瞥了一眼，有150多美元。

好久没去看爱德了，尽管我们常常通话，要不是前几天他告诉我他生病了，我还得拖一阵子。

见了爱德，我大吃一惊。爱德衰老多了，全没有以前那种活泼幽默劲。爱米莉在家，爱德提议我们去对面的小中餐馆坐坐。

坐下后，爱德摘掉帽子，他的头光光的。

我吓了一跳，你得了什么病？

他慢吞吞地说，肺癌。

肺癌？你都不吸烟喝酒，怎么可能得肺癌？

我年轻时吸得多，后来戒了。第一个妻子脾气暴躁，我们经常吵闹。现在和爱米莉也不愉快，我怕死得很。想想过去，觉得这辈子过得好没意思。

那医生怎么说？

先化疗看看，控制癌细胞扩散，不一定有效，已经中晚期了。

爱德简直变了个人。过去他也常唠叨，数落这数落那的，可现在他连这点劲头也没有了，眼神迟缓，我仿佛觉得他正在一步步退后，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显得不再真实了，我好想伸手拉她一把。

我努力想安慰他，癌症不算什么，尤其在美国，你要相信医生。

爱德以前经常发牢骚说有的医院的医生简直是杀人犯，病人到他们手下，不死也得死。我总觉他有些夸张，但看新闻看多了，这种危言耸听的故事还真时有发生。我也有些担心。

我们坐在那里，爱德一定要我点份吃的，我本不饿，可他坚持要请我吃午饭。

我知道爱德平时非常节俭，自己几乎不下馆子，以前我送菜单时，他多次说要去那里吃一次，并要告诉老板我是一个很好的人请他不要亏待我。

有一天回来，他对我说，我今天路过“妈妈佛”，进去坐了一下，问服务小姐你在不在，人家说你不在里面工作在外发菜单，我就站起来走了，让她们知道我是专门为你而去的。

吃饭时，爱德心情好点了。他说，自从生病以来，他看透了很多人人生事，明白了许多不曾明白的道理，可似乎为时已晚。他看着我说，你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做自己想做的事吧，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也别顾虑太多。还要善待自己，现在我想对自己好点，也没有多少用了。

我想和他说点别的，问他的那一对同性恋老人朋友还好吗？爱德曾告诉我，这一对老男人同居了许多年，但他不知他们是同性恋。有一次其中的一个人亲吻他，爱德觉得不对劲，回来直对我说，我可不是同性恋，亲得我怪不舒服。

老人俱乐部的那些老太婆也是他的老话题。有一次，他自告奋勇地分发演出票，我们俩早早去票房领出给他们这个俱乐部的几十张票，选出最好的留给自己，他阴谋似地把票放进口袋。然后我们到剧场门口，等那些七老八十的人来领票。老人们三三两两地来，这个问有更好的位置没有？那个说为什么选在今天这么糟的天气看演出？

爱德听了心里挺烦，说自己是来为大家服务的，不是来听他们抱怨的。

我开玩笑说，算了，咱们把票卖了，不等这些乌龟王八了。

他开心了，我可不能干这种事，损害我们俱乐部的名誉，以后人家就不会给我们票了。

票快发完时，进来两个老太婆。爱德给其中一人一张票后，把另一人叫到一边。我见他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一张票给了她。

见我纳闷，他说，这个老太婆就是常常送核桃甜饼给他的人。

我们从餐馆出来道别时，爱德两眼模糊地说，你要来看我呀。紧紧抱着我亲了一下，我劝道，放心治疗吧，需要我帮忙时就告诉我。我随时打电话给你。

## 初识马克

现在是凌晨 2 点 3 0 分。在外整整一天，早上 8 点出门，刚刚才回来。

应基督教朋友玛丽露的邀请，去参加她们年度的妇女节大聚会，在中城马里奥特大酒店。我们和她的一帮菲律宾女朋友碰头后，就进场。好多人排着队吃自助早餐。长条桌上摆着各式点心、饮料，餐具银光呈亮，非常精美。妇女们都打扮得时髦庄重，盛大节日一般。

1 0 点钟开始唱圣歌“到达”，然后是开幕辞。接着有小型剧表演，一群青年人杀人抢劫强奸无恶不作，最后宗教拯救了他们，有两首歌我很喜欢，“梦想的力量”和“新生”，我们每个人都面临这样的选择。

一个叫罗萨·阿希莉的黑人妇女上台用她的亲身经历讲述基督的慈悲和拯救。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起她的过去，她和她的男朋

友贩毒吸毒，她为他多次堕胎，后来他被抓进监狱，她只好以卖淫为生，也被关进了牢房。有一次她的儿子来看她，他满目惊恐，唤醒了她的良知，她在监狱里读《圣经》，跟牧师祷告，获得新生。后来她当了传教士，在哈莱姆区为黑人服务。她最后的结语是：主啊，父亲，谢谢你给我们生命，谢谢你把我们叫到一起。

从聚会出来后，玛丽露提议去帝国大厦对面的曼哈顿商城顶楼喝咖啡，我知道她希望我也加入她们的姐妹会，每周学《圣经》。据说这些基督徒非常虔诚也非常执著，比如玛丽露，她不知给我打过多少电话，留过多少言，我回不回都没关系，她照打不误，回回都邀请。宗教的力量真的伟大，虽然很多美国人不信上帝，可没有宗教，很多人也无法活。

第二个活动是晚上约好去花园大道罗萨的家，我到达时，里面人已经很多了。

我穿着一件红丝绸的长裙，外加一件白衬衣，非常分明。

罗萨指着一个壮实显沉默的男人介绍说，这是记者兼作家马克。

我笑笑。他点点头。

马克旁边站着一个胖胖可爱的小伙子，自我介绍叫丹尼尔。

我和丹尼尔聊天。他是德国人，半年住美国，半年住德国。“这种生活蛮有趣吧？”我问他在美国这半年做什么呢？他说他开大卡

车，运货。自己买了房子。

我们站在旁边看别人跳舞，边聊天边喝饮料，我喝水，他喝啤酒。那个马克到处逛，一会儿被一个很帅的黑人男子揪回来了，那男子抓着马克的衣服说：“大名鼎鼎的记者总算给我逮住了。”

马克连说，别别。脸却显得很兴奋，问：“你们看他熟不熟？”

我是不知道的，丹尼尔也不知道。

马克急了：“你们都不是纽约人啊？他是纽约电视一台的新闻主持人。”

我想想，在爱德家住时常看一台，好像是有这么个主持，专报杀人放火。

这下我们成了四人小组，主持人说，这里不好玩，问我们去不去一个有名的夜总会。我怕太晚不安全，有些犹豫，丹尼尔说：“我们开车送你回家好了。”

来到五十七街八大道的夜总会，门口的警卫见了主持人上前打招呼，

把紧闭的门打开让我们进去。主持人拿出几张纸片发给我们，说拿它买酒喝。我不喝酒没有要。

里面人已多得像煮烂了的水饺，个个看起来都像鬼，奇形怪状，一楼是震耳欲聋的摇滚，二楼是乐队表演。我们呆在一楼，看那些拼命忘形跳舞的人，中了魔一般。他们几人都买了酒，给我一杯可



乐。主持人跑没影了，我们三个站在挤挤的人堆里。跳舞吧，丹尼尔说，并称自己太胖了跳不动，让马克和我跳。

跳舞时，马克问我：“丹尼尔不错吧。”

“是的，他很好玩。”

不一会儿，我就出汗了。和马克挤来挤去，我推他他推我，他一把抓下我的橡皮筋，我头发一下子披散开来，我索性张牙舞爪吓唬他。人群里跳也跳不开，东扭一下西扭一下。全当锻炼身体，出身臭汗罢。

出来坐在丹尼尔的车中时，已快凌晨两点。

送到家门口，丹尼尔给我个电话号码，说我若有空，可以再一块儿出去玩。

他说他没带纸，让我半小时后打个电话给他，他再记下。

当我照丹尼尔的电话打过去时，接电话的却是马克。

马克说：“你要找丹尼尔是不是？”

我问：“这是谁的电话？”

马克醋醋地说：“我知道你喜欢丹尼尔，可他已成家了。我告诉了他我喜欢你。”

“什么喜欢不喜欢，干吗搞鬼？”我有种上当的感觉。

马克吓得连连道歉，小心翼翼地问：“我们可都是好人。以后我可否打电话给你？”

“再说吧。”我很不高兴地把号码给他，放下了电话。

## “校长社区服务队”

这学期我报名参加的义务活动学校“校长社区服务队”，在图书馆十楼举办隆重的会议，介绍这学期的社区服务项目。我报名参加教堂的义务工作，别的项目有给小学生当辅导员，在东村西村做周日布施等。办理完登记手续后，我们每人得了一件印有“N Y U 校长社区服务队”字样的T恤，然后享受特别的午餐。

学生大多是美国人，有少数亚裔。过去，纽约大学一度被称为“犹太人的哈佛”，并得到犹太人社区的大力赞助。如今，纽约大学的亚裔学生也多起来，主要来自日本、韩国、中国内地和台湾、香港等地。但这种场合，多半是亚裔美国人。

我端了些吃的，结结巴巴和一位西班牙裔的女生聊天。她问我，有没有见过第一夫人？

“没有，哪来那种机会？”我口里包着金枪鱼三明治，心里想，连这种鱼我也还是第一次吃呢。

叫诺巴的女生兴奋地告诉我，前一段时间，西班牙国王夫妇来纽约大学捐助修建一座西班牙文化中心，第一夫人来纽大欢迎国王夫妇。诺巴和她的同学们见到了希拉里。诺巴来自西班牙一个小岛，高兴地马上给家里写信，还附上有大人物照片的校报“华盛顿广场”。

诺巴已经是第四年参加“校长社区服务队”。从她的介绍中，我得知纽约大学是全美国推动大学生社区服务的领头羊，学校每年春天会派出一个代表团去白宫、国会、纽约州政府等地游说，宣传扩大学校影响，同时争取大财团的支持。

学生凡义务服务超过几千小时会在贷款读书和学费方面享受政策优惠，特别出色的可获校长奖学金等等。此计划深得克林顿总统的支持。虽说纽约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但从它建校初始到现在，宗旨都是“私立学校，公立服务”，并因此深受各大财团、民间基金、社区组织的支持，近十年发展迅猛，成为全美最大的私立大学，在世界各地尤其欧洲办有多所分校。据说，这届校长的雄心是要把纽大排进长春藤名校的行列。

开学期间我看到欢迎新生的口号中就有“把纽约大学办成全球性的大学”。这几年报考纽约大学的人数和录取的新生都是直线上升。犹太裔的校长奥利维亚因此多次受到《纽约时报》的采访。

### 马克身缠三件官司

晚上，那个马克打来电话，热情邀请我第二天和他去长岛上飞行课。

开飞机？我连车都不会开，自行车也不会骑，还要上天开飞机，简直是开国际玩笑？

他一再保证有老师没有任何危险，我要真害怕可以先在地面看

一会儿再说。

我从未去过长岛，心想不上飞机看看风景也好，便答应了他。

他激动得像孩子似的，一个劲地问，你真愿去吗？早上我来接你。

我们沿着长岛高速公路行进，一路上阳光灿烂，树木浓绿。我住在曼哈顿还未享受过这样的美境，开心地放声高唱四川民歌——

太阳出来罗喂，喜洋洋罗喂，背起扁担唧唧采，罗喂，上山来哟喂……

马克一句不懂，连连称好。他讨好地说，那晚我们在夜总会跳舞，我看着你觉得非常有意思。你很有魅力，很好看。

我一想到电影里坏人总是先说好听的，便矜持起来。

到了小型私人飞机场，马克的老师杰里，一个退役老人，从边上的小木房里出来打招呼。我看见机场里停着好几架小飞机，都比较旧，有的和汽车差不多大小。马克选了一架红色飞机后，就钻到底下做飞行前检查。我无事可干，在机场闲逛。

奇怪的是，我听见鸡叫。循着“呱呱”声，我看见角落里有一个木笼子，里面关着两只鸡，还有一只盛水的碗。这种养鸡方式和我记忆中家里养鸡差不多。

“嗨，薇，准备上机了。”马克在叫我。

我坐飞机后座，杰里在马克的旁边指导。老头问我想不想驾驶

飞机，我说，我胆子小，不敢。他们为我的坦白哈哈大笑。

我还是第一次坐这么小的飞机，心里有些紧张，一下子不太适应，胃很不舒服。马克的技术恐怕也还未过关，飞机颠上倒下，让人活受罪。下面是海水，长岛的树木，可现在再美也无法着地，此时，我倒羡慕起机场的两只鸡，平平安安过日子多好。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我给他们讲一个我外公买了一只瞎眼鸡的故事。

马克大笑：“嘿，真精彩，让我们飞到你外公家去看看中国的鸡吧。”

“不过，‘鸡’这个字在中国可不能乱说哟。”我诡秘地一笑，随即也哈哈大笑起来，感觉好多了。

下了飞机，马克看我脸色苍白，怪我没告诉他自己在飞机上不舒服，否则他可以早点着陆，并说，你这个可怜的孩子，要学会表达自己。

为了赎罪，他说要请我吃长岛的龙虾。

回来的路上，他开车路过皇后区森林小丘他家门口。问我愿不愿意进去看看。并说，你要不喜欢，站在门口看一下就走。

我想了一下，就跟进去了。

马克开了门边的一盏小红灯，我不习惯，让他开了大灯。里面空荡荡的，两间没有隔墙的房子，两个床垫重叠在一起，窗台边一个音乐架，几种乐器，有萨克斯管、吉他、一个乐谱板。另外就是

一堆健身器材。

“你住这儿，怎么没家具？”

“要家具干吗？”他倒干脆。

没有凳子，我们站在屋子中间，他翻出一本书，说是一个朋友的新书，并指着后记里的第一段话，感谢的第一个人就是马克。我想这人也太炫耀了，又不是你的书。

他解释说，他和这个朋友一起做研究调查收集大量资料，现在他出书了自己也高兴。

“那你也可以写一本啊。”

他答没时间，整天跑采访累得筋疲力尽。

好像怕我不放心他，他从一大堆书籍中掏出一些杂志、报纸复印件，有的有照片，是穿着潜水服的他。

原来马克过去是个职业潜水员。他说他的打捞水平一流，很多人采访过他。后来有人建议他从事新闻工作，他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了新闻硕士，当了记者。不过这之前，他在长岛石溪分校读了社会学硕士，专门研究社会下层无业流民，他说，他的教授剽窃了他的研究成果，出了名。

“你可以去告他呀。”

“得了，我已经两个官司缠身了。”

我一听，吓了一跳，在中国谁有官司可就是大麻烦。听他这么说，

好像美国人打官司是家常便饭。忙问是什么官司？

他说一个是和美国广播公司的摄影师，两人在一次采访中抢镜头发生争执，那家伙用摄像机把他推下楼，摔伤了膝盖。

“看不出，你这么壮实还被人打？”

“嗨，我要还了手就没理由告他了，要在过去，我对付几个人都没关系。”

你还会打架？我又吃了一惊，往门边退了一步。心想这家伙恐怕是个惹不得的，说不定一下子急了就会像狮子一样扑上来吃人。而且他又是意大利后裔，说不定与黑手党还有关。我恨不得马上拔腿就走，又不好明说，只好告辞要回去看书了。

上午参加国际学生学者办公室举办的文化历史旅行，地点就是学校附近的格林威治村，参加者大多是欧洲学生。

如今在纽约，所谓的村与我们中国人头脑里的村完全不搭界。这里，村是前卫艺术文化的代称。我住的东村与纽约大学附近的格林威治村和西村，是纽约年轻艺术家、作家积聚之地。走到村里，遍地是小酒吧、咖啡店、小剧场。光西村就有139个剧场。这里最有名的同性恋街西四街、克里斯托佛街，是纽约同性恋文化的中心，染发的男人戴一只耳环的男人，穿戴简单贴身显露体形的男人，彼此勾肩搭背，夜里还有戴着面具打扮成鬼的人。

沿街店铺多出售银质首饰，旧首饰，奇奇怪怪的T恤衫，旧

唱片之类。到了这儿，就像到了世界的另一端，各种非常态的生活和人的想象力都有充分发挥的自由。

村里有个以跳裸体贴面舞及吸毒被取缔的“石头墙酒吧”，有过去欧洲移民留下的古典楼房，现在身价百倍千倍，有的以名作家艺术家曾住过被载入村史。

导游指着六大道上的现纽约公立图书馆，说这个教堂建筑过去是一座法院，顶层的尖顶屋还关过犯人。

我们站着的地方朝北有帝国大厦，朝南有世界贸易中心。而中间是这样的一个村，好像这正体现了纽约这个地方的戏剧性和多元特征。

光有财富的纽约不是真实的，还得有艺术；光有一种艺术也不行，得有各种艺术。林肯艺术中心不能少，村里的街头艺术也不能少，地铁里的弹拉艺术也不能少。

编一个口头禅吧：是人是鬼，有钱没钱，都可以到纽约来。

逛了村里，我去联合国听一个“美国妇女健康问题”的讨论会。我从学校贴的广告上看到这个消息。在国内时我对妇女问题有兴趣，在一份对外交流的杂志上多次撰文探讨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还自作聪明给当时的全国妇联黄副主席写信表达鄙人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和看法，黄也是我的校友，就回了信，说，关心妇女问题可以做很多事，建议我和重庆妇联联系，做些义务工作。



后因忙于出国也没顾上。但在联系美国学校时，也申请了“女性学”研究专业，可惜没被录取。来美国后，虽然学的写作，仍对妇女问题比较关注，所以选择了当《革命与进化》的编辑。

我们全部编辑人员都是自愿参加的学生。由一个研究“女性学”的博士生带头，负责定期编辑、撰写、出版、分发杂志的全部工作。我们每周一在华盛顿广场边的“紫罗兰咖啡店”聚会，因为经费有限，每人只能点一杯咖啡或茶，边喝边商谈有关的专题，审阅来稿。

这一期我们要主持一个民意调查，如何看待政治与女性。

初步选了这样六个问题：

你认为美国在什么时候可能出现女性总统，下10年，25年，下个世纪，或永远不会？你如何评价自己，对政治有兴趣，略知一些政治动态，或对政治不感兴趣？

现在女性候选人是否和男性候选人一样可以获得同样的政治席位？……

今天我去听这个讲座，也特意带了一些调查卷发给在会场的人，她们从事妇女工作多年，也来自不同的领域，想法应该和学生不一样。

快十点时，马克打电话来，说他上夜班，问我有没有兴趣去他们报社看看，然后去采访隧道里的无家可归者。我说我要读书写作，他大笑：哪有作家光坐在家里读书写作？认识社会才是根本。他接

着说，你这样在纽约呆上一辈子，也写不出好作品。这一点刺激了我。

我去他们在中城的报社坐了一会儿，就催他出发。

马克把车停在哈得孙河边，我们穿过一个废弃的车库，进入一个隧道走了100多米，来到一面断墙的洞口。洞口下面有一排石头叠成的梯子，通到地铁线上。

马克说，顺着地铁线再走上100米，就是修斯的家。修斯是马克认识的一个流浪汉，今天就是来找他的。

一路上，马克给我讲了许多他知道的这些人的故事。一个流浪汉买了一张奖券，居然中了奖，跑回南方看母亲去了。有一个老头被几个吸毒的流浪汉劈开了脑袋，就为了十几美分钱。“这些人疯起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也得小心。”我吓得大叫，啊，那今天我的命就交给你了。你要不好好保护我，出了事我跟你没完。

马克抡起粗壮的胳膊晃了晃，让我放心。

修斯是一个30多岁的非洲人，壮实，留着胡子。要是在晚上的地铁里遇见他，我会离他远远的。眼下，他见我们到了，挺热情地让我们进他的家里坐。

他所谓的家在隧道的一个拐角处，用几根木条撑起一个架子。里面有一台电视，一部收音机，一张床，地上到处堆着从垃圾箱里检来的物品，有的成色还不错。一张桌子，桌上堆着一些瓶子和炊

具，还有几把椅子。

我们各就各位地坐下。马克给修斯一个纸包，也不知装的什么。修斯接过去放在口袋里。

当修斯给我们煮茶的时候，马克拍了几张照片。这是事先与修斯说好了的。不一会儿，修斯端来几杯茶，说是印度茶。

“我在这儿住了快7年了。这儿是我的家。是我的。极少有人来干扰我们，连偷儿强盗也不大来。我喜欢这儿，不喜欢上面。”

他指的上面是地面上，说：“那里充满了混乱。我喜欢宁静，隧道里才有我认为的宁静。”

他摸了一把自己的胡子。

“上面的人撒谎、欺骗。在大街上人模狗样，制造混乱。只有到了我们这一层才安全。人人都害怕黑暗，但黑暗并不可怕，黑暗才安全。我喜欢这个地方这环境就是因为这点。警察都害怕这种地方，来的人越少我们越好。偶尔会有一些偷情的或杀人的会跑到这儿来。前一段，有个人被活活烧死在铁轨上。”

“你们在这儿以什么为生呢？生了病怎么办呢？”我忍不住问他。

“我们卖书，卖罐头盒子、瓶子，还干一些小偷小摸。”他说：“这些够应付基本的开销了。买食物、木材和水。以前隧道靠东墙处有一条水管，后被切除了。我们只好去买水。我去和他们交涉过，

他们知道我们并不乱来，还显得很有礼貌。但他们切除水管给我们带来了混乱。我们没有电，用蜡烛光，但冬天冻得受不了，这是致命的。我生病都是因为太冷。然后就吃中药，嘿，还真管用……说到罐头盒子，我一个卖两个的钱，当然不是卖给那些赚钱的店里，我们另有买主。那可是一笔不少的钱。一个礼拜可挣 1 5 0 0 美元，相信我，真有那么多。这里有的人不知怎么管理自己的收入，有时就出麻烦，吸毒，我偶尔也试试。”

当修斯给我们讲他每周挣 1 5 0 0 美元时，坐我旁边的马克咧着嘴使劲点头，故意赞同他。

这里可丝毫看不出主人月薪有 6 0 0 0 美元的痕迹。那可是一般中产阶级的收入标准了。修斯一直表示他的生活很不错，有吃有喝。比上面那些人还吃得好。所以他认为自己也是中产阶级的一员了，并看不起上面的那些中产阶级。他下面的话还真吓我一跳：

“我曾在马利兰大学读过新闻学。开始在一个电视台工作，但他们让我买咖啡干杂活，我不愿意。后来我发现了这个隧道，当我没有住处时，就搬来了，一住就是几年。我还上过电视，德国有一个女人还要在这里拍一部我的电视片呢。”

这样看来，修斯并不是一般的无家可归者。他有文化，谈吐也不俗。

走出他的家时，我们看见墙上有一幅画：一个被锁链缠住的大

脑，脑髓的纹路画得很清晰。旁边写着：“现代社会是知识分子恐怖主义的罪魁祸首”。

修斯对他现在的生活似乎很满意：“我在西边捡了5年的罐头盒，这很值。现在我只守家，让别的两个伙伴出去。我做饭，然后休息，他们回来时，我的饭也做好了。上帝是一个公正的神。只有在这个层面上，他才把你需要的都给你。这是一个宁静的地方。”谈话时，他进进出出地，一会儿到外面的小空地上把散乱的几张报纸归拢，一会儿又揉揉他的腿。这个地方只点着一根蜡烛，显得很暗。冬天，他躺在床上取暖。看看电视，听听新闻。日子也满惬意。

告别时，修斯对我们说：“一个人一旦变成一个无家可归者，到了生存的这个境地，太多的事情就不同了，要想再调整回到那种正常状态，也非常困难。”

“我这一生没有遗憾。”他大声地对我们说着，当我们穿行在黑乎乎的隧道时。回声响了好一阵子，才消失在长长的洞子的尽头。

一出洞口，我问马克为什么对这些人感兴趣，采访他们。

“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啊。我也当过流浪汉。我只关心下层生活。过两天，我还要去采访纽约市内好几座废弃的垃圾站。这些地方排出的废气毒气严重影响了大气环境，包括你所呼吸的空气。”

他把车停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一条街上。外面下着雨，我摇下了车窗，雨一丝丝地飘进来。马克拿了件雨衣盖在我身上。我猛

然有一种想了解他的冲动。

“给我讲讲你自己吧。”我侧过身子看着他。

他拿出一副墨镜带上，头朝车外：“我出生在纽约州府奥伯尼。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意大利人，所以我是个杂种。在这个城市待了十几年。我住过曼哈顿十几个地方，有时半夜醒来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为了付哥大的学费，我在南头海边当装卸工人，一天三四十块钱搬运货物，有时没活干时，饭都吃不起。”

“你是美国公民，总比我们外国人容易些吧。”

“也对也不对。像你这样的中国学生大多有奖学金，我可没有，全靠贷款和下苦力。我至今都还在还贷款。”

我看着他觉得他也是普天下的劳苦大众之一。顿生同情。我摘下他的墨镜，以为会有满脸眼泪，结果一滴也没有。他反倒对着我做了个对眼。他的眼睛很绿，像猫眼一样，到了晚上还有反光。

“喂，那你家人不帮你吗？”

“谁？家人？我没有家人。我父亲也是杂种并酗酒。一喝醉就打我们兄弟三个。后来我母亲离开他，他就更垮了，把我们赶出门。母亲因恨父亲也恨他的孩子。我们兄弟三人前几年才团聚。”

“不过，没关系，没有父亲也没什么不好。我也是没爹的孩子，可我不仇恨，我有其他的亲人爱我。”

马克听我说完，却马上掉转身体对着我，异样地温柔，用手摸

摸我的脸：“可怜的孩子，你也和我一样。”

“不，我和你不一样。”我莫名其妙地反驳道。

马克当潜水员时曾结过婚，因为流动干活，他前妻受不了，要离婚。他就把房子留给她，自己开始流浪。后来他在哈德孙河边有过一个船屋，像一些作家一样生活。后来和他同住的人把船弄沉了，他的全部家当都没了。他也在告那人，要求赔偿。这是他的第二个官司。

真是一个苦命的人。

他送我回家时，说了一句话，你要想留在美国我会帮你。

昨晚我和马克聊起我在找工作，他说，你不是作家么？写故事卖不好吗？我的故事卖给杂志，一千字 1 00 美元。

他马上从后座摸了两本采访笔记本和一只笔硬塞给我，写，马上写故事。我可以帮你投稿。

他听过我的一些怪故事，觉得挺有意思的。他问我有没有电脑，我说想买一台。今天他就陪我去“鳄鱼电脑店”选了这台。他自己的电脑也是在那里买的。

终于实现了我的第一个梦想，用打工的钱买电脑。看着这台灰白色的小电脑，我心爱得不得了。这是我来美国花的最大一笔钱，6 7 5 美元。

## 爱，血，冷，美，黑

昨天写作课上发生的事让人深思。

莫里老师要我们写五个自己最喜欢的词，我写的是：爱，血，冷，美，黑。

再写一个情境。

我是这样写的：在一间屋子里有三张床。外公的老式大木床，床里面上方架着长条横木做的短木箱，里面是空心的，左右各一个小抽屉，是外公藏宝的地方；床前是一个宽宽的搭板，搭板两头各有一小柜子。柜子上是外公做了记号的各种食品杂物，都是很宝贝的东西。这张床占了整个屋子 1 / 5 的空间，我和幺姨的床一左一右靠着有窗的那面墙。白天大人们上班后，我就自由了，在家里翻箱倒柜，哪里有什么我都知道。外公的宝贝自不必说，他那些做了记号的食物我也有法子盗用一点再复原，他从看不出来。最大的发现是我在大衣柜的抽屉里发现了芹姨的一整抽屉的情书。我一封封读，看着看着，好像我才是那个被别人爱的女人。那个读信的我不是五六岁而是 20 来岁刚刚学会折磨男人的大姑娘。恍忽间觉得自己充满了情感。直到墙上的大闹钟一敲才猛醒，大人该回来了，做个记号第二天再接着读。

夜晚是最难熬的。10 点钟外公得睡觉，便要熄灯。黑黑的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了，我却睡不着，怕得要死。觉得眼前的一切都不



是真实的，都是转瞬即逝的，可我不能没有这一切，这一切也不能没有我。

莫里老师说她喜欢我写的，她要我们用这些词汇和情境写一首诗，下周带去课堂讨论。

本来是高高兴兴的一堂课，可上到一半时，黑人女同学丹尼哗地站起来，“这是什么词汇练习，分明是心理测试，带污辱性质。我抗议！”

我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丹尼愤怒地冲出了教室。全场顿时一片沉默，大家不知该怎么办好。

隔了好一会，莫里老师说：“诗歌写作与每个人的根源、历史、文化背景本不可分。如果某个人用了黑人这个词，那是个人的差异，不是这堂课的目的。”

话一出口，加拿大来的爵微儿吓得哭了起来，唔唔地道歉说：“都怪我不好，我不是故意的。”说完，她也抓起桌上的东西跑出去了。

原来，爵微儿在写自己不喜欢的五个词时，用了N E - G R O（指黑人的俗语）这个词，导致了丹尼的抗议。

结果一堂课不欢而散，没有人知道该说什么。班上的同学大多数是白人，谁也不想在这个时候表示意见。从上学期切瑞特的辞职我已感觉出，美国的黑人问题以及其它的种族问题普遍存在，但尤

其以黑人问题最敏感。很多人都像踩地雷区似的特别小心。

文学传记课老师很有意思，每次上课他都带一瓶甜酒来，放在桌上，从包里摸出一摞塑料杯，一叠纸巾。同学们互相传递着，每个人自取。

从开学至今，我们讨论了美国在传记领域的发展状况，有哪些类型的传记作品。这门课的目的是教学生如何从头开始从事传记的写作。

首先我们每个人要有个选题，然后，收集资料采访各方有关人士，最后才是写。

教授坐在圆桌对面，抿一口酒说：“收集资料是一个非常复杂又漫长的过程。有些传记人物或他的家属根本不愿被写，像美国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自杀后，她的生平故事和诗歌创作广受瞩目，可她的丈夫英国诗人泰特·休斯拒绝合作，封闭普拉斯的日记、信件和一切可能的资料，任何人都无从下手。还有的作家留下遗嘱，他的日记信件50年内不得公开。”

教授还举例说，他曾无数次打电话给一位年老的艺术家，想寻求他的合作写一部传记。每次老人客气地回绝他，他也不管，逢年过节打电话问好，或寄张贺卡，顺便问老人：“您改变主意没有？”

就这么问了多年，老人有一年因病住院，教授打电话去问候，老人终于说：“你来吧，我可以接受你的采访了。”

教授高兴地讲了这个故事，还把手指头含在嘴里，使劲咂了两下说：“当传记作家得非常耐心，好脾气，才能找到或等到好的传记人物。”

大凡传记人物多为公众人物、历史人物、作家、艺术家，收集他们的资料也往往包罗万象，除了他们的作品、信件、日记等，还可能包括出生公证、死亡公证、身份证、驾驶证、结婚公证、房屋产权证书等五花八门的东西，仿佛无证不成书；资料来源包括诸如图书馆、档案馆、医院、出版社、拍卖行、电影公司，现在又增加了电脑网络。有的还须从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处等地方收集一些保密材料，以确保真实和可靠性，这也是当代传记作品吸引读者的密招之一。而且，在美国，收集资料是一门科学，资料的透明度大，很多东西也是公开的，照章办事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有人际关系或后门。

资料收集最可贵的是找传记人的家属、朋友、编辑或经纪人等获得第一手材料。美国有专门收集作家手稿的机构，有艺术家的档案馆。所以要写一部传记作品非十年八载的工夫不可，写出来你就可能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了。

我们这学期每个学生要做三次课堂报告，讲述自己收集资料 and 准备进度；另外请三个传记作家来课堂上报告他们如何完成一部传记作品的全过程，也回答同学们的提问。期末每个同学最好能交二

十来页的传记作品。

唉，又得冥思苦想了，我可不知道自己想写谁，又能写谁。

有同学就说：“写克林顿一定有市场。”

老师说：“你要愿意，还可以写希特勒，他是最好的传记人物，可你到哪里收集他的资料？”

晚上下课差不多 11 点，走出教学楼，看见马克的车停在门边，我走过去，看见他三更半夜还戴着墨镜，双脚踏在方向盘上打瞌睡。马克事先说过要来学校等我，说他轮休，要带我去北部著名的音乐小镇乌兹达克看看。

我轻轻地敲车窗，他一把把我抓进去，说：“看见你，我就忍不住。”

我一路睡觉，到了汽车停下时才醒来。面前是一个山里的汽车旅馆，我让他找有两张床的房间。他奇怪地看着我，没说什么，照办了。晚上两人相安无事。

早上起来，我们去爬山。他问我为什么不愿和他睡觉？

“你和我交往不是就为了和我睡觉吧？”

“如果互相喜欢，为什么不呢？”

“可我还没想好自己是否喜欢你。”

他受污辱一样地不理我，后来爬到山顶上，冷不妨地抱住我，使劲地亲，还咬我的耳朵。

我大叫：“你疯了，是不是？”

“是的我就是为你发疯。你这么好看我受不了。我要和你去中国。”

山风很大，风中夹着我的声音：美国鬼子！美国佬！

这几天不想见马克。那天他在乌兹达克疯狂亲我的耳朵，差点把我憋过气，还导致了我的耳膜出现一个小洞。

马克打来电话，希望有更多时间和我待在一起。问我，可否愿意搬去和他同住。他觉得遇上自己钟意的女人很危险，工作时一有空就想到这个女人，没有了自我，没有自我的男人很可怕。

我说：“我还是学生，非常珍惜这个学习机会，没有精力谈情说爱，你自己出去散散心吧。”

“你真是一个冷酷的女人。好吧，我自己来解决。”

这两天天转冷了。马克果然不辞而别，离开了纽约。半夜他从一个朋友家打来电话，问我为什么不喜欢他？

我说我根本没心思琢磨这件事。爱情现在对我是太奢侈了。我要读书打工写作想家，哪里还顾得上别的。他不死心。

第二天晚上他在高速公路上打电话来，说车坏了。

我说你车坏了打电话给我，我也帮不了你。

他叹口气，说没想到世界上有这么狠心的女人，一副痴心汉的口气，听得我直想笑。

他一本正经地在手提电话那头讲故事给我听——

有个男人这辈子存了很多硬币零钱，希望有一天用这些钱去旅游。等他终于有了足够的钱又有了时间去旅行时，他爱上了一个女孩。每次见了女孩，这男人就想和她做爱。可女孩不爱他。他只好逃避，一人上路。一路上他都在思念着女孩，不停打电话给她。每次都是留言机响，他不知道该说点什么，便挂了电话。这样多次后，他终于在路边停下车不想再前进了。他想知道女孩在干什么。这一次他又打电话给女孩，女孩拿起了电话，问：你是谁，为什么老打电话又不留言？他说，我一直在等你拿起话筒然后告诉你我没法不想你不和你同行。女孩说，我一直在等对方说话，只有知道是你我才会拿起话筒，不是你我就不接。原来女孩在这个男人离开后，才发现自己割舍不下他。

我说：“马克，这个故事讲的是你自己吧，我可不是那个女孩。你赶快修车去。”

## 第六章 倾听大萍果

### 替查理打工

昨天回家收到郑先生的留言，希望我一回来马上往他家里打个电话。原来是有个华人组织想招用一个人，郑先生推荐了我，让我马上去见他们的主管查理。

我按照约定地点到了中央公园南边花园大道旁的一家旅馆，见到了查理。

我们坐在楼下的钢琴酒吧里喝咖啡，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会问我什么问题。

查理个子小小的，但很有气魄，精神抖擞，像个军人。他笑咪咪地问我是中国哪个地方的。听我说重庆，他马上说，抗战时期我也在重庆，在国民党的外交部工作。重庆是个好地方，可惜战争残酷老百姓遭殃。我们那时住在南坪，到处可见逃难的人，有的死在路边也没人管。惨啊！中国现在是到了千载难逢的时候，必须自强才不受人欺负。

我听他的话觉得这人满有中国情怀，颇有好感。

他说：“我们这个组织奉行的是‘落地生根，饮水思源’的精神，我们都是中国人的后裔，来自不同的地方而已。对内对外政策我们讲究‘求同存异’，为一个共同的大目标努力。”

忽然，他话锋一转，问我：“你如何看待海外的民运人士和人权运动？”我不知道他是什么观点，只能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我也是学生出身，但对有的民运人士出国后大骂中国，有的甚至不惜欺骗制造谎言让西方人同情，我苟同他们的做法。我想，海外的中国人也是形形色色，大多数是爱国爱家乡的。

我告诉穿着笔挺西装的查理：“我来自一个贫困地区的贫困家

庭，小时候生活非常艰苦，粮食、布匹、食用油、糖果通通都是凭票供应，一个月几两，感觉从未吃够过。我外公还总是口积牙存省下少得可怜的供应肉，用盐和油泡起来留着过年吃，有时都生蛆了，有时发腊了刺喉咙也得当个宝吃下去。日子过得多苦，中国老百姓真是天下最好的老百姓，能忍。后来我读师范学院由国家出钱发生活费，后来又读研究生也是国家出钱，我都赶上好时候，有什么理由责怪国家？”

查理听我的话，只微笑不做评价。

最后，他问我可否周三就开始去上班，因为他们办公室目前就他一个人，急需有人坐班。

我说，我正在申请一个在联合国宗教司做实习生的机会，他们答应这周末回话。

查理倒干脆：“这种机会以后还会有的，我们这儿是急需呀。何况做实习生是半义务的，你们学生多少需要钱呀。”

我想想也是，做好事也得有一定的基础。

周三开始去替查理打工。坐地铁晚了3分钟，查理有点不高兴，与昨天的和蔼截然不同。

所谓的办公室，是租的二楼楼梯下面一个狭长的过道。除去满屋的办公用品，杂乱无章的纸箱，只剩下一人宽的余地走路。

第一天的工作紧张而混乱，查理也是不停地接受电话传真吩



咐，然后吩咐我，都是索要急迫。这个文件得马上打出来，谁谁谁要；这个人要什么资料，马上找出来；我们连谈论我的工作计划和责任的时间都没有。办公室的资料档案如何分类保存在哪儿也不知道，只好临时抱佛脚，要什么时找什么，非常被动。有时候正在干一件事，查理忽然想起另一件事，只好马上停下。

从查理的唠叨中，我知道这个办公室换了几拨人，所有的资料文件报告都散乱放着，每次没等到整理好，往往又因为各种原因换了人。

查理本是一教授学者，对管理这套也不太懂。服务对象们都是些大老板，他全心全意也应接不暇，还总受责备。我在一天之内所听所见，感觉这个工作的压力之大出乎我的意料，深深佩服查理的能耐，他已是70多岁的人了。他感叹说，还不是为了一个共同的想法，我才这样努力，要为私，我才不干呢。

我的午饭是在下午3点钟时才吃的一块匹萨饼。

下班之前，终于有个机会谈论我的工作。

查理说：“你最紧急的任务是把办公室完全地整理出来，把散乱的资料都分类归纳，写出这几年的财务报告，有关资料都在这间屋子里和电脑里，你自己想想办法怎么办。我也尽量帮你。”

我听得脑袋发麻，好像掉进了一个大水池，不知道从哪里游上岸。

这么打工我还是第一次遇上，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这一段时间除了学校就是替查理打工，清理满屋子大大小小的纸箱，把不同的资料归类，在这过程中我也读到了查理他们组织的内部文件和有关它的新闻报道。



为查理打工

该组织当初成立是在“六四”以后，为修补过分紧张的中美关系。他们中有来自中国的和美国出生的，所以各自背景不一，与不同的政府有不同的关系，但有共同的利益，大部分是商人。最近竞选华盛顿州州长的骆家辉也是他们的成员。

我看到一份对中美关系立场的声明，觉得很有见解：

身为美国华裔，我们对最近台海两岸的危机及中美关系深表关切。我们都有双重文化的背景，因此认为必须要站出来说话，帮助寻求途径，使美国及台海两岸的人民，争取到双赢的局面。

我们特建议：

坚定地维持由尼克松总统发起，并由尔后历届政府遵行的“一个中国”政策。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是由中国的历史形成的。中国在最近的150年，饱尝到日本及西方殖民列强的侵略，丧失领土及受辱的苦痛。这种对历史的反思，使中国必然会要求，只有在

互相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双边关系。

中国不断地在国内及国际方面走向法治，我们热烈地支持这种运动。这是为中国培育人权，保护美国的对华商业投资及智慧财产权的最好办法。

经常举行美国及中国的领导人的高峰会议。首次的高峰会议要尽早举行。寻求在军事、政治、经济以及环保诸方面和中国领导人进行有建设性的对话。

虽然中美两国间有互相不能同意的很多问题，两国应该把力量集中在两国彼此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对 21 世纪的亚太地区应有长期展望，使美国和中国可以在经济战略和全球问题上合作，保障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发展一个明确，连贯并有两党一致拥护的中国政策。鼓励中国内地和台湾的对话……

我为自己读到查理他们的内部文件暗暗高兴，但也觉得这没什么好保密的。查理当初告诫我，一定不要把内部资料带出办公室，那紧张神情好像满世界都是 F B I 似的。我当然不会去违反他们的规矩，同时也犯不着为此丢掉这份差事。

今天一进办公室，查理说，我们要赶快做一份简报，报道全国各地我们会员的动向，否则有人会说这个办公室没有起到沟通交流信息的作用。说完，给我一大堆从中英文报纸剪下或复印的资料，

让我先看一遍，用英文简要草拟一份两页纸的内容，他再修改。希望今天做完。

我说，我尽力而为吧，拿张纸边看边写：

第一条：10月14日出版的《富比士》杂志评选出今年全美最富有的400个人，王嘉廉和另外三位华裔美国人当选其中。王为这4人首位。比尔·盖茨为第一。400人中有217是从零开始积累财富；400人中有23人为第一代移民。

第二条：《新象周刊》8月16日报道中国画家丁绍光，介绍他在中国云南开始的绘画生涯，以及他1980年来美后的发展，文中称，他的画是在美国的中国画家中价格最高的。

第三条：《世界日报》8月16日报道我会成员欢迎多尔对合法移民的支持。多尔在一次演讲中陈述他对移民的观点，他说，合法移民应该享有和其他所有美国人同样的权益。祖炳民说，美国政府应该象多尔说的那样对待移民：对非法移民关上后门，向合法移民敞开欢迎的大门。别的一些成员也做了类似的表态。

第四条：根据中国新闻10月10日报道，田长霖访问家乡武汉受到热烈欢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校长田长霖和他的姐姐访问武汉黄坡县。他们表达了在家乡投资为武汉建设出力的意愿，受到当地政府的热烈欢迎和支持。访问期间，田长霖还给武汉政府官员和武汉大学的学生分别做了演讲。今年5月田长霖被中科院选为外

籍院士，受到江主席和李鹏总理的接见。

第五条：连战获纽约科技大学荣誉学位。《世界日报》8月24日报道纽约科技大学向连战颁发荣誉学位，科技大学校长张钟睿说，这一举动是表彰连战所谓的“爱国精神”，杰出的领导才能和政治成就。

正在进行时，电话响了，有个重要人物需要一份文件，并要特快邮件寄，周一要收到。查理让我停下手里的活，马上打的去特快专递邮局。我连外衣都没来到及穿上，就抱着文件出门了，边下楼边想，我要是孙悟空就好了。

## 马克，马克

在《革命与进化》杂志聚会上，我们讨论最近一条新闻“7岁男孩与性骚扰”。

皇后区有个7岁的小男生，强行亲吻一个女同学，被控性骚扰，引起社会各界的争论。一种论点是，一个7岁的孩子没有性冲动，扯上性骚扰完全是女权主义的过分反应；另一种论点是，不管是否性骚扰，这个男孩明确告诉他的母亲说，当我亲她时，她很不高兴，不愿意我这样做。可他还是亲了，从这一点看，至少男孩子没有尊重他人的意思，应受惩罚。我的看法是，法律自然重要，教育却应先行。对一个几岁的孩子因为这样一件事施之以法，可能过于严酷，将导致他未来仇恨社会走向犯罪。

编辑部的同学也赞同我的看法。我们基本上不认可女权主义以激烈方式反对社会，我谈到在中国，人们甚至说，女权主义过时了，现在应该谈男权，因为男性觉得他们受到不公正待遇。

当然这是又一种偏差。他们为什么不说，抛弃女婴，贩卖妇女，逼迫妇女卖淫等社会现象。众所周知，在全世界范围内，女性的地位远远低于男人。在美国，既存在男女同工不同酬，女性还没有堕胎自由的现实，也有女同性恋争取恋爱结婚自由。在日本，女性和男性同行，需要慢两步走在男人的身后，如有行李包裹，得由女人肩背手提；在中东的一些国家，女性不能和男人同吃同行，更不能平起平坐谈论国家大事。可为什么这个社会意识不到这些整体的大的偏差，而仅仅看到一些偏激的女性活动就给以全盘否定。

我不主张这个杂志办成那样，我们应该客观地探讨一些问题，各抒己见，力求办出一定的水平，也吸引大多数读者看。

下午我和盲眼同学大卫有个诗歌约会。他上周写了一首诗谈他在盲人寄读学校时，第一次产生性萌动的男孩子心理活动。诗大概讲，午餐时他吃了一个橘子，后来他和一个女孩坐在一起，他摸了她，整个下午他都从自己的手指上闻到橘子的味道，从此他觉得性的味道就是橘子的味道。

课堂讨论时，有人说，性的味道不是橘子的味道。

我心想，怎么这么笨？便回答说，那是因为他中午吃了橘子的

缘故。橘子的味道很长，轻易不会消退。

我和大卫谈起这首诗，他很高兴我的理解正确。

他向我讲起他和他的同胞兄弟，两人生来就是盲人。弟弟非常聪明，作曲、写诗还在酒吧唱歌，深受周围人的景仰。他自己现在打两个半工，一个是在学校教书，一个是做电脑工作。每次上课，他和他的狗都得从宾州坐汽车坐火车然后在纽约还得坐地铁。但从未出过事。他总是班上最认真的学生，老师讲的他都录下来，回去再用盲文做笔记。

我盯着大卫的眼睛说：“我真不能想象你这么能干。这么出色。换了人，早愁死了。”

他笑到：“邵，你不知道你自己也能干，一个人到了这儿。”

“其实很多中国人像我这样来到这个国家，我们基本上都得到善待。真要感谢上帝。可我的诗不够好，有的同学说像童话。”

“不，”大卫说，“你的诗很有个性、赤裸、野性的真实。我们都佩服得不行。像童话也没有什么不好。”

我们交谈时，他的狗会时不时哼哧一下，大卫便抚摸它，说：“乖女孩，别闹。”狗便真的安静了。

大卫一边摸它一边夸奖说：“这狗是专门训练过的，跟我有七八年了，我们相依为命。它非常棒，没有它我什么也干不了。”

大卫说话时，他眼睛里白泛泛的肉会眨一眨的，但没有光，令

我想到了外祖父那只瞎眼鸡的眼睛。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据我所见，纽约的建筑物，公共设施，包括公共汽车，都有专供盲人使用的通道或滑梯，司机和乘客也都对盲人和其他残疾人很客气礼貌。

又被马克诱惑着去当了一天冒牌记者，采访了一起强奸案和一桩弃婴案。

马克知道我对他的工作很有兴趣，所以每当我不想见他时，他就说我带你去采访怎么样，我总是答应他。

我在约好的地方钻进了马克的车。我们第一站是去西村。

凌晨两点钟的时候，在西四街与银行街之间的一栋楼房前，一位女人被强奸了。当我们到那里时，四周静悄悄的，除了有几辆采访车和几个记者模样的人之外，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我们在附近的几条街走了一遍，没什么特别的，就回到事发的那栋楼前。楼前的台阶上我看见一些暗红的血滴，顺着血滴我走到马路边，一辆车停在那里，马克试着与路人或住户们谈一下。可大多数的人反过来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凌晨时分，他们被外面的警察和一些声音吵醒过。而且据他们说，住这一带的人有不少在圣·文盛特医院工作，有的会上晚班。所以，他们并不奇怪晚上有时有点吵。看来，我们不大可能从路人中获得多少情报。

马克决定进那栋楼里看看。我留在外面继续观察。过了好一阵，



一个老头从对面的楼里出来。我装着没事似的对他笑了笑。

他神秘地问我：“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我摇摇头。老头凑上前对我说：“发生了强奸案。”然后一五一十地讲他所知道的一切：

半夜两点左右，我听见外面有一个女人的声音：“放开我，放开我。”然后又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叫：“放开她，放开她。”我探出窗外一看，见对街路边停着的一辆车旁，一个男人从地上站起来，实际上是从那女人的身上起来。因为车挡着我的视线，不见下面。往下猛划过两拳头向东跑了。从街的另一头跑来两三个人。我看见那男人戴着一顶帽子，肤色很深，大约20多岁，便打了911，然后来到对街。被强奸的女人被扶到了台阶上坐下，她脸上流着血，所以也看不清面貌……

马克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旁边，他问老人：“那女人是不是住附近的？”

老头说不像，长相不熟。

马克自言自语道：“那她半夜在这儿干吗？这一段正是扬基球队的球迷们疯狂庆贺他们胜利的时候。附近有酒吧或夜总会吗？”

“有一个，就在下一条路上。”

马克又问他：“那几个跑来的人是谁？”

“是拐角处那家‘新戏剧食品店’的伙计。”

正说着，两个警察局的侦探过来了，马克就打听了一下。

那个矮个头的人对我们说：“那女人在附近圣·文盛特医院做护士，可能是上下班路过此地。”

马克问那女人情况如何，矮侦探不回答了。

这种案子涉及到当事人今后的生活，所以媒体也得谨慎，不可泄漏的一定要保密，否则还可能吃官司。

随后，我们到“新戏剧食品店”想采访一下那个勇敢的店员。但被告知，他要晚上8点以后才上班。

我看见，整个过程中，马克不断用手提电话与报社联系，报告案情的进展，报社掌握的情况，以及有否新的任务。下午两点马克被告知一桩刚发生的弃婴案。于是我们上车，赶往布鲁克林区，去采访今天的第二个案子。

在布鲁克林区N大道与海湾大道之间的一个住宅区，一个出生一天的女婴被发现扔在一个路边的垃圾箱内。

我们赶到现场时，许多人围在那里。警察把垃圾箱四周都围起来，不让人靠近。人们三五成群，议论纷纷。国家广播公司（NBC）、美国广播公司（ABC）、纽约一台等都在采访电视新闻。记者们千方百计地搜寻独家新闻。我和马克也站在不同的地方，以便探听到不同的信息。

我的眼睛到处搜寻着谈话对象，两个男人很有兴趣地看着我，

我便走过去。

“嗨，你们好。”

其中的一个问我：“你也来采访？”

我一笑，算是回答。

“什么报的？”另一个问。

“中文报”。我谅他们不知道任何中文报，便懒得去多说。

他们告诉我是兄弟俩，而且，兄弟俩都喜欢中国女人。我并不奇怪，但故意问他们为什么。两个人很有兴趣地说，中国女人漂亮，温顺。

“温顺？我温顺吗？”我显得特天真，对他们的话非常温顺地专心听着。

等他们说够了，我开始：“你们住这儿吗？有没有看见那个婴儿？”

他们凑近我，小声地说：“最先是这栋楼的一个小孩听见垃圾箱里发出声音，她告诉她母亲，然后她们打开垃圾箱拎出一个购物袋，发现了那个婴儿。于是报了警。”

我大喜，问是哪一家人发现的。

他们悄悄指着底楼的一个窗户，我明白了。然后我便对他们甜甜地笑一笑，表示先去工作，待会再聊。

我从人群里叫出马克，把情报告诉他。他也很高兴，连说：“不

错，不错，干得不错。”

我们来到那栋大楼，发现大门锁着。后来有人出来，我们问可否进去，得许可后，进到里边，商量由谁出面去找那个发现婴儿的母女俩。

马克说由他先去，便去敲门。我躲在一边。

门开了，没等马克说完话，门内的女人一声“对不起”，就把门关上了。

意外的是，那两个我们在西村遇见的侦探也在这个现场。我们一无所获地出来时，那两个家伙正要进去。

矮侦探说：“你们看上去是很好的一对搭档。”

马克兴奋地连说别开玩笑，别开玩笑。

我说：“你和马克看上去很像哥俩，你是不是意大利后裔？”

他高兴地与马克说了两句意大利话。

我们去马路对面的店里买了杯咖啡，还捎了两瓶水给那俩侦探。他们刚刚和那个捡婴儿的妇女谈完话。

待我们进车准备离开时，矮侦探走过来，马克立马摇下车窗，道别似地听着：

“女婴被发现时，被包在一件金黄色的T恤衫里，放在一个购物袋里，然后像装着的垃圾一样被放在垃圾箱里。她母亲是一个阿拉伯女人。医院已给女婴取名，体重正常，目前健康良好。”

矮侦探若无其事地走开后，马克摇下车窗，掏出电话，马上与报社联系，把所有的情报告诉了编辑。

晚上我们又回到“新戏剧食品店”去采访那个店员。

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矮矮胖胖的西班牙裔人，英语不太好，可很高兴我们采访他。

西班牙人略带兴奋地说：“我在这里开店20多年，左邻右舍有什么事，我都会站出来。昨晚大约一点钟，有个女人来买烟，说看见一个住十三街的女人正被强奸。我和另一个伙计跑出去阻止，随后又报了警。”

马克说：“你做得很好，我在文章中写上你的名字你不介意吧？”

那人憨憨地挥了挥削胡萝卜的手说，没关系。

和马克分手时，我给他读我记的笔记，他说：“你可以写成故事卖给中文报纸，做自由撰稿人嘛。”

“现在是实习，学习学习。前一段我曾去一家报社面试过，他们要做全工的，每周六天工作，我不愿意为了挣钱耽误了学业。以后再说吧。”

马克问我喜不喜欢他这工作，我说喜欢，他便问我：“为什么不天天读我写的故事，全纽约多少人喜欢我的故事，你为什么 unread，不买报纸看？”

我说：“真对不起，我每天要读的功课都没读完过，再说，要我每天花五毛钱买你们的报纸，读这些杀人放火的事也不值。”

他又生气了。我在家门口下车时，他连再见也不说就把车开走了。而平时他会看着我进了大门才离开。

这已不是第一次了，我也无所谓。他这么好这么有名的记者居然不被我崇拜，心理特不平衡。我们有时会为此几天不理对方。

有一次我们争执很厉害，我气得中途下了车，他气得在车里大叫，你不回到车里，我把你的中国磁带扔了。

我想这种孩子气的吓唬我才不怕呢，后来当我得知他真的把我喜欢的中国歌剧精选磁带扔了后，在电话里大哭大闹，他吓得沿原路找了一遍，没有找着。后来被我拖到中国城的东方书局买了类似的一盒赔偿才算了事。

我们之间交往越多，问题也越多。有时是语言的误解，有时是各自背景不同导致的。

有一次我们聊天，我问他一切还好吧，他说W H A T - E V E R，即不管怎样，或无论什么，无所谓的意思。我觉得这个词很好玩也想用用。他问我，你的男朋友还好吧？他是故意气我，有时我不和他出去，他就认定我有别的男朋友。所以，我也用他的话W H A T E V E R回答他。他一听，差点没把我从车里拎起来扔出去，觉得这样的回答证明了他的猜测是对的，而我和别的男人好简直是

对他这个大记者的污辱。我也觉得委屈死了，为什么一个词他说得我不得，于我不过是新鲜，活学活用罢了。

后来我们讲明白了，我说：“你要再这样无理取闹我就不理你了。”

他把我按在他的床上说：“我们会相爱，结婚，有一大群孩子，所以你还得来多次。”

我心情好时对他的这种大男子作风也无所谓，觉得很酷。马克长得和扬基棒球队的教练很相像，属于那种稍一修饰就酷极了的绿眼睛意大利情种，甜言蜜语一整套，不知迷惑过多少女人。他自己有时也吹牛说很多女人想跟他上床，跟他生孩子，他得意地说你还不愿跟我好，我是多好的一头种马呀。那神情简直不像一个40多岁的大男人，大活宝一个。

我最喜欢他早上起床洗完澡，头发往后梳着，身体还是湿的，不穿上衣，眯缝着眼摇晃着唱情歌，新鲜的表情新鲜的眼神，一个新的快乐的马克，甚至还带孩子气。完全不是那个受父亲虐待被赶出家门，让生活折腾得六神无主的人。

有时候，他教我时髦的脏话。有些话我没听过，像A S S，原意指傻瓜，俗称屁股，现在他们骂人就骂A S S S-H O L E，屁股眼儿，发成一个音，怪怪的。我是听很多人A S S H O L E，A S S H O L E，听了好久也没明白。当然还有别的一些脏话，有的不稀

奇，我们中国人早有了。

很多时候我们要吵架。我告诉我的美国同学，说他怎样怎样，我的同学都奇怪：“如今这样的美国男人可少见，他太有控制欲。”马克听我说起我同学的评价，骂我侵犯他的隐私。他还说，你为什么告诉他们我一见到你就想跟你上床，他们会嫉妒死。

有时我一天不给他打电话他就发火，说：“你不成熟，事事都怪我，自己不承担责任，像个孩子。你要多作自我批评，像你们的毛泽东讲的那样。”很多美国人并不很了解中国，大多知道个文革知道天安门，他知道毛泽东还算有学问了。

我反驳他，你不看看自己，七老八十还不懂事，和你相比，我当然可以算个孩子。

有一次我下决心不再理他。后来他在我的留言机上录下一段话，反悔地说，他这人从未被人爱过，不知好歹，不懂得如何爱人。

我听得差点掉泪，又原谅了他。

## 读书时代

与莫里老师有个约会，开学时我将长江传说一诗交给她，请她抽空看看。

可她没有提任何特别的意见，只轻描淡写地说，这是一个奇妙的故事，你很会讲故事。有些语法与我们美国人用法不一样，可以修改。



然后，她很有兴趣地问我：“你多大了？”

“30来岁。”她看着我说，“这正是女人开始严肃创作的时期。你要多读多写。”

我开始怀疑，他们是否真能够明白我这首诗。

莫里老师建议我读读美国女诗人的自传性质的诗集，而我过去以为写诗不能太自我，否则就太渺小卑微了。这是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文学观。

这学期我集中读莎拉教授的诗集《撒旦说》、《死了的与活着的》、《金色细胞》、《父亲》、《源泉》等。有一次我在地铁里读《金色细胞》，以至于出门坐地铁时也读，最后居然弄丢了，赔了图书馆两倍的钱。

《纽约时报》9月15日有一篇关于莎拉的书评文章，文中称，惠特曼歌唱过的带电的身体，加上唐纳德·霍尔笔下的激情智慧，可能就演变成莎拉·奥茨诗中的那个肉体。1987年3月22日的一篇书评文章中把奥茨笔下的父亲与西尔维娅·普拉斯的父亲相提并论，如果说普拉斯诗里的父亲是从古老而俗丽的恐怖电影里爬出的吸血鬼，那奥茨的父亲是从当代CONTEMPORARY SPLATTERSLICK演变而出的。



1997年12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奥茨有一整本诗集《父亲》对此做特别的阐述。这本诗集写她在患癌症而临死

的父亲病床边日夜守护的感受，以及父亲死后她的悲伤。这里的父亲不是一个模式化的父亲，从奥茨过去的诗中，我们已认识了这个特别的男人。奥茨用几乎非自我意识的坦诚写她对这个高大、强壮、冷酷、吸烟的男人在她心中唤起的敬畏又愤怒的复杂心情。但现在这个男人因为恶性肿瘤正在死去。她勇敢无畏地目睹了这一过程，也在这一过程中重新回顾了她的生命与这一临死的生命的关系，以及生命如何在父亲死后在她身上延续。奥茨不动声色地描述她的细微观察，如父亲每十分钟吐出的粘液和他的像湿水泥的汗味，直到它们和她的内心情感结合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因爱而生的理解，个人的自由跟随真理的探视而发展，走进了很多不曾在诗歌中出现的情感领域。残酷的现实充满了真实、美和幽默而没有辛酸。从死亡中引发大悲，从理解生命中理解大悲。但同时也还有愉悦，作者在个人的大悲剧中，把她的勇敢而欢畅的写作风格发挥到最强有力的程度。

不知是否受了奥茨的影响，我也写了一首《父亲》——

他走向我

在我的一个安宁的早晨

在我没有父亲却完整的童年

“叫我爸爸”

“叫我”

“ 叫 ”

我拒绝了他赏我一记耳光

我们去老镇上参加他母亲的葬礼

他用那样的眼光看我

好像我是他的什么女人

这一晚是仅有的一晚

女儿和父亲呆在一间屋子里

我无法睡觉

担心黑夜里有一只手伸向我

“ 你要再这样跟着我，我把你扔进河里 ”

我看着他眼里愤怒的火

我站在江边的石梯上

等着他给我这个月的生活费

他跑了，一定去赴哪个女人的约会

我不敢空手回家告诉母亲

蹲下来，我双手抱着膝盖

泪汪汪的眼盯着东流的河水

寻找证人似的

我想从那以后我不是一安全的孩子了

如果他要我的命

我保证

我会像送礼一样把命还给他

过了一个礼拜，莫里老师又约我聊天，在她家附近西村的一个酒吧。

我先到，占了一张靠亮处的桌子，等她。酒吧里挂着许多旧式绘画，还有剪贴的旧报纸，好像是介绍这个酒吧当年的状况。这一带过去有很多欧洲移民，尤其是爱尔兰人，所以，酒吧的布置也是爱尔兰风格，它的历史大概也有100多年了。

莫里老师披着一件毛领坎肩来了，花麻麻的颜色与她的头发很搭配。

坐下后，她说：“金耐尔向我提起你，所以我想多帮帮你。”

不过这学期就剩两周了。通常写作课老师帮你就是课外多看你几首诗，提些意见。

好在我包里有两首诗，其中一首“我的曾曾祖母”在课堂上讨论过，我又修改了。

莫里老师看过诗后，问我：“你来美国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是写出好的作品，既做一个中文诗人，也做一个英文诗人。”

我请教她，如何才能使我在美国的时间更有成效，如何达到我的目的？

“要精读，不要贪多，进到一首诗里面去，然后模仿类似的诗，比如，罗伯特·勃莱的诗，还有金耐尔的，奥茨的，爱米莉·迪金森的。还可以通过翻译练习诗歌中多重语气，比如庞德的诗，模仿他的比喻，复合意象，传统的音节，重写，这些看似简单的做法很有帮助。庞德的诗有中国文化在里面，这种血脉的东西我们没有。邵，你知道吗？美国人根底很浅，我们在努力做的是你已经拥有的。”莫里老师的话吓了我一跳。

莫里建议我读简·肯尼尔的诗。简·肯尼尔是诗人唐纳德·霍尔的第二任妻子。这对夫妻诗人辞去工作，住在霍尔祖传的农场，也不工作，专心写作和朗诵。简还去过中国，参观过长城。两年前，简患癌症去世，令很多美国诗人们遗憾不已。

肯尼尔生前有三本诗集，和一本翻译前苏联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译诗集。她去世后，唐纳德编辑了她的最后一本诗集《另一回事》。

晚上刚好唐纳德·霍尔在我们专业有个朗诵，我们一块去听。

朗诵会就称为“共同的一生”，专门献给肯尼尔的。

回家的路上，我的耳朵里回响着唐纳德饱含爱与哀愁的声音。

## 人生的背景

11月正是多尔与克林顿竞选总统最激烈的阶段，忽然爆发出民主党接受亚裔非法捐款事件，一时间，各大媒体大炒新闻：“印

尼李文正家族的力宝集团在美政坛投下巨金，并与克林顿总统及民主党关系紧密。”有线电视新闻网C N N、《华尔街日报》连续几天报道，《纽约时报》一周刊出四篇文章。

整个新闻的中心人物是华裔黄建南。

有一天上班时，查理不在，就我一个人。我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者称是《美国之音》的记者，要了解黄建南的情况。

不一会儿，又有一个称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想了解黄建南。我统统答曰不知道。

《纽约时报》介绍说：“黄建南会讲五种中国方言。他当过康耐狄克大学的中国学生会主席。他还经常对人讲，要参与进去，这是你的国家。不要只知道赚钱。”他建立了一个亚裔人的网络，到处参与各种与亚裔有关的集会，发表演讲，是一个成功的筹款人。同时也处在这次外国捐款政治风波的中心。

今年51岁的黄建南生于中国内地，1949年去台湾，长大后来美国受教育，1976年加入美国籍。他与印尼力宝集团Riady家族关系紧密，曾出任其在小石城的银行行长，于1980年认识了克林顿。这场亚洲非法捐款事件如此引人注目一是关系到美国总统的宝座归落哪党，二是关系到亚裔在美国的政治前途。按美国法律规定，任何党派不可接受外国公司来自外国的捐款。

共和党甚至在电视发布“公告”，用讽刺的口吻问道：“你有没

有看到黄建南？……联邦警官正在搜寻他。”还漫画似地描述，黄“中等高度，中等身材，深色头发，上次被看到时是着西装……他被认为是藏在白宫与雅加达之间。他可能身怀上亿元的生意……知道黄建南行踪的，请通知……联邦警察”。

与此同时，大批的亚太裔两党人士呼吁声援黄建南。一时间，此事的动态成了美国社会和华裔社区的关注焦点。亚太裔在美国的政治地位一直不高，但人口不少，贡献很大。少数族裔的权利与义务是美国社会的一个大问题。许多有远见的亚裔担忧黄建南事件会影响到亚裔在美国的政治处境。黄建南的朋友们评价，黄是一个稳健的人，有智慧和经验，不会做违法的事。有的亚裔干脆认为黄建南成了民主党的替罪羊。有的也反对亚裔利用政治献金的方式来换取亚裔在美国社会的政治地位。

一时间众说纷纭，很难有一个公正的说法。

我替查理打工时，常常会听到他感叹，如果哪天没有关于华裔的不利消息，我的心就安稳一天。起初，我不以为然。可黄建南事件后，我连续从中文报上看到华裔们的复杂反应，才有所体会。像查理这种有学问有地位且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尚且如此，别的人更可想而知了。我们心目中的杰出华裔人士们，原来还有这么多的苦衷。

不过，我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黄建南是个英雄。

查理没回答我，过了一会儿，扔出一句话，在美国，我们要做合法公民。

今天一进办公室，查理高兴得差点没跳起来，他告诉我，终于有了我们的特大好消息。我还睡眼惺松呢，以为是他发财了。

接过查理递过来的《纽约时报》，我才看到上面一篇激动人心的文章，称骆家辉当选为华盛顿州州长是“亚裔美国梦的实现”。这不仅仅是骆家辉个人的成功，也是数百万华裔在美国奋斗200多年来，在政治上取得的又一个来之不易的硕果。

查理认识骆家辉，也参加过骆在纽约的筹款餐会。骆与查理的女儿都是耶鲁大学的校友。

我一口气读完了《纽约时报》和几个中文报纸的文章，才对骆家辉有了点了解。

现年46岁的骆家辉来自一个五个孩子的家庭，祖父那一代移民美国，在华州做工。父亲骆荣硕小时候在美国成长，成年后回香港，娶了内地出生的妻子，结婚后又回到美国。骆家辉的幼年时期，是在政府为安顿二次大战的退伍军人特建的住宅区长大的。他的兄弟姐妹们都曾在父亲的餐馆里帮忙。他从未觉得遭到种族歧视，也不觉得贫穷。高中毕业后，靠部分奖学金和学生贷款进入耶鲁大学就读。后入波士顿大学法学院。骆家辉认为由于父母有培植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传统思想，才有机会让他圆了美国梦。他们兄弟姐妹



五个，家中使用的语言是台山话和英语，不会说国语。他们家的传统是尽量和中国人通婚，只有一个妹妹嫁给了日本人，其余都是和中国人结婚。骆家辉在年轻时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因性情不合而离异，其后十余年，他一直是单身贵族，将时间和精力全部奉献给他热爱的工作，在政坛打下一片天地。

骆家辉当选后，各种媒体大加报道，仅从所用标题可见一斑：“骆家辉跃登龙门，华人振奋。亚裔从政收硕果，伟大的一天”；“骆家辉当选华盛顿州长。美国开国两百多年，华裔州长第一人。”；“树立美国亚裔典范，拓展从政新里程碑”（《世界日报》）；“开创美国华人参政的新历史”（《侨报》）；“伟大的抱负”（《亚洲周报》）；“亚裔美国梦的实现”（《纽约时报》）。

骆家辉的成功当选，不光是美国本土的华人为之感到骄傲，世界很多地方的华人也纷纷庆贺。在他当选后的24小时内，先后收到了中国政府与台湾当局的访问邀请。

王孙来纽约，约好一块去中国城吃饭。前天晚上，久未联络的他忽然打电话来，说他1月份，也就是下个月要回台湾了，因为他找了一份工作，去中央研究院从事研究。

我吓了一跳。

自从我上次离开布朗后，他就很少打电话或写伊妹儿来，我估计是他忙而且对我的冷淡表示不满。我自己也忙，根本没心情没时

间来料理这些。

只记得有一次在《东方书局》，他看到一本关于张爱玲的书，其中有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写她的一段，引元稹《会真记》里崔氏的话说张爱玲：最是亮烈难犯，而又柔肠欲绝。

王孙开玩笑似地说这可形容我，冷漠理性，做事绝决。

没想到他这就要回到台湾，我虽无法阻挡，可心里明白我是舍不得远离他的，他的善解人意，宽厚体谅是很多男性不具有的。

我们坐在靠窗的地方，外面的人在雨中自顾不暇，不知道我在打量他们。我从小就喜欢在雨中打量模糊不定的人群，揣摩他们往哪里去，干什么，如果我也跟上，会发生什么。

我问王孙为什么突然决定回台湾？

他涩涩地说，你不是讲也要回祖国大陆吗？

我遗憾地说：“你是我来美国交的最知心的朋友，希望我们还能做好朋友。”

王孙很少表露他的感情，所以当他告诉我他一直很喜欢我时，我很惊讶。

我愚蠢地问，那你为什么不狠狠地追我呢？

我是没道理地问，他是有理由地答。当两条线无法合并时，只好平行向前，人生最后有一个终点，无缘聚会的人到那时可能团圆。

如果到那时，我们会谈些什么呢？我为我的理想奋斗过，他为

他的科学奋斗过。

这样一种人生，是不同背景的我和他选择的吗？

我就觉得还是家好。可以无忧无虑地听长江水的流动，看河上的帆船走远；仍做那个在岸上招手的小女孩，心中装满了对远方的憧憬。

莫里老师又一次主动约我在这学习诗歌写作。她问起我的经历和我父母的经历，以为我写诗有家庭背景。

我告诉她，我写作是自发的，但我的家乡是一个出文人的地方，有很多诗人作家，大概我也沾了点光。反之我的家人并不理解写作对人生的意义。

“你知道吗，你很少在诗中写到具有自传性质的内容，而这是当代美国诗人们较为重要又普遍的题材。”

我也想试试，有的东西可能适合人诗，有的可能只适合写成小说。不过，上学期我和金耐尔谈话时，他一再要求我写此时此地的事情，不要老陷在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回忆，或自己的传统中出不来。也许，莫里的话是对的，女性作家总有一些特别的题材。这些题材往往是由她们自身生命出发，再扩展为人类共同的经历。这方面我有太多的想法。莫里的话无疑是导火索，让我再次从自己出发吧。

整整一个礼拜以来，我都在想上周和莫里老师的谈话。后来我

写了《流产》这首诗，并鼓起勇气把它拿到课堂上去讨论。我们班的学生除了两个男生外，其余 11 人全是女性。要知道，让女人来读这样的诗，也是需要勇气的。

### 《流产》

那个秋天，我们分手了  
——我和我的初恋情人  
给你而不是给他  
但你没有离开我，留在我的身体里  
我们相伴着度过一段困难时期  
然后我们回到四川，鬼城里  
我让医生把你挖出来  
从心里和肉里  
我是一个杀人犯，我承认  
一个成熟年龄中的女人  
足以成熟到给人类以生命  
那天  
雨在外面泼瓢似地下着  
我在病桌上张开两腿  
那个孩子  
把自己藏在我子宫的某一角落

我是那个病人那个动物  
等着被处理医治  
他们可以选择的方式  
我是个罪恶的母亲  
我甚至没有听你的声音  
没有给你吃奶长大的机会  
可是你教会我如何感到疼痛  
尖叫，如何拒绝再作母亲  
你仍是我的儿子  
我惟一的儿子  
我记着并要告诉  
你永远是所有孩子中的第一个

课堂讨论时，所有的意见归纳起来有两条：震撼人的，诚实的。  
终于忙完了 1996 年。

晚上的气温在华氏 20 度左右，加上连日的大雪，细雨，简直是酷寒。

我穿上我的厚毛衣，外面再套上在北京买的长羽绒服，帽子围巾手套全副武装，活像一头母狼，加入到从下午就开始聚集在时代广场的人海，等着新年钟声，看那闪闪发光的金球，缓缓滑下，在正点时分落到地面。

后来听执勤的警察说，有四五十万人在时代广场看新年灯球。我和朋友力丹及她的儿子，还有外交官也在这几十万人中。

到处是警察、警马、电视录像车、探照灯，地铁口还在不断涌出一拨又一拨的人群，小摊贩在兜售“1997”字样的荧光塑胶眼镜。五毛一杯的咖啡这时是八元一杯，还有鸣叫不停的新年口哨，还有T恤衫、高帽子等。

多数是年轻人，本地外地的都有，借这个迎新年之机想疯狂一阵子。有的人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的人。一会儿，人群忽拉拉向后涌，一会儿又朝前推。有的人带来大音响，放的音乐吵死人。有的拿些喷水器，往寒风刺骨的空中一扬，不知是水，是雨或是雪，飘飘洒洒地落下来。这还没有什么，最怕那些不要命的主，警察的警棍也挡不住，他们乱推乱挤，有的手里拿着喷漆筒，或像炸弹似的东西，看得人心惊胆战。

快到12点时，电视台的采访飞机在低空飞行，人人都朝着飞机尖叫，希望在报道镜头中有自己那张冻得红扑扑的脸。

真等到大球开始从77尺高的支架往下滑时，站在我们这个位置的人只能听声音，看是只能看人头，有时还只看到人屁股，因为有的人坐在朋友的肩头高人一等远眺。已经没有什么秩序可言，你能保证自己平安地呆着就好了。听到远处的人开始叫“新年快乐”时，我们这边才开始，几秒钟的差异，人群开始激动起来，警察们

严阵以待，生怕发生恐怖事件。

看完，不，听完，不，也不是听，是感受完时代广场的降球。  
我们就到了1997年。

## 第七章 送 别

### 迈阿密之旅

昨天打电话回家，知道妈妈又没有得到来美国探望我的签证，她已被拒签多次了。

美领馆拒绝的理由总是说她有移民倾向。这才是活见鬼的话。别说移民倾向，就算让她呆在这儿她也不愿意。要不是想我，求她去她也不去。为申请签证，她得坐一天的船又坐一晚上的火车去成都，还连夜排队等号，花了无数冤枉钱。

我问妈，她气不气？以后还去签不？

她说，唉，我是无所谓来不来，你自己多保重就是。

不知道是否因为太紧张忙碌，这个月的例假没有按时来。我去校健康中心看医生，等了近一个半小时，填了许多表格，经过了好几关才见到了医生。

医生是一位年轻的女士。她问我：“上一次性检查是什么时候？”

我问她：“什么性检查？我从未做过性检查。”

她大吃一惊：“喔，可怜的孩子，这么大没做过性检查。”说完，出去取表格又要我填。

听她这么说，我也觉得自己真是可怜。在美国，女人都要定期做一些检查，而我们这方面的意识不够，总是等到有了问题才看医生。

所谓的检查不过是脱光了衣服，护士在你全身上下摸一遍，看哪个部位多长了什么或少了点什么。她的手在我身上移动时，我忍不住格格笑，太那个。好在我一切正常。

出了检查室，护士说：“你这个年龄的女性要定期吃避孕药，维持荷尔蒙的平衡。”我问她，这种药保险公司付不付。她说不付，但在她们这儿买便宜些。校医还兼职卖药？我没买，她给了我一包避孕套，说每次性活动时都必须让男的套上。

早上我被下雪的声音惊醒了。难得的周末，本应睡个好觉。

今天我要按照校医说的方法治疗我由于紧张和压力导致的头痛。方法很简单：先吃三片药，然后把冰袋放在头的右下方，15分钟后，喝杯热咖啡，然后洗热水澡，使头部血液快速循环。反复这样试几天，再去看医生。

我与马克之间的磨擦越来越多。他的压力恐怕也传染给了我。美国人，尤其是纽约人，普遍的生活压力大，心理紧张，对待事物疲倦冷漠，城市生活环境也不太好。



他往往一出门坐进车里就开始骂，不讲理的卡车司机，蛮横的警察，横穿马路的亚洲女人，拥挤的交通，态度恶劣的服务员，反正有的是让他烦恼。

久而久之，我也厌倦了听他发牢骚，要么不理他，要么让他闭嘴。两人一下子就会吵起来。

他说：“我们最好的交流方式是不说话的交流，或在床上的交流。一用语言，我们就出现误差，互相指责。”

比如我不想见他，他就在电话中发火，说，你为什么在睡觉时把我的毯子抓走；为什么不允许我在睡觉时听收音机等等。更荒谬的是，他说他故意扔在地板上的一元钱不见了，是我或者是他的房东给拿走了。还说我经常取笑他，比如他存硬币想以后用这些钱去旅游，我取笑他；他想买只船当房子安家，我也取笑他等等。

我听得头皮发麻，这才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往往骂一声杂种了事，也懒得去理他。

久而久之，我认识到，这个人与我没有关系，我不必要去懂他，理解他。我厌倦了这种方式，我希望理解不是建立在反复解释与辩解的基础上。人与人，国与国之间都不能如此。我想我与王孙就不这么复杂，相处容易，让人愉悦。从不同的人身上学会了辨别不同的人，也认识到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人。

我现在在飞机上记日记。飞机朝着迈阿密方向开。

马克前几天去了迈阿密他的年度假，三番五次打电话来让我也去。他很诚恳地说，他有时亏待我是因为他从小都没有得到过善待，也不习惯被善待，希望我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并表示愿意出机票钱。

我定的票是周四去，周日下午回。短短三天时间不到。

一下飞机，迈阿密的热浪便滚滚袭来，从纽约的冬天进入夏天，我还没来得及脱掉皮夹克，便看见马克与他的朋友大卫站在出口处，像两个打手。

马克戴着墨镜，穿一件绿色体恤衫牛仔裤，非常性感。他有些腼腆地站着，不知如何招呼我似的。

“嗨，男孩，今天怎么样？”我先打招呼。

马克与大卫交换了一下眼神，那意思是说，看看，厉害吧，我可没说谎，咱们可得小心这个女人。

坐在车上，我宣布：“我来迈阿密的最大愿望，是去迪斯尼乐园。”

马克一听，连说谁发疯了才去那种地方。不去不去。迈阿密多么美的地方，我还没享受够海滩与阳光哩。

大卫故意逗马克，说：“你会去的。我敢打赌。”

马克急得要揍他，我提醒他，小心，车要翻了。两人才住手。

昨天马克带我去迪斯尼乐园。我们开了四五个小时才到了奥兰

多。马克挺委屈地抱怨说，这是他的假期，应该干他想干的事，而不是我的事。

好在我想好了，坚决不和他在迈阿密生气，尽量哄着他，让他别把我扔在半路上就谢天谢地。

终于见到了米老鼠。这是我最喜欢的小动物。

在中国我平时很少看电视，尤其憎恨电视连续剧，可看“米老鼠和唐老鸭”时，我是每周六必看。不管人或动物，活到米老鼠这个境界，真不简单。它聪明勇敢不畏强势，随心所欲，真性情也。

奥兰多的晚上转冷了，我买了件印有大米老鼠的白色厚线衣，穿在身上，感觉傻傻的，却欢喜。

半夜回到迈阿密，我和马克都困极了。各自进了一间屋子，倒头就睡。

今天去海滩晒太阳，到处都是美丽的热带棕榈树。

我们并排躺在沙滩上，不一会就出汗了。马克告诉我他和迈阿密的一段缘份。他和大卫的交情来源于他和大卫姐姐的关系。大卫家祖上很富有，留下来的财产使他父亲、他姐姐和他都不必工作也可享乐一辈子。他们姐弟俩就是这样被惯坏了。

马克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曾受雇于他姐姐的公司，她看上了马克，想和马克生个孩子，却不愿结婚，两人好了一阵子后就分手了。大卫却喜欢马克，把他当兄长看待，马克也常去迈阿密，每

次也帮助大卫整理这两栋房子。本来是好好的产业，没有精心照料，有些剥蚀，室内游泳池堆放着杂物，大卫像个小男孩似的，把个房子当库房，音乐器材到处都是。他还特喜欢汽车玩具，我来的那天他展览似地领我看。他父亲也是个玩家，在纽约娶了个有名的舞蹈家，长年在各地旅游，反正他们家在各处都有房子。大卫的母亲死得早，他就自己由着性子，一会儿进这个学校读几天书，一会儿又进那个学校耗两天，三十好几也没个女朋友，马克说他不讨女孩喜欢。

此刻是晚上 9 点。我本应在纽约。但愚蠢的航空公司却没有把我更改的返程日期输入电脑，导致了一场混乱。

今天下午，马克送我去机场。我们在车中道了别。临下车时，我神经兮兮地开玩笑说，别走不成哟。

到了检票处，一条长长的队，都是度完周末回纽约的人。好不容易轮到我，耐心地等小姐给我登机牌。

小姐对着电脑看了半天，抬头告诉我，你的回程票不是今天，是 22 号的。

我知道不是，但我早已和航空公司商量改到今天了，否则我不会来机场。

小姐不耐烦地说，你不是从航空公司取的票，只能找买票的旅游公司交涉。而且今天的位子已全满了。

位子满与否我不管，我打电话去航空公司时，他们说有 19 日下午 5 点的飞机，我便改到了今天，现在我找谁交涉也没用。

她不再理我了，去处理其他人。我气愤地问，谁是负责的人？她指指右边，并不说话。

我到了右边，把理由陈述了一遍。负责的人说，位置满了，我也没办法，变不出多的来。

那我的定位作废了？我走不成了？白来机场一趟？

他也不理我了。我环顾一下，人人都在忙自己的，乘客中连个亚洲人都没有。我真急了。要知道我在迈阿密就认识个马克和大卫。马克送我来机场时就说他回到大卫家后，收拾一下就要去最南的西岛。我连大卫家的电话都没有。而且这一耽误就是三天，明天我该去百老汇上班，否则办公室没人。

想到这一系列，我头都大了。其时已是下午 6 点多，迈阿密的夏天也是晚上了。我满头是汗，想着对策。

我告诉航空公司的人说我在迈阿密连个方向都搞不清，朋友的电话也没有，要走不成的话，只好在机场过三天了，并说我是一个外国学生。意思是又穷又陌生。但没人同情我。

我看见有好几个机场服务人员在侯机厅里，有的聊天，有的在看报纸，我想与他们聊聊，或许有点主意。那几个人对我的故事不感兴趣，叫我去找咨询处。咨询处的一位女士叫我打 1 1 4 问。

待打电话查询时，才想起我连大卫姓什么也不知道。走投无路的我也算急中生智。我找到一份地图，查找红木巷的位置。

好在，很快我找出了红木巷的位置。然后我就打电话问红木巷的大卫的电话。那条街居然有三个不同的大卫。我好歹记下三个电话，然后去咖啡店换了四个硬币。三个都打通了，却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大卫，也不是我们住的房子的电话。

我真是绝望了：找不着大卫，就不知道马克，没有马克，我在这个可怕的迈阿密就是孤身一个。三天前，我飞来迈阿密时，马克与大卫来机场接我时还笑说，不住大卫的别墅，去住旅馆。因为马克说过，大卫和这里的大多数人一样，都抽大麻烟，而我对这种不良习惯非常反感。那时我可不管这些，谁请我来谁负责。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什么也不留意。哪想到三天后成了落难公主。我心灰意懒地瘫在座位上，一动也不动。

过了快一小时，我不得不采取行动了。考虑到单独坐出租车的不安全性，我搭上一辆叫“SUPERHUTTLE”的多人出租车，告诉司机“我家的”地址，以免他把我当外地人欺负。

车到了红木巷后，我拎着两个小包迈出车来。真是一个安静的地方。非但街上一个没有，而且每栋房子都很独立，房子外面是草坪，与街道还有一段距离。白天出门还可以欣赏风景，到晚上看起来每栋房子都阴森可怕。

我知道这个岛上住的都是有钱人，但有钱人会不会在晚上出来犯罪我可没有把握。提心吊胆地沿着红木巷辨认大卫的家，可走了很长一段路也没遇上类似的房子。看着黑压压的树木，我不敢往更深处走了。但停下也是走投无路。要找不着大卫，我只好回机场，可远近连个出租车影子都没有。惟一的办法是上帝保佑我去敲一座好心人的房子，然后求援，但愿别自投罗网。我决定再走上一小段就停止。

正在这时，一辆车拐进红木巷，我左右不是地站在路中间，不想，车停在了我的面前，一个人朝我走来。我惊恐地想着对策时，一个声音叫起来，嗨，是不是邵？我听出好像是大卫的声音，高兴地大叫，我的妈呀（用的是中文），然后才用英文叫一声“上帝”。原来大卫就住在前面不远处，我路过的是他的房子后面，所以没有认出来。

“我们正准备去马克那里呢，上车吧。”

我坐在车里，惊魂未定，问大卫为什么查不着他家的电话号码。他说，他家的房子主人是他爹，他爹叫罗波特·杰瑞。人人知道他。电话用的也是他的名字，当然账单也是他的。

见了马克，他吓了一跳：“你怎么没走？我正要出发去西岛呐。”

没有西岛了，我还得呆到22号呢。

我在迈阿密多余的三天打破了我的行程也影响了马克的度假计划，我尽量处处小心别招惹他。哪知道也是这多余的三天让我下定和他分手的决心。

昨晚我睡得朦朦胧胧的感到冷，伸出手去抓被子。可没摸着，只好打开灯，才看到马克全身裹着被子，紧紧的，拖也拖不动。我正准备去抓只被角遮盖自己，手还没碰着他，他惊恐地大叫：“干什么，半夜三更开灯。”

我吓了一跳也没回过神去关灯，他已疯了似地开口骂：“我不去机场送你，你自己走路去。你和大卫都不是好东西，专门跟我过不去。半夜开灯不让我睡好觉，不让我过好假期，害得我像小时候一样老做噩梦，无家可归……”

我听得毛骨悚然，看他眼睛是闭着的，整个人却是一副歇斯底里的状态。骂了一阵子，他从床上跳起来到客厅里去了。

半天我才回过神来，关了灯，我躺在黑乎乎的卧室里，对自己说，够了够了！受够了！哪怕他是再伟大的天才，我也不打算和他好下去了。这一次是最后的一次，他别指望我再给他任何机会！

早上我还在床上，听见马克在客厅里咳嗽。不一会儿，好像进到卧室来了，我闭上眼睛装睡着。

“你恨我吧？”他听起来像个做错事请求原谅的孩子。

见我不吱声，他又说：“我真想偷偷进来强奸你。可是我没有。”



我想和你做爱。”

我大气也不出，真睡着了似的，我想好了，他要碰我一下，我就咬他十口。

我们僵持了一整天，我看有关辛普森杀妻案的一本书，是辛普森的好朋友写的，事发期间，他就住在辛普森家。我们曾经讨论过，这明摆着是辛普森杀了人，可法律就是无法制裁他，什么法律。马克也认为辛普森是杀人犯，是动物。

“可是你们的法律毫无办法。”

“美国的法律是假设一个人是无辜的。不愿错杀一个，有时难免放过一百。而且一定要有证据。不像中国的法律，是先定你有罪。”

“证据？辛普森太狡猾了，所以没有证据。这是不是说，法律对高明的人犯罪与不高明的人犯罪只好不同对待。这只是犯罪的手段不同，实质是一样的。”

晚上大卫和他的朋友来邀请我们去迈阿密最老的酒吧吃饭喝酒。我拒绝了，推说人不舒服。

马克很晚才回来，厚着脸皮坐在我对面，拿出一个小塑料袋子，诡秘地朝我面前晃了几下，我看见里面有一些草和叶子，他用一张纸把它们小心翼翼地裹起来，像农民抽烟叶一样，点燃后开始抽。这气味比香烟好闻些。

我装着不在意他，他却朝着我喷云吐雾，不一会儿，我感到头

有些轻飘飘的，脚踩着云朵似的，飘到卧室，扑通倒在床上。嘴却像醉了酒似地不听使唤唱开了——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

马克也进来了，他倒在我身边，说：“你唱吧，你唱歌。”一把撩起我的裙子……

“……清粼粼的河水，蓝格莹莹的天，小芹我洗衣衫，来到了河边……马克，好了好了，马克，你狗杂种……”

## 回到从前

回到纽约，我再也不和马克约会了。我很明白地告诉他，我是个中国人，我们之间差异太大，无法弥补。他在给我留过四次录音电话而没有收到我的回电后，也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我的生活恢复了过去简单忙碌的那种日子。

晚上，王孙的那一对好朋友和我，共同在我们系隔壁的“茶馆”餐厅给王孙饯行。

我和王孙第一次见面时，也是我们四个人。送他走，又是我们四个人。他们两人知道我和王孙之间有一层朦朦胧胧的感情，故意逗我们。

台湾小姐问王孙，你怎么舍得离开邵小姐？

王孙看着我，面无表情地说，她也要回中国的。

我基本上没太说话，心里也难过，在人前说什么也是淡淡的没意思。

我因为晚上有写作课，没去机场，我和王孙在餐馆门口道别时，我在他的脸上吻了一下。

王孙站在我对面，从他的脖子上取下绛红格子的羊毛围巾，套在我的脖子上，拉拉紧，说，别感冒了。

我鼻子一酸，赶快转身朝外语系的楼走去，心里一下子涌起很老的一首台湾歌：

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情到深处人孤独？

.....

我的生日又到了，正是中国的新年。但愿吉祥如意，好事成双。

开学了，金耐尔度完半年的假，回来继续教写作课。

一般的美国同学每学期都会选不同的教授，由不同风格的诗人从不同的方面给予指导。我原想选其他的诗人，但考虑到金耐尔熟悉了我的写作风格，也知道从哪些方面引导我，又选了他的写作课。

他一见我就问：“邵薇，你上学期的诗歌不错。这学期要写出更多的好诗。”

我只好狠狠地点头。金耐尔很高兴我再选他的课，称为“我们的再次合作”。据说，由于他的写作课最多只能收14个学生，有

的同学报了名，却得等到下一次，也就是明年春天了。

上完第一堂课，金耐尔就要我下周二和他见一次面，他要看看我的新作品。吓得我赶快到电脑室去修改我的作

这学期我还选了一门女性研究的课。同时继续上文学传记课，我上学期选定写的一部中国女诗人的传记才刚刚开始。同时，我与《革命与进化》原编辑班子继续合作，编下一期的刊物。

事情还是不少。

只少了一个马克。快乐和麻烦都少了。

公正地讲，马克不是一个坏人，他阅历丰富，富有同情心，爱伸张正义。

和他分手后，我反倒有时翻他们的报，读他的文章。昨天读报看到他写的一篇文章，关于纽约市政府对中国城过春节禁止燃放鞭炮，中国人如何过这个春节的报道。文章中说，记者在中国城呆了一整天，没有看到如往常的春节节日气氛。采访的一位中国妇女几乎哭着说，过春节放鞭炮是图辞旧迎新的吉祥。没有鞭炮的春节就像没有圣诞树的圣诞节，非常扫兴。

情人节到了。我在家看电视，国家广播公司的晚间脱口秀节目，愚蠢而好笑，打发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大鼻子的主持人听说是美国最有名的主持人之一。他每次上台总会把时下闹新闻的各类人物给调侃一番，从克林顿到白宫政治献金，到辛普森杀人案，有一次还

包括中国的政治人物，以卡通形象出现，阐述他理解的中美关系，既辛辣又无聊。

周二见了金耐尔，他问我上学期的收获，我给他看了两三首在课堂上讨论过的诗，看他的反应。他拿起笔几杠几划，对其中一首“中国城”的诗做了大手术，只剩下中间一部分，并建议我改名为“外曾祖母”。然后，我又变魔术似地从包里掏出几首新诗，他认为其中的“疼痛”是写得最好的——

我摔倒在地，伤了一只脚  
冒着汗水站起来往地铁——  
脸埋在又深又长的隧道里  
忽然我听见熟悉的苏联歌曲“喀秋莎”  
一个男人在拉手风琴  
他的脚旁，铺着一张前苏联的地图  
我的心直往下沉，下沉  
一直沉到我家乡的河长江的江底  
我告别或返家  
都经过它的激流  
走出地铁  
我的心脏忽软忽硬  
好像情人手里的男性生殖器

没有苏联人，没有喀秋莎也没有家乡

我的脚拒绝任何思想

某一天，我对自己说，如果我不再想要人的身体

我把我的心脏从中间剖开

把我的身体分成两半

但我知道

那一天，我的疼痛也变成了两倍

“女性主义批评”课老师，发了一堆阅读书目和部分复印资料，一大堆人的名字，我只知道个马克思、列宁，还有福柯、朱迪·巴特勒和弗洛伊德，别的一概没读过。除了要求读的书和文章，每周还要求看一部女性电影录像，只有这一条我最喜欢。每个人要就自己看的电影做个课堂报告，鉴于我来自中国，老师对中国“第五代导演”很熟，便问我可不可以推荐一部张艺谋或陈凯歌的片子，然后做课堂报告。

我想了想，对张、陈的电影虽然有些了解，但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恐怕就只有《秋菊打官司》还有些内容。我们学校影像图书馆也有带子，同学们可以借来看。

这里的图书馆真正和我在国内使用过的图书馆大不一样。只要有你的地址、学生证和签名，你就可以有借书证，校内校外，私立公立图书馆都可以用。只要是里面有的资料，你都可以借，按期不

还，有点小罚款。绝没有所谓的内部资料或哪一级别的才能借阅的做法。

## 悼念吴健雄

查理经常鼓励我发挥中英文写作的优势，替中国人多干些事。他甚至说，你这样懂中美文化的人不多，我们应该发挥你的特长。我不知道他说的我们是谁。反正我也不去想那么多。我只要写出我心中想写的东西，那就是我的真正的文学了。

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观点是不同的。查理认为，个人的喜乐不重要，国家命运和前途才重要。但我想，文学离开个人的喜乐就不是文学了。查理所理解的文学可能更是政治或历史。当然，对于正当的事业，我愿尽力，以作家的方式。

查理是历史学家，凡事讲公正客观。我们谈到当今的国际局势，美国和中国、日本的关系，谈中国的问题，不能不谈到台湾。现今的台湾社会力量分化严重，有台独势力，有从祖国大陆去外省人一派，还有新一代的台湾人，这些不同的成分形成今日台湾的不同党派及各自的理论主张。

我曾问过王孙，他赞同那一派，他说民进党。我问为什么不是国民党？他说，他不喜欢国民党，加上一个社会不能只有一党专政，必须有另外的党派和它平衡，互相有竞争才能发展。

我对查理讲，如果我在美国多呆上两年，一定写一部华人的书，

写写变幻莫测的世纪末，各种形态的中国人、美国人，这对研究历史研究中国人有好处。查理高兴地连声道好。仿佛我一下子成了他希望的为民族为国家命运承担责任的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才知道，查理不是等闲之辈。他得过日本天皇的勋章，而他几十年积极推动追究日本二战战罪，是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的发起人之一。

与他的交往和共事，也增加了我对美国华人的一些认识。这些是我在纽大学习写作所不能学到的，算是留学生涯额外的收获吧。

昨天一上班，查理就严肃地说，他们会的创会人之一，著名女物理学家吴健雄去世了，我们得赶快给所有的会员发出通知，追悼会在明天，请在纽约地区的会员参加。

偏偏电脑出故障，我和查理急得没办法，最后他说，你用手写好了，要赶在下班时间之前发出。我们也就一部传真机，都是超负荷运转，有时我都担心它累坏了不愿工作，那我就更惨了。

草草手写了一张纸算作通知，复印几张就开始传真。边传真边应付别的事，有时对方的传真机也忙着，好不容易通了，待开始下一个时，电话又响了。

中午饭也没顾得上吃，就和查理赶去殡仪馆吴健雄的灵堂。里面鲜花和花圈堆得挤挤的，有李登辉和连战的花圈，还有中央大学校长校董事会的花圈，我真惊讶他们如此快的速度。



正看得专心时，查理叫我去和他选花圈写挽联。

我的中文字一贯写得难以见人，可查理直说好，让我往白绸缎上写。我的手不住发抖，我也从未写过挽联什么的，更何况给知名人士。过去，只见过别人挥毫，都是书法好的人。

写什么称谓我也拿不定，有称吴健雄先生，女士，有称教授，院士，博士等。

最后，和查理商量后，我写下了“吴健雄博士千古，×××同仁敬挽”。

把花圈拿到灵堂，放哪儿又是问题。正方左右都是总统副总统的花圈，和吴健雄的家人亲戚等的。我和在场负责杂物的她的侄子交涉，说吴先生是我们的创办人之一，我们希望把花圈放在前面一点？

她侄子非常够意思，问我想把百人会的花圈放哪儿。我指了指前方，希望挤出个位置。他果真就到右前方，把百人会的花圈挤在台湾的某个机构的旁边。

最中间的挽联写着：居礼夫人高才征宇宙守恒参破哭中国；擎天巨柱卓识震古今原子先驱仰科学。

奇怪的是，我没看见国内官方的花圈，只有吴健雄江苏家乡的花圈。

出门时，我看见东方电视台以中央电视台的名义在采访袁家

骝。

今天又去参加了追悼会。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主持，印的小册子封面是穿着蓝花旗袍戴着珍珠项链的吴健雄的半身像。据说这身衣着是她身前最喜欢的，也将伴着她化为灰烬。

吴健雄虽然自己没有得过诺贝尔奖，但她的学生中有几人获诺贝尔奖。今天来参加她追悼会并发言的人中有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还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

两岸官方代表，有中国驻美国大使李道豫，台湾有驻美国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外称“民间大使”的吴子丹。

我想占个好位置拍几张照片，忽然看见第一排右边只坐了一个人，便过去问有没有别的人坐那儿。回答说没有，我便坐下了。

还没坐热位置，我看见了一个记者朋友，就和他聊了几句。我说：“李政道、杨振宁都会来，我从未见过他们，待会你给我指一下拍张照。”

这位朋友凑近我说：“坐你旁边的那人就是李政道。”

我吃了一惊。朋友走后，我挪到后面一排去了。

李道豫因为在使馆接待前去吊唁邓小平的美国贵宾不能前来，由他的夫人及另一位参赞代替。参赞宣读了江泽民主席的唁电，也代表国家教委、中科院、人民大学等单位和个人表示了哀悼，并遵从吴健雄家属的意见，不买花圈，将钱捐给刚成立的吴健雄学术基

金会。

查理陪同贝聿铭先生去联合国代表处设的邓小平灵堂哀悼回来后，我好奇地问他有关情况。他说，《世界日报》去了记者采访，问贝先生有否亲自见过邓小平。

“只有一次。”那是1972年邓小平来美国访问会见过。有一件事贝先生印象很深：“有一个活动安排邓小平接见美国运动员。那些运动员都是7尺多高，5尺来高的小平走过去和他们站在一起，谈笑风生，伟人的气派由此可见。”

记者又问贝先生最喜欢自己设计的哪个建筑。贝先生说主要在欧洲。

临上车前，贝先生对查理讲，香山宾馆也是他设计的，仿苏州园林建筑。有200多个房间，可养了700多工作人员。冬天时那些工人在瓷砖地上烤肉，墙上也熏得黑黑的，看到这些不珍惜不保护建筑艺术的行为，他心寒得不愿回去再看一眼。

作为中国来的人，我听到这些话非常难过。我知道，不仅如此，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古建筑古文物遭到破坏盗窃也非常严重，有的简直骇人听闻。

我家乡有个梁平县，县里的“双桂堂”是全国名胜古迹，建于1653年，高僧倍出，在东南亚有深远影响，有“云贵川丛林祖庭”和“蜀中丛林首”之誉。得名于寺庙前两株千年桂树，都说桂

花开时，千里飘香，保障方圆百姓的好风水。里面珍藏有 11 世纪用梵文写的《贝叶经》和其他佛经 7000 多册。有一年，忽然传出《贝叶经》被盗，守庙的高僧被杀。不知此案侦破情况如何。很快，老百姓就传开了，说“双桂堂”的一株桂树莫名其妙就死了。人们都惊恐起来，生怕风水受到破坏。

此类事件不胜枚举。可恶的是，有些盗贼系当地的农民，不懂文物珍贵，为了区区几文钱，把这些宝物廉价出售，有的流传到海外，再也不能物归原主。像有名的石雕群大足石刻，有一年当地农民把其中一尊大佛像的头给砍了，企图倒卖给海外的文物商就是典型的例子。

查理说，我们也得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设的灵堂吊唁邓小平，那个灵堂对外开放，美国人士也大多去那里。

我对查理说，可否让我代表去。吴健雄的灵堂我去了两次，邓小平的灵堂我一次也没去，心里不安。他也是我们四川人。

查理看看我，说，好，你去吧。也代我和我们主席签个名。然后你就直接回家不必来办公室了。

我坐出租车去了总领事馆。一进门，我在签名处写下查理他们的名字和我自己的名字后，还想写点什么，可一时没灵感，就写下不知在那里看到的一句“一曲哀思，天地共鸣”。

这些天《纽约时报》有两天的头版是邓小平的头像，基辛格等

美国政界人士也撰文发表哀悼文章。可见美国人对他的评价也很高。

## 查理的政治观

去中国城办事，顺便去华语广播电台看望郑先生。

他一定要请我吃饭。他自己吃素，却请我去了著名的海鲜馆一佰拌吃乳鸽，说是养生，对女性尤好。

我来美国不久就和郑先生认识了，他待人热情，请我吃了无数次饭，有时我都不好意思去找他，除非有事。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帮查理打工，使我对美国的华裔生活有了兴趣。过去，我偏见地认为，华裔就是中国城的打工仔，说着很多内地尤其北方人听不懂的广东话、福建话，开餐馆、洗衣店、衣厂、中药店之类。

我刚来美国时，最不爱去的地方就是中国城。心想，我好不容易出国，可不是为了和中国人耗在一起。真的，好多新出国的人，到了中国城一看，就像到了福建广东一带的南方，再往南点说，最多不过是像到了香港。满街是中国字，满目是中国人，地上脏脏的，说话快快的。到处是吃的、喝的，把中国人吃的传统发扬光大了。

我对中国城的感情是后来自然生出来的，西餐吃久了，还是觉得中国饭对胃口；英文书看多了，去中国城读中文书，别说一目十行，瞟一眼就知道国事天下事，这种感觉就像青梅竹马的恋爱对象，

对方的任何表现你都了然于心。

我对郑先生讲我的感受，他大笑。他的豪爽我第一次就领教了。我们见面时，他自我介绍说：“我是台湾的高干子弟。”

从台湾来美国几十年，他一直在中国城做新闻工作，办报纸杂志电台，五花八门，算是老报人，也算中国城的行家了。

我们边吃边聊。

80年代初，中国刚刚开始对外开放，中断了几十年的两岸关系也开始启动。那时，有少数亲共的人以及开始亲台后来亲共的人发表文章，对两岸关系提出建议。他们由于特殊的身份可以往来于祖国大陆与台湾两地，被称为“空中飞人”。

1982年，郑先生也做过一次这样的“空中飞人”。他和太太应邀去祖国大陆访问，去了北京、杭州等地。安排的行程要他们去浙江奉化，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气氛，他不想去，几次交涉下来，对方还是要他们去。后来，他和太太商量后，决定她去西安，他去奉化，然后在广州会合。他去了奉化，参观了蒋介石的故居，感觉保护得不错。他离开时，有人托他带奉化的特产千层饼和芋头给蒋孝勇，他便明白了自己此行的使命。当时他堂弟是国民党副秘书长，这件事可以办到。

可不幸的是，他太太在由西安去广州的飞行中，飞机出故障，在白云机场坠毁，不幸遇难，导致了他个人生活的一出大悲剧。

后来呢，郑先生看我听得津津有味，说，后来回台湾找了这首歌星太太，感情不好，只好在外面找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吃饭聊天了。

这就是他的性格。

与郑先生聊完，从中国城沿百老汇大道往上走10分钟，过休斯顿街，往西就算西村，往东就是东村。今晚东村有活动。

我们专业的莫丽小姐在著名的《巴黎评论》杂志当实习生。为促进这期新出的刊物，该杂志社今晚在东村举行朗诵酒会。莫丽邀请同学们参加助兴，门票10元。

我们班的吕贝卡和尼可两人负责守门卖票。我递上20元钱，吕贝卡把我的钱扔在桌上，说，这是找你的零钱。我不动声色地把钱收起来，按规定领到两份《巴黎评论》。

果然在酒会上见到我们专业的很多人。漂亮的莫丽打扮得像沙龙女主人似的，往来穿梭于人群中。

莫丽是我见过的美国女孩中最时髦最美国化的，头发是小男孩似的平头，时不时变颜色，一会儿灰，一会儿棕，一会儿又是黑糊糊的，不知刮的是是什么时尚。但我很喜欢她自然随意的风格，不用胭脂的脸总是红扑扑的，眼睛水汪汪的，穿着T恤，牛仔服，长长的腿，健康美丽。上课时常常哈欠连天，有时索性趴在课桌上听课。

有一次我告诉她：“莫丽，我看美国小姐选举，有一个你家乡新泽西的女孩入选了。我看到她，心想，选她还不如选莫丽，莫丽

比她漂亮多了。”

她高兴得两眼发光，连问：“是吗是吗？”

“当然，我可不是奉承你。”从此她对我非常好，也许觉得我慧眼识英雄。

莫丽举着酒杯走到我们这群人中，有人在夸她，她穿着一件布衬衣一条西裤，脖子上系着一方小小的丝巾，沙龙作派十足。我们中间有一个什么编辑，她便向编辑介绍我，说他们应该用我的诗，我的几个同学也附和她，搞得我不好意思起来，只得向编辑自我介绍一番，说要寄诗给他。

大仓库似的朗诵会场里，《巴黎评论》这期刊发了作品的几个新作家诗人在一个接一个地朗诵，听的人却进进出出穿梭不停。我们几个人拿着杯子楼上楼下到处逛，二楼是自由交谈的地方，还有些画在展出。我估计很多年轻作家和诗人都在借机认识编辑和出版商、经纪人什么的。有的人被围在中间，不回答问题似脱不了身。

纽约既是出版社云集之地，也是作家诗人云集之地。多少人苦撑苦熬，等着呕心沥血的作品问世，然后又是另一轮的拼打，到处朗诵宣传。运气好的可能一朝成名天下知，运气还不够的，又是多少年的风风雨雨，才有了些名气，成了可以要价的作家。若是获一两个全国性的奖，钱倒是次要的，有名的普利策奖也不过5千美元，可带来的荣誉就海拉去啦。到处请去讲座当教授，拿10万美元的



年薪，像金耐尔一样。这是很多作家诗人一生的梦想呢。

通常只要不太晚，查理和我在下班后，都会聊一会儿。

话题大多是关于日本，中美关系和中国的前途。

查理说，有些日本人公开对他讲：“只要中国胆敢侵犯日本，美国就会出兵，这是写在文件中的。”看来，把中国假想为敌人的还不止一个美国。

看看《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经常都会读到这类观点。在很多美国人心目中，中国是惟一个独立的共产主义国家，与他们信奉的理念格格不入。

有一次，我们《革命与进化》杂志讨论会上，我提到这一点。我们的负责人安小姐马上说：“中央情报局总要找一个敌人来维持和强化它的存在。否则世界太平，它们也要关门了。”我当然知道这个世界不太平，我也知道美国人拿中国当假想敌人有它的理论。

可他们为什么不说说中国上百年受西方列强们侵略的屈辱历史？二战时日本在南京杀了那么多中国人居然可以理直气壮地否认说，这是谎言。

想想西方国家对待在二战中死去的犹太人，他们又做了什么呢？

德国政府道歉认罪赔偿，全世界都向犹太人表示同情支持，到处捐款设立犹太人资料馆档案馆。几十年来有多少戏剧、小说、电

影翻来覆去陈述他们的苦难遭遇，前年有《辛特勒名单》，最近有正在改编的百老汇音乐剧《安妮·弗兰克日记》。

有一次听人说，有时候一个月，就会有十来本关于犹太人苦难的书出版。在英语词汇里，一说到H O L O C A U S T（大屠杀）自然就想到犹太人。

这些事说明西方人富有同情心，不健忘，他们能反思过去，改正错误。但他们对日本又做了什么？

查理说，二战后，美国把钓鱼岛划给日本，导致海域分裂主权争端越演越烈。在香港、台湾、美国都有华人自发组织的“保钓会”。民间能否讨回钓鱼岛我不敢说，但这个行为本身说明了历史的错误如不及时纠正只会给后人导致更多的不幸。一个如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更需要谨慎才会造福于世界和平和有利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否则就是滥用强权。

还有一件查理亲身经历的事。他在美国调查日本战罪时，去国会图书馆的一个仓库收集资料。巨大的仓库里全是日本在亚洲和中国的战争记录，都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他和另外几个教授埋头整理，希望影印下来。可很快，他们被告知，这批材料要归还日本。这是政府的决定。

可同样的德国的战争记录美国留下了。

从此，那一批资料再没有下落。后来，有人想调查是谁下的命

令把那些资料还给日本人，如今那些资料在哪儿，统统查不出来，成了一个谜。

查理越说越激动，“不说远了，说说美国本身的情况吧。”

50年代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在全国镇压清除红色共产主义运动，人人危及，恐怖到极点，动不动就兴师问罪，投入监狱。我记得看过的一部美国电影，写一个同情苏联和中国的好莱坞女明星遭受迫害，被强迫送进神经病医院治疗洗脑，直到她丧失记忆力为止。类似的惨案不知有多少。

再想想美国的黑人。他们的苦难又有多么深重。整个种族被沦为奴隶的耻辱和身体上的烙印不但没有消失，至今美国社会仍有歧视黑人的种族问题。

是的，我也觉得，不但白人歧视黑人，亚洲人是否因为自己的肤色虽不如白人白，可比黑人白，也有歧视黑人的心态？大街上白人与亚洲女孩并肩而过，大家习以为常；可看见亚洲女孩和黑人在一起，就会心里不平。再怎么着也不能找个黑不溜秋的，滥竽充数呀？

比较犹太人，比较黑人，比较中国人，各自因为苦难受到的安慰和待遇是不是不同？

根本地说，是不是一些生命比另一些生命更重要？

过去我只知道查理太太是韩国人，出身显赫。不知道他原来还

有个中国太太，姓任，是苏州人。

当年任小姐的表哥是查理的小学同学，介绍他们认识，当时的查理是外交官，年少气盛，前途无量。那时任小姐才18岁，在燕京大学读书，也出身书香门第，她父母都是留法的留学生。

查理父亲是驻日外交官，查理几岁就去了日本，在日本读书长大。他在日本帝国大学读书，成绩比很多日本人好。当时有些日本人看准他的前途，想把女儿嫁给他。他一心苦读，想以后报效祖国。

二战爆发后，他不顾一切回到中国，在重庆国民党外交部任职，负责调查日本战罪，和当时的美国代表团去广东、河南等地考察，就是那时，他第一次看到了中国的老百姓是多么的穷，多么的苦，又多么忍耐。他这一辈子都忘不了，想尽力帮助中国强盛。

认识任小姐不久，查理被外交部派到美国，非常希望任小姐能来美国读书陪他。可娇气的任小姐本人不愿离家，在她家人坚持之下，她只好来美国。两人很快结婚，5年之内生了三个孩子。

1949年以后，由于各种原因他们也没法回国探望家人。任小姐父亲去世了，查理只得陪太太去法国她父亲读书的地方悼念。后来任小姐忧郁而死，当时还不到30岁。查理对此负罪很深，觉得是自己的固执导致了她的不幸。

他有三个令人羡慕的孩子，两个毕业于耶鲁，一个毕业于哥大，都是大律师。前一段时间，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处举办的1997

年新春招待会上，他很熟悉地与两位大使和周围的参赞们聊天，总有人会问，大女儿来了没有？小女儿还好吧？可见他们的影响远胜过他这个父亲。

还有一次我听他在电话里对人说，昨晚女儿去参加副总统戈尔的十人聚餐会，如何如何……

他说，我这一生只有两个心愿，一是希望中国强盛，不再受人欺负；二是让日本人民站出来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

查理说，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你也是中国人，正直具同情心，有才华，希望你以后多为中国人做些事。

最后，他才说，明天是我 77 岁生日，这些话算是有感而发。

不打工的时候，我天天来纽大的图书馆看书、写作。有时望着天空发呆。

八楼朝着华盛顿广场的书桌是我最喜欢的位置。从落地的玻璃窗望出去，正好看见广场上那些高大树木的树梢，它们在风中飘摇，有时阳光把一边树梢遮阴了，而另一边还在光灿灿中。我就想，莫非太阳公公老顽皮，故意用一面镜子来照我们地球，他手一偏，这里就打阴成晚上，再一偏又成白天了。而那些树梢有的与我齐肩，有的还矮些，在玻璃门里和我比高低。

有时候还有云，有的云急匆匆地来，把那些树盖成黑屋顶，一会儿又急匆匆地走了，赶路似的。它们走，我也走。远处是哈得孙

河，再远处有海洋，再再远处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家乡，还有黄沙扑面，锣鼓喧天的黄土高原，站在窑洞边上，黄土高原上的陕北民歌就会火辣辣地扑过来：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儿，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四妹子儿和了个情哥哥，他是我的知心人……

经常是好多思绪在头脑里拥挤着，要反反复复地拿起书来看，又胡思乱想一阵子，才好歹写下几行诗。今天我来个例外，先想出了题目“想后面的想”，然后才开始出现诗句，一句句的关于金耐尔说的此时此地的思想——

旅行是旅行者的目的地  
两边的墙壁上看不出他们的脸  
我听见教堂的钟楼上一颗头被砍下  
幸存者在微笑  
地下隧道里，不知名的鸟哨声更清晰  
坐在图书馆八楼  
我曾是一个新来者  
面对着灰色的高楼，下面的树让我想起小妹妹  
她流着口水的嘴常常咬我的肩膀  
云总是走得很急  
太阳的镜子让我们彼此相认

夏天的记忆总是关于草地上的性爱或汗湿的内衣  
灰色，灰色，死亡的颜色  
在早春忽然开了花  
一个遛狗的人带着报纸包的半个三明治  
诚实的人们在拱门背后  
整夜咳嗽  
我的旅程绕了半个圈，回到村里  
我在寻找第一节车厢  
像寻找原来的梦

今天晚上华美协会有讲座和签名售书活动，请的是《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的两位作者。

我和查理也去了。

两人谈了写作该书的动机以及书中的一些论点。

两位作者演讲完是观众提问。提问的美国人大多都不赞同他们的观念，都是挑战性地反驳书中的一些论点。

有个人说，这本书不应该告诉美国人，中国在亚洲的崛起是挑战了美国的利益，更不应该主张美国加强和日本、台湾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来制约中国，这样不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我心想，如果我们要对中国在亚洲的势力上升感到忧虑，那么我们如何看待美国对全世界的强大影响力？

在随后的小型酒会上，我和一位美国妇女聊天，我们站在酒水桌前，每人手里摊着用面巾纸包着的一点花生腰果仁什么的，她说，我不认为这两人了解中国，他们这本书会误导读者。

喝了两口酒，她说，你们的邓小平应该得诺贝尔奖，他在过去10到20年对中国的发展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

后来我高兴地对查理说，这些美国人也还是很公正地看问题嘛，并不赞同这两个作者的看法。

查理回答，这两个人没有哲学也没有历史依据，更没有宇宙观，不了解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现状，谈什么危机论，站不住脚。而这些常来华美协会的听众大多是对中国和亚洲很有感情的一批美国人。

这是对的，当初自胡适创办了华美协会之后，一直有一批美国朋友在支撑该协会的工作，使得协会越办越好，对中国文化在美国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一代接一代的人越来越多。

华美协会主要是举办一些中国文化和艺术的讲座和展览活动。我上楼下楼经常也取些印刷精美的广告，有古代文物展，有演讲孔孟之道的，书法，气功，京剧等，有时会有一些文化名人学者作家来做演讲。牛年开始时，有个讲座是专门介绍牛在中国文学艺术中的众多表现，还有龙灯狮子舞表演，各种聚餐活动等。现在因为中国市场开放，也有关于去中国投资与当地如何合作的讲座。总之，应有尽有。



查理天天买报看，我也抽空翻翻《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到处都在评论《即将来临的中美冲突》，媒体舆论就是可怕，很多东西不管是不是个东西，只要被它们一炒，不红不热都不成。

11点半，我又打开电视看国家广播公司的脱口秀。那个大鼻子主持人多次在节目中提到白宫献金案，今晚他说，他准备给辛普森打电话，建议他向中国要钱打官司，辛普森的涉嫌杀妻案让他几乎破了产。

然后镜头转向布景，画的是白宫门口，一个投钱箱，大鼻子的配音：“进不进来，要进来给钱。可以喝咖啡，可以和克林顿握手，多出钱，可以睡林肯卧房……”

这和前几天的一个政治讽刺剧差不多，站在钢琴旁的男歌手就是这么唱的：白宫是个地铁站，只要收钱就进来……

## 快乐春假

这一周是学校的春假。

我早早收到国际学生学者办公室设计的春假美国文化名胜之旅节目单，收到后我赶快勾上想去的地方和想去看节目和演出，还有一个是去美国广播公司做晚间节目的现场电视观众，这个最抢手，我打电话询问时早没了。

接电话的南茜是我的朋友，她说，我们办登记都要亲自来还要

当时付清费用，你还不快来，都没你的份了。吓得我赶在他们下班前去订了几个项目。

上周六去了新泽西的一个印第安人保护区。

到了那里，我满心等的土著人连头发也没见着一根，惟一的见证就是一个博物馆，进去参观了鱼钩、鱼叉和几根茅草。

最后导游带我们出来，指着外面野地里养的三头牛、一只孔雀和几根散架的木梁，说这就是印第安人过去生活的村落。

回来的路上，我们被带到西村一个酒吧，说是品尝印第安食物。这回我也不报什么指望了，安于现状，有啥吃啥，吃饱为止。有加了奶油的米饭、南瓜糊、大鸡腿、凉拌蔬菜，美国名叫沙拉。

我和一个中国女生坐在没火的火炉旁，惟一的一张沙发上还坐了两个欧洲学生，我们四人美得很，轮流取食品取饮料轮流坐阵，生怕别人抢我们的宝座。

语言帮了我们的大忙，周围的人不懂中文，我给她讲笑话，她也给我讲故事，说她们学院有个很帅的男生，在东村一酒吧认识了一吧女。哪吧女美丽温柔对周围男士体贴入微，很解人意。这小子本有一大堆女朋友，独独钟意这个。有一次到系里来玩，有人见“吧女”进了男厕所，吃惊极了，叫出声来。“吧女”反问他：“你怎么了？”

“吧女”原来是个男同性恋者。

一周春假，除了校外的旅游，我也选了校内活动，包括两小时的舞蹈班，学跳美国民间舞；还有烹调班，学做美国菜、美式点心，在食品营养系，该系学生教，教完，我们就开始吃，3月份吃了感恩节的火鸡，还有南瓜饼等。

周四和周五我们坐校车去华盛顿。

在华盛顿，我们白天自由参观，可集体活动也可单独行动。我背着书包装着矿泉水，设计了我自己的路线，在别人排长队时，我就去附近别的地方，这样下来，我比大多数人多看了几个地方。

其中一个就是大屠杀博物馆。穿过华盛顿的樱花树走进纪念二战时死去的犹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里面内容之丰富让我大开眼界。各种声像图片电影资料片分楼层展出播放，各类实物用不同的方式展示。有一面墙似的展牌，贴着被毁灭的波兰某个村庄全部人的照片，这些人没有名字和任何记载，只有破损的照片说明他们曾经在这个世界上活过；还展览着很多生活物品，像女孩子用的小钱包，锈蚀的一只耳环项链，一只绣花的布鞋或一条睡裤等等。

我们的导游丽萨是一位兼差的行政工作人员，她丈夫在国防部工作，她在国会图书馆当管理员，认识很多地方的守门人。

我们周四下午4点左右赶到FBI时，快到下班时间，不让人进了。

丽萨让我们等着，她去想办法。我站在队伍前头，听见她说，

这些人都是国际学生，来自欧洲或亚洲，很不容易，明天他们要参观白宫、国会大厦、林肯纪念碑，今天好不容易挤出时间来看你们，让他们进去吧。

那个人笑呵呵地放我们进了，后面一队儿童也跟着进来了。

有一个节目是FBI的特工表演射击。他从后面出来，手拿好几种大大小小的枪，先分别介绍各自的名称和特点，然后朝着一张画着人体的不同部位开枪，不同的声音，很好听。有一枝是无声小手枪，打在头上。我旁边的一个美国小孩抱着自己的头，哎哟一声倒在位子上，摹仿电影里的中枪镜头。

灯开了，特工就从幕后走出来回答问题，小孩子们抢着提问。

我也问了一个，我看凶杀侦破电影，总会出现FBI特工，而且往往他们还不解决问题，要中央情报局出现或某个超人才行。

我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案子你们FBI参与侦破？什么样的案子你们不管？”

他说：“这要由国会提议案，我们才介入。一般是涉及国家利益或影响比较大的。”

丽萨坐在我旁边，她问我：“你喜不喜欢那张射击人体图？每次我都要来送给游客。”

我说想要，这个很特别嘛。丽萨跟特工讲了声，特工取来给了我。

第二天是参观那些最有名的地方，可也最麻烦，一早得排队领票。

我在白宫买了一本画册和几只笔，还有别针什么的。我特别注意产地，很多东西背后，都是MADE IN CHINA。

这个春假旅游计划的最后节目是到上西城哈莱姆区有名的棉花俱乐部听黑人音乐表演。

我们是上午去的，吃自助早餐。这个俱乐部位于两条分叉的路的中间，两边汽车往来不断，而俱乐部里面别有洞天，让我想到西游记里唐僧取经路过的盘丝洞什么的。

我们来的学生坐满了近十桌，早上的生意这么好可不常有，老板高兴得和大家边跳边唱，还时不时走到我们面前问好。台上有六个黑人，三男三女表演唱他们的宗教歌曲。有个德国男生说他会表演，也上台和黑大妈似的歌手对唱。

他的同伴们赶快给他拍照，说要把证据寄给他的老婆。

德国人看来也有正常的，不是个个都像希特勒。



白宫外面赏樱花

又是《革命与进化》杂志的聚会，主要谈到女性性爱和爱滋病的话题，我们准备这期做一个这方面的调查。

聊到中途，格林小姐说她有次和一个小子上了床，她给他一个避孕套，那小子不想戴，说不过瘾。

她接着摹仿起当时的情境，讲得绘声绘色：

我问他：“戴不戴？”

他说：“不戴。”

我说好吧，那我也不让你进去。

那小子只好连说：“我戴我戴。”

我们全都听得哈哈大笑。

然后我也告诉她们下午的一件事。

我在系电脑室碰到黑人同学德伟，他每次遇到我，都会拥抱一下。

有时嘴还亲一下。我不是很喜欢。

德伟坐在我旁边的位子上用电脑修改诗稿，对我说：“我得去做爱滋病检查。”

我笑起来，自顾忙着手里的活，以为他开玩笑。

过了一会儿，另一个同学来了，他马上转过身去和那个同学商量起来。

那个人做过，就给他讲解有关事宜：“比较贵，要 100 多，学校也没有优待。”

德伟很苦恼，他最近打工少，钱有些紧，但有些症状又不得不

去看医生。

我吓了一跳：“你刚才不是开玩笑？”德伟还委屈地说：“你都不理我。”我心想理什么理，以后决不能再让你拥抱我了。

我说，过去我只从报纸上读过美国爱滋病的报道，没想到在校园也这样普遍。

讨论了半天，我们初步列出了这样一些调查问题：

- 1．你是什么样的性爱趋向？（答案有：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
- 2．你会如何描写自己？（性生活不积极／一般程度/非常活跃）
- 3．你对爱滋病的了解多少？（高／中／低）
- 4．你的好朋友对爱滋病的了解多少（高／中／低）
- 5．对爱滋病，你有任何防范和安全的措施没有？（有／无）
- .....

前几天，我们系的秘书约翰接到华裔电影导演李安办公室的电话，请他们能否推荐一个既会英文写作又能中文写作的人，帮李安做些这方面的工作。

约翰马上想到我，留言让我跟李安办公室联系。

约在今天下午见面，我和李安面谈。

他们附属的公司位于中国城的一家银行楼上。大仓库的楼层安

置着电影制作的各种设备，分成若干小的办公室。

他的秘书大卫也是台湾来的，姓李，也在纽约大学电影系就读。和李安算是师兄弟，不知是不是亲戚。大卫很斯文，说话细软，和我聊了一会儿，接过我的大衣挂在墙上，请我进了李安的办公室，说时间为半小时。

我的想法是，工作不工作于目前尚在其次，重要的是见识见识不同的人，说不定以后还有可能合作。

我原以为李安会像招聘官考我一点什么，结果他什么也没问，就和我谈电影，说，我们当导演的，没有时间看书，只知道电影。你是当作家的，看书一定不少，我就需要有人给我做些知识准备，有些资料在办公室可以做参考。你毕业后想干什么？

干什么？我本该说，和你们一起干电影吧。可我的回答是，不知道。

我的基本想法是，只要让我有时间写作，干别的什么都可以，反正纽约这个杂地方，杂人干杂事，不止我一个。

当然，我也告诉他，我从小喜欢电影，看的片子不少，也看了他导演的《喜宴》，对他里面表现的那个内地女孩印象很深。如果可能，希望能从事电影剧本的创作，或把自己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当然，我也老实告诉他，我现在在纽约大学主要写诗歌，这里说的小说是将来时间。



最后，他说，他想请人是为了下一部片子做准备。目前他在拍一部美国南北内战的片子，这部完了后，想拍一部中国的武打片《卧虎藏龙》，中文小说版权已买了，可现在没时间处理，尤其是电影里的人物对话最为重要，要花很多时间斟酌。目前的计划是明年或后年拍。如果公司同意，他想请个人先来公司干一段时间，做些资料收集整理，再学一点电影制作初期的工作。如果我暑假有时间也有兴趣的话，欢迎我来学。

不过，他也讲了老实话， he 现在是附属在这家公司的，凡事得和公司商量。公司请人报酬可以付多点，如果是自己掏腰包，就没那么大方。

我因为预定 5 月份回中国参加我妹妹的婚礼，6 月份才回来，所以请他考虑这个因素，如果用人不急，可以等到我回来后。

他说，不急不急。你回来后和我们联系。

从他办公室出来，大卫笑咪咪地说，谈得还好吧，一个半小时呢。

## 第八章 超现实的“小手指”

### 小手指

又是一年一度的创作假，又来到麻州这个小镇，住在布鲁克农场旅店。可我的心情和去年大不一样，觉得整个人很累。坐在巴士

上睡着了，居然又是与去年同样的梦。有天早上起床后，我朦朦胧胧看见床前一块红布包着我的两个心脏。我糊里糊涂又倒下，还说，难怪我这么累，原来有两个心脏。这个梦我已经好几次做到，好像在提醒我身体有问题了。

几个月下来，我替查理打工占了不少时间，而且都是很费心血的活，压力很大。查理当过教授，做事精益求精，一个词也得推敲半天，时间不够，就得加班。学习任务也不能马虎，只好下班后加油。晚上睡得晚，早上还得早起。金耐尔对我的要求我也明白，相形之下又增加了一份压力。一段时间下来，我觉得自己的脑袋都乱了，什么念头都有，看见什么东西脑袋都在转，大脑无法休息，灵感倒多了起来。思维越走越远，它们不像是从属于我，而有它们自己的生命似的。我看着它们在我周围跳跃，舌头似的，又如天光野火中的一群小鬼在唱那日出和日落，树木和尘土，我只得变成自己的牧童跟随它们去远游。

我对金耐尔说，有时写诗，写着写着，活生生觉得自己像一辆无法控制的车，疯女人似的直往前冲，感觉好危险。

金耐尔笑着说：“那你就让自己野起来，多写。”

我和盲眼同学大卫晚上9点多才到。同学们大多在楼下的客厅和小书房里聊天，或在赶写诗。

爵微儿见了我就说，晚饭时，金耐尔问起你，说你近来的诗很

出色，明天可得给我们读几首。

我打定主意在布鲁克旅店不写诗，要写，就写一首诅咒语言的诗，是语言使我人不人鬼不鬼的，这该死的语言，害人精的语言，你索性把我捣碎磨成粉子，再按照要求重新捏一个我好了。然后你把我送到哪里都成：

我像寡妇数养老金数我的词  
可怜的家伙，我的英语词  
我的情人也比你多  
洗去还存有浪漫的心，痛的头  
活剥下我的皮  
还有我的两个天使翅膀  
让我们从头开始  
向我的中文借我的声音  
我再学你的腔调，你的发音  
每样东西都调在一起，做我们的肉  
你来写诗  
我看着你，中国的美人鱼  
四条腿，两条英语，两条中文  
我们还要游过撒哈拉沙漠游到金字塔顶  
游回到我的四川

拜访我的妈，如今也是你的妈  
告诉他们我们多相爱，如仇人一样  
或者干脆说，你我是夫妻  
可以彼此折磨，合法地

可能是上周写了那首拿腔拿调的诅咒诗，周末一回到纽约我就生病了。周一又是雪又是雨，我不能去上班，只得躺在床上休息。

周二和金耐尔有约会，必须去。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这学期写的诗很特别，和以前不一样。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金耐尔直直看着我问道。

我说：“你参与了这个变化，从第一学期开始，只不过它来得迟了些。”

“当我读到那首“小手指”时，我在想，这样一首诗由你写出是多么不可能啊。”

我最初是想写一个“坏习惯”，人人都有的挖鼻孔的坏习惯。后来，一直不满意，修改成了“小手指”。没有了我主观的批判，而是陈诉这样一件事情，让诗本身说话：

我的小手指喜欢呆在我的鼻子里  
寻找什么似的  
里面，也许有些矿藏，这世界赠与我  
却没告诉我的

小手指旋转着，像天使在游泳  
我感觉着快乐  
感觉着小手指的力量  
一天，我和朋友一块儿  
朋友爱谈论后现代艺术  
和往常一样，小手指舒服地呆在我的鼻子里  
朋友正聊得开心  
忽然停止，盯着我  
小手指吓得一动不动  
好像它侵犯了别人身体的某个部位  
从此以后，我的小手指和我难过极了  
我们只好互相批评——  
“你为什么要进到我的鼻子里？”  
“我想感受你的内部。”  
“你为什么有我这样一根手指？”  
“我生来有手便有你。”  
我们没有找到答案  
我的小手指仍想进到我的鼻子里  
仍想亲近这个身体，它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它的小指甲里有些脏物

它们来自我的身体或这个世界  
但它们是否也是一个被压缩的生命  
像我自己被压缩一样？

“你还有一学期就毕业了，有什么打算吗？”

我原想一毕业就回中国，可现在进行的英文写作怎么办？我希望能再进一步地有所加强再走。

我忽然想到我5月份回中国的事，我对他说，你喜欢什么中国东西呢，我要买样礼物送你。

他想了想：“我在中国时买过一种信签纸，很古典，印着中国画的，纸也是很软的那种，绘画用的，不大不小的，一叠有这么厚。”他比划着。

我明白了，估计是荣宝斋出的那种宣纸信签，一口答应给他买回来。

## 要回国了

一直在念叨回国，是想去参加我表妹兵计的婚礼。而且在台湾的王孙听说了，积极鼓动，也表示想和我一道去游三峡。



左起妈妈、外公和么姨在家乡万县的和平广场上

我妈和我么姨关系亲密，我和我么姨就更不用提了。我一度觉得她也是我妈，甚至比对我妈还亲。我、么姨和外公三个

人住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我妈上班常不在家。我就缠么姨。她到哪我到哪。

么姨年轻时在蔬菜公司工作，她的同事都叫我是她的尾巴。么姨那时年轻又美丽，在外被称为“邵家牡丹”，追求的人不少，经常约会。我是每次必跟着，有的男人嫌我碍事我也不管，我么姨愿意就成。

她谈过的对象中有个戴眼镜的王叔叔对我最好。



这是我周岁时拍的

现在想来他一定是看我没爹，妈也顾不上我，才对我那样的。我6岁不到时，我妈就去和祥街小学苦苦哀求学校收下我，说家里没人管我，怕学坏了。

王叔叔知道我当上了小学生，给我买了一个当时很精贵的铁皮文具盒，里面配着几只花花的铅笔，一个兔子卷笔刀，一条橡皮。在我印象里，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得到的礼物，又那么好，来自那么一个善良的人。这件事印在我头脑，一直是我坚信世界是美好的、人是善良的依据。

深受资本家出身之累的么姨因为“血统论”观念没有和王叔叔好。王叔叔老家是万县人，家里过去是地主，有钱供他读大学，后在河北唐山工作。1



1982年刚上大学时，参加歌咏比赛后，我们唱的是红军组歌，穿的是红军服装。

978年唐山大地震，我芹姨要我给王叔叔写封信问候一下，可没有回音。芹姨说，死了那么多人，谁知他还活着没有。我伤心地想，为什么好人命不长？王叔叔那么好。

么姨也叹气说，你知道吗？当初就他看好你，我们都怕你不成器，不学好，被人看不起。只有他说你有天赋，可塑造。如学好，会出人头地；学坏，也能坏出个名堂来。



1980年万县市西山公园，开始“臭美”

么姨爱看小说，从旧书店借了《茶花女》、《悲惨时间》、《复活》，她上了班我就偷偷看，或晚上趁他们睡觉了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再不就借着从外面射进来的路灯看。后来眼镜近视了，也没收敛。我的文学兴趣恐怕开始于那时。么姨给我买过一套高尔基的连环画小人书，《我的童年》、《上大学》、《在人间》，还有《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类的苏联革命小说。我看多了就一心想当女英雄。可么姨不知道我的心事，一味责怪我贪玩，吃零食，不思上进，对我一直很严格，我长大了还耿耿于怀，说她虐待我，我要对她的孩子报复。

么姨大笑，说，不是我严格，你还没有今天呢。

兵计表妹是么姨的女儿，小我7岁，我们一块儿长大，非常亲



密。她是那种个子细细高挑，声音清脆悦耳的女孩子。这个妹妹和我虽说不是一母所生，却也让我欢喜让我忧了许多年。

小时候，我和她都住外公家。我大，外公就事事要我让她。可那时的我正是心眼最多的时候，哪吃这个理。趁大人们不在时，我就哄她的零食吃，她小人一个，只图有人陪她玩，哪知道我的用心。

我上小学时，她还没上幼儿园，一个人在家苦巴巴等人回来。踮起脚从窗台上看见我从路的上端往下走，高兴地从三楼跑下来接我，我书生样地递给她我的大书包，她像拖什么似地搬上楼，讨姐姐的好。我让她做这做那从无怨言。

1997 年回国就是参加表妹的婚礼，她清丽可人的形象一直是我生活中的安慰，如今她已为人妻，为人母了。

吃过饭，按家里的规定该我洗碗，我就期待妹妹伸出援助的手。外公总看出我的鬼把戏追我回来洗碗，我便跑到楼下的厕所里呆上大半天，直到妹妹来救我，说，姐姐，碗我已经洗了，出来吧。要么她还给我找来一本小人书什么的，陪我蹲在厕所里。



与妈妈、表妹陈兵合影

所以我们的友情是经过考验的，凡事我也会告诉她，连偷改考试成绩，我也告诉她。那时我读书不用功，只喜欢看小人书和小说，每回考试后，怕么姨打我，我就偷偷改成绩，一般都能过关。可有一次，

我改了成绩单后，发现改的笔迹不对，知道眼尖的么姨能看出来，就紧张地问妹妹怎么办。

怎么办？我们躲在厕所里商量的结果是我给么姨看成绩时，妹妹装着要妈妈，分散么姨的注意力。后来的结果是不但我挨了打，妹妹也因为与我狼狈为奸挨了打。么姨说，她跟坏人学坏。

后来我上了大学，我才成了她的学习对象。

妹妹口齿伶俐，待人活泼大方，总有不少朋友围在身边，连我的朋友都可以当她的朋友。别人办不到的事她可以搞定，家人都称她为外交部长。

如今这样一个妹妹要结婚，我自然高兴不已。问她要什么礼物，她说，姐，你能回来就是最好了，什么也不用买。



和表妹兵计在一起

话虽这么说，好歹做姐姐的出国留学，结婚礼物是不能少的。上个礼拜，专门请外交官参考，去商店给妹妹买了一件鲜艳的红色婚礼长裙，外带一个小坎肩，是名牌。妹妹非常时髦，穿上这件长裙，不但时髦而且有品味。给家里人的礼物都是平时随便买的减价货，给外公买了件暗绿色的开司米羊毛衣。

定的飞机票是5月8日，返程是6月8日。去经香港，返由北京。中间在香港与王孙碰头，然后飞重庆，再坐快艇回万县市。

热情的郑先生知道我要回中国，一定要给我饯行。今天我和他又一起吃饭。

认识久了，他的感叹也多了。他们家过去在台湾势力那么大，蒋家的天下，现在国民党走下坡，本省人势力大，就轮到外省人受排挤了。

说到华人媒体，我对郑先生说：“为什么有关问题只在两三个中文报纸上讨论讨论，自己说给自己听，有什么用？既然这是社会问题，就应该也在美国媒体上讨论，让更多的美国人知道华裔们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且美国人中也有正直的记者，应该和他们交朋友，争取他们的支持。这样才能对美国社会有所影响。现在在美国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受教育程度也越来越高，读《纽约时报》等英文报纸的人也不少。也许，咱们华人应该办一份自己的英文报。”

我曾给外交官说起过办英文报的主张，外交官还若有所思地建议我，如果真有兴趣，写份计划来，可以往上报。

有一件事，我也觉得有意思。祖国大陆也罢台湾也罢，都在互相比较量，为统一或独立在美国争取不同的政治力量，也争取不同的华人组织。报纸也公开登载，有时读到这类新闻，老给我一种封建社会的感觉。

上次骆家辉正式宣誓出任州长的仪式，报上报道，顾及各方关系，华盛顿州邀请了中国内地和台湾驻美文化代表处的官员，但如

何安排座位却颇伤脑筋，最后内地官员自然是正式的席位，而台湾官员就被安排坐到楼上乡亲族亲席中。

上了这学期最后一次写作课，然后和金耐尔有个约

我没有如往常带几首诗给他看，因为我想和他谈论一些问题。问题之一是，如何继续我的英文写作？如何提高？

我们一坐下，金耐尔说：“邵，你离开我们专业后，我，我们会想你的。”

我眼睛一热，忙说，我们还会见面的。我也时常和你保持联系，如果我以后回了中国，希望能邀请你去中国。我们一起去朗诵诗歌。

我是没有思考说的话，金耐尔却很感兴趣，问我中国有没有写作课。

中国有作家班，文学院什么的，怎么上课我不知道。但大学英文系好像不开写作课，因为大学比较注重学术，而不是创作。

“那你可以去上英语写作课了？”他兴趣不减地说。金耐尔年轻时到过很多国家教书，也很喜欢不同国家的学生，认为当他们的老师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我想我可以回中国教书，把我学的知识传给更多比我年轻的人。为什么不呢？我又邀请金耐尔，说，我要去教书，也请你去。中国有的大学环境非常好，适合上了年纪的人。

他居然说他想去，去呆一段时间，只不过要周围的人有懂英文

的，他才能和他们直接交流。

至于我的下一步，他的看法是，我最好再申请一个写作专业读，学位不重要，但可以继续写作，也可以和更多的作家和诗人交流。有的大学的写作专业都没有学位，但有一群作家诗人定期讨论作品，这样帮助很大。

## 在美国庆祝香港回归

我的返乡行以在北京大病一场结束。吊针输药折腾了一个礼拜。回纽约的飞机票延到6月16日。早就听人说，习惯了美国这边的环境，回到国内会生病。

千山万水，好不容易见了亲人们，前后聚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不满10天。妹妹的婚礼热热闹闹。家里一切照旧。我是隔眼看花。最后一天去上祖坟，给文革中死去的外婆烧香磕头。

想想那些应酬，没完没了的路途跋涉，转车转船。去成都签证后回重庆，那些个体户的车在路上坏了，半夜停在乡村路边，几个小时过去了也不管，我浑身发冷，急得直想哭。妈妈陪我一道又去签证又被拒签。混帐的签证官。妈妈没我的运气好。我第一次签证时，签证官都不看我的资料，说，你这样的人应该属于美国。把我当个宝，还请我喝咖啡。为什么我妈就这么难。宝贝的妈就不值钱了？看望方老遗孀何老，进门老人就哭，多谢你还来看望这个老师。我累得没有感觉，在方老遗像前站了会儿。

中国啊中国。

挥挥手，相爱一次便是人生中送你一程。

从中国一回来查理马上又请我去帮忙。他们要去香港参加回归仪式，还去北京、台北等。很快要启程，事情多如麻。

首先做的事是处理一封信，他们写给江泽民的，希望这次去北京能见到他，聆听指教。信是别人用英文写的，得译成江主席看得懂的中文。我说，江主席懂英文，不必译了。

查理一副严肃的样子说，要译，表示尊重。

同样的，也给台湾的李登辉发了信，希望在台北见到他。

我开玩笑，这下子，该握的手都握了。董建华就更没问题了。

我坐在华盛顿广场读报纸，正读到一篇报道，说一些主张台湾独立的人在时代广场示威游行，向中国说不。忽然，听见高音喇叭放着响亮的音乐，一个黑人小伙子从那边走过来，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他冲我眨眨眼，说，他们发疯了，我可喜欢女人。

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大型的游行，同性恋的什么 28 周年纪念。

男女老少的同性恋大集合，他们穿着或不穿衣服的身体，吸引了五大道两边的行人，尤其是那些裸体者们，身上涂着五彩颜色，一路表演。有的男人扮成女人真好看，不比宝玉哥哥差。

游行队伍里有几个政治家，市长竞选者，还有现任市长，统统为同性恋们呐喊。

嗨，想怎么爱就怎么爱吧！不爱也成。

我们学校的校报有一期封面是一对女同性恋学生在亲吻的图片，她们俩在学校举行婚礼，双方家长也来了，还有很多老师同学参加。

这是开明的一面，但时不时也有报道，某人因为是同性恋被解雇或被降级而上诉受雇单位。

纽约就是一个魔鬼与天使共存的地方。

我在中国时还一心想着回来参加留学生合唱团为香港回归准备的演出，后来生病耽误了排练，他们也不要我了。

这场演出定在7月3日，林肯中心。

外交官给了我两张很好座位的票，是给驻联合国的国际友人和美国朋友剩下来的。临时多出来了，外交官让我找一个美国朋友去看，还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座位可能就和我们挨着。

我的波兰朋友安娜住在我家附近，她也喜欢去听音乐会。我决定请她，可她要打工，建议让她妈妈和我去。

晚会气氛很好，又是在林肯中心的主音乐厅。大部分观众是中国人，有的还拖家带口的。我们周围坐的大概是各国外交使团的朋友，一个个彬彬有礼。

晚会过程中，时不时有人咳嗽，说话，带孩子进来出去，非常不守规矩。每次有人发出声音，我的心都提起来，生怕别人笑话咱们。

中间休息时，外面可热闹了，老张老王老远就吆喝开了。

安娜妈妈在给人家看孩子，听说来林肯中心听音乐会，特意打扮得整整齐齐，穿着黑丝绒连衣裙，戴着白珍珠项链，挎的是安娜的蛇皮钱包，临出门时，见我穿的连衣裙没戴任何首饰，非要我也戴上一串珍珠手链。她一头浅金色的头发，梳得光溜溜的，很端庄雅洁。

我逗她说，你看有人不停地看你，一定把你当作什么人的夫人了。

“夫人”用可怜巴巴的英文告诉我，她还没吃晚饭，我们就买了一杯果汁，一个小三明治，她一定要替我付了钱。

我问她喜不喜欢这些中国音乐，她点点头。不过，不管她懂不懂，她这么郑重其事地来参加这场中国人的音乐会，我已非常感动。后来安娜讲，她妈妈的几件珍珠首饰还是向带孩子家的主人借的。

今天我们在曼哈顿中城举行庆祝香港回归大游行。各个学校早就发出电子邮件请同学们自愿参加。

有一辆花车是留学生的。每个学校派出一个人站在花车上，任务是向两旁的观众挥手致意，当微笑使者。我们学生会的主席说我



活跃让我上花车，上车就上车。

我们十来个人在车上招摇过市，由于没有事先准备，别的花车上有音乐，各种装饰，小姐们还摇摆起舞，有的还有专门的服装道具什么的，我们就每人一面小旗子，香港的紫荆旗或美国的星条旗。好在我比较放肆，下车从路边一个人手中抓了一面，在车上时就可以左右开弓。

好不容易找来的一个录音机，声音放到最大，也盖不过周围的敲锣打鼓声。

前几天，美国广播公司电视七台现场直播了香港回归仪式。在这之前，美国媒体疯了样地涌到香港，派出大批记者人员争抢新闻。



1997年7月1日，庆祝香港回归大游行

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讲，查尔斯王子在香港降下英国国旗，宣告了大英帝国殖民时代的结束，也给了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一面镜子：太阳下没有永远的帝国。上个世纪的英国那么强大，殖民土地遍布全

球，号称“日不落”国家。到了这个世纪已经让位给美国，那么下个世纪的美国呢？怎不让一些美国人忧心忡忡？

前港督彭定康站在雨中，听着苏格兰音乐“友谊地久天长”，看着英国国旗下降的时候哭了。

彭定康该不该哭？英国，知不知道如何说“再见”？

各大媒体都在采访有关人士，谈香港从一个小渔村到现在这个贸易金融自由港的未来，尤其是它已经建立起来的民主自由。国家广播公司还采访了董建华，好像要让他代表中国保证香港未来的民主似的。

公共电视台分两次播出了“生在红旗下”专题片，力图从美国人的观念来看待中国近20年里发生的社会变化，也采访了许多至今流亡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

## 捡便宜租房

我在洗衣房认识的朋友安娜只有20岁，她们一家得以移民来美国，是她妈妈在波兰买美国政府给移民少的国家所配的绿卡彩券中了彩。她们半年前来到纽约，英语也不好，只好先打苦工挣钱，她想明年去读书。

我们认识后，她对我很友好，经常在她工作时间帮我洗衣服，我早上去学校把衣服给她，晚上回来路过洗衣店时就去取，顺便也和她聊聊申请入学和奖学金的事，这还是来美国后我第一次去帮助英语比我差的人。

她妈妈也常让她请我去她们家玩，有一次在她家吃饭时认识了她的姑姑，一个叫苏菲的胖胖女人。苏菲也是从波兰来，十几年前死了丈夫，来美国后一直在一家健身院当清洁工。我见到苏菲时觉得这个女人是一个苦命却要强到极点的女人，在纽约这个鬼地方，

人人都虎视眈眈，生怕别人咬你一口，久而久之，自己也有了虎相。

前一段时间苏菲的房客搬走了，安娜建议我去看看苏菲的房子，说，如果喜欢，可以考虑搬去住，至少比我现在的这套两居室住五个人的条件宽敞舒适多了。

苏菲的房子在十街，靠着一大道。走进去是厨房，两间卧室各在一头，中间一个走廊，看起来非常清静。里面还种了几盆花草，我看了很喜欢。

我想这样一套两居室在纽约恐怕得一两千，一间房在纽约起码要五六百。令人不敢相信的是，安娜说，苏菲这套房是十几年前租的，当时房价 50 美元，至今还是这个价格。

怎么可能？原来，过去这栋楼的房主是一个白人女孩，女孩因为得爱滋病死了，就把这栋房子留给了她当时同居的黑人男朋友。那黑人男子得了这笔意外之财，一直没有涨房价。每次一提到要涨价，整栋楼的波兰房客、犹太房客们就起来斗争，开会阻止他的行动。

所以就有了在纽约的东村 50 元钱住两居室的“天方夜谭”。

我捡便宜似地以 300 元的价格租下了苏菲的一间房。

## 第九章 我会倒下吗？

### 艾瑞克夫妇

现在终于有了一间自己的房子，门外没有人来来往往，打电话不用压低声音，电脑摆在桌上，好像具备了一个作家应该有的基本物质条件。

赶快写吧，打开脑袋，让那些囚犯通通出来，让它们跳起来，疯起来，野起来，让缺了牙的女人在高原顶上爱个死去活来。还有那个只有一根脚趾头的老廖，还有会唱歌的土豆，拥挤的跳蚤，东村的谋杀，独腿人的舞蹈……

梦中的人个个都出来了，我的背也发出了声音，听见蜜蜂在里面工作，个个都像在世纪末讨最后的一口粮食似的，活得慌里慌张。我从小对死亡的恐惧又回来了，总觉得生死是随时都可能的事。我认识的一个103岁的老画家，他对我说，你写作就要写出像《美国悲剧》那样的伟大作品，不要写垃圾似的东西。

他给我看他这辈子所画的作品，说，这些都是我的孩子，我这一辈子爱人类，爱美，可现在我要死了，害怕得很。

我看着他满脸的皱纹，他亲女孩子时非常专心地捧着对方的脸，像欣赏一件艺术品。

我不觉得一个103岁的人和一个几岁的孩子对死亡的恐惧

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们都是在孤独中挣扎然后触到了死亡的胡须。我亲近老人是因为他们害怕的东西。我觉得如果把我的身体剖开，恐惧的细胞一定比欢乐的多。欢乐时也是歇斯底里的欢乐，总有欢乐一次就少一次的感觉。打个比喻，就像做爱。做爱时恨不得把命也拼过去，打仗似的，总是往最后界限冲，不留后路的。也可以说，做爱是与孤独与恐惧做斗争，这样的极度感觉就是死亡的感觉。

今天下午与《纽约时报》即将派驻北京接替泰勒先生工作的艾瑞克夫妇见了一面。

上次在北京，我经朋友的介绍和泰勒先生喝了一次咖啡。朋友讲，泰勒先生是非常知名的记者，曾经在海湾战争期间做过战地采访，名声大噪。我在北京给他打电话时，他问我是中国哪个省份的，我说四川。他当即回答说他过去的一个助手也是四川人，他对四川人的印象很好。

我找他的本意是希望毕业后有机会在《纽约时报》驻北京的记者站实习一段时间，学习英文的新闻写作。

喝了一杯咖啡后，泰勒问：“你知不知道来这里工作会有危险？”

“为什么？”这个我可没想到。

“我就随时被人跟踪，找人谈话人家都不敢。我去北大采访学

生，事后那些学生都受到警告。”

“有这么严重？”

“我现在和你谈话可能就在监视之中。不过，我很快就要回美国，去斯坦福大学进修一年，写一部关于中国的书。接替我的是艾瑞克夫妇，你回纽约和他们谈一下，他们夫妇都在时报，这次会全家搬到中国。”

艾瑞克夫妇刚好就住在纽约大学附近，我们约好三个人一起会面。

我一进门，一个异常漂亮的小女孩儿就对我用中文说：“你好！”

我吃惊得不行，看见这样一个如天使般的孩子，心想他们的父母一定不简单。

坐下来后，我告诉他们，我的初衷是想有机会在《纽约时报》驻北京站工作一段时间，既在自己的国家，又在一份英文报纸，这样发挥了我中英文写作的长处。

我坦率地说：“我不想惹麻烦。我热爱自己的国家，我也知道她现在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尤其是在具体的一些操作问题上，很不成熟。如果万一发生不愉快的事，你们可否提供任何帮助？”

艾瑞克先生说：“我们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帮助。过去在我们报纸帮忙的中国学生都有比较好的待遇，而且他们回到美国申请学校

往往可以拿到全奖，有个人还去了哈佛。在北京的工作主要是翻译资料和采访时做口译。”

正如泰勒先生介绍的那样，艾瑞克夫人很友好。听了我的自我介绍后，她说：“你正是我们需要的人。我们去中国工作会有很多困难，如果你明年能回中国，那就太好了。”

我昨天刚读到一条新闻报道，中国政府发布了一个新规定，以后凡是重大的事件国内一律不要封锁，要及时准确地加以报道。如果自己不报道，被有的海外媒体有所扭曲地报道，反而不利等等。我便告诉了他们俩，两人似乎很惊讶。

## 歌舞升平的夏天

今天是外公的 94 岁生日。打电话回家，正是全家晚上聚在一起吃生日蛋糕的时间。

这次回国见了外公，发现老人还是变了一些，明显的是听力不如以前。我也知道这个年龄的人生理功能衰退是自然现象，可还是责怪家人照顾不周到。尤其是妈妈，她的脾气急躁，对老人有时不耐烦。后来想想我也没有理由责怪她，我自己什么孝道也没尽。

在家里总是尽力和外公多呆在一起，陪他说说话，劝他不要操心别人，要管好自己。外公这一辈子活得不容易，只有到了七八十岁才享了点清闲，天天读《参考消息》。开始家里没有就站在公共报栏前读。遇上我们，就谈论国家大事，台湾和内地的关系。不仅

如此，还有苏联和美国也是他关注的目标。操心完国家的前途，又操心孙子们的前途。他非常渴望全家人集资合力兴办一个家族企业。好几次召开全家大会，连谁当董事，谁当主管如何分红都安排好了，可家里人各有各的忙，并不在意他的想法。会开完就完了。

外公年轻时靠勤奋节俭创办了一家印刷厂，生意正兴隆时遇上1949年解放，公私合营交给了国家，他挂了个董事的名，实际上是个普通工人。他工作非常认真，从不迟到早退，在厂里不多言不多语。这样一个老实人在文革中又因为资本家兼国民党的身份被斗争，天天戴着高帽子挂着牌子上下班。么姨后来取笑他说回到家里都不敢取下来，怕红卫兵发现了受惩罚。一直到70多岁才退休。刚退休又不小心雨天路滑摔断了大腿骨，别人都说，这下老人要瘫痪在床上了。

谁也没想到他靠了什么力量撑着很快从床上站起来，一小步一小步地移动锻炼他的腿，直到他能拄着拐杖行走，天天早上去附近的公园打他自己创造的一套太极拳术，刮风下雨都不能阻挡。

公园里的人没有不认识他的，也没有不认识我的。放假回家，我的一个任务是每天上午去公园接外公回家。他从不要人搀扶他，我们总是并排着走，人人见了都说，这个孙女真有孝心。遇上不认



1972年元旦，全家福，外公，舅舅一家，么姨（二排中间），妈妈（二排右一），我在外公右边



识我的人，不管这人是打扫公园卫生的还是在政府做事的，他都介绍，这是我的外孙女。上大学的。

1994年外公过马路时，被放学玩耍的小学生撞到在地，这一次可严重了。他做了平生第一次手术，大伤元气，一直没有恢复过来。

过去，外公的生日我爱给他买一件衣服什么的，希望他穿得体的体面，可他总是放在箱子里。今年我可没法给他送礼物了。

我表示歉意，外公在电话里说，你给我买的衣服最多，穿都穿不完。我这辈子，只有你最让我称心了，给邵家挣了光彩，过去也是你最听我的话。

我想外公是记不得他敲我脑壳的事了。在我老家，小孩子做错了事，大人就敲脑袋，说：“敲了就记得了。”长大些，外公一要打我，我就跑。有一次为和妹妹闹矛盾，外公追得我躲进了厕所，好久不敢出来。

马克又打电话来，问我可不可以和他见面。因为他很难过。

他们在报社玩命工作是出了名的，他爱穿着又差又脏的衣服，把自己打扮得流浪汉似的在街头做些实地采访，不像有的记者专跑市政府，开新闻发布会等热闹的没危险的地方。有时候，在枪声中他也敢冲进去抢新闻，很多时候都得违法冲过警察的防线，只要不被抓住就成。所以，他总很得意，以为别人也同样看重他的工

作。

可这一次他很伤心。他有个和市长的约会，就他最近花了很多时间做的有关城市垃圾处理问题的专题采访和市长交换意见。可发生了布鲁克林的两个恐怖分子涉嫌使用化学武器的案子，一时间引起骚动，他们报社的编辑明知他有安排可非让他去现场采访，气得他采访回去就说要请假几天。

原来是这样。

我听过他多次说要辞职的话，知道他这个人很情绪化，便故意激他：“算了辞职吧，反正世界末日也不远了。或者哪天科技发达了，世界太平了，打开电脑就能直接看到整个地球，哪里发生什么都一目了然，不需要你们搞新闻的了。”

“那我们就写为什么没有新闻。”他马上不服气地反驳我。

“那你干吗不去骂一顿或者揍一顿你的编辑呢。你只有在我面前威风，遇到比你厉害的就没气了？欺软怕硬的家伙。”

我知道他很喜欢他的工作，虽然辛苦熬夜，可只要有情况，他马上精神抖擞如战士上前线一样不怕死往前冲。我曾问他，他们记者去开什么会，有没有红包纪念品之类的。他说，除非你想被炒鱿鱼。

我们从他们报社一直骑到中央公园，横冲直闯，有人盯着我们看。公园里正有一个墨西哥的摇滚乐团在做夏季表演，马克拿出他

的记者证挂在胸前，我们进去听了不一会儿，他便拉我出来。

我们在附近的草坪躺下，周围也多是成对的人。

你今天穿的什么内裤？

住嘴。

告诉我，我又不强奸你。

住嘴。

他的手伸过来，放在我的腿上。

我一巴掌打过去，他故意叫起来，我要报警，这个中国女人用暴力。

去吧。

我在草上打了个滚，滑到一边去。

过了一阵，没有动静了，我回头看他头朝下地趴在地上，睡着似的。

哎，你死了？

他扑过来抓我，吓得我哇哇叫。别别别，我跟你谈件事。

什么，是不是想通了嫁给我？那我一定开着直升飞机去中国接你。

听着，我可是要谈正经事。我想请你替我写份申请绿卡用的推荐信，你愿不愿意？

他一听就大呼小叫起来，啊，难怪你今天愿意出来见我，是想

利用我。

你这个猪！我认识那么多美国人，没一个像你这样说话的。有的朋友听我一说，马上就写给我。我找了十来个人，其中两个还是普利策奖获得者。大家都乐意帮我，有个朋友还打国际电话向她一个外交官朋友请教如何写。你算老几？我算瞎了眼认识你这个混蛋。

他见我当真了，马上说，对不起，我开玩笑。需要写些什么嘛？

我转过身不理他，他只好说，那我就告诉移民局，这个女人是个危险分子，把她送回中国好了，别在这里惹麻烦了，让我不得安宁。

杂种！我边笑边骂，真拿他没办法。我也无法理解他这样一个小流氓出身的人如何变成了一个自律敬业的好记者？

我记得金耐尔有一本诗集叫作《当一个男人独自过了太长的时间》，书我没看，但这样的男人和马克应该差不多，即使是天才，也是一个让人发疯的怪才。

在地铁口分手时，马克说，现在我的儿子回来了，我的生命才完整了，多少年，我都在不完整中度过。以为此生如此了。

马克真让人烦不完。

他又打电话来，严重地说，有人在他的邮箱里放了两张照片。是我和他在中央公园骑自行车的镜头。

“这有什么？”我一副沙场老将的架式。

“有什么？这事一定是警察干的，他妈的纽约警察总不干好事。他们恨我写的报道。”马克那头有火警似的。

“我可是读到纽约自从这个犹太裔朱里安尼市长上任后，纽约的犯罪率下降到最低历史水平。”

“他们是威胁我，这也证明我可能被人盯着。上次去布鲁克林采访那个被警察暴力虐待的黑人时，我就收到过奇怪的电话，让我当心点。这次又是照片……”

“我的天，那我不是也受到牵连了？警察会不会来找我的麻烦哟？我可还是个外国学生。”我一明白过来也知道和警察过不去没有好果子吃，哪里都如此。

“我这不是正要告诉你吗，你们五街有一个分局，如果有人来找你谈什么，你把他的样子记下来。喔，对了，还有个女的，她曾想跟我上床，我说我有女朋友了，我说的是你……”

“啊，马克，冤有头债有主，你干吗平白无故冤枉我？我们早就不好了，你还拿我作挡箭牌？你要是跟她好不就没事了，现在我可惨了。”

“我操，你让我去死呀？我为什么要跟她好？看见她我根本就没有情欲，还带着枪。”

“可现在怎么办呢？你不是拿我当牺牲品吗？”我气得直想骂

娘，这家伙好事没让我沾一丝，坏事都拉上我，纯粹一个霉星。

呼天抢地过后，我冷静下来，想来想去觉得不可能。如果真是警察注意上他，干吗让他知道？

“照片拍得清楚不清楚？”

“非常清楚，而且，我们是在骑车，一定出自专业水平。”

“我知道了，可能是你们报社的人，或别的电视台记者，认识你的。

我侦探般地下结论：“说来说去，你神经过敏。”

他一听不高兴，挂了电话。

他晚上路过我这儿，请我下楼一趟。

开了车门，他一把把我拉进去，我吓得以为他要强奸我。却听一个人说，嗨，你好。

一看，后座还有个人。再一看，是个英俊的小伙子。

马克说，猜猜，是谁？

我怎么知道？

有次他在电话中说他们报社有个记者想认识我，问我愿不愿意和那人交朋友。我想他是故意说来刺探我的，就没理。总不可能是这个人吧？

马克拍了下我的后脑勺，说，是我儿子呢。

26年前的周六是猫王艾尔维斯·普利西里去世的日子。

摇滚音乐的太阳落地了。更多的女人得救了。

比尔·克林顿也爱猫王。难怪他也有一张杂皮的脸，让好女人爱的坏男人的脸。

电视台正在播猫王的演出，那张脸，是吸毒过多的脸。俊男的脸，再毒，也让人想摸一下。

猫王进了白宫，见了尼克松总统，还造访了联邦调查局。然而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里，他是以吸毒犯记录在案的。上次我们去华盛顿，那个女导游带我们参观F B I时，讲给我们听的。

我又开始头痛了，什么药也不管用。睡不好也吃不下，浑身没劲。可能是放假后，生活没规没律，吃得太少。

偏偏遇到一个中国诗人来做客，看到桌上的一本北岛诗集，他就开骂，而且骂得义正辞严，好像开我的批评会似的。

我说，求求你了，别在我面前骂他，我正头疼呢。大家好不容易还写点诗，应该互相支持才是。

他很诚恳地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没立场，而且，承受力也太差了。

我端着准备给他的水，自己喝了两口，不说话了。

上学期做过的社区服务包括粉刷教堂厨房，周日分发救济衣服等。

今天被安排去一家低薪家庭儿童夏令营服务，带那里的孩子们

去布鲁克林一家大型超级市场的游乐园。

下午5点钟送这些孩子回到了夏令营后，我去学校，原准备看点书。可在网上读《纽约时报》的一条消息，说美国乡村音乐之父加斯·布鲁克晚上在中央公园举办一次特大型的露天音乐会，他的歌迷们甚至昨晚和今早已经开始在现场占位置。

叫上一个住学校附近的中国学生，我们就往公园赶。

公园好多街口都被封了，到处是警察。我们两人左看右看，摸不着方向时，忽然听见路旁的石坡外有嘈杂声。那位同学个子高，窜上石坡一看，大叫，就在这儿。我也爬上去，一看正是演出场地的边际。

我们高兴地直往前冲，警察拦住了我们，说已经封场不进入了。

正沮丧时，我忽然看见有一队人正在和警察交涉，好像是可以进去的架式。我一下子窜到他们后面站着，排着队。果然，警察让我们一个个都进去了。

那位同学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见我已在场内。怎么办？

我看见有的人在出去，出去时，警察在他的手背上用水彩笔画个圆圈，像那些夜总会一样。

我也让警察在我手背画了个圈，出来后马上抓住同学的手，把我的手背盖上去，给他也印了个圆圈。

两个人高高兴兴地进了场，演出正要开始。四个特大的屏幕挂



在四周，乐队正在奏乐。

据说这个乡村歌王是美国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个音乐家，他的歌比时间还久长。总之，诺大的一个北草地，密密麻麻的人，听刚才的警察讲，今晚可能有20到30万观众。很多是从外州来的，带着吃的、喝的、衣服、毯子之类，安营扎寨似的。而且，与很多音乐会不同的是，好多都是中年人，还有老年人，有的人听他的歌从小听到老。

有意思的是，美国广播公司做现场直播中途，有个画面非常感人：一个小小的四五岁的女孩儿，戴着一副小小的黑边圆眼镜，脸也是圆圆的，头发短短的卷着，镜头停在她身上可能有十几秒钟，她在干什么呢？她在音乐中闭着眼睛摇头晃脑，她的小身子也左一下右一下地摆动，完全不知道几十万人在盯着她，人群随即呼叫起来。

了不起的摄影师！

## 受不了的苏菲

早上和房东苏菲吵了一架。这是我来美国后第一次吵架。我一向不大有胆量和人面对面地吵，大多在心里愤愤骂几句了事。可如今，我也学会表达自己了。

苏菲每天早上5点起床，然后就到我旁边的卫生间泡澡，泡澡也罢，还开着门，在里面乒乒乓乓，全不管是否会吵醒我。好不容

易泡完澡吧，走廊那头的厨房又开始响了。

她每天在家的时间几乎全在厨房倒腾吃的，只要她在厨房，锅碗瓢盆的声音就像她的怪脾气一样让人心慌。我是断断不和她同在厨房的。第一，她会把她30岁死了丈夫养儿育女的辛酸给我天天讲，动不动就哭起来，听得我也像当了寡妇似的；第二，她的动作之重之大，加上厚重体形，举止又很强硬，我无法喜欢这种女人。

她所有的餐具都是很厚的钢质，任她怎么甩也甩不坏，发出的声音在楼梯上都能听见。我只要一听见她在厨房的声音就焉了，绝望得像世界末日似的。总是趁她不在时才到厨房弄点糊口的，半饥半饱凑合一下。厨房在进门的地方，靠近她的房间，每天怎么也得路过两次。

和不快乐的人相处，迟早你也会不快乐。这是我的切身体会。

这两天特别热，我只好开条门缝睡觉？

早上五六点钟我又被吵醒了，头又疼，只好起床把门关上。关了门也不行，厨房的声音还越来越大，好像跟我做对似的。

我站在门口，对着厨房喊：“苏菲，你可不可以小声点？”

“我已经很安静了。”苏菲继续铲着钢锅里的东西，口气蛮横地说。

我只好打开电视看早间新闻，又是一件怪事。

前一阵子发生的同性恋者库南钠枪杀服装设计师后自杀的案

子还没有了结。

那个在旅馆里发现库南纳尸体并报告警方的清洁工正在电视里发言，说，是我碰巧发现了他，我在现场。因此节省了纳税人成百上千万的钱来侦破这个案子。

他已获得了4.5万的悬赏金，这些钱来自联邦调查局和佛罗里达州和迈阿密市。

他上电视的目的是因为纽约市也曾悬赏一万美元寻找库南纳。可现在纽约市拒绝付他这笔钱。

71岁的清洁工对记者说，如果我得不到这笔钱，我的律师就会考虑起诉纽约市。我们希望他们付了，以免法律行为。

纽约市长的回答是：“这笔悬赏金是给那些提供线索捉拿库南纳的，不是找个死人。”

看完了新闻，我又躺下，想再睡一会儿。

那边又开始打电话了，苏菲60来岁，声音非常响亮，但由于英语不好，她又很急躁，说话又快又抢，听起来很难受。

我等她打完后，走到她开着的门口，先敲两下，然后说：“苏菲，我是学生，晚上需要学习，早上起得比你晚。请你以后起床后小声一点。还有最好打电话时请把门关上，你也有你的隐私，让我听了不好。你洗澡时也请关上卫生间的门，我来去去你在里面洗也雅观。”

“为什么？你关上自己的门不就行了。那我问你，你为什么不打扫厨房，为什么不洗地板，为什么……”

我一下火气就上来了。

刚搬来时，我问她我需要分担什么家务，她总说不要。甚至有一次她说我吸地毯不如她在行，我房间的地毯她要来吸。其实我喜欢自己来，也不喜欢她动不动不敲门就这个事那个事进我的房间。安娜说过，苏菲很讲卫生，让我特别注意。我就想她可能怕我做不好，不放心。现在又说我不做。我过去租房是这样的，我打扫自己的房间，每次用厨房后负责打扫干净，扔掉垃圾袋。别的就随便了。像爱德家，我常帮他清洁地板。那是我自愿。在中国房东家，也是负责自己房间的卫生，公共地方几个人打扫，或者房东自己打扫。

现在她倒好，找这个茬。我马上非常冲动地问她：“你是不是每天早上都要发一阵疯才舒服？不烦别人你就不快乐？为什么不离我远点，我不惹你，你也不要惹我！”

这么简单的道理她那个脑袋为什么不明白？

最后她叽哩哇啦一阵，什么道理也不管，说：“你下个月……搬出去。”

“什么？你有病呀？不懂事的孩子说话，说来就来，说搬就搬？我和安娜辛辛苦苦搬了家，花钱安装了电话，你让我现在搬出去？”

好，我搬你也搬。你非法租房给我，我要告诉你的房东。”

我火气大得冲天，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毛主席教导的。

我回到房间想给安娜打个电话请她来用波兰语和苏菲说说。可安娜说，她不想来，她知道苏菲的德性，和她讲道理没用。苏菲和她在纽约的姐姐十几年都不往来的。要不，你真搬走算了……

我们正聊该怎么办时，苏菲在门外大叫：“撒谎，你们都是撒谎人。”

我一听，也叫：“苏菲，你怎么能偷听我的电话？”

难怪，有一次一位男性朋友来访，谈话间，他说门外面有人听我们说话。我还不相信。

看来我长期被监听。

去学校呆了半天，晚上回来时，我坐在路边的石梯上不想进苏菲的家，心里挺难过。原以为换个好环境，学习写作有个好条件。这是最后一学期了。早知事情会这么复杂，还不如住在那个烂房子里，至少都是中国人，就算有个矛盾，互相还明白。

坐在台阶上好一阵子，我抱着头，直想叫娘。

再一想这种事情总不至于抹脖子上吊，让一步，也许就海阔天空了。

我疲乏地进了屋，敲苏菲的门，她身子缩在里面伸出个头，问

干什么。

“请你到我的屋子里来一下。”

她忐忑不安地进来坐在我的床角。我喝了一口水，尽量平静地说：“苏菲，我知道你不是个坏人，我也不是。你生活不幸过得不好，我没法帮你。大家都不容易，往好里想想，你在健身院工作十几年，还在波兰买了房子，以后回去和女儿团聚……”

我话还没说完，她就哭起来了，说：“邵儿（她发不来微信），你宽恕我，我宽恕你。我心里也很沉重。”

说罢，站起来给我一个拥抱蹬蹬蹬地走了。

## 我要倒下了

纽约的夏天是歌舞升平的时候。

中央公园的夏季舞台，林肯中心的夏季音乐节，华盛顿广场的露天音乐会，以及大大小小的公园都有免费的音乐舞蹈演出。对低收入的年轻人、穷艺术家来说，夏季，纽约向他们敞开了门。

虽然大师级的艺术家表演的不多，可比起平日二三十，六七十甚至上百元的各种门票，现在可是大好时机。

上个周末我就连着看了两场爵士乐演出。

虽说头痛一直未好，思考的事情总是有增无减。每次演出都给我一些新的主意，大脑里酿酒似慢慢有些变化。身体每天得休息，可大脑活动很活跃，我睡觉时，猴子们仍在我的脑脉里爬动，跳跃，

不停地捣鬼。我很担心，这样下去我的神经会紧张出问题来。

我的“长江传说”一诗不知修改了几十遍，仍是问题不少。

最近又大改了一遍，给几个同学看了，他们都说好。但我知道，他们说的好是因为这样的诗对他们太新鲜，而没能做进一步思考。他们有的人比我小，生活比我单纯多了，对里面的思想可能还体会不出来。去年夏天一写好，它就像个有病的婴儿，我不停地治疗它，修改它，希望有一天它能成为一首能传给后人读的诗歌。可现在看来，罗马非一日建成，还有得熬。

今天我在重庆的朋友小李毕业从加州来纽约找工作，要在我这儿住两三天。

我很怕苏菲做事不理性吓着她，也让我没面子。打算给苏菲些钱让她这两天住嘴。

我们中午和晚上两顿饭都在对面吃一元钱一个的热狗，回到家关着门。

晚上从洗衣店一进门，苏菲劈头盖脸地问我，你房间的灯为什么不关？我还没来得及说对不起，她咚咚咚进了她的门，啪地一下把门摔上。我站在原地愣了一下，血直往上冒，为什么我手里没有一只枪呢？

回到屋里，我瘫在床上。

小李说，别生气，先休息一下吧。

我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给她看，正听到“戴安娜王妃在巴黎出车祸”，一惊，换个台，也是这个新闻。

好像整个世界一下子都乱了。

啊，严重受了伤？政治谋害？

十多分钟后，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字：戴安娜王妃（1961-1997）。

死了？怎么这么个人说死就死了？

前几天还在纽约拍卖她的衣服；前几天才说有了新爱情；前几天刚陪小儿子去游玩；前几天……

这个世界说变就变？和更年期女人的脾气一样？

偏偏屋漏还遭雨淋，马克又来骚扰，说他决定辞职，去当电焊工。

你要上天也别来烦我。挂了电话。

我终于倒下了。我知道我得倒下。

9月3日带小李去学校，帮她查找工作信息和住房信息。

系里正有个欢迎新生酒会，我们也没有吃早饭，趁机拿了杯红酒和一些点心。

我是不能喝酒的，尤其甜酒，所以我只象征性地湿了湿嘴皮子。

遇上给我写过推荐信的文学传记课教授，他问我绿卡有消息没有？我说正请律师看，如没问题月底可以递上去。



我告诉他我准备继续旁听他的课，希望把我刚开始的这个写作计划推动下去。他说，欢迎你来上我的课，师生之间可以互相学习.....

然后我就感到有问题了。头开始晕，眼睛张不开似的。小李在旁边电脑室里，我就说了声教授对不起，就往电脑室里挪动。

“小李，我不行了。”我话一出口，想往一张椅子上坐，人就没知觉了。

据后来小李的描述是，我话没说完，就从凳子上滑下地。当时她和另外一个学生在电脑室，吓坏了，那个学生马上拿起电话打911，然后跑到楼下校卫生中心叫医生。

我第一次醒来时，看见有穿白衣服的人在抽我手指的血。

我嘴上戴着氧气罩。

然后我又一次昏过去了。

第二次醒来时我听见好几个人在说话，问我的名字，我的社会安全号码，我的地址.....

小李哭声哭气在叫我的名字，让我千万不要闭上眼睛。

医生问：“宝贝，你感觉怎样？”

“我我我，很好。呼吸困难。”

“宝贝，我们现在带你到圣·文森特医院，你不要怕。我们先把你放到椅子上去，你坐好，我们抬着你下楼，好不好？”

我记得他们把我固定在椅子上，推出电脑室，路过开酒会的走廊。没有人问什么，感觉他们可能全在看着椅子被抬走。

躺在急救室里，黑的白的医生走进走出，给我输液，做各种检查。

我的心很淡，让我在这儿呆着吧，反正我也没有家，与其回去看那张寡妇脸还不如让我呆在这儿。

我终于明白了，我身体平白无故这么差就是因为苏菲在我屋里放了几盆植物，吸我的氧份吸我的精华。我这么个体弱的人，敌不过她和她的植物。

如果我昏迷过去不再醒来，那有多好。无牵无挂就走了，让人们怀念个死，后悔没有对我好点。

凌晨两点钟，一个护士进来说你可以回家了。

“就这么离开这儿？”我舍不得似的问。

马克知道我生病后打电话来问好，拿起电话就说，赶快和我生个孩子吧，要不然，你死了，可什么都没了。

“对，像你那样生一大堆，又不负责任，做孽呀。”我没好气地诅咒他。

“你根本不知道，我会是一个最好的父亲。”

“当然，你肯定不会把他们煮来吃了。”

“如果是个女孩，我就让她学会做妓女。”

“很好。那是你的本行。”

我们三句话有两句斗嘴，说着说着，他就要马上来看我，我坚决不让他来，眼不见心不烦，来了也没好事。他只要性。

早上他在楼下打电话，让我头伸出窗外去看。

喝，真神气。皮夹克皮裤，头戴钢盔，坐在摩托车上。拿着手机对着我的窗子摇头晃脑，得意得很。

那些汽车呀摩托车呀自行车呀都是他的玩具，他心血来潮时，会几天几夜摆弄这些我看了就头痛的铁家伙。

说好他带我去皇后区法拉盛一个地方开《明报》的一个文学座谈会，主讲人之一是诗人郑愁予。

一上路，马克就开始报怨，说我既不跟他上床，又不和他出去玩，他还得给我开车，送我去开会。多不公平。

## 致信江主席

今天去帮查理干点事。

我问查理，听人说，他们这次参加香港回归观礼后，去北京没有见着江主席，有些人有意见。

查理挺识大体说，江主席好多事走不开，托他儿子来宾馆看望了我们。

“咱们还是先干活吧，这里有封给江主席的信，请你修改修改。”他边说边递给我一张纸，我一看，妈呀，还是之乎者也的用

法，不懂不懂。

原文执笔者古文修养比我好多了，可用的称呼词汇都是老式的，我都读不利索。为了方便阅读，在尽量保持原样的基础上，查理让我把信的用语改成中国人习惯的用法。

尊敬的江主席：

您好！

我们于今年6月底7月初参加了香港回归祖国的庆祝活动，并到北京进行了友好访问，拜访了多位领导人。这些活动坚强了我们对中国在世界历史上所占地位的认同，启发了我们，日益增强了我们的信心。虽然这次旅行我们没能像1994年在北京时与您见面。但我们发现西方媒体没想到中国能顺利的达成香港回归并向全世界显示出自己的尊严，他们因此非常惊异。

近来，我们欣闻您今年下半年访美。我们预祝您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国事访问成功，以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及互相理解。同时亦祝愿您与克林顿总统及其他美国领导人的会见顺利成功。

我们相信首脑会晤的成功有赖于有利环境的形成。而华裔团体一定会对此事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中有的人可对美国政策制定者起沟通交流的作用。事实证明，许多美国的政府首脑、新闻界要人和商界巨头都十分重视华裔团体的贡献并支持我们的各种想法。

我们提议在纽约为您举办一个大型晚宴招待会，邀请全美各界包括美国政要和美籍华人参加，聆听您对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关系的讲话。举办招待会的人都是在美国主流社会有相当地位的各界精英，同时联合其他全国性的华裔组织共同邀请来自新闻界、中央和地方政府、学术界和商界重要人物参加此会。其中有主要电视、广播的主播或评论员，上下院议员、州长、各大公司主管，还有一些中国问题学者及他华裔组织的领导人士。

我们相信这次招待会如能举办，将在美国培植和巩固一批有影响力的“中国之友”。我们希望这次晚宴招待会能成为您访美期间联系有影响力的美籍华人的有效机会……

我边修改信，查理边和我聊天，说他们在北京见到过什么人，提过什么建议。由于查理他们团体中的一些会员来自台湾，所以他们到台湾见了李登辉和连战，提出了两岸双赢的统一建议。

查理他们今天下午在哈佛俱乐部二楼举行欢迎董建华的招待会。

我和另一位小姐琼负责接待来宾。

琼是华裔后代，不会讲中文。她多次告诉我前年她去内地时办签证办了几个月都办不下来，还不敢去催问，否则要多交钱，对领事馆的服务很有意见。

前两天为筹办招待会，查理他们，特邀请了总领事及夫人参加。

可领事夫人没有收到请帖，领事馆工作人员打电话来问，琼在电话里告诉对方，夫人不用请帖，来就是。对方可能是秘书之类的，说这样不礼貌吧。琼说，没关系，现在我们马上就要下班了，也没法送请帖给你们，我说她能进去就能进去。

我问琼为什么不愿意传真一份请帖给领事夫人？

我觉得没必要嘛，也不是什么大型的活动，他们就喜欢来事。

我想她可能不懂得外交官的做事方法，也不懂中国的一些规矩。便故意说，要是总领事夫人为这事不高兴，你别想再去中国了。

她吓坏了，有这么严重？

谁知道呢？

她马上要将功补过，我说明天早上吧，他们也下班了。

当客人们陆续到时，她躲到一边去，说不想让领事馆的人认出她。

不一会儿，真有一个领事馆的人来问我是否是她？我忙说，不是我，不是我。

本来说好不邀请新闻单位，可《世界日报》的人还是来了，弄得很被动。

董特首和夫人一行人来了，他讲了些客气话，请大家提问。

郑先生坐在我旁边，我悄悄请他提问，香港将在北京和台北之间扮演什么角色？

郑先生一问完，大家都笑了。董也笑了，并没有就这个问题谈下去。

招待会结束时，很多人围上去想和董特首合影。马上就有两个人站到他的前面，保卫似的。

我在门边，看见一个老人站在一边，安静慈祥地看着大家。这不是贝聿铭先生吗？

我走过去，贝先生，您好。我读过您的文章还看过你的专题片，很喜欢。

我请一个刚与董特首合了影，正高兴着的人给我和贝先生照了张照片。

董特首很快被送走了，只有几个人与他合了影。

前天中共十五大在北京召开，A B C 美国广播公司的记者站在天安门前报道说，实行公有制国营大中型企业股份制改革，标志着中国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全世界都关注着中国的每一步发展。中国，赶快往前走吧。

## 打 击

给家里打了几次电话，总没人接。

今天早上又打回去，么姨接的，开口活生生一句：公公死了。我们一直在那边办丧事，今天埋的，刚从山上回来。

.....

我的公公.....我的公.....公.....

我...过...过...过一会儿再再打给你.....

么姨在电话里急得大喊，邵薇，你不要太难过，我们就是怕你太难过，上周你打电话时才没告诉你.....你别难过，外公是睡觉时自然死亡的，他死得安稳，没有受任何痛苦，是有福的人。他90多了，算高寿的.....

甩了电话，我就开哭。

我的公公喔，我的公公喔，呜呜呜.....昂昂昂.....

我滑下床，肠子都哭痛了。

求求你们了，有什么办法让我见见我外公一面吗？

我只好去翻照片，却翻出了外公的遗嘱。5月份回国，他让我帮他改错别字，我认真地读它、修改，哪里想到这么快.....

“我生在农村，亲戚介绍来城市当铺巷兴盛永棉花行，当学徒三年，棉花逐日减少改制棉纱，业务减少，另外改行帮巨利生印刷纸铺当店员。帮三十余年又发生抗日占（战）争，自做明康印刷纸店。节约积存找亲友借贷买得兴隆街208号即电报路17号门面二楼一底，后面有二楼一底。接着抗日战争胜利，日后发生共产党解放占（战）争在1949年胜利了，与资本家算薄血（剥削）账，1956年资本家拿（纳）入国家公私合营，生产机器商店货物钱财一齐交国营印刷厂。又1958年自座房屋改造门面一间后面全



幢二楼一底全改造。又在1988年二楼一底全部发还按国家政策办理。我有一子二女邵明忠、邵明秀、邵明英，孙子孙女四人邵天青、邵天云、邵天霞、邵天红，外孙子女三人邵薇、陈兵计、陈海轲，重孙子四人邵开金、邵开银、邵开元、李韵……望邵氏宗族团结永远幸福，祭祀祖先后代培养教育在公正青年人思考……”

我看着外公的照片，我的老外公，老实憨憨的性格倔强的老外公，你笑咪咪的和我站在一起，他们干吗说你死了？不吉利的话不能乱讲哟，我外公还等着享我的福呢！

哭晕了好几次，回过神来又哭。酸甜苦辣想到什么哭什么。

快黄昏时，换上一身黑衣黑裙，我出去买了些东西回来。

从箱子里找出白丝巾，铺在电视机上，放上外公的照片，还有黄白菊花、柑桔、松枝、苹果、一包点心等，给我外公布置个小小的祭台。

对着祭台，我哀哀地跪倒。

阳光一大片泄在地上，陪着我磕头。

一拜 二拜 三拜

一拜 二拜 三拜

前几天东村的一个诗歌团体举行马拉松诗歌朗诵会，100多人参加，从一天晚上7点开始读到第二天早上7点，



惊闻外公去世，所搭的小灵堂，写祭文，供的花果

朗诵《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家之一杰克的《在路上》。

朗诵在10街的一个教堂，我听了几个小时，没能熬到半夜。

今天去东九十二街听美国诗人W.S.默温的诗歌朗诵。

默温在台上自如地读他的沧桑，我在台下完全不能集中精力，好像自己被埋在什么地方，看见所有的沧桑都是我的沧桑。

现在已经到了晚上不吃药无法睡觉的地步，卫生中心的那个印度医生对我多次找他他却找不出问题来有些不耐烦了，给我开的西药，一次比一次劲大，吃得我整天昏昏然不说，有时还做呕。

最后他开证明让我隔几天去纽约大学的医院做脑扫描。

连医生都不知道我为什么长期头痛，莫非是癌症不成？

人人都说是压力太大，很多学生包括纽约人都有这个毛病。神经紧张，睡眠不足，总会导致一些问题，生理或心理的。而我，心理生理都有问题。

我去中国城买了治神经衰弱的中成药，中西药双管齐下。

每天睡觉前数出十粒，放在手心，看了又看，才放进嘴里，然后到自来水管前喝几口冷水。药啊药，你说话呀，治不治我的病？

天麻、人参、珍珠、当归、党参、五味子、丹参、桔梗、知母、天冬、云苓、女贞子，药们一个个好像挺灵性的，名字也好听。每一节的最后两个字押了韵，意思也好：珠子和母子。对于心神漂浮的我，任何一点意思都可以激起无数联想。记日记，英文日记的开

头字母D，在我看来，是死亡；走到四街，四，也是死亡。我觉得自己被死亡所包围，我被死亡所包围。

天啊，这个日子是过不下去了。

所有不幸的事件都发生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更是钢筋铁骨也抵挡不了了。

说来鬼不相信，我刚从警察局出来！



纽约效外长岛的夏日风光

本来好不容易从外公的死亡中恢复过来，昨天外交官邀请我去纽约总领馆参加了国庆酒会，高高兴兴地见了查理和一些

人。

外交官说他们放假出去散散心吧，便

约了今天去长岛一个大超市采购。

考虑到我下午4点要做脑扫描，我们只好一早出发了，我特意穿上我的大外套，我的药们让我弱不禁风。

超市大得像个球场，我选了几样衣服去试衣间。又出来，又去试。反反复复，也蛮累人。

中间一次，外交官在外面拦住了我，说他有点事想去别的一个地方，我可否跟他一个同事的车回去，就现在。他们已经在排队了。

马上？好啊。我没时间筛选了，拎着购物袋随外交官去找他的同事。

付了款，我们正准备出门时，一个黑人妇女走到我面前说，请你跟我来一下。

我？

对，你。

干吗？我马上要上车了。

请你跟我来。她不容辩解地说。

黑女人带我进了一间很简陋的棚子，关了门。里面一男一女正在争执什么。

“有什么事请你快点，我朋友还等着我呢。”

“脱下你的外套。”

“脱就脱。”

“啊！”“啊！”

原来我外套里面有一件衬衣。

我记得试过它，付款时我还在琢磨怎么衬衣没了。原来我还穿着，可能匆匆忙忙没脱下来，就套上了外套。

喔，非常对不起。我真是抱歉。怎么办，这件衣服原价30元，打50%的折扣，15元。我愿意买下，以原价也行。

那女人不听我说一个字，开始填一张表。问我有没有证件，我打开包把钱包递给她，里面有我的学生证等。

“你是学生？”

“是，我是外国留学生。”

那边一男一女几乎要打起来，他们在争夺那女的身份证和驾驶证。

“你这样做是违法的，我告诉你。还保卫呢，你抢我的证件……她们都看见了。”那女的脸都气红了。

“你不承认你是偷窃行为，我们只好送你去警察局。”男保卫一脸胜利者的姿态。

“我才不怕呢。我还要告你。”

我听得正专心，黑人妇女说，嘿，别看别人，你自己还有事呢。

“什么事，我朋友在找我吗？”

“什么朋友，不用等了，你今天可能回不了家。”

“你说什么？回不了家？凭什么？”

“你在本店偷窃衣服，我们正在捉拿小偷。你购物袋里的衣服付钱没有？”

“当然付了，一共两百多呢，还不知道合不合适，都没时间仔细选。嗨，说清楚，我可不偷，是试穿时忘了脱下。不就十几块钱吗，我在你们店花了几百块钱，难道还在乎这十几块吗，我买下不就成了？”

黑女人一句“没那么简单”就不管我了，让我等着，说一会儿警察就来带我走。

我这才意识到问题真不那么简单了。

“我告诉你，我可一辈子也没和警察打过交道，我不喜欢警察。别让他们来了，你要罚我的款就罚吧，反正我包里还有几十块钱。”

我忽然想到，下午有个脑扫描的约会，赶快拿出单子给她看。而且我长期头痛，可能是试衣服没有用心。因为我这一段时间不能集中精力看书学习。

她什么也不看不听，只让我待会去警察局再说。

“我4点钟得在医院，我这个头痛很久了，非得做检查不可，你得让我走。”我也不罢休地念叨。

“你生病了就不应该到这种地方来。”说罢，她索性出去了。

噢，上帝，怎么这么倒霉？

那边两个人也不吵了。

那女的对着我说，我买了300多块钱的东西，这个丝巾值十块钱。你说，我会偷吗？我把它搭在手腕上，边排队边想，无法决定要不要买它。结果付款时忘了，还没过门，他就把我带到这里。

“别提了，我也一样。鬼使神差，我今天都不该到这里来。我从未来过这个鬼地方，方向都搞不清，还和朋友一块儿，又生了病，我会偷吗？我的朋友也不知怎么样了，他说他有事，让他走算了。”

那个男保卫说，会让他走的。

“也真是，要不是朋友让我马上搭他同事的车走，至少我还会

回试衣间一两趟，总会发现里面的衬衣。而且也不会一下子买这么多东西。真是疯了，疯了。”我气得只想骂娘。

黑女人回来了，坐在那里，跟男保卫聊天。

“嗨，我真不是偷，我还带着药呢，晕头晕脑，什么证件都有，有这样偷东西的吗？”我希望打动她。

她理也不理，继续聊她的孩子如何如何。

落入这样的人手里，跟落入虎口有什么两样。我也累了，死心吧，等警察来，至少警察得听我说一句吧。

不一会儿，进来两个警察，黑女人对他们努努嘴，就她俩。

我听见她轻声说：“这个是外国学生，坐的有外交牌照的车来的。”

“交给我们好了。”

一个年老点的警察走到我面前，我站起来，想说点什么，他摆摆手，上了法庭再说吧。

“什么，还要上法庭？我以为你们来了就完了。我可是不受你们法律管的人。我是外国学生，我不是偷。明白吗？你们为什么不听我说。”我歇斯底里，就差说骂娘的话了。

老警察沉着冷静，走走走，上车吧。东西放在这儿，另外找时间回来取。

我出门时，听见那个女的又在里面吵闹，不一会儿，年轻警察

带着她出来了，她手上带着手铐，脸色苍白。她有没有被警察打呢？我开始害怕了。

他们上了车，那女的还在叫冤，指责那个男保卫粗暴侵犯了她的人权，她要控告他。

年轻警察说，我们只是执行任务，他们报了案，我们就来，别的也管不了。这个店马上要关了，搬到别的区，偷盗损失太厉害。

我心里想，活该，最好倒闭。看来这些保卫是饭桶，说不定还里应外合呢。

到了警察局，我把我的那一些药啊，单子啊统统摆到桌上。我又感到头昏，我请年老警察给医生打个电话，取消下午的检查，另外约个时间。

年轻的警察和那个女的坐在我们旁边，他们两个倒聊得很投机似的。

他安慰那个女的，你家人待会儿来了，付15块钱就可以保你出去。

“那我呢？”

“你嘛，说不定得在这儿过夜了。”

“为什么？我不愿意在警察局过夜。我害怕。”

他很下流地笑。

这下绝望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得拯救自己，不能让他们



来摆布我。

我不再理会那个年轻警察，我更信任年老的人。

我对老警察说：“我要喝点水。”

他取水回来，坐我对面，拿出一个本子：“说说怎么回事吧。”

“我真是生病，前一阵子还进了急救室。一直头痛，好像思维不正常似的。我外公刚去世，我整个人都垮了。本来是出来散散心，也没来过你们这个区。我乱七八糟买了一大堆东西，选都没时间选。哪还有心情来偷东西？”

“你有家人吗？”

“有，不在美国。”

“有亲戚吗？”

“没有。”

“有朋友吗？”

“有。”

他让我找人来保我出去。

我一个个打电话找朋友，而且还要有车的。可一个鬼都没找着，都是留言机。

我急得直冒冷汗。怎么办？我可不想在这儿过夜，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那个女的见我快崩溃了，忙说：“不用怕，我爸爸待会儿就来，

我问问他，愿不愿意也保你，应该没问题。”

她对老警察说：“我不想把她一个人留在这儿，我爸爸可以保他吧？”

老警察可能看我也够可怜了，就说：“我去问问可不可以让她自保。”

好心的老警察让我签了字，交 15 块钱，说可以回家了，11 月上法庭理论是否算偷窃。

我让他们送我去商场取我的衣服，他说，这个我们不管。

最后那个女的和她父亲答应送我去商场。我们坐在车里，他父亲看起来挺气派的，说：“你不用怕，有个法律服务处，免费的，你打这个电话问问。而且，你还可以通过你们的领事馆和他们交接。你是外国学生，他们拿你没办法。”

到了商场，我还不能自己进去，否则他们可以再抓我，只能由保卫人员进去。

有个地方执勤保安答应帮我，但要我等他，因为他的任务是每晚 6 点钟在这一片为所有的商家守门，保证他们不被抢劫。现在就剩最后一家匹萨店，老板在打扫卫生了，完了就帮我。

我坐在他的车里等着，累得连捉一只蚂蚁的劲都没有了。

他取了我的衣服回来，问了我的情况后，说：“别担心，你可以通过学校和商场总店联系，在他们递交给法院之前撤销。你这个

不算什么。刚才我去取你的包，那个男保卫特惊讶，说警察怎么就这样让你走了？这个店被偷穷了，马上要关闭了。”

我没有劲为自己辩护什么。

好不容易到了就近的火车站，他说：“这一班车刚离开，等下一辆吧。”

我伸手去拿我的东西，他按住我的手说：“以后可得做个好女孩。”

我看他，他的两眼充满暗示和期待。我心一横，先推开车门，把我的大包小包扔出去，笑着说，谢谢你了。我这一辈子亏就亏在做好女孩。

坐在空空的候车室里，我只想哭，只想叫，只想把我尖尖的牙齿伸进谁的肉里拼命咬它一口，撕下几两肉来。

这些猪啊狗啊牛啊羊啊马啊老鼠大粪呀乌龟王八呀，你们这些美国杂种，我操你祖宗，都不够。

进来一个老头，不声不响地坐到我对面。他看起来像个亚裔，放下他手里的矿泉水，又从黑色垃圾袋里摸出两片夹着什么的面包吃着。

吃了几口，才注意到我，咧着嘴笑了一笑，露出嘴里黑乎乎嚼得半烂的食物，搅和着口水，像一团蠕动的蛆。

他面相很凶，穿得又脏又破，却戴着几枚领章。

他用不知用哪里的方言和我说话，我听着是中文，但不懂，只好点头。

他走过来要我给他纸和笔。没有纸，他从地上捡了一张别人用过的餐巾，垫在腿上，写了江苏南京四个字。

看我惊诧的表情，他指着自已，点点头。

又进来了几个年轻人，老头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继续吃面包。我手里拿着他写的四个字，不知该怎么办。

老头吃完开始自言自语，这个该死的国家，我他妈可是差点丢了命的，知道吗，我去过越南打仗，看看我的领章，现在谁管你？我操美国。我操警察。我操这个鸡巴地球。你们.....

他看了一下屋里的几个人，我才发现有一个小伙子穿着制服。

.....什么狗屁警察，没做一件好事，就知道暴力，残忍。你他妈敢去打仗吗.....

火车来后，老人拎着他的垃圾袋，朝车头走去。我在进火车的最后一刻收回了我的脚步。人都走了，我忽然想一个人呆在这安静的小车站。下一班车在一个小时之后。站在微明的站台上，空空的火车轨道，牵动了我的万般思绪。我似乎看到了回家的路，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心里的百般委屈诉诸于歌声，让我在长岛的这个小车站放开嗓子哭喊了起来.....

娘的眼泪似水长，点点洒在儿的心上。满腹的话儿，不知从何

讲，含着眼泪叫亲娘，娘啊，啊，啊……从此后，一条破絮一张网，风里来，雨里往，日夜辛劳在洪湖上。洪湖霸，活阎王，抢走了渔船撕破了网，爹爹棍下把命丧，我娘带儿去逃荒……（洪湖赤卫队）

我现在的心态是天塌下来，我也无所谓。除了世界末日，什么事也吓不倒我。

晚上睡不着觉时，我再不像以前那样加倍吃药折磨自己了。我有了绝招，给朋友打电话。哪怕凌晨3点，挨个找朋友聊天。管它哪个角落，中国、台湾、美国，东西南北，逮住谁就是谁。

最后，连马克我都找。他一听发生的事就跳起来了。

“……我早对你说过？你从不相信我。这些警察坏得很，这个国家很糟糕，你总是以为自己了不得，不听我的。这里是美国美国。不是中国。你过去那一套行不通。让你学做美国人你还不愿意，结果呢，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以为是外国学生就受保护？放屁。

……马上去找律师，花个两千来块，没有吗，没有的话我借你，只要你跟我上床。”

我问一个中国律师，他说，这种事这里普遍的很，根本不用律师，你自己去陈诉就可以，最多罚100来元的款了结。或者找一两个了解你的人作保人。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做的。

“可我受的冤屈呢，我不是偷啊。”律师说，算了吧。

不行，我得斗争，得学着用美国的法律来保护自己。我多么努

力做一个具有优良传统和美德的中国人，关心他人和公益活动，义务参加社区服务，报答我得到的教育机会。学校的老师把我当个榜样树起来，什么事都想着我。上次我昏倒后，新来的专业主任给我拨了一千块钱作生活补贴。

我得斗争，不能用100块钱这么了事。法律讲证据，可讲不讲案发的动机和当时的特殊情境？让我去给陪审团的人讲理，告诉他们这一切，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会去偷窃。

马克坚决不赞成我的想法，说这是美国，处处都讲法律，你真是愚昧到极点，天真到极点。你以为陪审团的人多好，不过饭桶一堆。你自己去，说不定还吃亏。我知道你，你就想省钱。

不，我想斗争。

和谁？

我也不知道。

按照那天在警察局的规定，我得20日去法庭。

我本已打定主意自己去法庭辩护，奇怪的是我收到一个律师办公室的信，算是广告之类的，还说有这封信优惠100元，只要300元。

天底下还有这等事？

这个律师又从哪儿得到我的地址姓名呢？

我打电话去问，律师说，你的案子小事一桩，我有百分之百的

把握打赢。你什么也不用管了，一切由我。20号我代表你去法庭好了，再定日子，你再去。你只需去一次，一次就可以了结。

这么简单？

当然，我常处理这类案子。没事的。

行吧，既然他这么说，加上他不告诉我他从哪里得到我的资料，我便相信他一定在警察局或法庭有线索。300块钱买个轻松。这学期我很忙，得做论文。

说来鬼都不信的事都发生在我头上了，这才叫祸不单行，不止是单行，都三行四行。

收到上个月的电话单，有400多，是平时的十几倍。

打中国本来是七毛左右一分钟，我账单上却变成了两元一分钟。长途电话公司也不是我选用的LCI，而是AT&T。

差别是，我之所以选LCI是它的优惠计划，如果没有优惠计划就是一块多或上两块一分钟。

我又差点晕了，哪个这么倒楣哟？

## 第十章 最好的毕业论文

### 网络讨论江主席

最近美国国内对江泽民主席的即将访美反应激烈，众说纷纭。《纽约时报》特在网络上展开了一个专题讨论。

我本来也没想到要写什么，只是有兴趣读读美国人的看法。

可看来看去，有的人写的东西实在让我恼火，便也写了一段话在上面反驳那些过分的言论。

我尽量使自己听起来礼貌和客观一些，以便更多的读者对这种反批评不反感。

“我是中国人，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江泽民主席不远千里到美国来，是想和美国人民交朋友。

美国人民是善良的，也是热情好客的，和中国人民一样。如果我们亏待了远方的客人，这是主人的失礼和耻辱。

众所周知，中国和美国因为各自历史和现实等的巨大差异，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对自己国家，对世界，对彼此。不能因为不同，我们就停止往来，互相谴责。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与美国不同。我决不相信美国愿意把所有与自己不同的国家当成敌人。对于差别和分歧，惟一的方式是交流和沟通，以达到理解和彼此认同，共同提高。否则，对自己的国家利益不利，也对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不利。

美国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目前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中国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目前还处于发展中。我们愿意学习美国先进的东西，但也需要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更多一份理解和支持。

谢谢。”

下午欢迎江主席一行到纽约访问的队伍到了肯尼迪机场。



本来没有我，我主动问组织者可否去看看。虽然新闻会报道，但和我自己身临其境去感受一番还是不一样。

来时坐在车上，我一问才知道，好些人是领事馆直接通知或学校派出的，恐怕只我是一个是自己派自己。

我开玩笑对那些代表说，回来时，你们别太激动，不小心坐进江主席的车里去了。

我们站在机场的一个角落等候班机。很多记者也守在那里了。有一个美联社的记者走到我们这一群人中来，挨个问，问到我时，你怎么看江主席的访问？

好啊！多多沟通有利于互相理解，对双方都有好处。

那你怎么看待他这个人。

不错啊！你看他是学工程的人，可喜欢文学、音乐，会弹钢琴，会朗诵诗歌。我欣赏他这样的男人。

美联社小子话锋一转，你如何看待人权？

不少人盯着我。我对着话筒说，人权吗，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标准和理解。不能把美国的人权硬搬到中国去，对不对？当然，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有对有错。如果做错了什么，改正了就是好人。对不对？

我特别朝靠近我的几个人点点头。

好不容易盼到江主席的班机到，停在那一头，中间是无数的车

挡着。有人说，太晚了，恐怕江主席他们不会到我们这儿来了。

听的人一下子都泄气了，拥挤的队伍随之松动了。

忽然，有人高呼，江主席过来了。

我一直站在原位没动，这下我可看得清楚，真是江主席。他在人群中间笑容满面地朝我们走来，他边走边挥手，我们也喊，欢迎欢迎。

走到那一头，他们又掉过头走回来，很快，可能总共不到三分钟。

能在这里见到家乡来的亲人，像我这种容易冲动的人，早不管什么规矩了。我跳起来，冲到最前头，站在铁栏杆上，比周围的人都高出一截。使劲挥舞着手里的红旗，却忘了说点什么。我要是说，江主席一定能听见。因为整个队伍比较守纪律，没有人乱开口。



在纽约机场欢迎江主席访问纽约。在机场巧遇随团访问的中新社总编辑郭健，方留下这珍贵的镜头

没有说点什么是我最遗憾的。也许我可以说好多给他听。可惜了。

天底下真有巧事。

正在我们欢迎江主席的时候，随行记者中有人过来拍照。我一看，这不是中新社的郭总编吗？

我大叫，郭总编。

他也看到了我，走近一点，镜头对着我们这边闪了几下。我想我当时一定得意惨了！笑容一定灿烂到极点。

## “向日葵婊子”

今晚纽约市立大学有个纪念艾伦·金斯堡的？

我刚来时，查阅过去举行的一些文学活动资料，看到金斯堡多次介入，后来看金耐尔主持的惠特曼专题片，金斯堡也在里面，感觉到金斯堡和我们专业的关系比较好，加之他在中国的知名度，我很注意他的动向。

我的美国朋友葛里格知道我因没缘结识这位对中国诗歌和中国诗人很友好的美国诗人深表遗憾时，直说，我和艾伦就住一栋楼，你怎么不早说？

出于这类原因，我参加了金斯堡去世后为他举行的多次纪念活动。

有一次在中央公园也有一帮人自发组织了一场朗诵，有人抗议市政府不允许我们在汤普森公园，也是金斯堡多年居住和活动的地方为他树个雕像时，又有人就骂说，金斯堡不需要这些。

当时《纽约时报》有一个亚裔记者在采访，我看他长得像中国人，以为他是中文报纸的，他不屑地说，中文报纸对这些不感兴趣。

他采访了我周围的一些人。我也说了几句金斯堡和中国诗人的交往，也提到北岛。他马上问，北岛是不是那个曾获诺贝尔奖提名

的中国诗人，我说是的。

我说，金斯堡曾在早些年邀请一批中国诗人来美国访问，其中有舒婷和重庆的诗人李钢。舒婷来访时，是奥兹教授陪同的，她曾和我说起过对舒婷的印象，说她很坚强。而李钢写了一篇纽约访问记之类很幽默的文章，谈到爱伦带他们在纽约的奇遇等。而那个时候，甚至包括现在，中美两国在文学领域的交流还是很少，这样，就可以看出金斯堡的远见和特别贡献。他的名篇“嚎叫”既在美国的现代诗歌史上占一席之地，也被很多年轻的中国诗人推崇。

第二天《纽约时报》出来的报道却不怎么样。我发了个伊妹儿给那个记者，抱怨说，写一个像金斯堡这样的诗人不能仅仅就事论事，金斯堡在美国文学中一贯的反叛立场是个大前提等等。

他的回答是，你不喜欢我的报道我很遗憾。但时报有它的编辑立场和新闻取舍任务，这样的文章不是当天的重点，所以可能不尽人意。

那天的中央公园细雨蒙蒙，观众高低坐或躺在一个小山包上，不时有鸦片的烟味飘出来，也有人在散发为争取鸦片烟合法使用而将要举行的游行传单。

我觉得有一种特别的“跨掉的一代”气氛。

今晚的活动是另一种气氛，会场很大，请的是很有名望的诗人编辑和金斯堡的秘书或研究他的学者、教授之类。

他的秘书发言非常生动，讲金斯堡的为人，讲他和很多流浪汉是朋友，帮助过许多穷困潦倒的诗人。

他还提到和金斯堡出门非常危险。有一次他们坐出租车，司机是个穆斯林。金斯堡问他，知不知道被穆斯林教徒追杀的作家拉什迪？司机说不知道。金斯堡就讲给他听，听完后，司机说，如果这个叫拉什迪的人污辱了上帝，那他就应该死。

金斯堡一听涨红了脸，说，我要在你的上帝身上拉屎。

司机也红了脸，秘书吓得赶快拉金斯堡下车。

最后，他说，金斯堡死的那晚上还在准备给克林顿写信发表不满呢。

《巴黎评论》的诗歌编辑，也是当代美国最知名的诗人之一理查德·浩福德回忆了一件和金斯堡交往的旧事。说有一年，金斯堡和他分别被选上担任该年度美国图书奖的五名评委之一。金斯堡大概反对某种做法，就写信给《纽约时报》加以抨击，搞得整个评委会不好工作。浩福德就代表评委会给金斯堡写信做解释，弄得很不愉快。但两人从此开始了一些交往，对各自的立场多了些理解。

穿着非常正式气度轩昂的金耐尔也到场了。他说，他和金斯堡第一次认识是1957年或1958年在巴黎，那时的金斯堡也成名了，而他自己还没有出版过诗集，默默无闻。他和金斯堡的最后一次聚会是1996年11月，这时的金斯堡非常有名，他自己也

有了些名气。金耐尔谦逊地说，金斯堡是他知道的惟一个懂得 18 世纪一首很长的英文诗歌的人，所以他可以向金斯堡请教。

金耐尔还说到金斯堡曾为我们专业的一个基金项目工作，为医院的病残儿童教写作。有时他会问一些连新生都不会问的问题，并从不为自己提这么简单的问题感到害羞和丢脸。

然后，金耐尔用他极富男性性感魅力的嗓音读了金斯堡诗歌中的一些精彩选段。

最后主持人播放了金斯堡写的并唱的一些歌曲，没想到金斯堡有一副难得的嗓音，唱的歌忧郁感人非常抒情，没有他诗歌中特有的躁动和喧嚣。

听的过程中我写了一些句子在我的笔记本上，随手写下标题“向日葵婊子”，似乎与我心中现时的感受很投缘，我也要写一首诗，疯狂的，看这世界到底谁怕谁。

向日葵婊子

当暴风雨在空中煮开了锅

炒熟的种子长成了树

星星们开始了流浪

向日葵婊子你吃小牛仔的肉，吃未长熟的果子，站在地球的边上，

大叫，我是向日葵婊子，你能怎么样

奥兹教授有事，让我们自己上写作课。

一进教室，就看见黑板上有一行字：“为什么我们不去酒吧上课”。

大多数同学来之后，大家对黑板上的提议纷纷赞同，便定了一家酒吧，写在黑板上给后来的同学，出发了。

来到酒吧二楼，围坐在一起。

本来应该每个人挨着读自己的诗，然后评论，像在课堂上一样。可现在在酒吧，大家吃的吃，喝的喝，又不停说话聊天，使读了诗的同学也没有听到什么正儿八白的意见，先是爵微儿和人说笑，惹怒了吕贝卡。然后，爵微儿朗诵时，吕贝卡干脆站起来去了吧台。

每个人都没有意识到，我们应该自律上完这节课。由此我对美国同学们的自由精神非常不满，没有一个人说咱们应该如何。

我说了一次，咱们是否还是每个人读一首诗吧，可没有几个人响应。

我没有走，一个人坐酒吧的二楼，构思“向日葵婊子”一诗，又写了几段，还是不解恨：

你的眼睛是肉一样的白，心一样的黑

你被杀手们追逐着，水呀，火呀，情人呀还有厌恶

你的梦反复都是有关石头，枪杀和浪花的诞生

你用脚尖试水温，受惊如着火，哇，yo u bi t ch

生的方式是流浪的方式  
哈哈，你能说什么呢，向日葵婊子  
你的情人们吊在你的后庭院里  
你收集他们的眼珠装饰晚礼服  
鸟的舌头，小蚂蚁的手  
在火炉上翻来覆去地煮

自从出了一连串的事故后，我就害怕得要死，开始去学校看心理医生。我不想死，我也不想被动地让生活来摆布我。

今天又去见了我的医生安得丽。

我们每周见一个小时，我说她听，还做笔记。我也不管这个心理治疗有多少作用，我是尽可能地挽救自己。

每次坐下后，安得丽就让我告诉她我心里的苦恼。我一一说了，只是每次提到外公去世时，我就忍住了。

对不起，我不想说这件事。

安得丽是希腊后裔，长得很漂亮，而且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每次看见她，我都说，我之所以能这么坦白地诉说我内心的想法，是把你当成一个朋友。

我甚至告诉她有一天晚上我不想回家，我在外边徘徊了好久，觉得生活怎么如此艰难。

她问我，为什么不想回去？你怕什么？



我怕我的房东，我不想见她。

我一走神，脑子里开始往外冒：

向日葵婊子

兄弟哟，母亲哟，还有姐妹

你挨个诅咒胡乱称呼

y ou b itc h

你杀了太阳，在手掌上磨碎

走吧，你说道，把坏运气吹向别人

母亲死了，父亲死了，你这个婊子在死还有谁在死  
救命啊救命

向日葵婊子

你听这有多深多黑多伟大又激动人心

如果反复叫你的名字

你就看见马冲动地跑寡妇上吊

睡觉的羊呆在空山里

浓雾吃着它们身边的影子

你害怕吗，你

听见安得丽在问：“难道你见了她会发生什么？”

我不知道。我看见安得丽背后的长瓶里装着三朵开得黄灿灿的  
向日葵，此刻像三只手飞舞着，我抵挡不住，一步步往后退。

安得丽在继续说，你要明白，什么也不会发生的，你过分担心而已。

如果你长期把忧虑埋在心里，这么多事情发生了，你的心也装不下的。

坐在我对面的安得丽眼里闪着泪花，我伸出手想去接。

周二我带了“农场的鸡”一首诗去写作课。

奥兹教授对这首诗大加称赞。我自己是苦不堪言后已经麻木了。

同学香奈知道我在找房子，就问我，你刚搬到那里不久，为什么又要搬出来？

我说，我和房东太太合不来，有一次冲突起来，她差点想动手打我，我只好叫了警察。虽然她害怕了，但我也没心思住那里了。

上完课，我们步行回家。她推着自行车陪我，直说安慰的话，也不停地给我讲她在感情上的波折。

香奈的母亲是个艺术家，结过两次婚，又离了两次婚。香奈姐妹四人，两个父亲。她和另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住在纽约。两人住得很近，却各有一套单元房，不住一起。

香奈19岁时结过一次婚，20岁离了。然后就在几个男朋友中间来往，今年有37岁。

“那你应该再结婚。”我按照中国人的观念说她，忘了我自己

还是单身汉一个。

“啊啊，”香奈尖声笑起来：“是的，中国妈妈。好，我去结婚。”

香奈常去法国，也有法国女人的浪漫气质，衣着打扮总很特别。冬天穿件很长的格子呢大衣，一条长围巾，还有一个方型帽子，露出一张精致小巧的脸。

有次我们往家里走，每过两条街，她就要找公用电话查家里有什么留言电话没有。

这么晚还有约会？我看她每次挂下电话都很失望。

“还不是多尔。我们上次吵架后，好久没见了。昨晚他打电话来，说今晚我们见面。”

“喝，不错嘛，有人爱呀。”我酸溜溜的。

“什么爱不爱的。我在他生活中一点地位都没有。他从不带我去参加晚会，或见他的朋友。我们之间只有性。”

“那你干吗和他往来。人与人交往最需要感情交流。”我想到马克，对这种单纯的性的关系非常反感。

“我们好了七八年，谈分手也谈了七八年，结果还是上床。这是我们之间惟一快乐的事情，除此没有任何共同的东西。”

我听着香奈口气里深深的无奈感，唉，女人，总是需要爱情的。性是一种满足，爱和被爱也是一种满足啊。

分手时，香奈对我说：“你不用怕，如果你想马上搬出来，你

可以和我住，我有很大的套房。明天我就可以给你一把钥匙。”

她亲亲我的脸颊，推着车往三街走了。她住的地方和我原来的家只几步之遥。

我已在开始看房子了，论文也在进行中。所谓论文也就是一部诗稿，奥兹教授已看了两次，我们隔周谈一次，她提出意见后我再修改。

金耐尔特意打电话问我是否满意奥兹对我的指导。我说，现在还不好说，要看最后的结果。

晚上梦见我的肚子里养了一条蛇，它在我里面蠕动，把我的身体也撑得很大。

几度醒来，又倒下，又做梦。

那条蛇在我的鼻孔里呼吸，在我的眼睛里观看。是不是白蛇？

马克打来几次电话，一是问去法庭的事；二是要约我喝咖啡。

我已经跟他非常明确地说过几次，我不可能再和他好了，我需要个好男人来待我。

“我也可以对你好。”他诚恳地说。

不，你不知道什么才是对我好。而且，我目前和台湾朋友相处融洽。

他一听我提到另一个男人就吃醋，也不管该不该他吃。

什么朋友？他能帮你什么？他能载你出去散心？他能带你上

法庭？

我什么也没说，我的心在别处。

看呐，太阳月亮男人女人统统扔过来了  
快打开你的口袋接受他们吧  
你的门，比芝麻的门大一点点  
但你的心大，如地球一般大如时间一般大  
如你，向日葵婊子一般大  
现在就来看看你的嘴，你的几百颗牙都掉光了  
你朝着人群的笑让地球发抖  
让死亡飞走，让心野起来  
你这婊子，向日葵婊子最后的婊子  
没有比你更黑的了

前几天，金耐尔回来给我们办了个讲座，谈永恒的诗歌。他选了莎士比亚、叶芝、布莱克等人的诗。

他说，夏天时我女儿结婚，我找来找去找不出一首诗，后来选了一首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但改动了一句。

后来在讨论时，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金耐尔谈的那首莎士比亚的诗不是他写，而是今天某个人写的，我们还会认为那是一首好诗吗？”

这种问题虽没有结论，但我相信每一代人对诗歌的理解是不一

样的，审美要求也不一样。

写作课上我们班惟一的男同学阿富德写了一首诗，我一直没看懂。

讨论时，我提问，我凭直觉认为阿富德的诗很有特点，我也喜欢新的创造。我想问的是，谁能告诉他这首诗是哪一类的诗？或者我们如何给诗歌分类？

其实我是想通过这个问题引出同学们的不同见解。

每次上写作课，同学们都会提出很多的想法，有的不错有的也是乱扯。但有一个特点，美国同学大都是谈得很具体，往往关于一首诗的一个词，一个句子，或诗的开头或结尾，甚至诗的题目。他们对抽象的话题不感兴趣。而我快毕业了，我还有很多关于诗歌本质问题的看法，希望能和他们交流。

每当我把话题引过来，同学们包括奥兹教授都会很赞同地说，这个问题不错。可没有人进一步谈下去，让我很扫兴。

有一次也是类似的话题，香奈发言说，我可是读过很多东西的人，像在大海里游过一样，我不喜欢水池。

可她到底想说什么，没有人明白。

昨天下午留学中心有个教委招聘团来纽约，我趁上课前的两小时去看了看。

开始谈正事吧，居然有一串的人发言。什么团长，副团长，什

么代表，讲话，鼓掌，感谢支持等，花了不少时间。

挨着摊位看，有没有什么学校需要我这个写作专业的。

北京大学说，我们只要博士，博士后，不要硕士。

可我们专业就只有硕士，我不相信你们英文系不开专门的写作课。博士也不一定能写作。

到了另一个理工大学，该校校长倒满热心，边吃饭边和我说，我们正需要你这个专业，理工科学生写作能力差。你要愿去我们学校，倒是很适合。

我坐下来等他吃完饭，吃完饭又看他在我对面剔牙，剔完牙又看着他鼓鼓鼓用茶水在嘴里漱口。

我坐不住了，抱歉说我还得上课，拿了张他的名片就告辞。

有一次，我去参加重庆市长来纽约访问的招待会，由华美协会和领事馆组织的，总领事也去发了言。

我看着家乡来的父母官，本来很激动。和一位随行官员聊天，我说，我想回中国。他说，你刚出来，回去干啥子嘛。

出来的时候我直怪自己，来的人大多是和重庆有点商业往来的人，或者想去投资的。我这样的人与哪类都不沾边，何必凑这个热闹？

为了9月份的电话账单，我无数次地和电话公司交涉和据理力争，他们甚至威胁说要断我的线，我也说要去告他们。

今天总算了结了。

A T & T的一个有级别的管理人员说，他们会给我这几百块钱的优惠。

咋一听，我还不相信。我今天是通过本地电话公司的顾客起诉办公室直接和A T & T的管理人员交涉。我烦透了那些推销员，惹麻烦又没有权。所以，今天拿起电话我就宣布拒绝和推销员对话。

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不知是否心情很好，她拿起电话就说，你别再打了，我给你这几百块钱的优惠。希望以后不再有类似的麻烦出现。

看看，就她两句话，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可能还是我外公在天之灵保佑我。

一想到外公，我心情一下子就不对了。藏在心头的痛和苦一点点地化着，眼泪流下来，我的体重也好像轻了好多。

生命中离我最亲的人就这样远离了，甚至没有道别。

这一份伤痛何时了结？

自从看了心理医生，很多往事都回到我的梦里来了。我都告诉安得丽这些梦。

有一个梦是这样的。有一天，我去看望母亲。爬过荆棘丛生的山路，远远看见母亲了，可我忽然掉进一个深坑，浑身扎满了刺。母亲心疼极了。



偏偏邻居的鸡还来咬我，母亲便打了鸡。

（安得丽，这是真实的事情，我五六岁时，在街道任居委会委员的邻居养了一只恶鸡公，我每每要穿过巷子上厕所，它就跳起来啄我。）

鸡的主人跑出来骂。他们是几个人。其中两个架着母亲到屋后。好半天，母亲才出来，满面泪痕。我大叫，他们打你了？我被他们的鸡咬，他们还欺负人。

鸡的主人又出来了，拿着一个弓箭，箭还带着羽毛，要母亲跟他们走。

我站在母亲前面，说，你们要拼命找我好了。

多么盼望有个男人能出来拍着胸脯帮我们。

（安得丽，我的童年中，没有一个这样的男人，使我一直在惊恐中成长。）

我很理想，希望人人相爱。但一遇到人际冲突时，我也很容易一触即发进行反抗。有时候也有误伤。

但在对待苏菲的问题上，我没有丝毫的手软，我厌烦了她。我在搬出来之前，没有告诉她。走了以后，我把钥匙放在邮箱里。

有一天去银行却发现月初我付她的房租支票她没有兑现，我当即打电话给银行注销了这张支票。

真是上帝给我机会惩罚她，让她再吼再骂，抹脖子上吊吧。

过了一个醉生梦死的周末。

我因为搬家，和好多人失去了联系。半年前我曾经在华美协进社教过中文的杰里满世界找我的电话号码，最后是通过伊妹儿和我联系上了。

他刚从香港、台湾出差回来，不知怎么一定要见我，说要还我的人情。可能又是东方情结。

过去我教过他几次中文，他问我要收多少钱。我说不用了，有机会请老师玩一次。他每次学完中文后，就邀请我吃饭，有时邀请我去跳舞。我一次也没去，不是客气，是没有兴趣。我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他说这次无论如何不能让我再溜掉，好像我变成了他的救命稻草似的。而且，他的公司正在做亚洲生意，他的中文大大地不够用了。

我们在八街广场附近的星巴克咖啡店见面，他轻柔地问我这几个月发生了些什么？

我说，你不会愿意听的。我知道美国人，尤其是纽约人没几个人没有成堆的问题。

我当然愿意听。过去我们在一起老是没时间聊天，你也忙，老拒绝和我见面。

好吧，我告诉你，这半年，我搬了两次家；进了警察局；外祖

父去世了；进了急救室；在看心理医生。

他伸出手轻轻按摩我皱着的眉心。然后，又按在我的嘴唇上，在我肩头轻轻拍着。

没事的，这些会过去的。别担心。

好温柔的一个美国人。

晚上你想吃什么？

无所谓。

我们去吃牛排吧。中城有一家不错，吃完我们可以去跳舞。

随便吧，反正我要放纵自己一把。

我们去了时代广场旁边的夜总会。

跳舞时，杰里紧紧搂着我，然后他低下头亲我。我吊着他的脖子，也回吻他。

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属于我的，只有现在，这一刻。

出来快到凌晨3点。

还想干什么？我不知道。我们去大西洋赌城吧。

## 最棒的诗诵

下午和奥兹教授最后一次谈论文。

我先到她的办公室，她还没来。过了一阵子，她端着两纸杯咖啡进来，连说道歉。

一坐下，她就问我：“你知道舒婷多大吗？那年她来纽约访问

时，我接待过她，她很强大。”

“我想她可能是50年代的人，我上大学时，她是我们整整一代人的偶像。最近我读到一篇新闻报道，说舒婷休笔不写了。”

奥兹说：“我们今天最后一次谈你的论文，过去我没有给你讲我的看法，我今天要告诉你。你诗歌中这种野的声音，你所用的英文是被中文所丰富了。这样的一个精神在已有的英语作家中是无人这样写的。也许，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也没有中文作家这样写。”

她放一杯咖啡在我面前，继续说：“通常，移民大多会失去自己的母语，母文化，以接受移民国新的一切。但你带来了你的母语和母文化，包括其中的真实，音乐，它们成为你的一部分，现在仍然鲜活有力而且独特。你的过去变得很美好，与众不同，有了它自己的生命。”

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郑重其事地宣布：“这是生命的礼物，你要珍惜它。”

“奥兹教授，我一直读你的诗歌，我在它们中感受到了我自己。我要谢谢你，这份灵性的启迪让我受用无穷。很久以来我有一个问题没机会问，今天特请教一下，你如何把一首诗写得那么丰富，又如何许多首诗中写一件事物。比如你写父亲，一本诗集的父亲；上次在莫丽父母家度假，你写了母亲，我感觉你会写一本关于母亲的诗。”

奥兹低头把玩了一下围在胸前的丝巾结，是那种耀眼的紫色，然后把手放在左胸上，抬起头来回答我：“因为，我的心是满的。”

奥兹教授满头灰白的卷发披在肩上，左边垂下一根小小的辫子，辫子的末梢扎的是根细细的红线。此刻，她对我有些调皮的眨着眼，好像做游戏一般。我们有些同学不喜欢她，说她在课堂上太矫情，表情太夸张。但我却认为这是她的天性，她喜欢做些小动作，有时甚至很幼稚。有一个同学简直恨透她这种风格，说像她自己的母亲，而她和母亲这一辈子像仇敌一样。

我刚开始和奥兹做我的论文时，爵微儿提醒我，很多人和奥兹合不来。后来，我说感觉不错，她吃惊地说：“你很宽容。”“为什么不呢？而且她还是你的老师。你是向她学习的。”

由此，我对有的美国同学太个性化，自我意识太强有所抨击。

爵微儿也赞同我，以为我能接受，别人也应该能够。

我第一次给奥兹教授看我的诗稿，里面收了我的长诗《长江传说》，奥兹说她很喜欢，但诗本身不成熟。她在有些她感兴趣的段落旁边画上图画，有的是人头，有的是月亮，有的是一条蛇或一只手。

我看后很喜欢，开玩笑问她：“这些画有没有版权。将来出书我可要采用的。”

她腼腆而得意地说：“是你的了。”然后还做了个鬼脸。

现在论文指导完了，我才感到有些舍不得。这样一个女人，活得真实自然不乏天真性情。这才是她自己的一生。

我站起来拥抱了奥兹教授，说：“我希望我50岁的时候是你这个样子。”

“邵，充满信心写下去。你在课堂上总是那么谦和，有的人写诗不怎么样，可张牙舞爪我不喜欢。我很荣幸与你一起学习。”

“不，老师，是我荣幸有机会向你学习，由你指导我的论文。”她拿出笔，慷慨地在我论文封面签字，边上画了一个心形图案。真是一个天真的老师。

“邵，”她严肃地说，“我很兴奋地读到这部诗歌，它是我这20多年在这个专业指导过的最好的论文之一。不，事实上，是最好的。”

我张大自己的嘴，天哪，有这么好吗？

晚上是我的毕业朗诵，在纽尼肯诗人咖啡馆。我连朗诵什么诗到现在还没定呢。

奥兹刚才还提醒我，为什么不朗诵“小手指”、“土豆”、“农场的鸡”和“向日葵婊子”，那都是你的杰作，大家都知道。并说，不要紧张，吐字要慢要清楚。

对，就这几首，再加几首就可以了。

我上台前，主持人说：“这是邵薇的毕业朗诵，我问她需要介

绍些什么给听众，她说，邵薇，从中国来。就行了。”

“好，现在就请从中国来的邵薇上台吧。”

站上朗诵台后，我就开始一首接一首地朗诵，非常镇静，好像我注定有能力这样面对观众，有这个信心。其实，上台前，我浑身都在发抖。

“在我朗诵最后一首诗前，我想用这个机会感谢所有在这里的听众，站着的和坐着的。感谢纽约大学写作专业给我机会来纽约学习写作，度过了两年时光，今天在奥兹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我最深的感激是给金耐尔的，是他教会我用英文歌唱。”

这首诗是我6年前在中国写的，整整6年前，1991年12月3日。我把它送给所有的朋友，并用中英文朗诵。

### 《朋友》

静夜里想起某个人  
很像你  
二十岁遇上  
便慢慢回想不能忘怀的你  
想起来时光多么短暂  
如今你远走他乡难以想见  
多少个晚上我是温暖的  
却想起某个寒夜与你同行

多么潇洒傲慢的你  
从未去过你的家乡  
但我选择相别的地方  
有山有水  
弯弯的山道上  
白雪皑皑  
坐上马车我走了  
那个地方酷似你的家乡

朗诵完后，香奈和几个朋友一拥而上，非要拉我去喝一杯不可。我的害羞的朋友杰瑞也在，他一句话也不说，只给了我一个拥抱，然后在买了饮料后，他付了账。这可与美国朋友聚会不同，都是各付各的。所以，香奈马上在旁边挤眉弄眼的。

喝下一大口啤酒后，她说：“邵薇，我没想到你在台上那么漂亮。不，简直是美极了，你的黄色白花的长裙子，你的前额，头发梳到后面，露出整个脸和脖子。我都呆了。朗诵得也很出色，你看你下台后好多人去拥抱你。太出乎我们的预料了。”

香奈的评价我心领了，我知道我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好，因为我很用心。他们不知道我有多少的痛苦在心里，我的心像奥兹说的一样，是满的。



## 第十一章 艺术永恒

### 最后的写作课

开始下雪了。有人在三街的匹萨店旁边扔了一个白瓷马桶，里面装满了雪。

今天上了我两年学校生活的最后一次写作课，我交了一首母亲的诗。我与我母亲的感情，像很多母女一样，既复杂也简单。复杂的是因为家庭生活和人性的复杂性导致的，简单的是天底下的母亲都是一样爱子女，不论这方式如何。而我们家，又有其特别的原因。我从小跟随我妈姓，在外公家长大……

#### 《无辜的母亲》

我的母亲从街上进入这栋土砖房  
在邻居的眼皮下  
她 25 岁，带着一个婴儿回到娘家  
因为她的丈夫进了监牢  
我的母亲辫子中缠着红绳  
红云似地在 1965 年的灰色街道间扭摆  
她的母亲，病得很利害，沉默地看着这个二女儿  
接过她的孩子  
我的母亲，和男人一样，开始在农具厂工作

他们经常取笑她，害羞的她，胸部平平  
她的脸变得和铁块似的，她的生命之树  
开始凋谢，而她其实又年轻又美丽  
从农具厂出来的时候，天黑了。她叹口气  
背着那些男人们，没有叫累  
半夜，她穿过空洞的街道回家  
昏黄的街灯照着她和她三个月的孩子  
孩子整晚在哭，抽泣，要人抱  
外祖母累得不行  
坐在破藤椅上打盹，孩子拼命吸自己的手指  
我的母亲也累了，她轻轻地进厨房  
找些剩饭，又冷又不够  
然后她缩进自己的床，  
旁边的床上，她的父亲正在打鼾  
一天晚上，我母亲梦见一颗流星靠近她  
她睡得好香  
没有被告知她的母亲三天后就要去世  
那晚上，我25岁的母亲没有担忧她的未来  
她深深地呼吸，深深地，就像要靠这口气活一辈子

这首诗本身写得不算好，太直白。有时候，一件与作家太亲近

的事情反倒在上艺术上难以超越。我的几首写外公的诗，写妈妈的诗不如我写的“土豆”、“农场里的鸡”那样空灵体验的作品好。

又是除夕了，天气晴朗但很冷。

严格地说，我已经算毕业，拿到我的学位了。但纽约大学的毕业典礼只有每年5月一次，所以我正式毕业要等到明年5月份。但我们专业在学校的爱尔兰中心为我一个人举行了一个毕业晚会。



纽约大学写作专业的同学们祝贺我毕业的酒会上。我手拿着郁金香，感慨万千

奥兹教授正式发言：“……无论你今后到哪里，无论你用什麼语言写诗，我相信你的语言都是土豆的语言，小手指的语言，鸡的语言，向日葵的语言……”她省略了婊子两字，但每个人都知道，旁边有人就加上了，大家都笑起来。

香奈代表专业拿着四五朵郁金香献给我，把我搞得措手不及。我结结巴巴地想致感谢词，却由于生性不善于在人前发言，加上没有准备，只说了几个谢谢，就没词了。他们也没介意，人人都在说话，解了我的围。

奥兹教授在大家开始吃喝的时候，悄悄地出去了。我跟出去，她已穿好大衣，头上裹着一方紫色丝巾。我们紧紧地拥抱起来，看着我眼里有些许泪花，奥兹说，金耐尔也祝贺你。你知道吗，你是

我们最好的学生。我知道你在课堂上总是很谦逊。但金耐尔的评价是，你加入我们专业，给我们带来的礼物是别的人都不可能做到的。你对中国文学的生动感知，你通过个人努力所得到的感性经验，你把中美文学结合起来进行的个人写作，产生了你自己新的文学。我们为你骄傲。

奥兹给我一个亲吻后步出了爱尔兰中心。我站在门边发呆。麦丽萨过来，和我面对面地站着：“邵薇，你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除了写作，我没有别的生活计划。可能会打份工。”

“你要随时回来，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就告诉我。办公室的电脑你仍然可以回来用。对了，下午我看到了奥兹对你论文的评价。想知道吗？”

“当然。”我迫不及待地说。

“她是这样写的：……当邵薇抵达纽约后，她没有遗弃她所传承的文化传统，她的学习，她对事物的感悟和她的技巧。她开始写作具有非凡独创性的新作品，其中锐利的洞察力，深入的率直，巧妙持续的音乐感，间接隐约的透明感以及具神秘性的真诚，使她看起来像来自每个人独自内心的一位大使……”

克林顿，So what?

虽然毕业了，但我的时间概念还是学校的时间。新学期开始，我回到学校旁听“文学传记课”和“诗歌艺术课”。

今天的电视新闻爆出一条惊人消息：花心萝卜克林顿和白宫一位现今 24 岁的实习生有婚外情。整个美国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有的台已在讨论弹劾或辞职的可能性。

克林顿在电视上发誓说：“我和那个女人没有性关系。”然后大谈他对美国的贡献，希望美国人们相信他，让他继续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去。第一夫人也上电视，指控这是政治阴谋。

不过我认识的美国人也并没有把这个事看得那么严重，何况，看着可怜巴巴的一国元首在电视里赌咒发誓，不少人反倒生了同情，恨特别检察官吃饱了撑的。

问他们是否相信克林顿与那个女人有问题，一些美国人倒反问，So what？那又怎么样？

有人大不了加一句，政治是肮脏的。以至于有的电视台播出了一些保守派人士的感叹，世纪末，美国的道德沦丧如此也。

So what？

被骂得狗血淋头的克林顿照旧人模人样在台上表示如何改革美国的教育制度，如何领导全国人民向前进。

## 我成了一个新人

上周在中国城办事，奇迹般地丢失了我的钱包，所有的证件都没了，我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人。香奈安慰我，这下好，过去的都过去了，你成了一个新人。

托香奈的吉言，我在33岁时变成了一个新人。

昨天在家里举办了一个小小的生日聚餐。七八个人，爵微尔、香奈，我的两个室友，从芝加哥来的诗人朋友张真。我的房东还送了我一个生日蛋糕，大家宣读了送我的贺卡上的留言，吃了我从中国城买的烧腊卤菜、凉拌菜、炒四季豆、炒面、水饺等。

腼腆的杰瑞在整个晚餐过程中一句话也没说，我看见香奈多次朝他做怪脸，引我们取笑他。杰瑞特别害羞，简直不像35岁的人。但生日前几天，他带我到梅西百货商场，买了一个紫色水晶石项链送我，水晶石是我的生日石，戴上感觉满怀的吉祥。

按照事先的安排，聚餐结束后，我和杰瑞去古根汉博物馆，参观该馆举办的“中国，5000年展”。听说这次展览是江泽民主席访美时敲定的文化交流项目，否则不会有这么多的中国珍宝，连兵马俑都来了。站在底层大厅里，把洋鬼子们高兴得开圣诞派对似的，一个个浓装艳抹，加上千山万水运来的中国的青铜器，玉石，陶瓷，雕塑，水墨山水，组成了一个奇特的纽约之夜。而且是我的生日之夜，让人有时光倒错的感觉。

展览介绍中，我第一次知道中国哲学里的四极理论来自于曹植的诗：兰龙居东坡，白虎啸西山，龟蛇盘北边，红鸟栖南村。

我花300元请的律师打电话说，我需要做一件事，参加一个警察局主办的学习班，交50元钱去听一天课，然后我25日去法

庭那天就了结这个有关盗窃与否的案子。记住，上完课后，要老师的一封公文信，表示已经接受了学习。

按照什么茨基的安排，昨天我去上东城一个社区学校里，参加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学习班。

这个班是由一名自称“政治家”的社会工作人员主讲，主题是如何防盗。学生有十来个，各种肤色各种年龄都有。

“政治家”在黑板上写了一整板的问题，她的助手向我们收钱，叮嘱我们收好收条，上法庭时交给法官。

学生中有一位40来岁的亚裔妇女，长得很漂亮，在室内仍戴着一顶贵妇人样的绸帽子，非常惹眼。在回答“警察如何对待你？”这一问题时，漂亮女人她自言自语地说，她被警察虐待过。这个制度不好。

“政治家”在台上讲述如何处理和警察的关系，漂亮女人不停地唠叨，说她在监狱中看到很多人其实是牺牲品，不是罪犯，有些人是爱滋病病人，有的人不在乎所处的监狱环境多糟糕，已经麻木了。可她没有，她很清醒，生怕染上爱滋病。

“政治家”几次盯着漂亮女人，漂亮女人毫无警觉，继续她的控诉。



1998年2月7日，古根汉博物馆举办“中华五千年文明艺术展”，开幕式上刚好是我的生日

周围坐着的人都看漂亮女人，希望她住嘴。

忍无可忍的“政治家”问漂亮女人：“无论有没有犯罪，但警察抓了你，把你送进监狱，为什么？”

漂亮女人不明白“政治家”的话，说：“因为我想偷东西，我知道有录像机，有保卫，可我就是想挑战他们。所以我又一次偷了。”

每个人似乎都有一本苦经，他们抢着说，一个黑人残疾人说他故意在书店偷了三本书，有个纽约大学电影专业的女生说她这不是第一次了。她偷了一本九块九毛九的书，然后花了500元请律师，可能还要交罚款。但她肯定地说，她还要偷，直到偷成功。

说来说去，一个学习班的人有多半都不是初犯了，有的已经是三进宫，四进宫，对警察那一套熟得很，也不在乎。

漂亮女人旁边坐了一个黑男孩，他掏出一小袋花生米，撕封口，发出哧哧的声音，每次抓几粒出来，又发出一阵哧哧声。漂亮女人又开始数落了：“你可以把开口一把撕开吗？每次不发出刺耳声音不行吗？”旁边的几个男的就笑她。

黑男孩看她一眼，调皮地笑笑，继续他的动作。漂亮女人愤怒了，从她的手提包里摸出一把小剪刀，递给黑男孩。黑男孩不接，两人僵持时，“政治家”发话了。

“我说你不能歇一歇吗？一整天都为小事情不停地唠叨，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傻冒。”漂亮女人有些尴尬地愣了一下，但只是



一瞬间后，她又若无其事地开始唠叨了，黑男孩继续吃他的花生米。

“政治家”的下一个问题是“你们为什么要偷东西？”

这一下气氛活跃起来，人们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答案也多：没钱、忘记了、故意挑衅权威、因为是双性恋、没有前途。漂亮女人说的是“受虐意识，自我摧毁，绝望”。只有我和另一个男人说：“无辜。”

“政治家”又问：“人们为什么不偷？”

学生们回答：害怕被抓，非法，犯罪，不需要，宗教让人不偷盗。

“政治家”最后在黑板上列出一个表格，让大家把偷盗的东西价钱和因此付出的代价相比较。除了一个人帮女朋友偷一件450元的大衣，和一个人偷的波罗T恤衫价值300元外，其余人偷的东西都不过10元，20元，有的只有几块。但每个人付出的代价都在几百元甚至上千元，加上学习班的费用，去法庭的交通费，精神损失等，有个人被关在监狱里8天，工作也丢了。

最后，“政治家”让我们提问题，只有我发了言。我对自己的冤案耿耿于怀，也表示我将斗争到底。

“政治家”说：“你应该明白，那两位保安抓住一个人，他们就得到50元的奖励。对于你来讲，你可以找律师，最终可能撤销案子。所以，你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可问题还不在于此。所有的时间，精力等等，莫非就只当见了鬼？

“政治家”倒很坦率：“只好自认倒霉了。我自己也曾遭遇过类似的事，但由于我坚持斗争，终于获胜。”

上午赶到那家商场所在的区法庭，到约定的地点等什么茨基。

见面了，他是一個大胡子的大男人。他问我信带来没？我说，带来了。简直像特务的干活。然后，他拿出一些表格来填。我心想，他不是说什么准备好了吗，敢情表都没填。

填好表，他问我，你是想交100元罚款走人，今天就可以了事呢，还是要求撤销案子，这样做有一点危险，如果法官拒绝了，你就得准备多花钱再上诉。很多人会选择前者，省事，当事人省事，律师也省事。但你有选择任何一样的权利。

权利？

我有没有不到这个鬼地方的权利，我有没有不浪费这么多时间，有这么多精神折磨的权利？如果，有那么一个人在事发当时就听我的申诉或思考一下，我也不会来浪费这么多人的时间。看看这个法庭，满庭的人，坐在外面等待公平的人，或者就是发神经要触犯法律，向社会挑战的人，浪费多少纳税人的钱？我敢说，美国的法庭是生意最好的地方。有人开玩笑说，在美国，屁打不通，也可以上法庭的。难怪过去马克可以同时打几个官司呢。

可我算哪门子事？

我想也没想，回答什么茨基“当然是要撤销案子，我请你就是要还我清白。”

到了时间，进到小小的法庭内。我的律师什么茨基拿出一大本卷宗，走到法官面前。法官可能认识他，问他先审哪个案子。哪个案子？我的案子。

什么茨基走到法官面前，我们先处理邵小姐的。

法官问，她选择什么方式？

什么茨基凑近法官，小声说道，这个学生是冤枉的，她要求撤销案子。然后他的声音更低了，我什么也听不到。可能在为我辩护。满屋子的人，等待下一个案子。看来，什么茨基同时在处理四五个案子。难怪，他为什么只收我这么少的钱。否则，他只能喝西北风。我这个案子，其实算不了什么。连法官可能都觉得麻烦。他很快答应了什么茨基，宣布我无罪。

什么茨基走到我面前：“你可以走了。”然后，就走到旁边的一堆人中间，好像是关于什么车祸死了人的案子。

这就完了？我还没有为自己辩护呢？我原以为会有一番慷慨陈词，然后我也可以大义凛然地做一回英雄。就这么完了。我站在原位一动不动，直到什么茨基又到我面前，问我还需要什么？

“我的结果呢？”

“我过两天把法庭的宣布寄给你。然后，你就可以放下包袱了。”他亲切地告诉我，安慰我：“你雇我打这个案子，这就是你的公道了。”

我的300元钱讨回的公道。

## 华裔生活

金耐尔去法国了，请我定期去他家，给种的植物浇水，给他把家里的邮件转到法国。金耐尔的公寓是学校配给的，有三室一厅，在18楼上，窗外可以看见哈德孙河。

每次浇完水，我都在他的大客厅里坐一会儿，闻闻植物的香气，或翻翻他的书。有一次，我看见一本老相册，里面有很多金耐尔小时候和家人的合影。他看起来很腼腆，多数时候头微微低着。金耐尔的父母是从爱尔兰来的，所以他应该算是爱尔兰裔美国人。

相册里有一张旧报纸，是罗德岛报，里面有一篇金耐尔的照片，很年轻，他被称作年轻的爱尔兰诗人。那时金耐尔恐怕30多岁吧，出了第一本书《恶梦之书》，刚刚尝到成功的滋味，笑得仍然很腼腆。

我用他的传真机把这篇文章给复印了一份。

有一次去金耐尔家，打开门，却有一位妇女在里面。原来诗人罗伯特·布莱夫妇借住一个月。布莱还要给我们上一次“诗歌艺术课”。这门课由多位美国诗人讲座似地轮流上。

布莱听说我从中国重庆来，马上送我一本他的新书《早晨的诗》。布莱在中国的名气很大，好像是因为他的诗歌深受中国古典诗的影响。我对他仰慕以久，没想到这么认识了。

布莱长得高大，头发和胡须有些发白了，不像我想象中那么年轻。他们住在明尼阿伯尼斯的一个农场，他种田，农闲时，夫妻俩就出山旅游，朗诵，参加文学活动，也定期来大都市纽约住个把月。

他坐下来，问我：“你写诗？”

“当然，我是金耐尔的学生呢。我写诗，可没地方出版。中国出诗集不容易，美国也很难呀。”我心里想他要愿意帮我，那多美。

聊来聊去，结果是我帮他。他太太在做研究，收集古代炼金术的资料。我的妈，炼金术，古代皇帝用来长生，他们要来做什么？

我旁听的“文学传记课”上，每个人都有一个写作计划。我的计划是写一个还活着的女诗人。同学们写的都是死了的人。

一个真正的诗人是为自己活着，为体现真正人的价值而创作的人。他既不为现实利益活着，也不为别人活着。诗歌，真的诗歌是人灵魂中最纯粹的火焰，因为它的燃料是生命本身。

3月份既是黑人历史月，也是亚裔传统月，很多图书馆、大学、少数族裔文化机构都举办一些讲座，朗诵什么的。

华美协进社这个月的活动也很多，其中还请王蒙来谈中国当代文化。今晚有个京剧讲座，请了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的儿子梅

葆玖、梅葆月等讲演并做表演。有两位主持人，一个讲中文，一个讲英文，放映了部分梅兰芳的演出片断。

听众对梅兰芳的儿子扮旦角，女儿扮老生似乎很有兴趣，也很好奇，问梅葆月，她扮演老生是否自愿选择？葆月说，她家四代演京戏，哥哥演旦角继承父亲，她想，如果自己演老生，就可以和哥哥合作。

美国听众有的人看过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霸王别姬》，他们对男性女性颠倒性别扮演角色非常感兴趣，梅兰芳的两位子女，个人生活中有没有男女混乱的问题。梅葆玖身为男人，但举止眉目有些女性化，葆月可能由于在舞台上扮老生，虽然如她说，内心还是女性化，但外表看，的确有些男性化。

当然，美国人在任何场合下，都会问到人权方面的问题。如今的女孩子可以进戏校学戏吗？对于中国人来讲，这当然是个简单的问题。

中国不但有专门的戏校，戏剧学院，戏曲学院，地方上也有剧团，有自己的名角。我家乡万县市，在我打小时，就有川剧团、京剧团，里面的年轻女演员很多，让我羡慕得不行。有时走在街上，认出自己喜欢的角色，会高兴半天呢。

不过，像梅兰芳和他的子女们，即便像我这样的戏迷也是无缘见到的。所以，振兴京剧，振兴传统艺术，不一定要走到国外。真

正的观众还是在中国。

昨天，查理请我参加他们的一个聚会，纽约的反日团体举行的，有关日本在南京大屠杀的罪行。

前几天，查理建议我去世界贸易中心的 Borders 书店，听华裔女作家张纯如朗诵她的书《南京大屠杀》。他说，这本书是第一本介绍南京大屠杀的英文书，还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栏。美国的反日团体在大力宣传这本书，并买了大批书准备送给各图书馆。后来我去了，也买了一本，准备看完后捐给纽约大学图书馆。

由于给查理打工的缘故，我对华裔生活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查理在二战期间是外交官，亲自参与了战后清理日本战罪。他对于日本人欺负中国人的历史刻骨铭心，特别鼓励我这种年轻中国人发奋努力，为中国人争气。有这样的活动，他总是邀请我参加，也不让我出钱买票，多是他出或他得到的邀请票。

昨天的活动，他们还请了二战时在南京参与国际保护区的美国牧师马吉的儿子和张纯如两人演讲，以及特邀从日本来的几位战俘。查理说：“战俘们都很老了，他们对中国人有负罪感，所以，想趁有生之年把历史真相告诉世人。但他们的行为受到日本政府的干扰，有两位就没能来。”

活动在中城的万寿宫。我和查理他们一群老教授坐在一桌，包括夏志清，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教授胡长度。演讲开始前是自助餐，

自称是美国长春藤学校的第一位华人教授的胡先生，边吃边讲纽约知名华人的轶闻趣事，谁谁的父母干过什么，谁谁又干过什么。某某又和中国的关系很好了。但对待日本问题，所有的华人都持一个态度。

坐在老人中间，我只好勤快地帮他们端茶倒水，胡教授问我哪来，答曰重庆后，他马上用川话跟我耍嘴皮子，还说了两句“龟儿子”什么的。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咦，你这川妹子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一般很少有内地的哟。我便问，要不要得嘛？他答说，哪个要不得嘛。引得一桌人大笑。

今年还不到30岁的张纯如讲了她为什么写这本书，如何查资料，如何从资料中查到德国商人拉贝的日记……

马吉的儿子大卫生在中国，如今已有60多岁了，看上去很穷。他一上台就指着他的白裔夫人说，她是外国人，我是中国人。他拿出一台相机，据称当年马吉在南京就是用它拍下了很多珍贵的照片，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一手可靠材料。他表示说，中国人不忘记历史的精神，让他明白为什么他父亲当年要帮助中国人保留这些珍贵的资料。

会后，查理买了一本内地江苏刚出版的《拉贝日记》，借给我先读。

“……忽然，我看见桥那边，我妈妈在奔跑，一群日本鬼子在



她后面狂追。眼看就要追到了，我大叫，妈妈，快跑。妈妈也叫，你快跑，躲进山里去。不，我要和你在一起。我朝我妈妈冲去，桥变得好长，怎么也跑不完。桥那边，我的村子里，房屋都起火了，人都被捆起来，站成一排，等着被集体枪杀。留着小胡子的鬼子们，端着刺刀在杀婴儿，杀老人，满河的血水，水面上还浮着尸体。我好像是去山里打柴错过了鬼子进村的时刻。我妈妈一定是为救我，逃出来报信被鬼子发现了。不能让我妈妈落到鬼子手里。我不要活了，我要跟鬼子拼了。近了，我看到我妈妈浑身是血，衣服也被撕破了，她的脸在夕阳中好绝望。鬼子们已经从几个方向把她包围了。妈妈，我痛哭起来，大声嘶叫，桥都开始抖动了。我妈妈，她看也不看我，就高呼一声，打倒日本鬼子，纵身跳过桥，整个人像一节甘蔗一样，慢慢向河里坠落。妈妈，妈妈……”

我陡然醒过来，右手按在左胸上，好像我的心脏已经滚落出来，红腥腥的，怪吓人。好半天，我才明白我是在做梦，因为周围没有河，也没有桥。可我觉得不像是梦，而是在回忆什么情景。想起来了，周而复的《南京的陷落》。查理借我的，我还没看完呢。可要这样开始做恶梦，要是看完，非看出神经问题不可。没有战争经历的人，读到战争能吓个惊心动魄。

好一阵子才清醒过来，我继续睡觉。

天大亮了，我又醒来，感觉很冷，望一眼窗外，一片银白，下

雪了。“下雪了，天晴了，下雪别忘穿棉袄……”我开始哼了，转脸看到睡在地毯上的杰瑞还没醒，便嫉妒得发疯，伸出胳膊挥舞，又是唱歌又是闹，终于把他闹醒了。

“狗屎一堆。”我莫名其妙地骂道。

“什么？”杰瑞抬起头来问。

“杰瑞，外面在下雪。”狗屎是我从马克那里学的几句骂人话之一。可对于杰瑞这样的美国人来讲，已经够糟糕了。

当他穿着睡衣上完厕所回来时，站在门口，目瞪口呆的样子，遭抢了似的。

“你怎么了？傻瓜”我老想取笑他。

他站在门口，受惊吓似的说：“你刚才说了狗屎，客厅里地毯上真有一堆狗屎。”

“你有魔力。”他半天才回过神，恳求我不准再乱说话了。否则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呢。

但今天我有理由胡闹一气，我告诉杰瑞我半夜做的恶梦，好像这个世界亏待了我一回似的。他很同情我，用比较标准的中文说，别怕，有我在。

“你是谁？”“我是皇帝。”我大笑，谁教他学的中文，还皇帝。这样的皇帝，早下台了。

这个周末，我应杰瑞邀请去他家，其实是他父母家作客。他父

母去大西洋城赌博了，他弟弟和他的女朋友进城去庆贺他的生日，晚上住曼哈顿的旅馆。

我们单独呆在他的家里，这还是第一次。因为昨晚我和他吵架了。

杰瑞多次要我去他家，我没去，因为他住在他父母家。

我告诉他，如果他想和我交往下去，就得自己独立生活。我不想和一个大男孩交朋友。

他回答道，因为他父母是很保守的德国人，他母亲像个间谍，每个人的房间她都要检查，有时还在门外听里面的谈话。所以，不花钱住在家里，其代价是失去了美国人最看重的自由和个人隐私。为此，我说他不像个美国人。

昨天参加完查理他们的活动，我就去了他家。

我去了，又从他的不独立说起。我说我们中国人够传统的了，可像我这种读书人，也是十几二十岁就会离家，不至于受制于父母的生活方式。我真没想到在一个人人独立的美国，还有他这种人。我劈里啪拉说了一阵子，他也不吭声。半晌后，我质问他：“你听清楚我的话没有？”

杰瑞坐在地上，呆呆的，满眼泪水。我吓了一跳：“你在哭？”

他伸出左手，用大拇指和食指做了一个比划，用很标准的中文回答我：“一点点。”

“我的天，天底下还有你这样的美国人。”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好像我欺负了一个小孩子似的。真没想到，我还以为美国人都和马克一样张牙舞爪呢。

“算了，我还是回去的好，免得再欺负你了。”我有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感觉。

他走过来，拉着我的手，恳求道：“你别走，你留下。”

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

## 体验声音

罗伯特·布莱昨天给我们上了一门课。他讲了诗歌写作的五要素，意象、节奏、心理重量、两个自我和声音。他说，这是他的写作体验，他主要谈了声音。

然后，他要求坐在阶梯教室里的我们全体站立起来，发英语的五个元音，并且随着发音的不同，做不同的身体动作。做了几遍后，他让我们坐下，看他的。发“阿”音时，他两眼闭着，慢慢伸出双手双臂围成一个圆，随着他声音的提高，手臂也提高，最后举过了头顶。发“育”音时，他的双手向外慢慢推动着什么，像愚公移山的愚公。育……他的气力提起来了，胡子也在动，好像推了半天山还没有动似的。

我暗暗好笑，一看周围的同学早在笑了。不知谁笑出了声，布莱停了下来，睁开眼睛，从世外桃源回来一样。

有一次，金耐尔上课时，给我们听他带来的声音录音带。里面各种声音：有流水声，口哨声，沙漠里的骆驼声，非洲热带雨林里的鸟声，部落里的集合声，还有叫不出名字的乐器声等。我很喜欢。

下课后我和布莱约在学校附近的一个中餐馆吃饭。

他说：“中国古诗很美，可以当歌唱。你会吗？”

我马上想到李商隐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唱了几句，布莱又提问，四川话与普通话有什么不同？比如讲：“请给我一些酒或茶。”

我讲了两句，忽然觉得普通话中气很足，而川话有些气弱。难怪四川人讲话得吼着说，可能字本身气太弱，得加重语气才行。

布莱拿起我给他看的诗：“你的诗中有些字太弱了。要换成元音重和突出的字。而且，尽量不用‘是’或‘不是’这类简单的词，要多样化。在你的‘方鼎’一诗中，你的个人感情藏起来了，你感到什么呢？哭还是别的？读者没有读到。诗歌中的意象，不是光用一个事实来陈述，最好说出另一个世界的另外的声音。这一点你的‘长江传说’里做得好。”

喝完我帮他点的鱼头汤，布莱说，如果惠特曼写了一首交响乐，那我们就先用短句子写首歌。

布莱告诉我，他的个人译诗集很快要在中国出版，他问：“在中国出诗集容易吗？”

“当然不容易。不过你在中国名气大，应该好出。”据我的美国同学们讲，布莱在民间名气大，与他在20年前倡导男性运动有关。他写过一部畅销书《铁约翰》，就是呼吁男性精神，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

布莱写了篇关于惠特曼的文章，标题是“我对惠特曼的疑问”。其中有一条是惠特曼从来不承认他受过谁的影响。我原准备把此文翻译成中文，看看美国的诗人如何看待他们的前辈。可金耐尔知道后，很不高兴地对我说，我对这篇文章毫不感兴趣。因为布莱不真懂惠特曼。但和他吃饭时，他未提，我也回避。

因为，我相信金耐尔的判断。

布莱付我75美元的支票，作为帮助他太太在图书馆查资料的报酬，我死也不肯要。支票夹在我的日记本里。后来想想，这恐怕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所谓清高有关，觉得凡事一粘钱字，就失去了意义。布莱知道我的心思后，说，别傻了，你不替她干，她也雇别人干。但我仍然决定不动那张支票。

3月份结束了，我首先在东二街的大理石公墓里看到春天的影子。没事的时候，我会在东村里瞎逛，专门找不同的路走，探险似的。有一次路过这个公墓，觉得很有特点。鸽子们喜欢在里面啄食，不知吃的什么。今天路过时，发现里面的一株桃树绽出了小骨朵花蕾，粉红粉红的，不注意会忽略。

这个公墓建于上个世纪，里面葬有两位纽约前市长，一所医院的创办人，一个银行家，一个建筑师。大家族的祖先。我从没见到人在里面扫墓，惟有门口的大理石碑上简单写着这些。不知道他们生前过得好不好，也不知道当时的东村是什么样。房子该不会这么破旧，人该不会这么年轻而腐朽吧？

东八街有个公园，上午我常去那里散步，老遇到一个喂鸽子的老人，穿得烂烂的，有时他自言自语：“我喂你们喂了30年。每天早上都来，你们知道吗？”

鸽子们点着头，在阳光下面吃老人的面包屑，喝老人给它们的水。太阳光像是泼出的脏水，洒得满地，人们都绕开它走。

能在这个时候与时间同在，多好。这世界不能没有我。

坐在七A的老位置上，东村在早晨8点钟是没有起床的，几个和我一样夜不安眠的人，坐在咖啡馆的各个角落里，等着同样慵懒的侍者送上免费咖啡和去年是一块九毛五今年是两块五毛钱一份的早餐。连放的歌也是最痛苦的，没睡醒的女人打不死搅不烂的嗓子，喊着她的心上人。在我听来，就像一首中国歌：“红萝卜的胳膊，白萝卜的腿，花心心的脸庞红突突的嘴，小妹妹和情哥哥一对对，刀架在脖子上也不悔……”

时间飞快地走了一圈，没有人去数它。我的生命就这样过去了它的多少分之一？昔日想的轰轰烈烈没有，现在习惯的平平淡淡也

不行的，总有什么在前面等着似的。

想起我在青城山认识的道姑王师傅，她让我天天对着水看。

可从水里能看出什么呢？

你不要急，你想得到什么都会得到的。

是吗？

我和她在青城山因缘而识，我陪别人去算命，她不算，却对着一大帮人说，要说强者，你们都不是，只有她。

我坐在山里的石凳上，既没因山高坡陡而高声喘息，也没因身居灵山有所忘形。

阳光从竹缝间斜穿出它的手指，王师傅手指着我，别看她外表柔弱，她内心坚强。

是吗？

我没有心动。如果真如此，那是我的生命熬到时候流出的水溅起的水花。我不狂喜。

王师傅寄来一棵灵芝，治我的头痛。而从药店买的灵芝怎么也不灵。

王师傅年纪轻轻，长得前额饱满，脸颊红润，少见她那样端正的人儿。早先，她入伍当兵，学过医，是什么意念让她放弃红尘，投身道门，著布衣布鞋，步行千里万里，往来于名山大川，万不辞难。



如今她看透我的一生，我不回避。

得今生有今生，有来世得来世。若有缘，不必约定也可以重逢。

## 荣誉人物

昨天，我在学校的信箱中，发现有张通知，是专业主任麦丽萨发出的，说我被选为研究生院的硕士学位学生代表，出席研究生院的毕业典礼。并将与一位博士生代表，在研究生院院长带队下，代表我们参加全校的毕业典礼，从校长手中获得我的学位。她特别说，这是我们专业的荣誉，希望大家祝贺邵薇。

我到麦丽萨办公室去道谢，她亲热地说拥抱我表示祝贺，接着说，这只是个荣誉，没有钱。

人人都知道，要在纽约当个执著的作家诗人什么，可不是开玩笑的事。

麦丽萨知道我是这样的人，当然钱是最重要的。可是，荣誉也重要。没有人在乎，总不是一件好事。而且，当学生代表，也需要有资格。因为，全院有这么多文理科系别，每个系又有很多专科，很多专业。每个专业推荐一名候选人出来，就有多少人，然后由院长卡莎琳决定一个人，一定需要有竞争力才行。

而且我还是个外国学生。我为自己被选出感到骄傲。

当我回到家，告诉我的中国室友时，室友撇撇嘴，酸溜溜地问我，又是你自愿报名的？

我喜欢报名参加一些没有报酬的义务活动，社区服务，既是我的回馈，也是认识社会的学习机会。但这个荣誉，不是报名都可以当选的。我很不高兴地回答她：“你错了，我当选是因为我是好学生。”



颁奖会上，与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文化事合影

“喝，你还是你们专业的好学生？”她好像很吃惊的样子，因为平时谁也不会去说自己怎样。但这回，我不说，毕业典礼人人都要参加，也会知道的。而且，为什么人要害怕说自己好呢？

我明白，为什么中国学生在一起谈论，老说中国学生互相怎么不团结，怎么互相嫉妒，劝国内的同学报专业最好报中国学生少的专业。纽大有很多北大、清华等名牌高校的学生。他们都很聪明，读物理化学电脑等，而且拿奖学金，毕业找个年薪五六万，八九万的工作没问题，我很佩服他们的能力。但很多时候，听到他们谈论自己和别人，谈论国家和个人时，我总觉得，虽然我比他们大一点，但感觉上差别很大。我只好认为自己太传统或太保守了。

我忽然想，如果我们专业有很多中国人，我会受到如此待遇吗？他们还会如此看重中国人吗？

晚上，爵微儿打电话来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她得了加拿大大使馆的一个文化基金奖，有加币一万元左右。

“美元多少？”我迫不及待地问。

“五六千吧。”“太伟大了。”我羡慕极了，也替她高兴。爵微儿为了来纽大读书，存了好些年的钱，够第一学年的学费。第二年，她没钱了，差点放弃读书。后来，好在她的英文好，在学校找到一份教应用文写作课的工作，加上她每周三晚上在苏荷区一家酒吧打工，才能继续学业。她也算是国际学生，但加拿大和美国毕竟更哥们一些，没有中国学生遭遇到的太多签证问题。



获罗娜·杰菲基金会“第五届女作家奖”颁奖会上，与获奖者罗娜·杰菲（左一）合影

“你打算怎么花这笔钱？”我好奇地问她。因为她每次领了打工的钱，就爱去买一样礼物给自己，我问干吗要这样浪费辛苦挣来的钱，她说，如果不买点礼物给自己，她怕下个月自己没有心情打工了。算慰劳品吧。

我问她：“你们加拿大文化奖金是否只给加拿大人？别人可以申请吗？”

她笑着说：“我可是申请了四五年，他们才给我。每年有30多个获奖者，很遗憾，只给加拿大人。你没有机会了，除非变成加拿大人。”

由于爵微儿和我都算是我们专业的外国学生，自认的少数民族，所以我们一直互相鼓励，她多次说：“你的作品比他们都好，

干吗不得点什么钱？”我们不说奖，说钱。因为有了钱，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写作，写更好的作品。

4月份是美国的全国诗歌月，《纽约时报》说：“给春天带来一点疯狂”。美国诗人协会组织诗人全国巡回朗诵，宣布说，去年诗集的销售额比上一年增加了25%。这是个好消息，我开始在论文的基础上，补充一些诗作，全面修改，然后准备找出版社。

好多诗歌活动。书店，图书馆，大学校园，咖啡馆，公园草地上都有人在朗诵诗歌。即使不是诗歌月，纽约的文学活动也很多。奥兹教授、金耐尔都被邀朗诵。

昨天，九十二街的Y文化中心，举行一个很大型的朗诵，纪念西班牙诗人加西亚·洛尔加。邀请了金耐尔、布莱、W.S.默文、菲利浦·列文等朗诵。洛尔加只活了短暂的38年，但他的诗歌，西班牙文和英文的，必将受到几代人的喜欢。他的诗歌，以西班牙文写的，音乐感很强，充满激情。布莱以西班牙文朗诵了一首圣地亚哥的诗，即使不懂西班牙文，也很动人。然后他又朗读了自己的英语译文。

金耐尔自己也朗诵了自己翻译的诗。美国很多诗人都懂两门语言，所以也通常翻译诗歌。金耐尔还懂一些德文，有一次，他说，他的终生计划是翻译里尔克的诗歌。

更有一次，他说要请教我翻译一首王维的诗，吓得我几个星期

不敢见他。我最怕翻译诗歌。我固执地认为，再好的诗一翻译就糟糕了。不过，对于不同语言的诗歌，要交流，不通过翻译还不行。像去年暑假我选的诗歌课，最后也翻译了李白的《长干行》，庞德不懂中文，也敢翻译李白，可见翻译自己喜欢的作品，不一定是受折磨。

朗诵完后，照例有酒会，麦丽萨和我去祝贺金耐尔，金耐尔一见我，就叫道：“你最近又写了什么闪光的美国诗歌没有，什么时候让我欣赏欣赏？”

我伸伸舌头，麦丽萨告诉金耐尔我被选为学生代表参加学校的毕业典礼，荣耀着呢。

金耐尔说，那好哇，麦丽萨有什么办法把邵薇留在我们专业就好了。

麦丽萨得意地应道，我们来想想办法吧。

朗诵会完后，麦丽萨召了个出租车，邀请我搭车。

我说，大半年不见，金耐尔看起来老了许多。

“是吗？他又结婚了。”“真的？”我很吃惊，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多年前离婚，他和他前妻是诗歌界的一对大美人，美男美女，很多人羡慕死了。不知怎么离婚了，我一厢情愿地认为是他太太抛弃了他，而不是他抛弃了她。因为我热爱金耐尔，也不希望他是一个负心男人。

“和谁？”我问麦丽萨。她说：“和与他同居了差不多十年的女朋友。”

我想起来了，上次爵微儿还到佛蒙特金耐尔老家去帮他做点事，回来爵微儿就说道他的女朋友。我们俩谈论了半天，掌握了金耐尔的重要情报似的。因为在美国，如果你连一个人的私生活也知道，就算是真的了解了一个人。我们像两个小女孩，为知道这天大的秘密激动，而且似乎因为分享这些秘密，我们的友情也深了一步。

不过，爵微儿说，跟金耐尔相处的时候，她也蛮紧张。所以，她的结论是，名人只能远看不能近处。

杰瑞邀请我一道去拉斯维加斯度周末：“我开会，你去赌博。”但几天赌场日子下来，我差点发疯。从一下飞机开始，老虎机的声音就响起来。后来，我对赌场的声音气味敏感得像到了世界末日一样，整个一个疯狂绝望，天天躲在我们住的外形如童话里宫殿似的旅馆里。

飞机晚点，飞到纽约上空时已是晚上。从飞机上看地面，好像遥想故乡。任意一束灯光，一块可辨认的土地，水泽，感觉像从外星球回来，有些激动。胃也开始蠕动起来，努力回想那些它所消化过的最踏实的食物。那些食物，曾经在你的胃里劳动，转化成力量，送给你的身体和生命的运动。若干年后，人类也许可以自由在天空飞行，居住，和鸟一样，比鸟更自由。打开电脑，网络让我们对地

球一目了然，然后，一个按钮，就把我们像电波一样带到任何地方。我们不为家园所困，不为情困，是自由的动物，云彩，河流，山村，由我们任意选择。相聚和离别不再折磨我们脆弱的神经。

在飞机快要着陆的时候，我居然睡着了，梦见我外公，他给我戴上一些漂亮的金首饰，有黄亮的手镯，波浪形的项链，心形的戒指。戴上这些，我觉得自己一下子沉重起来。外公活着的时候，我很少梦见他，如今他去了，反复来到我的梦中。命脉永系，无论我在哪个星球。世事沉浮，我会在某个时候寻找环宇中一块天高云淡的地方与他重逢。

## 麦丽萨和中国女儿

上周末，麦丽萨邀请我去她家，她儿子露克过生日。她特别说，她要让我看看她的两个小宝贝。两个？她明明只有一个孩子嘛。

原来，另一个是她楼上的好朋友邻居领养的中国女孩小婉。

麦丽萨住布鲁克林公园坡，她楼上楼下的邻居都有领养中国小女孩的。后来我发现，岂止是她楼上楼下，整个公园坡，包括纽约，领养中国女孩的美国家庭还真不少。

到了麦丽萨家一看，她儿子的生日聚会，成了她们那一带领养中国女孩的家庭聚会，满屋子的中国女娃娃。穿着各异，有个女孩穿的是花木兰的行头。七八个梳着妹妹头的小女孩，和她们在一起的是她们的养父母，都是白人。这些领养父母或单身妈妈们都给她

们起了各种各样的美国名字，但大多还保留了一个中国字，如“薇”、“平”、“妹”或“静”之类。像马格丽特所说，这是要让她记得自己的中国背景。

“花木兰”的美国爹斯帝夫最骄傲，一见我这个中国人，忙介绍他的中国女儿爱米莉。爱米莉两岁多，来自江西南昌。斯帝夫说，女儿的中文名字叫“松”，松树的松。“这是男孩子的名字，对吧？”从事儿童社会工作的斯帝夫认可这个名字，并对爱米莉的性格倍加赞赏：“个性坚强，独立自主。在幼儿园，她敢坐在比她大的男孩子身上，男孩子只好叫老师救他……”他的律师妻子梅格补充道：“她既活泼好动，也文静好学。喜欢书本。”在这对夫妻看来，小松松是上帝送来的礼物。斯帝夫一家先后五代，只生男性。到了他这一代，不但不生女性，连男丁也没添上。多年努力失败后，他们有了小松松爱米莉，成为他们家几十年来的第一位女性后代。当夫妻俩在南昌的一家旅馆见到小松松时，双方都吓坏了，不知如何是好。夫妻俩觉得能拥有这个孩子很幸福，可把孩子从她的出生地带走，是一件悲伤的事。双方相处两天后，松松才第一次开口笑。他们激动得连按快门。斯帝夫看着女儿自由自在地四处玩耍，笑着说，她一听到中国音乐就会跟着唱的，她知道那是她的一部分。

麦丽萨的儿子露克虽然才两岁，和小婉已经打得火热。小婉也只不过两岁多，两人已经知道搂抱在一起，上下楼都要牵着手。麦丽



萨说，有一次，露克生病了不能去幼儿园，小婉也不要去，陪露克在家玩。麦丽萨红着脸说，你都没看见，他们那种神情，就像两个小情人似的。

我开玩笑道，喝，你可要当心，他们这可是早早恋哟。

正说话时，另一位五六岁的女孩过来拉我的手，自我介绍叫喜尼·薇。她的犹太养父说，薇薇从安徽来的。我们薇薇也是中国的海外华侨。薇薇每每见到亚裔，就会格格笑，因为亚裔与她自己长得相像。

小名“妹妹”的朱莉叶来自南京，和大多数领养家庭的孩子一样，她也有置身双语文化中的心理焦虑，学语言的进度比单一文化中的孩子进度要慢，他们的家长们一度很担心，很多都求助于心理医生。如今，一岁半的妹妹可以说24到25个英语单词，对于中国保姆说的中文她似乎可以理解。幸运的是，妹妹的养母是一位亚裔后代，妹妹的中国背景得到外祖父母一家的热情认可。

据麦丽萨介绍，公园坡每月有一次“收养中国孩子的家庭”聚会，是20多家住在公园坡和史塔顿岛的美国家庭的节日。这一天，孩子们可以见到二三十位同自己皮肤头发一样颜色的小朋友。

长沙来的得米五岁半，她是犹太裔心理女医生卡特的女儿。单身的卡特当初看见一位朋友收养的中国小孩，一下子喜欢得不行，马上决定自己也收养一个。1994年她和十个美国家庭去长沙接

孩子，从此他们十个家庭成了好朋友，每年都庆祝中国新年，庆祝他们心爱孩子的“生日”。得米是所有孩子中特别的一位，她并不多话，但却是一位小天才，有极好的运动员天赋。目前有关方面已在专门训练她。穿着小对襟衫的得米听从卡特的话，当众给记者表演劈叉，倒立等功夫，让在场的妈妈们羡慕得不得了。两岁半的安徽马鞍山的女孩莉莉，被史塔顿岛的一位单身女记者收养。

我好奇地问一个叫弗兰克的养父，有没有遇到人问他为什么有一个黄皮肤的女儿？如果有，会不会尴尬？弗兰克说，我让女儿学中文就是让她要对中国文化感到骄傲。如果有人对我们好奇，我不会尴尬，不过我只遇到一次。我曾带克罗迪亚到时代广场玩，当时因为什么她哭了。我就蹲下来问她，一个妇女走过来说，对面就是警察局。她以为这是一个迷路的孩子。弗兰克家住的东公园坡一栋楼里，就有三家人收养了中国女孩，孩子们互相都是朋友。

曾经在1995年去北京参加“世界妇女大会”的心理医生简，因为领养了两个中国女儿，她对中国对华人社区更加关心。简的大女儿小梅也叫“Hope”（希望），小梅来自湖南，虽然只有三岁半，但已有典型的湘妹子性格，聪明，善于交流，独立要强，深受喜爱。简1998年5月又去中国，替小梅领养了妹妹伊丽萨白，中文名平红运。小红运1999年2月满两岁，是南昌来的江西妹子。当初红运被南昌一家农村夫妇收养，简带她走后的第一天，她不停地

哭，后来才适应。刚回美国时，小红运生怕姐姐和她争夺母爱，要推开简怀中的湖南妹子。如今，两姐妹相处不错，姐姐还会保护妹妹。简还介绍说，他们第一次去收养孩子的七户人家，如今就像亲戚，同庆中秋和中国新年。平时还写信联系，他们希望孩子们像表兄妹一样长大。简对于孩子们的未来并不担心，她担心作为家长会有难度，如何教育好孩子。如果她们受到歧视，简果断地说，我们要教育她们与歧视斗争。

受访的家长几乎没有人对孩子的未来有什么担忧。他们都认为，孩子就是孩子。尤其在纽约这个移民城市，被收养的中国女孩们的种族身份不会因此受到歧视。这些养父母们大都是律师，医生，艺术家，金融界等中上职业人士，可以说经济上都很好。他们选择领养中国小孩的原因很多，有的因为去中国旅游，对东方文化产生兴趣；有的如简看到《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出于人道考虑，愿意收养。当然，像弗兰克夫妇，因为一直没能生育，只能收养。还有单亲家庭也是如此。但有一点共识是，中国政府制度化规范化的领养政策比很多国家都优越便利，使得领养中国孩子的过程简单而顺利，也是很多家庭成功收养中国女孩的重要因素。据初步统计，目前在纽约的收养中国孩子家庭大概有两千家。而“收养中国孩子家庭”作为一个联谊机构自1993年成立以来，在北美和欧洲共有89个分支。

麦丽萨的邻居马格丽特和卡罗是一对社区工作者，她们是一对同性恋人。1997年时她们填表决定领养一个中国女孩，并且很快收到名为“小婉”的照片。照片上，小婉长得健康，面色红润，一看就是典型的中国农村孩子。卡罗她们兴奋地到处给朋友看，介绍她们的女儿。1998年7月卡罗到了合肥，下飞机后两小时，就在旅馆见到了照片上的女儿——小婉（不知道姓什么）。小婉当时15个月大，由当地一位妇女收养。所以，小婉记忆中一直都是那位中国妈妈。卡罗正式领养小婉后，她们在旅馆呆了几天。小婉老哭，什么都说“不要”。陪同卡罗去中国的朋友会说中文，告诉卡罗小婉的话是什么意思。卡罗伤心极了，觉得不该把小婉从那位中国妈妈处带走。不会讲中文的她从此记住了小婉的“不要”。回到美国后，她特意寄了小婉的照片给合肥的孤儿院，请他们转给小婉的中国妈妈。回到纽约三天后，小婉很快适应了环境，她记忆中仍有中文单词，但学英文很快，摹仿能力强。卡罗虽然遗憾没能去小婉呆过的镇里看看，但她计划好了，当小婉长大后，她要带小婉回去看曾经照顾过她的中国妈妈。这是小婉的一部分，美丽的一部分。

我后来打电话给卡罗，聊起小婉，我说我想写一篇文章，介绍这些小女孩和他们的养父母们。我和大多数的家庭都通过了电话，希望她们能和我聊聊。

卡罗说，可以，但不要提到她们是同性恋者，这样对以后的人

领养不利。

她停顿了一下：“你知道吗，小婉刚来时，不会自己走路，她过去在孤儿院大多呆在床上。我们鼓励她，两三个礼拜后，她就开始自己走。你知道小婉每天早上最爱吃的是什么呢？鸡汤烧豆腐。”

看过那些小女孩回来后，我心情颇复杂。这些小女孩们的未来会怎样？与他们的父母接触后，我相信这些人是善良的，她们的未来会比我们过去好。但她们长大后，会记得自己是中国人，自己出生在某个乡村，某个燃过煤油灯的小屋吗？她们还会有中国人的情感吗？她们的养父母会像中国父母一样宠她们吗？她们可以像任何一个孩子一样撒娇吗？因为人的过去是不能忘怀的。我对小婉她们忽然生出一份牵挂和担忧，好像我是她们的母亲或姐妹，好像我们有一份共同的历史。

我告别的时候，卡罗要小婉向我说拜拜，她不肯。最后，她把手里啃了几口的苹果给了我。我们都笑了，认为她小小人儿还有些人情味。

## 艺术永恒

前段时间，我给妈妈写了一封信，邀请她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里面也附上了麦丽萨的邀请信，特别注明“邵薇将作为研究生院的两名学生代表之一，出席研究生院和学校的毕业典礼。在全校的典礼上，将由校长亲自授学位。同时出席的，可能还有戈尔副总统，

美驻英国大使，好莱坞导演和曾获诺贝尔奖的校友等”。

可签证官们并没发善心，妈妈仍然没有得到签证。

这一次我真的很悲哀，我的毕业典礼没有一个亲人能来参加，再辉煌又怎样？我不明白为什么妈妈多次被拒签，因为很多人也是在被拒签几次后最终获签。据人们分析，包括一位律师，申请参加毕业典礼不能签到证的人实在很少见。我妈妈就成了其中之一。我认为我妈妈的运气实在很差。

妈妈曾经来信说过，美国驻四川领事馆的一位女领事非常刻薄，对探亲的老人态度也不好。但老百姓也胆小，生怕提意见会真的永远签不着，无法与国外的亲人团聚。只有一位老先生当面顶撞过那位女领事，老人说，美国有什么好，到你这种人的国家我还不想去呢。当场把退还的资料撕了。

而我自己当初签证却格外顺利，尽管我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去的，那位英俊的领事连资料都没详细看就说，你去纽约大学学英文写作？一定了不起。你应该去美国，成为美国公民。

我今年，也是以美国国家利益的名义申请到的绿卡。也许在这样的美国人看来，我还算得上是一个有才能的宝贝。那么，宝贝的妈妈为什么又这么不值钱呢？

我将我妈妈申请签证被拒的事情告诉了麦丽萨，她听了也很生气。我说，我会见一个人说一次，直到我妈妈获得探亲签证为止。

看看周围的人，就知道在美国，参加子女或亲人的毕业典礼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美国人家庭平时亲情淡，可在圣诞节都是尽可能要团聚的，毕业典礼也是要尽量出席的。我的很多同学都是纽约州以外的人，东西南北都有。毕业典礼日期一确定，每个学院就通知毕业生们，参加学院的毕业典礼需要多少票，参加学校的毕业典礼需要多少票。一般学院的票可以要五六张，学校的典礼通常只能要两张。我们作为学生代表可以要四张，可我拿四张又给谁呢？

同学们纷纷订上票，马上寄给家人，一般是父母或给予他们读书有过帮助的长辈或朋友、恋人等。收到邀请的人也会早早订好机票，旅馆房间，一般同学住的地方也很小，家人来大多住旅馆。

纽大的亚洲学生多，尤其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学生。他们的家长来出席毕业典礼既容易，条件也好，也看重这个。内地学生有些也借毕业典礼邀请父母来，但能否来得了还是一个问题。

看到别人都热火朝天地准备毕业典礼，我反倒没事人似的。因为是学生代表，我们的服装也不需要自己操心，照相录像也有专人，事后给我们。加上我也不打算邀请谁，朋友都忙，何必惊动，所以这个毕业典礼我是最轻松的。

我们研究生院新来的院长是一个女强人，我当面戏称她为我们的“第一夫人”，她很高兴。她把我们的学院在著名的肯耐基音乐厅举行的研究生院毕业典礼当作一个重点工程，决心要在学校造一些

影响。所以，在毕业典礼前的那几天，她经常叫我们代表们开会，而且重申，我们这些人要作为学院的形象出席学校的典礼，一定不能有任何差错。她一再重复那些过程，什么时候从座位上站起来，什么时候开始走，走多少秒，到谁面前，然后又如何与她拥抱，听得我们三个学生，一个旗手，一个博士学位代表，一个我，硕士学位代表，个个头昏脑胀。

果不其然，当司仪今天第一个念到我的名字时，我从台上第二排往台前走。按规定，我要先到两位站着的教师处，让他们为穿着学位服的我佩戴上学位帽；然后走到院长面前，和她拥抱，定格，等摄影师照相，再走回来。

我一站起来，我们专业的人就在台下高呼我的名字，而且研究生院这么大，理工科的中国人也多，中英文叫我的名字是很不一样的，有的人还带着小孩子。我赶紧向台下点头示意，飘飘然就直朝着院长走去，张开胳膊要和她拥抱。

院长指着我去戴帽子，我才反应过来，没有帽子还毕不了业。赶紧去戴帽子，偏偏负责戴帽子的两位老师个子矮，我一蹲再蹲，还蹲，他们才把帽子和绶带戴上去。

然后卡萨琳，我们的院长，终于在我折腾出汗的脸上亲了一口，拥抱，定格，照了相。

一回头，我看见金耐尔从他坐着的第一排站起来迎接我，满脸



是汗的我快步跑过去，紧紧和他抱在一起。事后，麦丽萨说：“你和金耐尔拥抱时好可爱哟”，我没有告诉她我还是第一次亲了金耐尔的脸。金耐尔亲我的脸时连声说“祝贺”，我赶紧说“感谢”。



我穿着毕业礼服，手捧鲜花，向未来微笑

今天一早，全校各学院的院长，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集中到华盛顿广场旁边的图书馆八楼，集体吃自助早餐，然后在专人服务下，按学位换上紫色长袍，帽子，领取观看毕业典礼的简易望远镜和毕业典礼的小册子。上面印刷了毕业典礼的议程，来宾名单和各学院的代表们。

9点钟一到，我们就按照指令下楼排队进向广场的典礼台。一出图书馆大楼，远远就见到辉煌的广场拱门上坐着一群乐队，这是纽大毕业典礼的经典节目之一。天晓得乐队人员是用直升飞机送上去的，还是搭着梯子上去的，平时只能看见鸽子在上面飞。走在我们队伍最前面的是穿着方格衣裙的爱尔兰音乐演奏队，我们按照学院名称的字母排行依次进入广场，登上临时搭的台子，整个广场人山人海，各个学院的学生已经按区域站满了人。

学校的毕业典礼比研究生院的又复杂多了。加上戈尔来，我估计我们的校长昨晚一定没睡好觉，不然他为什么发言只说了几句话，时间全留给戈尔。戈尔也不客气，一站起来，就没打算立即坐

下，保护他的特工们也假惺惺穿着我们的紫色长袍。戈尔从昨天宣布离开哥伦比亚电视台的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和电视红星桑菲尔德说起，谈到民主党对美国工会的支持，谈到白宫对世界和平的贡献，谈到他对美国政治的最新见解，最后才谈到我们学校的学生社区服务工作，再最后才从校长手里接过他的荣誉学位。

我早坐得不耐烦了，心想我们毕业干吗听你罗唆。给您个学位就是尊敬您了。我想，台下那些真正的美国人恐怕更不耐烦了，我几次听见有人的嘘声，虽然是个别，但代表了大家的心情。我尤其观察到，站在我们台子后面的特工们，一个个眼睛滴溜转，警惕性高着呢。戈尔一讲完，他们全等在台边，戈尔一走下去，那些特工个个都把我们美丽的校服脱下，随手就留在草地上。

最有意思的是一家祖孙三代纽大校友，孙子今年毕业，爷爷坐着轮椅来祝贺，爸爸多年前毕业，他们的到会让大家感觉很温馨。

学生代表到台前接受毕业典礼仍然按学院的顺序。轮到我们研究生院时，掌声不如有的学院多，比如商学院、艺术学院，他们的本科毕业生多，相比之下掌声也多。硕士博士再多，也不如本科毕业的多。而且本科生大多年轻些，喊声也大。

不过，我们的“第一夫人”自有她的本领。她第一个站到前面，开口发言道，我们研究生院培养的是管理性的人才。今天，您，尊敬的奥利维亚校长在这里给我们的学生授予学位，明天，也许我们

的学生就站在您的位置上了。



台湾朋友王孙专程从台北赶来出席  
我的毕业典礼

我走到台前，接过我的象征性毕业证书后，就与奥利维亚握手准备离开。我曾去过奥利维亚家两次，因为我参加了“校长社区服务队”，他在年终请我们过节表示感谢。所以，今天再次与他见面，他提示我说，别忙走，朝下面的观众们挥挥手吧。

下面的人也累了，每个人走到台前都得拼命鼓掌，所以我也尽量灿烂地笑，手在空中使劲地挥舞，只差没来个飞吻了。

等到该发言的都发言了，该表演的都表演了，司仪宣布结束。这句话一出，台下简直成了舞台，很多人都拿起帽子朝天空抛。

穿着紫色长袍的年轻学生们咕咚咚地跳入广场中心的喷水池，在水花中享受着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快乐。

此刻，家长们，朋友们，老师们都是配角，都是观众，只有年轻人，年轻的心最美。

而我，将把我的毕业照片，放在纽大166届毕业典礼册子里，寄回到我的遥远的家人身边。他们能不高兴吗？虽然没有一个亲人出席我的毕业典礼，但这份纪念册，毕业典礼的录像带里都有我的

名字和形象，他们会得到欣慰的。

因为在这个时刻，我是自己家族的代表，我是我成长的小城的代表，我是中国的代表。

对此，我深深地感激，感谢金耐尔，感谢纽大，感谢生养培育我的这个世纪，这样的时代，社会，所有的缘份……我愿意，我是中国的，正如金耐尔是爱尔兰的一样。

有一次，听加西亚·洛尔卡的作品朗诵。我记住了他说的一句话，诗歌存在于万物之中，无论美的丑的，还是互相矛盾的；问题在于发现它，善于搅动灵魂中那深深的湖水。

是的，搅动灵魂中那深深的水，是一切从事创造的人的责任，不管每个人能趟多远，每一寸距离都令人接近海底。我愿用生命和努力来搅动，来冶炼纯金，来继续写作那首让我梦牵魂绕，花费多少心血仍不得的“长江传说”——河里的水，生命中的血；流动是万物，流动是美……

是的，我们得继续……